

满洲人在东北

(十七世纪)

[苏] 格·瓦·麦利霍夫 著

满洲人在东北

(十七世纪)

[苏] 格·瓦·麦利霍夫著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年·北京

本书用中国文献揭示了满洲国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满洲诸部的聚集史以及满洲人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部落相互关系的性质，阐明了东北的管理制度以及清朝当局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记述了清帝国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国领地的侵略。（原书内容简介）

Г. В. Мелизов

**МАНЬЧЖУРЫ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XVII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4.

内部发行

**满洲人在东北
(十七世纪)**

[苏] 格·瓦·麦利霍夫著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238千字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67 定价：1.4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指使其御用学者，炮制了许多歪曲、篡改中国历史的文章和专题著作。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在1974年出版的《满洲人在东北》就是其中的一种。

作者格·瓦·麦利霍夫，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一个修正主义御用文人，是一个卖力反华的小丑。他在六十年代，曾抛出过几篇与满族或清朝初期历史有关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又拼凑成《满洲人在东北》一书。

这部书摆出一副大架式，旁征博引，大量堆砌史料，书后罗列的书目竟达三百四十多种。从表面上看，作者好像是在搞什么“学术研究”。其实，这完全是装腔作势，借以骗人。该书作者根本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要研究满洲人在东北的历史，而是为着一种明显的政治目的在搞反华宣传。他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明目张胆地歪曲、篡改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的历史，赤裸裸地为老沙皇侵华罪行辩护，并为新沙皇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舆论。

这部书尽管篇幅很大，文字冗长，内容繁杂，但它妄图说明的主要问题不外是：第一，黑龙江流域不是满族的故乡，它“始终处于满洲人实际控制之外”，因而不是中国的领土；第二，黑龙江沿岸地区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直接发现”的“不为人所知的新土地”，“已经在法律上纳入了俄罗斯国版图”；第三，1683—1686年中国清朝政府在黑龙江地区所进行的雅克萨战争是对俄国的“侵略”和“掠夺”，等等。如果把这些问题和苏联政府声明散布的谬论加以对

照，我们就会发现，作者虽然用了很多篇幅，绕了很大圈子，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却是重弹苏联政府声明的老调。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为苏联政府声明散布的谬论制造“根据”和作脚注。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历代史书明确地记载着，满族人的祖先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白山黑水的辽阔富饶土地上。黑龙江流域一直是他们的重要基地。就连苏联近期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从考古材料看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女真人》一文，也不得不承认“阿穆尔两岸，不仅在女真族国家形成和兴盛时期，而且在晚得多的元朝和明朝时代，都住满了女真人”。既然满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黑龙江沿岸，这里当然就是他们的故乡，是中国的土地。所以，当十九世纪中期老沙皇侵占黑龙江流域时，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它（指俄国——引者）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①可是，麦利霍夫竟公开否认这个事实，直接反对恩格斯这个论断。他用了大量篇幅，装模作样地考证什么“满族聚集的土地”，并得出结论说，“满洲人是阿穆尔河上的外来人”，因为清太祖努尔哈齐崛起的基地——建州卫在辽东一带地方，所以辽东一带“才是满洲人的真正故乡”。苏修御用文人用割断历史的手法伪造历史，甚至直接反对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论断，恰好暴露了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丑恶嘴脸。

作者为了“论证”黑龙江流域不是中国的领土，还极力否认当地居民同清朝的隶属关系。中国过去的大量历史文献证明：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已全部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疆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各部已属清朝管辖。可是，该书作者竟胡说什么“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个部落，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既不是满洲国的藩属，也不是他的臣民。这些部落居住的领土，至多不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11页。

是满洲人侵略性袭击的对象”，并胡说这些部落向清朝纳贡，是什么“商品交换”；他们同清朝的来往，“是一般使团往来”，“带有外交关系和对外政治联系的性质”等等。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地捏造说，“现代的黑龙江”或者说“是包括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嫩江流域”，“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也不属于中国，而是什么“中间地带”。甚至说“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的长时期内”，这些地方“事实上尚未纳入清帝国版图”。这种对历史的恶意歪曲和无耻捏造，不仅是为老沙皇侵占中国领土作辩护，而且是在为新沙皇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根据。

这部书虽然题名为《满洲人在东北》，但它的实际内容却是通过歪曲满洲人在东北的历史，歪曲十七世纪中俄关系。这部书把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派出的武装匪徒，入侵黑龙江流域，侵占中国土地，残害中国人民生命的滔天罪行，当成俄罗斯人的英雄业绩，大肆吹嘘。说这些武装匪徒是“新土地发现者”，为俄国“发现”了“不为人所知的新土地”。而对中国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为驱逐这些侵略者而进行的雅克萨战争，反说成是“侵略行为”，是清朝政府“企图用武力把它的控制权扩张到俄国人居住并已开发的领土上”。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说。作者在书中还不厌其详地一一列举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在黑龙江沿岸地区修筑的城堡名字，开列了沙俄武装匪徒斯捷潘诺夫在黑龙江下游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的清单，以说明俄罗斯人对黑龙江沿岸地区“开发的成功”。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列举了侵略中国的据点，摆出了向中国居民勒逼贡税的罪证。

作者声称，“本书基本上是根据满汉文件和资料写成的”，并吹嘘这是该书的“特点”和“优点”。这部书确实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但是，作者并不以这些资料作根据去研究问题，而是任意歪曲这些资料去适应自己的观点。例如：人所共知的柳条

边,是清朝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筑的一条柳条篱笆,目的是用以标示禁区的界限,禁止一般居民越过篱笆打猎、放牧、采人参,它并不是什么国界。可是,作者硬说这就是清朝的北部疆界。中国历史文献只要一提到“边内”、“边外”字样,他就有意地把它译成“国界”以内或以外,并特意用着重字体排印,似乎为他的观点找到了什么“证据”。又如:中国历史文献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遣兵征东海萨哈连部,1617年又招服使犬路。可是作者却极力否认,强调什么“没提到俘虏数字”,“无法想象满洲军队究竟走的哪条路线”,因而怀疑“是否确有其事”。作者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态度是:他可以歪曲利用的,一个字,一句话,都紧紧抓住不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随意发挥;与自己观点不利的,则极力否认,即使一件大的历史事实,也可化为乌有。从作者这种任意玩弄历史资料的卑劣手法中,我们可以看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者”,搞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研究”。

象这样大量地利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来歪曲和篡改中俄关系的历史,在苏修出版的同类书籍中,这还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此书出笼,恰好暴露了苏修的窘境。他们为沙皇侵华罪行辩护的谬论遭到我们有力驳斥以后,自知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于是又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上打主意,妄图把已被批臭了的谬论重新打扮一番,再蒙混一时,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我们将该书翻译出版,作为苏修反华的又一个反面教材,及时给与批判和揭露,粉碎他们反华的新阴谋。

该书作者出于偏见和无知,对书中引用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翻译,以致错误百出,甚至闹出笑话。如康熙皇帝的一份上谕,提到“乌喇别无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讦讼”,而作者竟把它译成“吉林地方暂无军事冲突,当地居民性喜暴乱”。并由此引伸出结论,说“吉林地区的居民根本不是什么‘满洲人’”,

“当地居民对满洲人不怀好感”。中国一位历史学家的文章中说：“清人入关前所并服东北诸部落之位置既明，则其开国初之疆域亦了如指掌矣。”而作者把它译为：清“开国初的边界就象伸开五指的手掌那样宽广”。由于该书引文和原意有出入，不少地方有意歪曲，因此在译稿中无法照填原文。为了便于读者辨别真伪，我们对该书中引用的中文史料，一律按俄文照译，以脚注的形式附列原文，以资对照。

1975年11月

目 录

引言	3
第一章 满洲人对东北各部落和各部族的 军事征伐(1583—1644年)	29
第一节 努尔哈赤对毗邻各女真部落的征服和 统一(1583—1626年)	29
第二节 十七世纪前半叶东北各部落和各部族的分布	52
第三节 阿巴海对东北各部族的军事远征	60
第二章 东北和阿穆尔沿岸地区(1645—1682年)	97
第一节 满洲人侵入中国后东北的状况	97
第二节 阿穆尔河上最初的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和俄罗斯人 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开端	106
第三节 满洲人关于东北的地理概念和清帝国的东北边界	119
第四节 清人和东北当地诸部落的相互关系	138
第三章 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领土扩张 (1682—1689年)	149
第一节 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成就和 满洲军队对阿穆尔河的入侵	149
第二节 解决供应问题的种种困难和满洲人对 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的准备	162
第三节 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和清人在 黑龙江采取的下一步措施	193
第四节 满洲人对第二次攻打阿尔巴津的准备及其 毫无成效的围攻	200

结语	214
注释	227
附录	242
书目	251
人名索引.....	280
地名索引.....	291

引 言

[3]

阐明满族在哪一块领土上进行聚集和满洲人在十七世纪前半叶在远东的军事远征的性质等问题,以及清帝国对东北*土地的兼并史和开发史,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无论清帝国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武装入侵阿穆尔^①沿岸地区的历史,还是1689年第一个俄中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都同这几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

只是在十七世纪,清朝统治者在东北极力继续侵占并侵犯到东北的边界以外的地方时,才同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当时俄国已顺利地实现了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经济开发,并已把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版图。清代中国在上述地区的扩张,从这时起便变成远东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使以后时期俄中关系的全部历史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某些问题,直到现在在专门著作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事实上这些问题还是第一次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在本书中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彻底、圆满的解决。

同时,诸如满族的聚集、满洲人的国家组织及其特有制度的形成,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历史等问题,都需要加以专门研究,因此

* 东北——系指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领土。然而,十七世纪时这些地区尚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十七世纪对该地区不能使用“满洲”这个术语,因为满洲诸部本身当时只占据上述领土的一小部分,用“满洲”来表示这一地区只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据此我们今后只好把“东北”(Северо-Восток)这个术语作为地理概念来使用,但比现今“东北”(дунбай)这个名称,意义要狭窄些。

① 即黑龙江。——译者

[4] 本书没有予以阐述。本书只研究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只研究其领土方面。

本书基本上是根据满汉文件和资料写成的，这些文件和资料可以补充我们前辈著作中所使用过的俄国档案文件的资料。本书所用史料均取自它们的汉文版本。汉语是清帝国三种官方语言之一（与满语和蒙语并列），清帝国出版的每一种官修著作必然有其汉文版本。

正是这些满汉文献资料使我们能够最有说服力地、最完备地描绘出清帝国在远东扩大其政治势力的真实情景。这些新的、首次应用于科学的历史资料 and 文件，不论对进一步研究俄中关系史（更广泛地使用中国文件和资料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还是对研究十七世纪远东各国、各民族政治历史的各种问题，都是珍贵的史料。

* * *

本书所使用的主要中国史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官修的从 1583 年至 1689 年的政府编年史——满清四代皇帝的《实录》，以及收集在《八旗通志初集》和《平定罗刹方略》¹ 两部著作中的官方刊印的文件。

第二类史料是官修东北地方志书——《盛京通志》和《吉林通志》。

第三类包括非官修的、私人撰写的地理志，首先是杨宾的《柳边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以及萨英额的《吉林外纪》和西清的《黑龙江外纪》。

第一类史料中，本书使用的有《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这些汇总于《大清历朝实录》中的记事的书，是各种档案资料和文件的汇编。这部著作是把藏于

盛京(沈阳)皇宫的手抄本之一用照相方法复制成有原书四分之一^[5]大小的印本。它是根据伪“满洲帝国”政府国务院的专门委托,于1937年在日本出版的,共印行三百部。在清帝国选编《实录》资料的工作由专设的机构进行。这一事实证明这一文献资料的编纂方法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反映了官方的倾向性。然而《实录》的浩瀚篇幅以及书中对公文原件的使用,可以使人认为,书中有足够数量的客观报道。例如,编纂《实录》所使用的资料目录中仅在“命将出师、大军凯旋、献俘纳降记”^①的简短的条目里,就包含着记载努尔哈赤和阿巴海²时期对满洲领地周围的北方、西方和东方诸部和对中国所进行的军事远征的广泛而又极其丰富的材料。

虽然在阿巴海时期,满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全部基础均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在记载阿巴海统治时期的《实录》中,军事性质的资料仍然占有最大的比重。军事活动、对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同毗邻各族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满洲第二个汗的活动的全部内容。

在使用这部文献资料时应注意下述情况:远在满洲人侵入中国之前,满洲国政权中央机关的形成便受到了明朝国家机关结构的重大影响。满洲人除了因袭这一机构外,还采纳了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和制度,其中包括纳贡制度。对中国来说,这种纳贡制度是同接壤各民族和远方民族的对外政治联系的唯一形式,它同时也是一定政治观念的产物。在这些政治观念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中国皇帝对邻族拥有无上的权力,中国皇帝把周围世界看成华夷,即由中国本土和它周围的所谓蛮夷组成的独特世界,四周围是特殊的“蛮夷”之地。满洲人也开始希望他们的汗对邻族拥有无上

^① 查原书无此条目。在《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有一条是“命将出师、指授方略及凯旋宴劳书”,在《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有一条是“……献俘纳降”。——译者

的统治权力；用满洲中心主义来代替所谓中国中心主义。与此同时，应该指出，《太宗实录》是在满清王朝定鼎中国之后编纂的，当[6]时满清统治者已采用了中国的全部官方和外交用语。这些用语在上述文献资料中得到了反映。在中国官方公文里，在谈到同东北诸部的相互关系时，开始用“纳贡”关系来表示，这些部落所进方物被看成是他们进献给满洲统治者的“贡品”。

这个相当晚才进入满洲文献中的新用语，同满洲头几个皇帝特意推行的千方百计吸引这些部族归附满洲人的政策精神，显然是矛盾的。其实，《太宗实录》中所说的这种“纳贡”关系，只能是各小民族和部落对满洲人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的表现形式。因此，对满清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稍后时期——顺治和康熙统治时期——的《实录》，包含着极其珍贵的资料，尤其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前半叶清帝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资料。研究者在这里可以找到大量记载满洲人对阿穆尔河上俄国居民点准备军事行动的、以及同签订尼布楚条约有关的各种事件的极为珍贵的材料。这一记述同俄国人相互关系的最丰富的资料汇集，可以使我们能够透彻地研究满洲人侵略阿尔巴津^①的各个阶段。

关于东北、阿穆尔沿岸地区、滨海地区各民族同满清的外交关系的资料，关于这些民族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也具有很大价值。可以断言，满洲人和清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全部最重要的文件，在《实录》里都可以找到。

《大清历朝实录》堪称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除了优点外，也应指出它所特有的某些缺点。在为《实录》选择档案文件时，毫无疑问，是有一定的官方倾向性的，这当然会使这个或那个历史事件的真相遭到歪曲。这部文献资料的这种倾向性，还表现在所

^① 即雅克萨。——译者

收次要资料连篇累牍,而对研究者很有用的某些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皇帝谕旨,反而未被收入。此外还应指出下述情况:《实录》中的资料不是按题材分门别类编纂,而是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³。

所有这些情况,在使用这部文献的资料时,都应加以注意。 [7]

在目前已知的阐述满洲八旗历史的文献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八旗通志初集》。在这部文献里除了根据别人著作编成的材料以外,还包括根据原始资料编的篇章,这种原始资料在目前已知的任何一种历史文献里都未曾发现过。就这方面而言,这部文献是《实录》的极有价值的补充。

记载八旗牛录(汉语为“佐领”,相当于“连”)的形成时间和每个牛录的民族成分的卷3—卷10,记载八旗蒙古的卷11—卷12和记载八旗汉军的卷13—卷16,都具有重大价值。

然而,这部文献的最有价值之处,看来是包括满、汉、蒙各级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传记(近五千篇传记)的极为完备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占该文献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卷129—卷250)。《八旗通志初集》所收的这些传记比收在其他官修或非官修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和传记文献中的详细。这些传记里有一些不见于《实录》相应部分的皇帝谕旨、奏章和地方报告,这对补充说明满洲统治者一系列对外对内政策观点,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这部文献中的传记资料,所收事迹至1735年10月8日(雍正13年8月23日)⁴为止。

由此可见,《八旗通志初集》对我们的题目⁵来说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平定罗刹方略》(共4卷)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史料。所有的版本均未指明它的出版地点、出版时间以及编者等等,因此过去被视为一部匿名作品。目前已有可能查明这部著作的编者和确定其成书年代。根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资料,《平定罗刹方略》的

作者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编纂这部著作是康熙皇帝于1685年10月8日钦定的〔见12，卷122，页4上〕。文中提到的最后事件发生在1690年1月末。

由此可见，该书是在所述事件发生当时，即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编纂的，比《圣祖实录》中相应部分的编纂时间要早。这使人对该文献所引用的资料极为注意。

- [8] 该书对事件的叙述始于1682年9月16日——密派满洲侦察人员郎坦和彭春前往阿尔巴津的日期。该文献的资料是一部与阿穆尔河上军事行动有关的档案文件专辑。其中绝大部分文件，后来都收入《圣祖实录》里了。但是人名、地名的音译没有象《实录》那样得到统一；其中不少文件与《实录》中所收的同一文件在措词上略有出入。对事件的叙述也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这些特征也间接地证实《平定罗刹方略》比《圣祖实录》成书要早，因而使我们在使使用这部珍贵文献的资料时，可把它与前面提及的官修文件和资料汇编同等看待。

应当指出，虽然这部文献在取材方面比《实录》狭窄，但是其中某些文件，甚至康熙皇帝的某些谕旨，却是不见于《实录》的。正是这些资料为满清在阿穆尔河上的侵略历史补充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详细情节。⁶

我们使用的第二类史料是官修的中国东北的地方志书。《盛京通志》是流传到今天的最早的东北地方志书之一。它初版于1684年。尽管书名是《盛京通志》，但是这部官修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却不仅限于盛京地域本土，它还涉及到该书编者所知道的在该区域的全部毗邻地区。该书辟有专章，叙述宁古塔和吉林（卷8）地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684年版本中还没有类似的叙述黑龙江的章节，只是简略地提到了爱浑城堡。

后来《盛京通志》曾多次再版，而且每次都有修改和大量增补。

目前我们拥有 1736, 1770, 1776 和 1782 年刊印的几种版本。1782 年版(最后一版)是“钦定”本,较以前各版篇幅显著增多。这一版本共 45 卷,其中包括首次列入的关于黑龙江的专卷。

这部文献资料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是关于清帝国在东北的国界的部分(卷 8)。我们在考证十七世纪东北的各个地理名称同现代名称是否同一时,广泛地使用了该书中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

该著作各个版本所附舆地图也有一定价值,尤其是比较各个 [9] 版本的地图,可以弄清满洲人和汉人关于东北地区的地理概念的演变情况。

最早尝试摘译《盛京通志》中资料的是俄国汉学家 B. П. 瓦西里耶夫教授〔见 63, 第 1—77 页〕。在 B. П. 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中所引用的资料都有作者的注释。由于对资料进行了精选,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充满了大量的实际材料。遗憾的是, B. П. 瓦西里耶夫的译文没有注明所据原文的页码和卷次。

为了考证东北地理名称,也为了搜集关于该地区居民的材料,我们利用了《吉林通志》这部文献资料。这部志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编成问世。著名的俄国汉学家 A. B. 鲁达科夫教授对这部著作首次作了总的评价,提供了研究此书的书目资料,并且把此书的某些章节译成了俄文〔见 168, 卷 1〕。

在谈到我们利用的第三类史料——私人撰写的地理志——时,首先应该谈谈杨宾的《柳边纪略》。这部著作是少数流传至今的、由汉族流人直接在流放地写成的关于东北的著作之一。

这部文献资料,是关于清帝国东北边疆在不同历史时代(明、清)的各种资料的汇集。这部文献资料是关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前半叶中国东北地区历史和生活的别具风格的小型百科全书,这使我们可以把它同《盛京通志》等量齐观。

虽然这部著作在科学上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在

专门著作中对它的利用要比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少，几乎不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历史和历史地理的人所重视。

《柳边纪略》不仅在许多情况下证实和补充《实录》中可以找到的那些片断资料，而且使这些片断资料系统化，并附有对现代研究者有价值的作者注释。这部文献的资料，毫无疑问，反映了东北在作者为其见证人的那个时期的实际情况。尽管这部历史资料具有[10]局限性，但它对某些问题的精确记载，在很多情况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可以用来作为一些原则性结论的根据⁷。

另一位在东北的汉族流人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是关于宁古塔的不可多得的、饶有趣味的著作。同《柳边纪略》一样，这部史料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趣的详情细节。自B. П. 瓦西里耶夫把这部文献资料译成俄文，俄国汉学家才第一次知道这部著作〔见1〕。

吴振臣的著作包括了关于宁古塔、该地自然条件、居民和居民的风俗习惯等各种各样的资料。在这部文献资料中有流传到今天的、中国著述中关于俄国人出现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最早的报道。《宁古塔纪略》向我们提供了关于当地各部落代表来此“贡貂”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虎尔哈、黑斤、费雅喀来宁古塔主要是为了进行现物交易。这部文献资料所提供的关于这些部落的人种性质的资料也具有很大价值，俄国人种学家在其著作中也使用了这些资料。

这部著作令人感到的唯一“缺点”是简略。就所提供的资料范围来看，《宁古塔纪略》远不及我们上面提到的吴振臣的同时代人杨宾的著作，但比起杨宾的著作，它有一个优点：在很多情况下一些被《柳边纪略》的作者所忽略的问题，在这部著作里都得到了阐述。

西清的《黑龙江外记》于1810年编就，于1894年第一次刊印；萨英颖的《吉林外记》大约于1895年出版。这两部文献资料使人

感兴趣的是它们都收入了一些在官方出版的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属于十七世纪的档案材料。然而这两部文献资料仍然不免有错误。比如《吉林外记》中对宁古塔历史的阐述就有失实之处。

* * *

如果说各种文献资料，如同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为我们所研究的问题提供了最丰富的详尽材料，那么研究这一题材的科学著作却为数甚微。大部分现有著作只涉及清帝国开发东北领土历史的个别方面，或者只局限于泛泛的论述，还没有见到任何专题科学研究专著。

俄国和苏联著作。俄国学者和苏联学者对十六——十七世纪居住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苏联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领土上的部族和部落——其中包括满族——的过去历史的各种问题的研究，注意得较少。无比广泛地进行了研究的只有这些部族的人种学问题，而且在这方面做出了最大贡献的正是苏联学者，其中应该首推：B. K. 阿尔谢尼耶夫、B. O. 多尔基赫、Ч. M. 塔克萨米等人〔见 43；93；94；184〕。

与我们研究的某些方面有关的最早的著作之一——B. 戈尔斯基的《满洲王朝的崛起与最初的事业》一书把满洲人多次对北方和东北方的军事侵袭，十分正确地视为短期的远征，其目的首先是为了捕获毗邻部落的有生力量，然后将其带回满洲国境内，同时也是为了掠取战利品和毛皮〔见 79〕。

二十——三十年代的苏联历史学家的著作，对通俗地阐明俄国人进入阿穆尔河和早期俄中关系历史的问题，作出了重大贡献。属于这方面的作品首先应提到 C. B. 巴赫鲁申的《哥萨克在黑龙江上》和《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概要》，K. B. 巴齐列维奇的《在博格德汗那里作客（十七世纪俄人旅华记）》等著作。但应当指出，这几部著作有些过高地估计了满洲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

的势力。

有不少苏联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接触到俄国东进和早期俄中关系等问题，其中 K. A. 哈尔恩斯基采取了极端虚无主义的立场〔见 192〕。

然而早在 1938 年 Л. И. 杜曼在其著作中，不论对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的领土条款，还是对这个条约在以后俄中关系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都曾作出过准确的评价。Л. И. 杜曼写道：“根据这个条约，达成了划定中俄两国边界的协议，——诚然这个协议是临时性的——并且从俄国领地中割出了阿穆尔地区……俄国政府由于不愿同中国的关系尖锐化，不愿失掉互市的利益，所以做了相当大的让步，把本来不属于满洲帝国的土地割让给它。阿穆尔地区居住着独立的部落，因此俄国征服这个地区，根本没有侵占清帝国的领土”〔见 97，第 2 册，第 2 页〕。

在俄国和苏联学者的著作里，就我们所研究的全部问题而言，给予最大注意的是十七——十八世纪远东各部族的分布情况。在 [12] 这些著作中首先应当指出 Л. И. 什连克院士、B.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和 B. O. 多尔基赫的著作〔见 202; 153; 93; 94〕。

Л. И. 什连克在其著作《阿穆尔边区的异族人》里，实际上第一次再现了基本上正确的十七世纪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民族分布情况的画面。

在 B.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的著作《十九世纪初以前的西伯利亚史概要》和《十七世纪阿穆尔河当地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两书中，这些部族的分布情况完全是根据已公布的俄国档案材料描述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补编》）。

B. O. 多尔基赫在其科学巨著《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氏族和部落的组成》中，把诸如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的《163 年达斡尔、吉切尔、基里亚克地区实物税册》这样重要的、并且以前从

未利用过的资料应用于科学著作，是他的一大功绩。这部实物税册是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势力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民族影响程度的明显证据。然而，Б. О. 多尔基赫步 Л. И. 什连克的后尘，也把吉切尔人说成“在人种上是满洲人的一支”〔见 94，第 557 页，第 558 页；202，第一卷，第 154—155 页〕，对此，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苟同。

Е. П. 列别杰娃的论文《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洲各氏族的分布》阐述了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远东各民族的分布问题。这篇论文是对 1744 年的满文文献资料《甲工固山曼珠穆昆哈拉拜乌赫里额哲赫笔帖》（这部文献资料的汉语译名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的资料的简要叙述。但是只要比较细心地研究一下这部于乾隆皇帝大兴文字狱时期编纂的著作，便可发现该书资料在很大程度上是伪造的。Е. П. 列别杰娃完全不加批判地把这些较晚时期的满洲人贗制品当成反映十六——十七世纪满洲各氏族分布情况的真实材料，是应该受到严肃指责的。Е. П. 列别杰娃在其文章中根本没有试图把文中引用的地名同中国东北的现代地理名称联系起来，也是她的文章的一个缺陷。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撰写了许多著作，其中对我们有用的是他的《满洲人及其语言和文字》一书。这部著作是根据俄国和西欧文献写成的满族聚集史简编。

近几年来，苏联史学界对俄中关系早期历史问题发生了很大^[13]兴趣，而且已经出现了一些研究这一题材的个别方面的成功的专著，其中包括：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的《苏中经济关系概要》、Н. И. 里亚鲍夫和 М. Г. 斯坦因合著的《俄国远东史概要。十七——二十世纪初》、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П. И. 卡巴诺夫的《阿穆尔问题》、Н. Ф. 杰米多娃和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著的《第一批使华的俄国外交官（И. 彼特

林的“手稿”和 Ф. И. 贝科夫的出使报告)》、B. A. 亚历山大罗夫的《俄国在远东边界上》、《十七世纪俄中关系》(1—2 卷)等书,以及 Г. 拉比奇的《论十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问题》、B. A. 亚历山大罗夫的《1689 年尼布楚和约前的俄中经济关系史》、P. B. 维亚特金和 B. C. 米亚斯尼科夫合编的《俄中关系史文件集》、B. C. 米亚斯尼科夫的《关于伊凡·彼特林旅华的新文件》、Л. A. 杰尔鲍夫的《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开端》、H. Ф. 杰米多娃和 B. C. 米亚斯尼科夫合写的《明朝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年代考》、П. Т. 雅科夫列娃的《尼布楚条约签订(1689 年)前后通过涅尔琴斯克^①的俄中贸易》等等。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著作《1689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是根据范围广泛的俄文史料和档案文件(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发表)写成的。对我们的题材有价值的是,该书除阐述尼布楚条约本身的历史外,还阐述了俄国对达斡尔地区和滨海地区的殖民史,以及 1689 年前俄中关系的主要阶段,并就这些问题引用了大量实际材料。

这部著作对这一题材的全部基本问题都作了成功的阐述,这无疑是作者的一个功绩,这一点已被第一批书评作者 A. H. 科佩洛夫和 B. C. 米亚斯尼科夫指出过了〔见 118, 第 177 页〕。

然而应当指出,甚至在这样一部专著中,清帝国在阿穆尔河上的侵略史以及涅尔琴斯克谈判史,也还是阐述得极其简略。毫无疑问,这是由于作者没有掌握满汉方面的材料以及关于到尼布楚条约签订时满洲人对东北领土开发程度的资料而造成的。

譬如,作者甚至对清使臣在尼布楚谈判时奉有什么专门训令 [14] 一事表示怀疑。然而,作者没有能够利用的满文和汉文材料,却提

^① 即尼布楚。——译者

供了许多能够更好地说明涅尔琴斯克谈判过程和满清方面立场变化的新资料。这些文件中所阐明的满清方面的立场较为合乎逻辑,较为合情合理,虽然满清方面并没有改变其极端敌视俄国的掠夺和侵略的本性。

1969年发表了B. A. 亚历山大罗夫的有价值的科研著作《俄国在远东边界上(十七世纪后半叶)》。这部著作完整地再现了俄国东进和俄国移民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外贝加尔地区的经济开发的史实上最完备、最准确的情景,并且最广泛地阐述了十七世纪六十——九十年代俄国的远东政策。

1969年和1972年先后出版了有重大价值的著作《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件》两卷集。H. Ф. 杰米多娃对古文献进行了考订、整理。出自B. C. 米亚斯尼科夫手笔的两篇历史序言,是对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的深刻研究成果,这两篇学术论文中叙述了俄中关系的科学观念。

由此可见,尽管有个别败笔,阐述早期俄中关系问题的俄国和苏联历史文献,显然积累了大量实际材料,并且对这些问题作了基本上正确的阐述。

中国著作。中国作者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的俄中关系,也同样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在早期的中国著作中,何秋涛的著述占有显著的位置〔见240; 241〕。用俄语引用他的主要著作《朔方备乘》的内容,以及介绍此书的基本材料,首次见于H. B. 丘涅尔的著作〔见125,第287—289页〕。H. B. 丘涅尔指出:这部著作“在叙述的完整和详尽方面,在中国文献中占有特殊地位,对研究从早期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西伯利亚历史具有特殊意义”〔见125,第287页〕。但据我们看来,这个评价过高,不能无条件地接受。《朔方备乘》——首先是一部用各种早期历史文献资料编纂成的著作,作者本人的独立研究成果微乎其微。而且只

需对作者所引用的文件和材料略作分析，便可看出，根本不能认为何秋涛不偏不倚，甚至不能说他是一个诚挚认真的学者或者编纂者。

[15] 就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而言，下列各卷具有特殊意义：卷1. 东海诸部述略，卷2. 索伦诸部述略，卷14. 阿尔巴津考，卷15. 涅尔琴斯克考^①。卷1的全部实际材料，都是作者从努尔哈赤和阿巴海《实录》的相应部分中抄录的。作者从上述文献资料中杂乱无章地引用个别片断引文，甚至常常不指出这一或那一事件的发生年代。何秋涛在其著作中得出了下述错误结论：经过他所列举的满洲人的历次突然袭击以后，东海各部落到1642年（即沙尔呼达远征松花江之后）便被满洲人全部征服，而他们所居住的领土则并入了满洲国领土〔见241，卷1（正文）页6下〕。

作者在卷2中把居住在阿穆尔河上、中游地区的所有部族、文献中提到的村落、博穆博果尔族和别的一些氏族，一律不确切地归为索伦各氏族和索伦居民屯落，甚至没有提到这些地方的人种上最稳定的土著居民——达斡尔人。作者在该卷草率地下结论说，所有这些“索伦”部落都被满洲人征服，并且接受了满洲人的各种制度〔见241，卷2（正文），页1上一1下，页6下〕。

卷14的第二部分写的是满洲人准备进攻阿尔巴津的历史，这部分的材料，作者完全是用从各种文献资料（主要是《实录》）中摘录的引文编成的，只是偶而有对文献资料的简略转述，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均未加引号，也没有一行作者注释，同《实录》相比，作者在该卷中引用的材料远不完备，重要事件被遗漏，所引用的史料有时甚至被歪曲。这一部分只利用了《实录》中的一小部分关于八十年代攻打阿穆尔河上的俄国村屯的材料。作者选材是有倾向性的：

^① 《朔方备乘》中原文卷名是：卷一、东海诸部内属述略；卷二、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卷十四、雅克萨城考；卷十五、尼布楚城考。——译者

通常只引用那些正面叙述满洲人政治或军事成就的文件。关于何秋涛编纂书籍的性质和方法，下述事实可略为说明。我们进行的核对工作表明，在卷 14 里何秋涛从《实录》中引用的材料，毫无例外，都不准确。譬如，卷 14，页 23 上—24 上，在马喇 1684 年 6 月的奏疏里，竟有四个错误，还增加了两处《实录》中没有的、来源不明的词句⁸。在页 25 下—27 上，何秋涛引用的康熙皇帝 1685 年 2 月给国务会议成员的谕旨和给阿尔巴津居民的信件里发现有七处疏漏（每处遗漏二——十六个符号），此外还增添了来源不明的词句，随意挪动词语的位置。这样便严重地歪曲了上述文件的内容，^[16]没有将其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

由于引用材料时不加引号，因此作者当然可以认为怎样方便，怎样合乎道德，就怎样处理材料；但是《朔方备乘》作者的这种突出的抄录《实录》材料的作风，却令人难以容忍。何秋涛残缺不全地抄录这些文件，不仅使这些文件黯然失色，而且有时歪曲了这些文件的内容和原义。因此，我们所研究的《朔方备乘》中的这几卷，只可以说是极不完整的材料选辑，简直可以说，研究者使用其中任何一行时，都得核对原始文献资料。

在卷 15 中，虽然何秋涛没有掌握任何实际材料，但却试图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涅尔琴斯克地方早在俄国人占有之前，便已为中国侵占。他声称，涅尔琴斯克地方“本归隶属中国的（ η ——格·麦·）蒙古人所有”，“初非俄人所有”^①〔见 241，卷 15，页 1 上〕。然而这位民族主义情绪极浓的中国作者也不由自主地说走了嘴，指出只是在康熙皇帝对俄国人采取军事行动后，阿尔巴津和沿额尔古纳河的土地才“收入版图”，即纳入清帝国的领土〔见 241，卷 15，页 1 上—1 下〕。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尼布楚城本中国蒙古属地，初非罗刹所有，亦非匪脱之区也。”——译者

《朔方备乘》作者的信条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承认清帝国领有远东全部土地和管辖远东各民族的绝对权力。自然，作者既抱有这种观点，就只能单纯地歌颂满洲人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在阿穆尔河上的军事行动，他根本不认为这些行动是侵略的。

我们之所以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何秋涛编纂书籍的性质和方法，以及他的一些观念，是因为他的著作尽管包含很多实际错误，但到目前为止，仍不失为涉及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领域的中国历史巨著，这部著作直到今天在苏联史料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全面的评价。而且何秋涛的著作在中国和西欧著作中过去和现在一直被毫无批判地广泛使用，很多现代作者把它当作研究的出发点，因而这些作者的观念同《朔方备乘》作者的观念，是完全相同的。

例如，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见 220〕表示完全赞同何秋涛的结论，他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自己的前辈走得还远。顾颉刚把努尔哈赤和阿巴海的一切远征都只看成是征服性的、旨在扩大清帝国（按他的理解，也就是中国）的领土〔见 220，第 291—292 页〕。作者认为单只是满洲人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军事远征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个论点的“证据”，根本无视这些远征的真正目的和性质。

另一名中国历史学家赵泉澄的立场，同顾颉刚的立场完全相同。他书中的一些论点，同顾颉刚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甚至在文字上都完全吻合。

在西方，拥护何秋涛观点的有艾·陈芳芝和文·陈，关于他们的著作我们将在下面详述。

历史学家、国民党的著名国务活动家蒋廷黻在 1932 年于北平出版了《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书〔见 242〕，在这本书里，他对我们所提及的全部问题都谈了不少见解，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值得注意，因为这些问题能够反映国民党的官方观点。作者在该书第一章概述了满洲人向东北北部地区推进的历史，他同样把满洲人

在这一地区的所有军事成就都等量齐观，一概评价为加强了中国的地位〔见 242，第 4—5 页〕。然而在他的结论中却反映出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满清恃其武功而达到的最极边的点是雅克萨城堡，俄人称之为阿尔巴津（?——格·麦·），这个城堡后来成了中俄两国相互抗衡的地方”〔见 242 第 5 页〕。虽然作者过分夸大了满洲人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但同时却承认：“直至康熙 20 年（1681 年——格·麦·），清帝国在东北边境驻扎的边防部队没有超过宁古塔（现名宁安——格·麦·）”〔见 242 第 5—6 页〕。

蒋廷黻指出，在满清文献资料中几乎完全没有关于瓦·波雅科夫和叶·哈巴罗夫的哥萨克队伍出现在阿穆尔河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资料，这证明，这些地区在那个时期尚未引起满洲人的认真注意。作者写道：“被他们（俄国人——格·麦·）骚扰的鄂伦春、达斡尔、赫哲、费雅喀和奇勒尔等人，是否向他们的宗主国求救过？如果求救过，满洲人对此曾作何反应？这些问题由于缺乏历史资料，无从作答”〔见 242，第 7 页〕。

这位国民党作者还不得不承认：“我国（中国——格·麦·）一〔18〕些边民逃往涅尔琴斯克，投向俄国方面”〔见 242，第 10 页〕。这种承认对俄国人进入阿穆尔沿岸地区历史所抱的偏见是一个严重打击。蒋廷黻继美国历史学家 F·戈尔德〔见 311〕之后，也试图支持这种偏见。这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问题：既然哥萨克只是“一味残忍”，为什么当地居民还这样大规模地自愿归附俄国，并且断绝同满洲人的联系呢？

由此可见，无可争辩的真正的历史事实，使得甚至象蒋廷黻这样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满洲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没有实际势力。

徐兆奎所著的那部内容客观、冷静的《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似乎与上述这些充满大汉族沙文主义影响的著作相对立

〔见 237〕。例如，作者完全正确地指出，清人视东北的中心腹地为他们祖宗肇兴重地，但是他们丝毫没有重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他们的反动措施却拖延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使这些地区荒无人烟，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禁止汉人移垦〔见 237，第 8 页〕。作者写道：“〔满洲人〕对明帝国的连年战争，摧毁了辽河流域的农业，从而失去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的任何基地”^①〔见 237，第 8 页〕。

另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莫东寅在其《满族史论丛》一书中，谈到满洲人在他们最初几位汗时期的军事远征时，正确地指出了这些远征所追求的目的是获得贡物，吸引有生力量，掠取大量奴隶〔见 232，第 74 页〕，但绝非为了征服领土。在这位作者的书里，我们还可以找到对明帝国在东北的势力所作的一系列相当确切的评价。

中国历史学家刘选民的著作《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见 230〕专门考证远东各部落和部族，首先是“满族”本身所居住的地点。这是一部到今天仍有其价值的，基本上是认真撰写的研究著作。作者使用的实际材料，都是采自《实录》和范围广泛的各种地理统计方志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材料的处理方法仍是当时中国历史学家所习用的传统方法。作者也把满洲人的军事远征看〔19〕成是为了征服一定领土，在这点上是不能同意他的看法的。根据这些观点，刘选民有时竟试图随心所欲地扩大某些部族，尤其是远离满洲人聚集中心的部族（诸如萨哈连、虎尔哈、索伦等部落）所居住的领土，这不能不引起对这位作者的一些批评。

西欧和美国著作。在西欧和美国的科学著作中，对清帝国在东北进行领土扩张和开发其领土等问题，都没有专门进行研究。

^① 《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中的原文是：“明清在辽河东西战斗长达数十年，戎马蹂躏，城堡为墟。不但摧毁了辽河流域的农业基础，使黑龙江流域的开发失去了很好的基地”（该书第 8 页）。——译者

只是在专门研究满族史和清朝历史的著作中，才能找到对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一般性论述。在这方面首先应提到 J. 罗斯和 H. 贾尔斯的早期著作〔见 336; 310〕。

J. 罗斯完全正确地指出相互独立，并且不受中国势力管辖的女真各部的极端分散性和软弱性。他写道：“在北至宁古塔南起兴京（现名新宾）之间的一百平方英里左右山地范围内，有十一个独立的部^①，满洲人分属其中五部，而其余的任何一个部比这五部〔合在一起〕都要大”〔见 336，第 4—5 页〕。

H. 贾尔斯在谈到满洲人同他们北方邻人的相互关系时，只说了一句话：“到 1625 年努尔哈赤把他的首都移到盛京时，他的国界东达于海，北至阿穆尔河”〔见 310，第 12 页〕。可以认为，这位作者把满洲人的远征看作是满洲国疆界的扩展。

葛斯顿·加恩〔见 282〕在概述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签订前的俄中关系时，曾简略地提到某些问题。作者指出：虽然各自的原因完全不同，但“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不愿在阿穆尔河上打仗，相反，都希望和平”〔见 282，第 24—25 页〕。然而这位严肃客观的作者认为清帝国希望“和平”的这种判断，主要是根据康熙皇帝致俄国的大量修谈爱好和平的外交照会和信件而作出的〔见 282，第 24 页，注 2，第 24—25 页〕。也就是说，作者不由自主地落入清朝统治者所设下的伴和的外交圈套。关于此事，我们将在后面专门加以论述。

J. 巴德雷〔见 280，第 1—2 卷〕在其专门论述俄中关系史的著作中，对领土问题和其他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几乎没有予以任何〔20〕注意。他只是在泛泛的引言里提了一下尼布楚条约和条约签订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见 280，第 1 卷，第 6 章〕。

对蒙古史研究有素的美籍作者 O. 拉铁摩尔得出结论说，在

① 俄文为 страна。——译者

十七世纪前半叶，现今东北的领土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曾属于蒙古各部落〔见 323，第 308—312 页，第 325 页〕。作者认为柳条边“在东部是满洲人和汉人的边界。在西部是满洲人和蒙古人的边界”〔见 322，第 225 页〕。

艾格尼丝·陈芳芝是两篇关于中国边界外交的论文的作者〔见 284，第 99—205 页〕，她断言说，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在俄国人出现在这里以前，仿佛属于清帝国。这两篇论文基本上是根据西欧和美国作者的著作，其中包括 F. A. 戈尔德的著作写成的。所利用的主要史料——《平定罗刹方略》——一书的各段译文科学水平不高，错误百出。在这方面艾格尼丝·陈给文森特·陈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后者在其 1966 年的著作〔见 285〕中承袭了自己这位女前辈的许多论点。

1965 年美国出版的由 J. 费正清、E. 赖肖尔和 A. 克雷格三人合写的关于东亚文明史的著作，对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总原则〔见 298，第 2 卷〕。

J. 费正清（关于中国的相应各章的作者）看来也是从清帝国对“北满当地各部落”享有某种宗主权这个论题出发，认为这些部落在俄国人进攻他们之后，似乎曾向自己的宗主国求救过〔见 298，第 45 页〕。接着，作者断言，当阿穆尔边境上的当地各“通古斯”部落的领袖根特木尔投奔俄国人之后，由于这一地区的事态，清人的不安情绪有了特别显著的增长。J. 费正清写道：“这就提出一个清人须对阿穆尔地区各部落以及该处领土和战略交通要道保持控制的问题。所以，康熙皇帝的目的不仅在于把俄国人逐出阿穆尔河，而且首先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各通古斯部落和蒙古人之间扩张势力”〔见 298，第 46 页〕。

这位美国作者没有把满洲人对阿穆尔河上俄国农业村屯发动的军事行动称为侵略。然而，费正清正确地指出，满洲人只是在十

七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的地位得到巩固之后，才开始有系统地确立他们对阿穆尔河地区的军事控制〔见 298, 第 48 页〕。

这部著作有几段是叙述尼布楚条约的。作者指出，到涅尔琴〔21〕斯克谈判时，清人的地位已因西蒙古人（指厄鲁特人）力量的增强而遭到削弱，这使得这次谈判延期，康熙皇帝也被迫变得较为肯于让步了。但是，费正清无视清使方面施加军事压力这一情况，竟写道，尼布楚条约是两国——俄国和清代中国——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作者说道：“这一条约遏制了俄国向阿穆尔地区的推进，但却向俄国提供了发展贸易关系的稳固基础。戈洛文所获得的东西要比中国人多”〔见 298, 第 48—49 页〕。

关于俄中关系史的西欧专著之一的作者——文森特·陈〔见 285〕的基本观点，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他只不过重复了他广泛利用的 F. 戈尔德、F. 拉文斯坦、蒋廷黻和艾格尼丝·陈等人著作中的论点。这部出版于 1966 年的著作的史料学基础极其薄弱。在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范围内，他基本上只利用了一部史料——艾·陈翻译的《平定罗刹方略》。

遗憾的是，作者在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方面，并没有什么新建树。作者所持的观点是，满洲人远在他们的宗主权扩大到蒙古之前，便确立了对阿穆尔河流域的控制〔见 285, 第 20 页〕。照作者的意见，这是由于满洲人的军事远征造成的，但作者对这些远征的真正目的和性质，却闭口不谈。满洲人对这些遥远领土的征讨次数远比我们在自己著作中列举的要多，然而这些征讨并未导致北方和西北方领土并入满洲国。作者的这个不正确出发的命题，使他继艾·陈之后对十七世纪中叶满洲人国家的领土得出更加错误的结论〔见 285, 第 21 页〕。

文·陈在谈俄国人对满洲人入侵阿穆尔的回击的第 8 章里，极其简略地叙述了 1682—1687 年间发生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事

件。该章同前几章一样，也是根据同一文献写成的，作者在该章中使用了《朔方备乘》的卷首二——《平定罗刹方略》、《清史稿》中的郎坦传和《东华录》中的一道康熙皇帝谕旨。显而易见，仅靠这些文献资料根本不足以在现代历史科学水平上阐明俄中关系史上这一虽然短暂，但却很重要的阶段。

[22] 作为说明作者在写该书这部分时带有偏见的例证，我们只须引用作者的下述论断就够了：“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上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跟满洲人同属一个族系，（?——格·麦·），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是满洲人的贡民……俄国人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对满洲人肇兴之地的入侵（?——格·麦·）”〔见 285，第 76—77 页〕。

作者试图使读者相信康熙皇帝所作的“渴望在阿穆尔河上实现和平”的历次声明，这些声明是清政府为侵占别国领土进行辩护的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对清人似乎致力于和平解决阿穆尔问题这个论题的多次重复，便是为此服务的〔见 285，第 77—80 页〕。

史料基础的狭窄，观点的偏颇，作者对他使用的数量有限的史料所抱的不批判态度，这一切导致文·陈犯了大量史实上的错误。例如，在宁古塔设置昂邦章京一事上，作者重复了《吉林外记》和艾·陈的错误，错误地认为是在 1657 年，而不是在 1653 年〔见 285，第 41 页〕；据文·陈断言，康熙皇帝曾面谕郎坦“察看从宁古塔经乌苏里江到阿穆尔河的水路”〔见 285，第 77 页〕（见我们翻译的 1682 年 9 月 16 日给郎坦的谕旨）；作者完全随意地把阿尔巴津城下的满洲军人数确定为三千四百人，而且还包括有臆造出的一千名来自中国内地四省的炮兵，等等。

日本著作。在日本历史著作中，关于清帝国在东北领土扩张的错综复杂的各种问题，在稻叶岩吉和矢野仁一的著作里都得到了最广泛的阐述。此二人都是研究明、清两代东北的历史和历史

地理的大专家。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 1913 年出版的一部集体编写的很有价值的著作《满洲历史地理》两卷集〔见 265〕。书中的十七世纪东北概要一章，出自稻叶岩吉的手笔。努尔哈赤早期活动的材料，作者只引用到 1616 年为止。这部著作主要注意的是历史地理问题，而不是这个地区的历史。

稻叶岩吉在其巨著《清朝全史》〔见 256〕里所持的见解是，满洲人的多次远征，使他们征服了当地部落，使这些部落居住的领土并入了满洲国。他的这个观点同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观点，基本上相一致。然而，稻叶岩吉断言，满洲人在黑龙江根本没有把^[23]侵占领土作为自己的目的〔见 256，第 2 卷，第 107 页〕。可是在提到文献资料中记载的来自黑龙江的使者入朝清廷的大量事实时，作者却把这些朝见解释为不是外交性的，只不过是当地部落前来表示承认他们从属于满洲人。在稻叶岩吉的著作中还屡次出现似乎清人早在崇德年间（1636—1644）就已征服了黑龙江的说法〔见 256，第 2 卷，第 116，121，137 页〕。

提到这个问题时，稻叶岩吉还错误地阐述了清帝国于八十年代在阿穆尔河上发动的军事行动。作者竭尽全力为这种侵略行径辩护，虽然他同时也承认，俄国农民曾在阿穆尔河上进行垦殖，俄国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土著居民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例如，稻叶岩吉写道：“俄国人趁着清人放松对北部边界注意的时机，逐步征服了周围的通古斯部落，到 1671—1672 年间已把大批农民迁到阿尔巴津附近，建立村庄，开垦土地”〔见 256，第 116 页〕。作者列举了从 1667 至 1682 年在阿穆尔河和结雅河^①流域建立的俄国城堡之后，指出，这样一来，“俄国人便布满了阿穆尔河的整个左岸”〔见 256，第 117 页〕。正如我们所获得证实的那样，这位日本史学家的

① 即精奇里江。——译者

立场相当明确，虽然并不总是合乎逻辑和始终一致的。

稻叶岩吉在另一部关于东北经济发展史(包括从秦、汉两代起的该地区的历史)的著作《增订满洲发达史》里，用了第6章一整章和第8章的几节来写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期。

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关柳条边的部分(第8章第5节)。据作者看来，他所描述的这个庞大的防御工事体系的唯一作用只是阻止一心想开发边区的汉族和平移民进入东北。实际上，柳条边的主要作用在于保卫满洲人在东北的世袭领地免遭朝鲜人从东方、蒙古人从北方的侵犯(以及这些民族一般进入该地区)，关于这一点，矢野仁一的想法是比较正确的。

矢野仁一在其大量著作中〔见277—279〕所表现的总的立场，基本上与稻叶岩吉的观点一致。然而在一系列情况下，特别在其比较晚期的著作中，矢野仁一作出的评价要清醒得多。我们看到，^[24]他对我们所研究的某些问题的观点有一定的进步，例如，在《清朝史》〔见279〕一书中，作者指出，由于满洲人同邻族多次进行战争的结果，征服瓦尔喀部是在攻克熊岛之后完成的。同时，他试图肯定，似乎同索伦人的几次战争导致了清人对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其中包括它的左岸地区的统治的确立。矢野仁一写道：到俄国人出现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时，分散居住在这些地方的所有达斡尔人、索伦人、鄂伦春人、额登喀喇人以及其他打牲部落似乎承认了清人对自己的主权，并且向清人缴纳一定的贡品〔见279，第104页〕。

第4章第14节专门记述清人和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上发生的冲突。作者在这里带着相当深的偏见评述了俄国向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沿岸地区殖民的主要阶段和在阿穆尔河上发生的最初几次军事冲突。作者毫无根据地把涅尔琴斯克地区看成是属于清帝国的地区。因此便说，根据尼布楚条约清帝国把这些领土割让(了)给了俄国〔见279，第263页〕。

遗憾的是，在矢野仁一的这部著作以及其他著作中，都没有任何解释、考证、评注等研究资料，因此很难断定他是根据哪些历史事实得出这些或那些结论的。

作者在另一部著作《满洲国历史》〔见 278〕中，当谈到满洲人在东北扩大势力的情况时，已经指出，这种情况的发生仅仅是由于清人准备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战争的结果。但作者继续把俄国人进入阿穆尔沿岸地区看作是对清帝国领土的侵略，他也跟着稻叶岩吉重复，仿佛当地居民曾向清朝求救以抗击俄国人的论调〔见 278，第 222 页〕。尽管如此，矢野仁一并不象稻叶岩吉说得那样绝对。他在这部著作中的立场是矛盾的：一方面承认清帝国在阿穆尔河上的某些权力，另一方面又承认阿穆尔地区属于俄国〔见 278，第 222 页，第 223 页〕。

矢野仁一歪曲了满洲国东北边界的形成情况。他写道，由于同俄国的军事冲突的结果，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似乎“清人领有整个阿穆尔河流域及其毗连地区的权力得到了承认”。同时他仍然断言，似乎“根据这个条约，清帝国把涅尔琴斯克地区割让给了俄国”〔见 278，第 223 页〕。

在这部著作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论述柳条边及这堵防御墙的作用。作者是把柳条边看作防御墙的。

在 1935 年出版的作者与稻叶岩吉合著的一部著作里〔见 [25] 259〕，谈到了第一批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的特出的英雄主义和顽强精神，并且对俄国人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规模，也作了应有的评价〔见 259，第 523—528 页；另见 277，第 47—58 页〕。矢野仁一指出，康熙皇帝的敕令，承认俄国人占有阿穆尔河的事实。因此，作者便说俄国向清帝国割让了一些领土〔见 259，第 531 页〕。在这部著作中，这位日本历史学家明确地指出，他认为，涅尔琴斯克“并非清帝国的领土”〔见 259，第 532 页〕。

矢野仁一在 1941 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写道：“根据尼布楚条约，涅尔琴斯克〔地方〕留给俄国。从索额图所采取的立场来看十分清楚，涅尔琴斯克地方并未纳入〔清帝国〕版图。当俄国人占领该地时，清人的军事势力尚未达到那里”〔见 277, 第 62 页〕。日本作者已经利用了伊·米洛万诺夫和尼·斯帕法里的材料来证实这一观点〔见 277, 第 62—63 页〕。

对我们来说很清楚，矢野仁一观点的上述进步，其原因是他熟悉了范围比较广泛的历史资料。然而，这位日本历史学家并未能够彻底地克服束缚他的传统观念。

伊藤义一于 1942 年出版的《满洲史概观》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带有很大偏见的著作〔见 262〕。诸如“俄国侵略西伯利亚”，“侵略阿穆尔河”一类的辞句在该书中比比皆是。该书对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只作了简短的一般性概述。

凡是涉及到我们题目的某些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其范围已概如上述。我们在上面对这些著作所做的简要评述，据我们看来，可以使人断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研究者中间对上述一系列问题，至今不但没有共同的意见，而且对同一历史事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相互排斥的评价和解释。之所以存在这些严重分歧，除了其它原因外，首先是由于这些著作缺乏史料基础和它们的作者不了解关于这个题目的主要满汉文史料所造成的。所列举的大部分著作的最普遍的特点是，没有能够充分利用中国史料来阐明所研究的题目。

第一章 满洲人对东北各部落和 各部族的军事征伐 (1583—1644年)

第一节 努尔哈赤对毗邻各女真部落的 征服和统一(1583—1626年)

到十五世纪中叶,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已最后稳定下来,沿着边界修起一条防御工事带,即著名的明代辽东边墙。

明代辽东占有现今中国东北的南部,主要是今辽宁省领土。它的边界从山海关伸向东北,经过今开原稍北的地方,转向南,到今抚顺市,然后偏向东南,到达鸭绿江(朝鲜语为阿母诺坎江,此江是明帝国和朝鲜的边界)。辽东居民过着定居生活,从事农业。他们是汉人,多是来自山东和华北其他省份的人。

明帝国边界以外的东北领土,在十七世纪前半叶有将近一半是属于南蒙古和东蒙古各汗国的〔见 323, 第 308 页—312 页, 第 325 页〕。除蒙古人外,在东北还住着为数很多的人种成分各不相同的部族和部落,这些部族和部落在明代史籍中称作女直(女真),或者照“女”这个象形字的第二个读音“汝”,作汝直(汝真),即朱里真^①。然而应当指出,十五——十七世纪的明代作者把远东这部分的所有居民统统称之为女真人:其中包括女真人本身、鄂温克

^① 《柳边纪略》中解释说:“女真本朱里真之讹,后遭契丹兴宗名改为女直。”
——译者

人、达斡尔人、索伦人、那乃人、尼福赫人、乌德盖人，等等。

中世纪中国作者把东北女真分为三部：建州和毛怜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建州女真所居住的地方在明代建立的所谓女真[27]“卫”之一的境内，这些卫都由当地首领管理¹，因此，文献资料中的“建州卫”这一术语是完全合理的。至于“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他们只不过是表示东北居民的两大类而已。

十七世纪初，女真各部本身基本上分为三个大的部落联盟，加入这三个联盟的部落之间的同盟关系具有不同形式。女真各部的基本核心是血缘相近的建州女真（“满洲联盟”）²和海西女真（所谓扈伦联盟）³。这两个联盟包括了定居在明代辽东边界附近的许多小城镇和村落里的女真人。这些女真部落自古以来便熟悉耕作和各种手工业，并受到近邻——明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他们同中国保持着极其频繁的经济和政治联系，是中国的名义上的藩属。在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诸部落稍东一点的地方，分布着第三部女真——即所谓长白山联盟的女真部落。

这几部女真部落，较之他们北方和东北方的邻人，处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他们正经历着原始公社关系解体和封建关系形成的时期；在这些部落里首领（酋长）的世袭权力已经显著地固定下来了。

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作者的著作中，“野人女真”系指居住在现今东北和阿穆尔沿岸地区领土上的大批小部落和部族，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任何政治联盟，而且在人种方面与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不同。这是鄂温克和通古斯-满洲系统的部族和部落——即今之那乃人、达斡尔人、尼福赫人、奥罗奇人、吉切尔人（虎尔哈人）和其他民族的祖先。除吉切尔人和达斡尔人外，这些民族都过着游牧生活，主要从事渔猎。吉切尔人和达斡尔人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和阿穆尔河流域。他们聚居的村庄都相当大，除渔猎之外，

他们还从事最简单方式的耕作〔见 232, 第 82 页〕。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 所有这些部落还保留着氏族制度, 只是在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那里氏族制才开始解体。远东诸部落具有高度发展的独立发展起来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见 154〕, 他们是现今苏联远东各小民族的祖先, 而在十七世纪他们成了南方的, 即满洲的各部落〔28〕的侵略对象。

据《满洲实录》——满洲起源的史料——记载, 在明代辽东的东北部和东部边界外居住着满洲、苏克苏浒河、浑河、完颜、董鄂、哲陈、哈达、叶赫和辉发等女真部落, 满语统称之为艾马尼, 意即盟、氏族或部落。《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在这个曾经进犯努尔哈赤部(顺便指出, 这部史料里已把努尔哈赤部称为“满洲国”)的各个部落名单里, 又增加了长白山的王甲、讷殷、朱舍里和鸭绿江等部落; 东海的窝集、瓦尔喀和虎尔哈等部落〔见 25, 卷 1, 页 2 上—3 上〕。由此可见, 满洲史料根本没有反映上面提到的汉人把东北女真各部落相对地分为三部的分法。还必须指出, 上面列举的部落中没有一个称作满洲。满洲编年史使用的“满洲国”这一名称, 毫无疑问是后来起的现代化名称。取了这样一个名称的努尔哈赤部, 在当时只不过是许多建州女真小部落之一。这个部落分布的领土面积不大, 这使我们完全同意刘选民和其他作者得出的下述结论: 这个部落人口不多, 力量孱弱, 最初它在毗邻女真诸部落当中所占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见 230, 第 135 页〕⁴。

我们在上面所列举的部落和氏族乃是被成吉思汗征服后散居各处的残存的女真人⁵。

说到这里应当指出, 满洲统治者氏族, 根本不象后来满洲汗所企图说成的那样, 是金帝国统治者的皇族后裔, 它与金皇室没有丝毫关系。金帝国被征服时, 金皇室的后裔和旁系亲族, 都被蒙古人斩尽杀绝了。

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前，辽东女真各零星小部落和氏族之间不断发生内讧，这是这些部落的先前氏族关系解体和阶级社会形成的结果。《满洲实录》写道：“彼时遍地骚乱……凶徒、盗匪蜂起，僭号称汗、贝勒、昂邦、噶珊⁶，人人〔竟〕当最高统治者，而穆昆⁷，则自称首领，相互攻击，同胞兄弟、旧日同道相互残杀，强族以暴力凌逼弱者。到处一片混乱”^①〔转引自 232，第 83 页〕。

由此可见，开始于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的满族聚集的客观过程，是在女真各部分崩离析和内讧频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最重要的表现便是这些部落之一——满洲——的逐渐强盛和将同一血缘关系的邻近建州各部落统一于自己的庇护之下。满洲的首领是天才的军事首领和大国务活动家——努尔哈赤。

下面将要提到的努尔哈赤的家谱，在事实上是真实可靠的，它已剥去了后来加上的宗教神秘色彩⁸。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个上溯到明初的家谱，起源于一位有影响的女真领袖孟哥帖木儿，十五世纪一开始，明帝国便想方设法试图促使他归附自己方面〔见拙著论文 141〕。从母系方面，即从他的母亲宣皇后方面来说，努尔哈赤乃是另一位重要的女真首领——王杲的外孙〔见 256，第 1 卷，第 53 页；232，第 88—89 页〕。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部（满洲国）究竟分布在何地？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实录》记载得十分具体：“都督兴祖直皇帝六子分居六城，人称六王或六祖。距赫图阿喇城，远者不过

① 《满洲实录》中这段引文的满文作：“那时，处处国乱……贼盗如蜜蜂，纷纷而起，自称汗（han）贝勒（bcile）大人（amban），每嘎山（gasan）立为领主，每木昆（mukun）立为长，互相攻打，兄弟同志相杀，族多力强者征伐弱者，甚乱”（见莫东寅著《满族史论丛》，第 72—73 页）。《满洲实录》中这段引文的汉文为：“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窝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呼伦国中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见《大清历朝实录》第一帙，《满洲实录》，卷 1）。——译者

二十里，最近者不过五、六里”^①〔见 25，卷 1，页 10〕⁹。

为了对这些地方有个具体概念，我们在此引用曾经亲自到过这些地方的 J. 罗斯的描述。这位英国作者写道：“赫图阿喇谷地，由西向东伸延七英里（一英里等于 1609 米——格·麦·）偏向东南方。东部最宽处近二英里。在周围群山中，它是最大的谷地。其余谷地——在它北面、南面和东面——都很狭窄，只是山坡之间流水汇集的河床而已”〔见 336，第 738 页〕。

中国历史学家刘选民和日本历史学家稻叶岩吉对六座城池（包括赫图阿喇在内）的所在地，做了细致周密的考证工作，其结果令人非常满意〔见 229，第 131—135 页；273，第 1—18 页；256，第 1 卷，第 78 页〕。这六座城池都位于东北境内，在苏克苏浒河（即今苏子河，为浑河左岸支流）上游及此河各条支流流域、抚顺市以东的地方。

上述“六祖”之中，景祖逐渐强盛。据史书记载，其子礼敦征服〔32〕了“居住于五岭山（‘五座山岭’）¹⁰ 迤东、苏克苏浒河迤西二百里、直至明辽东边界为止的各个部落，从此，‘六王’便强盛起来”^②〔见 25，卷 1，页 2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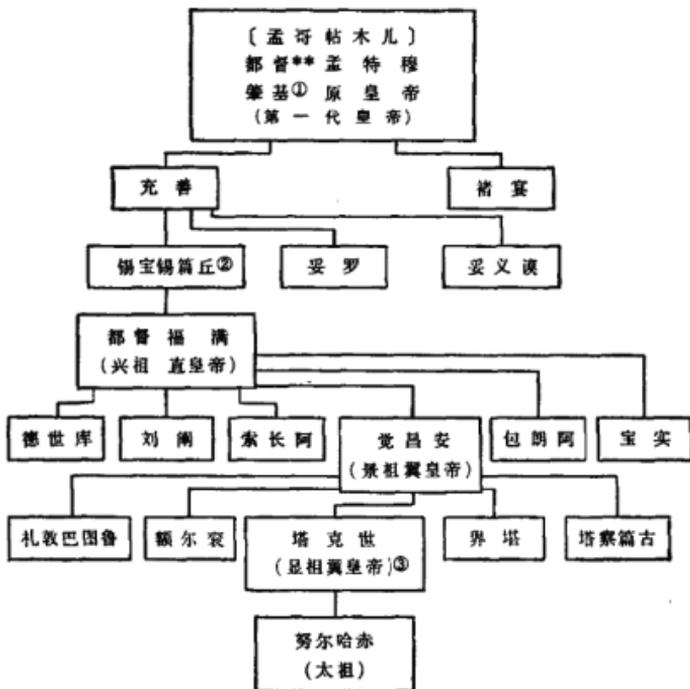
这五座山以东的土地和苏克苏浒河上游地区，便是“满洲国”在征服毗邻各部落以前的领土。这块领土才是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努尔哈赤以及后来他的继承者阿巴海所发动的历次征服战争，都是在满族聚集时期进行的。然而这个问题是专门研究的题目。本书的目的，只是确定满族是在哪块领土上进行聚集的。

① 《清太祖武皇帝尊号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都督生六子……六子六处，各立城池，称为六王，乃六祖也（夹注：五城距黑秃阿喇，远者不过二十里，近者不过五、六里）。”（1932 年，故宫博物院版，卷 1，页 1 下）。——译者

② 《清太祖武皇帝尊号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其子李敦又英勇，遂率其本族六王将二姓尽灭之，自五岭迤东、苏苏河迤西二百里内诸部尽皆宾服，六王自此强盛”（1932 年版，页 2 上）。

努尔哈赤家谱
 据《大清历朝实录》资料编制*

[30]



在努尔哈赤征服的第一阶段(1583—1589年),被征服的是所谓满洲联盟的邻近部落¹¹。1583年,努尔哈赤联合起他的为数不多的拥护者,开始实现宿愿:向杀害他亲人的凶手复仇。他总共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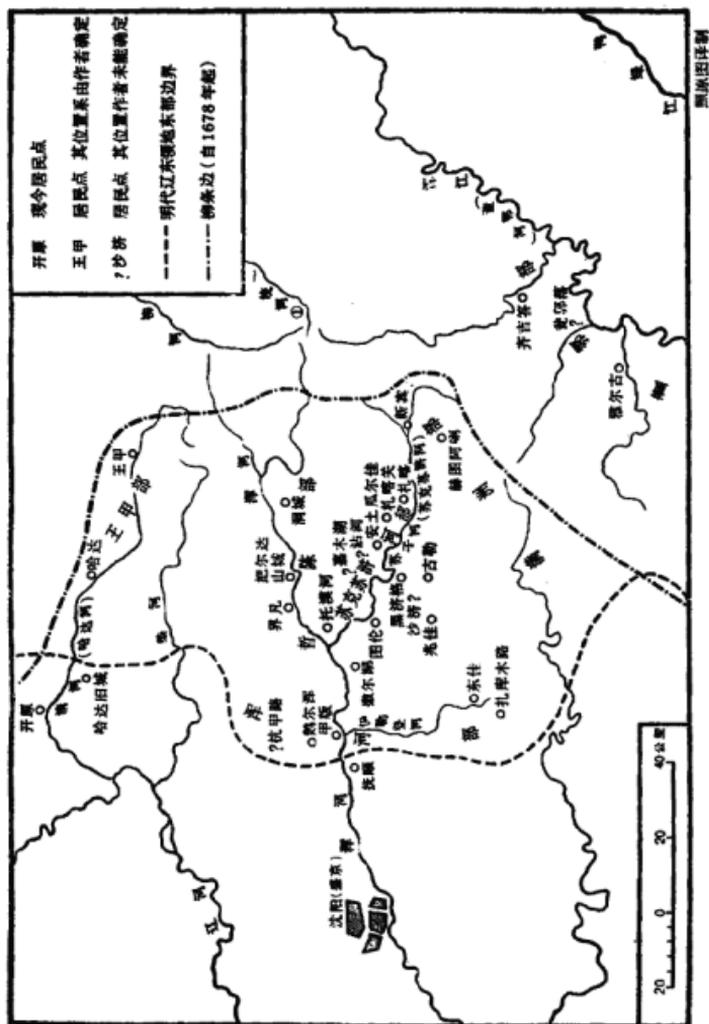
* 本家谱系采自莫东寅著作[见232,第39页]。

** 都督这一封号,是明朝统治者授予向帝国表示“忠顺”,即向明朝廷进贡的女真各部首领的;用于这些首领身上则表示“大领主”之意。都督是满语“贝勒”的同义词。

① 原文如此,按应为“肇祖”。——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应为“锡宝锡篇古”。——译者

③ 原文如此,按应为“显祖宣皇帝”。——译者



地图一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洲联盟各部领土分布图②

- ① 据地图,此河疑为“三统河”之误。按“一统河”,亦名伊通河(伊屯河),当在今吉林省境内。——译者
- ② 此图地名的译名系来自《清太祖努尔哈齐实录》(1931年,北平故宫博物院版)中的地名。——译者

领十三名披甲兵，便向尼堪外兰的驻地图伦城发起进攻，拿下该城，但却未能捉到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实录》对这场斗争的所有起伏波折都叙述得极其详细，提到了大批这一地区首先遭到努尔哈赤进攻的部落居民点的名称。这使我们可以考证出每个部落所占的领土。

以后对苏克苏浒河部进行了征伐。苏克苏浒河部分布于苏克苏浒河下游至该河注入浑河处的一带地方，北与哲陈部为邻，西南与浑河部接壤（见地图一）。

1585年5月，还在征服苏克苏浒河部以前，努尔哈赤便对哲陈部进行了首次征伐〔见25，卷1，页7下〕，1587年便已完全征服了该部。哲陈部分布于浑河上游流域，在鄂尔多峰以南，五岭山以北的地方。它最近的邻部在北面是王甲部和哈达部，在西面是浑河部；在南面它的领土与苏克苏浒河部领地毗连。

1586年6月，努尔哈赤一举攻下尼堪外兰藏身的鹅尔浑城。根据努尔哈赤的进军路线，可以推断出，这座小城位于托漠河西北，距甲版城（可能在该城以北）和明代辽东边墙不远〔见25，卷1，页8上〕¹²。

[33] 鹅尔浑攻陷后，尼堪外兰逃往辽东，但中国边防官员将他交给努尔哈赤，于是，努尔哈赤立即处死了这个敌人。

1588年，董鄂部两名头领自愿归附努尔哈赤〔见25，卷1，页8下〕，此后整个部便并入了满洲。

董鄂部居住在董鄂河（今浑江）及其许多支流流域。该部领土西与努尔哈赤部领地接壤，在远离该部的北面是辉发部居住地，在南面是长白山鸭绿江部的领土，而在东面是讷殷部。

在1588年同一年，苏完部^①酋长葛尔气自愿归附努尔哈赤〔见25，卷1，页9上〕。由于原始资料没有任何有关该部城乡的记

^① 在《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作“酸”部。——译者

载,所以该部分布地区未能最后确定。

同一年,努尔哈赤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人少力薄的王甲部。王甲部分布在哈达河上游(今清河上游)——阿济纳河流域,杏岭以南、鄂尔多峰以北的地方〔见 230,第 148 页〕。

同一年,最后征服了在此之前仍处于努尔哈赤势力范围之外的几座浑河部的城堡和村庄:兆佳、杭甲路、扎库木路和东佳〔见 25,卷 1,页 9 下〕。

浑河部在浑河流域以及从伊勒登河和苏克苏浒河汇合处起^①到明边墙的伊勒登河流域。该部东邻苏克苏浒河部和哲陈部,北接哈达部;在西面和西南面它的领土止于明边墙。

由此可见,到 1589 年,努尔哈赤已统一了分布在原建州卫境内的所有部落¹³。在努尔哈赤征服上述各部落的这个阶段里,在文献资料中还没有关于把被占领城镇居民迁移到努尔哈赤部领土上的任何记载。显然,这些部落的土地已被认为完全征服,并已并入满洲领地之内了。然而,在文献资料中也没有提到在相邻诸部并入之后,满洲领地的任何固定边界。

满洲联盟的领土,应该被看作是东北女真各部落——稍后,在 1616 年起自称满洲——进行聚集的主要领土,这块土地才是满洲人的真正故乡。满洲人在这一时期,充当着朝鲜和中国同蒙古人和北方各部落之间贸易的中介人,从中获取相当丰厚的利益〔见〔34〕25,卷 1,页 8 上——8 下〕。

由于满洲人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很大一部分满洲居民——职业军人——的生活多半靠军事缴获,即靠掠夺邻近民族来保证。这种掠夺的规模越来越大。满洲对邻部的侵犯,激起反击性的惩罚措施;产生了几个旨在反对这个侵略成性的邻居的部落联盟。

^① 原文如此。按伊勒登河向北流入浑河,并不与其东部的苏克苏浒河汇合。
——译者

于是满洲不得不保卫自己的边界。从 1589 年至 1619 年，满洲与它的四邻的战争接连不断，战争的结果使它逐渐强大起来，成了满族形成的中心。

与此同时，由于侵略战争次数的增多，“正规”军队也逐步得到扩充。后来靠从满洲领地界外的领土上捕获并迁入当地部落居民的办法，顺利地解决了扩军任务。由于战败者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同满洲人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绝大部分都同意留在满洲人这里，并在其军中服役。为这类新移民在新地方安家落户，创造了必须的条件；他们所享受的权利与本地居民完全平等，这是满洲汗为招抚这些部落所奉行的国策的固定不变的基础。由于推行这一政策，便顺利地解决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自我强大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新的满洲国是紧靠着明代中国的边界建立的。同时，由于上述历史原因，满洲对自己的邻居继续推行侵略政策的意图，也是十分清楚的。

现在我们先继续谈与满洲强盛有关的后来发生的事件的历史。

在努尔哈赤进行征伐的下一阶段（1589—1599 年）里，征服了所谓长白山联盟的各个部落：鸭绿江部、讷殷部和朱舍里部。前两部的名称源于河名。朱舍里这个名称的来源未能确定¹⁴。该部落的居住地点，由于缺乏具体资料，很难考证。刘选民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看法，认为这个部落分布在塞朱伦河流域，位于讷殷部之东，瓦尔喀部之西〔见 230，第 154 页〕。

1591 年，努尔哈赤发兵往征鸭绿江部，当年即已完全征服。该部分布在鸭绿江两岸，从明边墙以东至宽甸城地区的六个关隘，这可以证明，该部只能是源于朝鲜族，而不会是源于女真族。

1593 年，扈伦联盟四部、长白山联盟二部和三个蒙古盟的军 [36] 队征讨满洲领地，即所谓“九部”之征。然而，尽管敌人在数量上占

队把当地居民大规模地迁徙至建州领土的资料。

1598年2月，努尔哈赤遣其军事将领率兵一千往征瓦尔喀部安褚拉库和內河地区〔见25，卷1，页12上〕。这是文献资料中首次记载的满洲人对瓦尔喀部的远征。

由于粉碎了“九部”之征和征服了长白山三部，满洲领地在女真各部中间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此之后，女真进一步聚集和在他们基础上形成满族的先决条件便具备了。到这一时期，满洲已颁行自己的文字——满文(1599年)，这也是以后统一事业中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对满族的军事和经济聚集来说，施行和推广“旗”(军团)的制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满洲旗组织的基础是1601年奠定的，那时努尔哈赤为了巩固和整顿自己的武装力量，取消了从前按部落和氏族特征建军的原则，建立起一支置于统一指挥下的、分成黄、白、红、蓝四“旗”(军团)的军队。每个军团设一总指挥官，称固山额真(满语词“固山”——意为“旗”，“额真”——意为“主，长”)。旗下又分所谓的牛录，或尼录(相当于“连”)，每牛录有三百士兵。这一时期，一个军团由三十个牛录组成。

[37] 牛录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成员不仅是三百名士兵，还包括相当数量的工匠：铁匠、兵器匠、雕刻匠、鞍匠、铜匠；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编入牛录的还有士兵和工匠的家属、他们的家仆和奴隶以及大量的主要从事农业的农奴。由此可见，牛录不仅是基层军事单位，而且也是正在形成的满洲国家政权行政机构的基层经济单位¹⁶。

在女真各部落分散的条件下，“旗”和牛录制度是最恰当不过的组织形式。每次“满洲”征伐某部落掳来人员，只编成一新牛录，隶属某一旗¹⁷，这个牛录照例仍归这个被征服的部落或氏族的首领或酋长统辖。从这时起新被征服者便完全享有满洲“原有”居民的一切权利和特权。

关于多次迁徙所捕获的居民和将其编入满洲八旗牛录之事，努尔哈赤后来征伐所谓扈伦联盟各部——哈达、辉发和乌拉的战斗史可以证明。同这些部落的战争，标志着努尔哈赤统一相邻女真各部落活动的新阶段——第三阶段(1599—1614年)的开始。努尔哈赤在这一阶段的基本目的，是进一步巩固满洲领地在人多势众的相邻女真各部之间，首先是在扈伦联盟各部之间的地位，并从这些部落掠夺有生力量和战利品。

明代史籍把扈伦联盟各部按其居住地划为所谓海西女真〔见31,卷3,第43页;232,第73页〕。

哈达部由哈达河得名,该部分布在此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住在柴河流域,在明边墙的威远堡以南。在明代,该部居住地被称为南关〔见31,卷2,第36页;16,卷8,页3下〕。该部的紧邻在南面是浑河部和哲陈部,北面是叶赫部,东面是王甲部。在西面,该部土地伸展到辽东边墙(见地图二)。

1599年10月,在哈达部领土中心——哈达城下,经过七天激战之后,该部终于被征服。继哈达城失陷之后,该部土地上的所有城镇,都自动向努尔哈赤归降。据史籍记载:“〔该〕地〔居民〕尽被〔38〕俘获,〔满洲军队〕方回”^①〔见25,卷1,页1下〕。

征服哈达部以后,努尔哈赤把主要注意力转向辉发部。该部名称来源于辉发河,该部就居住在辉发河流域〔见25,卷1,页3下〕。它西邻王甲部和哈达部,东北面是乌拉部的领土,东南面是纳殷部。

努尔哈赤军队于1607年10月29日出征辉发部,辉发部首领拜音达里父子在战斗中被杀死,军队溃散,该部主要城池——辉发

^①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记载是:“哈达国所属之城,尽招服之。其军士器械、民间财物、父母妻子,供秋毫无犯。尽收其国而回。自此,哈达国逃亡”(1932年版,卷2,页1下)。——译者

城也被攻克。努尔哈赤得以招服当地居民。从此，辉发部作为独立领地便不复存在了〔见 25, 卷 2, 页 3 下〕。

在努尔哈赤征伐乌拉部之前，文献资料中提到努尔哈赤军队于 1607 年摧毁瓦尔喀部的蜚悠城之事。努尔哈赤利用蜚悠居民对统治他们的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的不满情绪，派遣他的将领洪巴图鲁和济尔哈朗^①去“保护”该城。他们从蜚悠城带回五百户居民及其全部财产，交给努尔哈赤〔见 25, 卷 2, 页 2 下〕，实际上是把该城劫掠一空¹⁸。

与消灭蜚悠城同时，努尔哈赤还向位于该城西北面的窝集部发动了几次征讨〔见地图三〕。第一次征讨是在同年 6 月对窝集部的赫席黑、俄漠贺苏鲁、佛讷赫挖克索等三个地区的征讨。努尔哈赤军队在此俘获二千人而还〔见 25, 卷 2, 页 3 下〕。

1608 年 4 月，努尔哈赤令其将领带兵五千往征乌拉部。据《吉林通志》记载，乌拉部南界与辉发部相邻，西南界几乎至苏完部，东部的自然边界是西老爷岭，或者是较远的张广才岭〔见 24, 卷 12, 页 6 上; 230, 第 158 页〕。

努尔哈赤军队包围了宜罕阿麟城，并将其攻克。文献资料记载：“被杀者过千人（1——格·麦·），掳获铁甲三百副及全城居民”^②〔见 25, 卷 2, 页 4 上〕。在以后四年内，努尔哈赤没有再去征伐该部。

1610 年 1 月，努尔哈赤往征窝集部的渚野路，据满洲文献资料记载，掳获并带回满洲二千余名俘虏〔见 25, 卷 2, 页 4 下〕。

1610 年 12 月，努尔哈赤命将领额亦都带兵一千出征窝集部 [39] 的那木都鲁、绥分、宁古塔¹⁹ 和尼马察等四路。这四路首领都受到

① 据《清实录》记载，济尔哈朗并未奉派参加此次出征。——译者

②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1932 年版，卷 2, 页 4 上）。——译者

額亦都的招抚，都自愿归顺了努尔哈赤〔见 25，卷 2，页 4 下〕。



照原图译制

地图三 十七世纪前半叶满洲东邻领土分布图

1611年8月，征伐该部的乌尔古宸和木伦二路，俘获千余人；1612年1月，征虎尔哈部的扎库塔城〔见 25，卷 2，页 5 上〕。虎尔哈地方城乡居民进行了顽强抵抗。战斗结果，千余名当地居民被杀戮，二千人被俘。在征服其他居民点之后，額亦都再次向努尔哈赤送去俘获的五百户居民〔见 5，卷 142，页 3 下—4 上〕。

1612年10月23日，努尔哈赤军队再次进入乌拉部领地。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率兵迎战，但据文献资料记载，布占泰的士兵慑于敌方森严军威，不战而退。努尔哈赤沿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而下，攻克乌拉靠岸五城。然后，又深入该部领土，在距布占泰邸城^[40]二里的地方，攻占金州城堡〔见 25，卷 2，页 5 上〕。

1613年2月末，努尔哈赤又往征布占泰。3月7日，大批满洲军开到孙札泰城下，又一举攻克二座城堡〔见25，卷2，页6上〕。布占泰率兵三万迎战努尔哈赤，经伏尔哈城下的一场鏖战，布占泰被击溃，逃往叶赫部去了。文献资料记载道：“乌拉所属城池皆归附努尔哈赤”^①〔见25，卷2，页6上一—6下〕。

文献资料中记载，1613年，阿穆尔河上的虎尔哈部逃人首次来归努尔哈赤〔见25，卷2，页7下〕。

努尔哈赤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第四阶段（1614—1626年）的特点是，同明朝中国的战争进展顺利，征服了辽东，完成了对扈伦联盟的第四个部落——叶赫部的征服。

1614年，满洲国家组织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改组为八旗，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又增添了四旗：镶黄、镶白、镶红和镶蓝四旗，即第一次建立了八旗军事组织。这一年还进一步制订了八旗中每旗的军事建制。

指令贝勒为一旗之首，每个军团长直接指挥五个甲喇（扎兰）额真（相当于“团长”），每个甲喇额真下辖五个牛录额真（连长）。基层单位——牛录——人数仍为三百人，后来才缩减到二百人。

通过八旗制度，开始逐步对满洲国居民进行全面的军事、经济管理。1614年，每旗设一专门办事机关，除处理一般文牍和账目外，还处理涉及军民生活各个方面的广泛问题。后来每个办事机关又分为两翼：左翼和右翼。左翼的职权范围包括升迁官职、监督世袭官职的承袭程序、逮捕罪犯和审理诉讼案件。右翼主管发放粮
[41] 餉、分配饲料、定期奖赏官兵、追缴逋悬、登记族中户口人丁、核算现有耕地等等。

这是满洲特有的一种制度，是后来满洲人借鉴相邻的明代中

^①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兀喇国所属城邑皆归附”（1932年版，卷2，页6下）。——译者

国的某些文物典章而发展起来的国家管理体制的萌芽。这种制度比较简单：军事由掌管八旗事务的最高指挥官——从满洲高级贵族中委派的八旗总管大臣主持；民事则由议政五大臣（主要负责审理诉讼）和理事十大臣主持。所有这些官员全都参加所谓议政王大臣会议——满洲统治者直接管辖的最高谏议机关〔见 144〕。

在征服扈伦联盟四部之一的乌拉部以后，仍处于努尔哈赤控制之外的只剩下四部中最强大的叶赫部了。该部于 1619 年被努尔哈赤征服，当时同明代中国的战争已经开始。

叶赫部居住在威远堡关隘东北，叶赫河（今通河）流域。南邻哈达部，两部领土以达穆鲁山^①为界，北接蒙古科尔沁盟和郭尔罗斯盟，西南土地连接明边墙〔见 24，卷 12，页 19 上；卷 18，页 26 上〕。

考证出所谓海西女真各部落（扈伦联盟）的大约边界（由于这些边界情况不明确），尤其是处于该联盟外围的各部落（即乌拉部和叶赫部）的边界，具有重要意义。

据《努尔哈赤实录》记载，叶赫部始祖为土默特盟的蒙古人，灭扈伦联盟内的纳喇氏族后，遂居其地，因姓纳喇。后，又率族众移居叶赫河，故名叶赫〔见 25，卷 1，页 3 下；31，卷 2，第 25 页〕。明代，该部所据土地，称为北关〔见 31，卷 2，第 25 页；16，卷 8，页 3 下〕。

1614 年 10 月，努尔哈赤率兵四万往征叶赫部。兵至兀苏城时，努尔哈赤号召城中居民投降，该城不战而降。从此时起，开始了对叶赫部的血腥征服。文献资料记载，继兀苏城后，努尔哈赤大军连下叶赫部的十九座城堡和其他居民点，并且“将其房舍、禾谷全部烧光，然后掳兀苏降民三百名回归〔本土〕”^②〔见 25，卷 2，页

① 俄作者误把“达喜穆鲁山”写作“达穆鲁山”。——译者

②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尽焚其房谷，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1932 年版，卷 2，页 6 下—7 上）。——译者

6下]。

[42] 1614年12月，努尔哈赤遣兵五百往征“东海南〔岸〕”窝集部雅拉，西临二卫。文献资料记载：“〔满洲军队〕收降民二百户，计人口一千名而回”^①〔见25，卷2，页7下〕。

1615年12月，遣兵二千往征窝集部东额黑库伦城及其毗连地区。攻城时守城士兵被杀死八百多名，俘获万人（这是满洲人征伐东北各部落时期俘获人数最多的一次）。此外尚有五百户自愿归附努尔哈赤〔见25，卷2，页8下〕。

1616年在满族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经过三十余年同相邻女真各部频繁的征战，满洲统一了相邻各部，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努尔哈赤自称为汗，称所建王朝为后金，建元天命——“上天意志”或“受命于天”。

满洲国是早期封建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八旗军事组织起着巨大作用，因为这一组织不仅包括军队本身，还包括全国大多数居民。

由此可见，只是从1616年起，才称东北女真各部联盟为“满洲”。然而在以后很长时期内，甚至在满洲人中间，这一名称也未广泛地通行开来。1635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阿巴海甚至被迫颁发特旨，宣称：“我国过去通行诸如满洲、哈达、乌拉、叶赫、辉发等名称。以前无知之人称〔我们〕为诸申。〔然而〕诸申一名仅〔指〕超墨尔根锡伯之后裔而言，与我国毫无干系。我国号称满洲，具有悠久历史，帝位代代相传。〔兹令〕今后一切人等只许称我国原名（ᡩᠠ——格·麦·）——满洲，〔禁止〕使用不正确的名称”^②〔见8，

①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十一月，遣兵五百征东海之南兀吉部押兰、石临二卫，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回”（1932年版，卷2，页7下）。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卷25，页29上）。——译者

卷 25, 页 29]。

相邻的封建中国及其在千百年间形成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经济制度,无论对满洲人的国家中央机构的建立,还是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努尔哈赤为其统治所采用的年号天命便是直接从中国借鉴来的。中国各种制度对在明帝国边界附近建立起来的新的统一的年轻的满洲国家产生影响,是很自然的,然而不应象美国研究者 F. 迈克尔在其专著〔见 327〕中所作的那样,把这种影响估计过高,并把它绝对化。

1616年,努尔哈赤远征所谓东海萨哈连部(或各部)²⁰。据《努尔哈赤实录》记载,满洲军队二千人,由统帅达尔汉辖和硕翁科罗指挥。满洲人于 1616 年 8 月 30 日抵达兀尔简河,于此地造船二百艘,水陆并进,向当地村屯进攻,攻占兀尔简河南北两岸三十六座村寨。后来,兵至萨哈连河南岸的佛多罗袞寨,便在此扎营。之后,渡至北岸,攻取了“萨哈连部之十一村寨”^①〔见 25, 卷 2, 页 10 上〕。

满洲文献资料中对这次远征的描写,夹杂着许多似乎证明天助满洲人的荒诞无稽的细节。文献资料在叙及这次远征时,没有提到俘虏数字,这是完全没有先例的异常现象。丝毫没有提到把萨哈连部的人编入满洲牛录之事。考虑到努尔哈赤同当时还很强大的叶赫部之间的敌对关系,令人无法想象,满洲军队究竟走的是哪条路线。象这样穹远的,特别是大规模的行军,只有在彻底征服该部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与此次远征有关的一些地点,根本无法考证,因为后来的文献资料中没有见到关于这些地点的记载。因此,尽管在象《努尔哈赤实录》这样的文献资料中有证明此次远征的记载,仍不免令人产生

^① 《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取查哈量部内寨十一处……”（1932年版,卷2,页10上）。——译者

一定疑问：此次远征是否确有共事。

刘选民仅仅根据上面引用的史料中关于满洲人侵占“萨哈连部”（可能是沿岸的）村寨的贫乏资料，竟然企图作出结论：该部领土似乎包括整个布列亚河^①流域和结雅河支流——西林穆迪河和托姆河流域，几乎到达现今的斯塔诺夫山脉^②（17）〔见 230，第 166 页，地图〕，这种结论，毫无疑问，是没有任何史实依据的。

在叙述此次远征时，《努尔哈赤实录》中还提到使犬国²¹。据该[44] 文献资料记载，1617 年 1 月，满洲将领攻打萨哈连部之后，又招服“阴答哄塔库拉拉，以及诺落、石拉忻尼等三处（部落）（？——格·麦·）首领四十人”^③〔见 25，卷 2，页 10 上〕。

“招服”“使犬部”首领一事，发生在 1617 年，这点颇令人怀疑。如果实际上确有此事，那么此事在后来使犬国同满洲人的相互关系史中，竟没有任何反映，这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不管在努尔哈赤时代，还是在阿巴海时代对该部进行过什么样的远征，但在满洲编年史中提到使犬国最初几次自愿来朝之事，却是在 1633—1635 年，即在上述事件十六年之后〔见 3，卷 14，页 30 下〕。

1635 年以后，在满洲文献里有关使犬部的资料消失不见了，直到 1660 年 8 月（即几乎中断了 25 年之后），由于满洲人在阿穆尔河上击溃俄国的队伍，这个部落的名称才重又出现。据文献资料记载，在同俄国人发生冲突之后，满洲人才认为该部被征服〔见 12，卷 124，页 6 上〕²²。

努尔哈赤被尊为满洲国最高统治者，自立朝代年号，以及满洲人崛起在紧靠中国辽东边界的地方，这一切使满洲人同明帝国的关系顿形紧张，按照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外交原则，四邻的任何一个

① 即牛满河。——译者

② 即外兴安岭。——译者

③ 《清太祖武皇帝等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又招服阴答哄塔库拉拉（即役犬处也）、诺落、石拉忻尼三处酋长四十人”（1932 年版，卷 2，页 10 上）。——译者

统治者都不应有自己的、与中国皇帝不同的年号和历法。努尔哈赤的作法似乎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宗主权。

1616年10月，经受努尔哈赤严重军事压力的叶赫部的上层人物向明帝国求救。该部首领金台石和布扬古称，努尔哈赤已灭扈伦四部中的三部，仅存叶赫一部了；努尔哈赤意欲侵占辽东，把中国开原、铁岭二城四郊变成满洲人牧马场所。

明廷决定介入东北事件，增援叶赫部。派遣一千名中国士兵携带火器前去保卫叶赫各城。明人加强了辽东边防线上的驻防军。明朝统治者命令作为明朝名义上藩属的努尔哈赤停止攻打叶赫部的军事行动〔见7，第一帙，卷4，页10上—10下〕。

满洲军事将领公开声称必须同中国作战。努尔哈赤没有支持他们，但却明确示意，必须着手准备打这场战争〔见7，第一帙，卷4，页16下—17上〕。1618年2月，努尔哈赤第一次表示在最近的^[45]将来发兵攻打明帝国的意图，他在议政王、贝勒会议上和在军队面前宣布了他的“七大恨”，似乎这七大恨迫使他发动这些军事行动〔见7，卷4，页12上—13下〕²³。

满洲人同中国的战争便这样开始了。1621年春，努尔哈赤占领了设防坚固的盛京（沈阳），不久又攻克了边区重镇辽阳。从这时起，明帝国便完全丧失了整个辽东。1625年4月，努尔哈赤决定把满洲国首都迁往盛京。在1622—1644年期间，特别是在阿巴海汗统治时期，辽西土地和长城以外的华北领土遭到满洲人的不断侵袭。

由此可见，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便成了满洲国侵略战争的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在继续征伐辽西和华北的同时，满洲人还得以顺利地征服了察哈尔汗国〔此事见99〕，而经过1626—1627年和1636—1637年的两次军事远征，征服了朝鲜。这是满洲人在十七世纪前半叶对其邻居发动侵略活动矛头所指的主要

目标。

在这种对所有邻族不断进行军事活动的历史背景下，努尔哈赤和阿巴海发动了对东北各部落和部族的进一步的征服活动。

满洲人对叶赫部和其他邻部的军事行动进行得极为顺利。例如，1619年2月，对叶赫部又一次发动远征。据《努尔哈赤实录》记载：“1月7日（2月20日——格·麦·），大军入叶赫，自克亦特城、粘罕寨起至叶赫城东十里止，将此带〔叶赫部之〕降服诸城居民，尽数截获。将十里以内大小二十余处屯寨纵火焚烧”^①〔见25，卷3，页1上〕。由此可见，显然满洲人侵占叶赫部领土时，将整个地区洗劫一空，破坏无遗。经满洲人侵袭后，东北的这块人烟稠密、业已开发的土地便完全荒废了。

1619年9月，努尔哈赤军队包围叶赫部第二首领布扬古的驻城，并一举攻克该城以东的该部主要首领金台石的驻城——东城。文献资料中记载道：“其他被围之叶赫城邑守军，闻东城陷落，便献城投降。自此叶赫已不复〔独立〕存在”^②〔见25，卷3，页1上〕。绝大部分居民被迁往满洲，编入满洲八旗。征服叶赫部后，扈伦联盟各部便全都归努尔哈赤管辖。满洲的军队和居民，由于吸收了扈伦联盟各部而得到了显著的补充〔见168，第1卷，第7页〕。

征服较远的“野人女真”各部，对增加满洲联盟的居民也具有不小的意义。

1619年2月和7月，曾两次远征“窝集部虎尔哈路”。满洲人

①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己未，天命四年，大明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征夜黑……自将诸王臣统大军起行。初七日，深入夜黑界。自掳特城、粘罕寨掠至夜黑城东十里，将投诚人畜皆截取之。十里外所居屯寨，大小二十余处，尽焚之”（1932年版，卷3，页1上）。——译者

②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中的原文是：“于是，凡夜黑城郭皆降。其王臣军民等，一无骚扰，父子、兄弟、夫妇、诸亲等，亦无离散。秋毫无犯，俱迁徙而来。给房田、粮谷等物。查其无马者，千余，赐以马匹。夜黑自此灭矣”（1932年版，卷3，页8下）。——译者

在这两次远征中，第一次俘获二千名壮丁，第二次掳得一千户计二千名壮丁。接着，《八旗通志初集》证实，某一个出生在松花江的名叫尼堪的人，于1621年往征虎尔哈，带回五百户居民〔见2，第11卷，第159章，第54页〕。

1625年9月和11月，又先后两次派兵远征虎尔哈部。第一次俘获五百户居民，第二次满洲军队在努尔哈赤的儿子阿拜指挥下，奉命往征“东海北虎尔哈部”，俘获一千五百人〔见2，第9卷，第139章，第289页；5，卷139，页20上—20下〕。

1626年9月21日，努尔哈赤崩逝。被选为他的继承人的是他的儿子，第四贝勒阿巴海，庙号太宗文皇帝。

努尔哈赤得以把邻近各部统一于满洲庇护之下，不仅靠武力，而且也借助于外交手段。遗憾的是，满洲文献中记载努尔哈赤外交活动的资料，却非常之少。

在编年史记载的关于满洲首领所采用的各种外交手段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千方百计地和最大限度地吸引当地各部的部落上层人物归附努尔哈赤的各种方法。努尔哈赤在其活动初期照例总是必定亲自迎接来访的邻部酋长，亲自陪伴客人到自己驻地。

努尔哈赤为了使尚未并入满洲的诸部落酋长归附自己，对来访者施以各种恩惠，为他们大排筵宴，慷慨馈赠金银绸缎，答应客人亲自予以荫庇和保护。来访的贵宾临走时经常带着赏赐给他的出身于满洲宗室的姑娘，有时甚至是努尔哈赤本人的女儿或姐妹。于是就建立了亲戚关系和政治联系。这就是他采用的一套争取新的同盟者的办法。这套办法是经过精心筹划，几乎百试不爽，行之有效的。^[47]

因此，从1583年到1626年间，努尔哈赤统一了满洲联盟邻近的女真各部，并且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满洲国。在此期间，他还几次征伐较远的部落。从我们所引用的满洲文献所载的资料中可以

看出，进行这些远征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努尔哈赤建立的部落联盟的对外政治地位，是为了掳获俘虏和掠取战利品。迁徙被征服部落的大部分居民和洗劫他们的领土，这两点无可辩驳地证明，虽然从这时起满洲的军事势力和政治影响毫无疑问地在某种程度上普及到了这些部落，但努尔哈赤却根本没有把这些部落领土本身并入满洲国当作他的直接任务。

然而，甚至在一系列相邻部落并入满洲之后，满洲居民人数仍然比较少，而此时正在同明代中国进行的战争，以及迫于眉睫的同朝鲜的军事冲突，则要求急速和不断地补充年轻国家的兵力。满洲人始终面临着要千方百计增加本国居民人数的任务，尤其是要增加能够手持武器的壮丁。

满洲人把东北本土的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距离很远的部落选作为补充自己人力之源。对扈伦联盟各部的征服，打开了通往这些部落居地的通路。然而，大规模地征讨这些部落，已经是在努尔哈赤的继承者——阿巴海时代了。阿巴海统治时期，满洲人进行了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同明代中国的战争也未曾停止。经过这场战争之后，满洲人广泛地采用了中国武器，熟悉了大炮，掌握了围攻设防坚固的大城镇的技术。

第二节 十七世纪前半叶东北各部落 和各部族的分布

在满洲文献资料中认为属于东北部落和部族的最常见的是瓦尔喀、窝集和虎尔哈等三个主要部落〔见 25，卷 1，页 3 上〕^[48]。在《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里，还常常可以遇到远东这一地区的其他部落和部族的名称，其中最重要的有库尔喀人、索伦人、乌扎拉人〔见地图三、四〕。

《太宗实录》的材料使人可以考证出十七世纪前半叶该区域某

些居民居住的地点。

瓦尔喀部和库尔喀部。按照居住地点，很难把库尔喀部和瓦尔喀部分开，因为，遗憾的是，满洲文献对该部的分布情况记载得极少。

瓦尔喀部和库尔喀部——可能是奥罗奇人的祖先。

窝集部²⁵。根据中国文献的资料可以断定，窝集部在松花江以南、乌苏里江以西，并且包括图们江和牡丹江流域的一部分。

这里应该附带说明，窝集人在这块辽阔的领土上，绝非聚居一处，而是单独地、一群一群地按地域散居各处。

对满洲人来说，“窝集”这一名称毫无疑问是许多不同氏族和部落的总称，下面这样一个事实便可证明：满洲文献中没有记载把窝集部本部的人作为某个整体编入满洲八旗牛录之事，所记载的只是“宁古塔路人”，“那木都鲁路人”或窝集部其他分布地区的人。看来，满洲人把这些地区的人看成是独立的氏族或某些族群。

窝集部的某些分支毫无疑问是那乃氏族，而另一些，例如住在“窝集部之虎尔哈路”，住在扎库塔城的分支，则可能属于尚不为人所知的东北部族，可能属于完全同化于后来自称为满洲人的那些部落群的那乃人的祖先。

许多“东虎尔哈”氏族——如诺雷、克宜克勒、拈什哈理等——毫无疑问是那乃氏族。文献资料中常常记载他们的使团入朝满洲朝廷，但满洲文献资料中没有加以区分，而把他们统统归入窝集部〔见 31，卷 3，页 46〕。

在谈到那乃人同满洲人的相互关系时，国民党作者凌纯声指出，他们似乎“归服满人(ᡩ——格·麦·)但仍如以前一样，并未编入〔满〕旗”^①〔见 226，第 56 页〕。这种“归服”的事实尚须有证据来

^① 凌纯声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原文是：“赫哲在明清之交，虽为满洲所招降，然仍保持其政治的独立，未输入旗籍”（上册，第 56 页）。——译者

[50] 加以证实,而满清文献资料却无法提供这种证据。但是,作者却正确地指出,只是从光绪八年(1882年)起,满洲人才试图把住在黑龙江省的部分那乃人编入自己的八旗军,向他们委派了满洲军官——佐领^①[见 226,第 57 页]。

虎尔哈部。不论在满洲文献资料中,还是在科学著作中,关于“东海”虎尔哈部的记载都很混乱。在各种文献资料中提到该部名称时,通常都附有涉及其居住地点的各种不同说明。最常见的有下列一些固定说法:“东海虎尔哈部”、“东海某地虎尔哈部”、“松花江虎尔哈部”、“黑龙江虎尔哈部”等等。此外,在乌扎拉地方,即在乌苏里江下游流域,也住有虎尔哈人。

据我们看来,这证明在满汉文献资料的诠释中“虎尔哈”这个名称还包括有远东的这部分地区居民的某些部落、氏族和按地域居住的人群。在文献资料中,虎尔哈部经常同索伦部、瓦尔喀部、乌扎拉部等相混淆,这也证实了这种情况。

在我们前辈所著的科学著作里,涉及到虎尔哈部时,也有相当多的不正确说法。甚至象刘选民这样比较认真的中国作者,也把该部名称音译为“虎尔喀部”,而同时却把“虎尔哈路”归到窝集部[见 230,第 171—175 页],这大概就使他陷入了严重的混乱之中。

魏源曾经正确地写道:“自宁古塔东北行四百余里路,居住于虎尔哈河(即今牡丹江——格·麦·)与松花江两岸之所谓诺雷部,即为虎尔哈部”^②;“〔该〕虎尔哈部居住在虎尔哈河上,该河发源于吉林乌拉,流经宁古塔,在其东北面七百里之三姓城附近流入混同

① 按凌纯声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应为“协领”。——译者

② 俄作者误把魏源引自《满洲氏族源流考》的一段文字,当作了《圣武记》正文。这段话见于《圣武记》卷 1 的一个夹注里,原文是:“满洲氏族源流考曰:自宁古塔东北行四百余里,居虎尔哈河、松花江两岸者,曰诺雷部,即虎尔哈部”(卷 1,页 7 下)。——译者

江(这里指松花江下游——格·麦·)”^①〔见 219,卷 1,页 6 下,页 7 下〕。

刘选民认为魏源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断言说,魏源把“虎尔哈部”同窝集部的“虎尔哈路”混为一谈了〔见 230,第 176—177 页〕;他对此的主要论据是十八世纪《舆图》的错误标注,该图把现今的牡丹江流域划入窝集部“虎尔哈路”〔见 29,第 3 排,3 上〕。

在考证虎尔哈部的居住地点方面,刘选民不但没有任何新的建树,反而使之更加混乱。他把虎尔哈部同另外一个部——库尔喀部(住在鞑靼海峡沿岸)混为一谈,并且盲目依照乾隆年间的《舆图》的混乱资料,制造了该部得名于库尔喀河的说法。库尔喀河在结雅河和库马拉河(呼玛尔河)之间流入阿穆尔河中游。他认为虎尔哈部居住在该河流域〔见 29,第 5 排,4 上;230,第 177 页〕和“松花江和阿穆尔河汇合处以北、库马拉河流入阿穆尔河处以南”^②的地区。刘选民说虎尔哈部东南与窝集部邻接,东北与萨哈连部接壤,在西面,该部边界为小兴安岭,并且该部在那里似乎与索伦部为邻〔见 230,第 177 页〕。这是一幅完全错误的示意图。刘选民在研究 1627—1645 年间的历次远征时,在其著作中没有使用《太宗实录》的材料,而只是从其他次要的成书较晚的极不系统、极不完备的史籍中汲取关于这些远征的资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沿袭了这些著作作者的谬误。这就是刘选民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

例如,刘选民不知何故把乌鲁苏、穆鲁苏苏、额苏哩等城镇说成是虎尔哈部的居民点,但据《太宗实录》,这些城镇是索伦部的城镇;此外,他在列举虎尔哈部诸城镇时,还举出一座呼玛尔城,而这

① 《圣武记》中的原文是：“虎尔哈部者(虎一作呼),居虎尔哈,河出吉林乌拉界,经宁古塔城,北行七百里,至三姓城入混同江”(卷 1,页 6 上)。——译者

② 刘选民的《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中的原文是：“松花江黑龙江会流处以北,呼玛尔河黑龙江会流处以南”(见《燕京学报》,第 23 期,第 177 页)。——译者

一城名却从未见于文献资料〔见 230, 第 177 页〕。

虎尔哈部过着定居和聚居生活,在牡丹江两岸、松花江下游和松花江江口,和几乎到乌苏里江江口的阿穆尔河两岸,该部的大村落星罗棋布。根据 Л. И. 什连克、В.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和 Б. О. 多尔基赫提供的资料,这些地区在十七世纪四十——五十年代乃是吉切尔人聚居之地。Б. О. 多尔基赫写道:“吉切尔人乌卢斯可分三部分:阿穆尔河上的、松花江上的和乌苏里江上的”〔见 93, 第 583 页, 第 607 页〕。“吉切尔人”的名称不见于满洲文献资料,然而,吉切尔人的分布地点同虎尔哈部的聚居地点却相吻合。这使我们有根据认为虎尔哈部就是吉切尔人。

然而,Б. О. 多尔基赫及其前辈在其著作里却把吉切尔-虎尔哈人与满洲人等同起来²⁶,对这种观点,我们不能苟同。Б. О. 多尔基赫称吉切尔人是“满洲人种的一支”〔见 93, 第 557 页〕。尽管这种提法有些含混不清,但作者随后又发表意见说,这一部族是“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满洲人”〔见 93, 第 558 页〕,这就使人无可怀疑,作者确实认为吉切尔人就是满洲人。我们十分清楚,并非所有属于满洲-通古斯语系的民族都是满洲人。

遗憾的是,这些作者都忽略了下述情况:首先,他们忽略了在^[52]各部落聚集的基础上形成满族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过程的基本特点;其次,他们又忽略了满洲人进行聚集的领土的地理分布区域,而阿穆尔沿岸地区则与这一领土根本无关。

对于究竟东北的哪些部落和部族是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叶急剧形成的后来称为满洲或满洲人的部落联盟的基础,满族究竟是在哪些当地的女真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及最后这些部落的融合究竟发生在哪块领土之上等问题,十七世纪的满洲文献都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回答。

如上所述,满洲各部的统一基本上是在建州地方(抚顺以东)

和辽东境内进行的。这块领土不仅不包括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而且也不包括诺尼江江口以下的松花江流域。某些部落和部族(虎尔哈部等)部分地参与正在进行的聚集，已是发生在十七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的事了。吸收这些居住在松花江和阿穆尔河一带的部落居民的最重要条件，是他们必须迁徙到处于满洲人有效控制之下的中央地区。

Б. О. 多尔基赫的观点之所以引起根本异议，在于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十七世纪满洲文献资料中根本没有提到过在这一时期阿穆尔河上曾住有任何满洲人²⁷。

与Б. О. 多尔基赫的观点相反，十七世纪满汉文献资料中记载着满洲人只是在1616年和十七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曾个别地，偶尔出现在阿穆尔河上，至于他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设防之事，是从准备侵略阿尔巴津时期才开始首次提及的。

具有权威性的文献资料直接了当地指出，满洲人是阿穆尔河上的外来人，他们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由于清帝国对俄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国领地发动军事行动，才定居此地。例如，《黑龙江通志》证实道：“满洲人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格·麦·)由将军萨布素统率自吉林、宁古塔〔进行〕远征来此(指来齐齐哈尔[53]尔,阿穆尔沿岸地区——格·麦·);士兵均留此长期戍边,其眷属后来〔亦〕自吉林等地迁来”^①〔见23,卷7,页3上〕。同时,清代文献具体称这一历史时期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居民为萨哈尔察、索伦、虎尔哈、萨哈连等部族,对这些居民,满洲人曾多次兴师征伐,最后在1639—1640年间同他们进行了残酷的战争。

因此,象E. П. 列别杰娃那样,把过去这些部落分布的领土说成是什么“满族文化的巨大中心”〔见128,第70—71页〕,就未必合适了。这位作者把阿穆尔河和绥芬河流域都算到了这些中心

① 这段引文系根据俄文译出。——译者

之内〔见 128, 第 74—75 页〕。需要考虑到在十七世纪前半叶,居住在阿穆尔河两岸的是人口众多的属于蒙古语系统的各达斡尔氏族,他们同满洲人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此外还住有俄国文献中称之为吉切尔人的部落,以及纳特基人和阿枪人(即那乃人和乌里契人)部落,如所周知,这些人也根本不是满洲人。

如上所述,Е. П. 列别杰娃的主要错误在于她未加批判地因袭了清朝乾隆皇帝年间伪造的满洲文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资料。我们所使用的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证明,满洲人曾多次发兵征伐虎尔哈部。满洲文献资料中断言,虎尔哈部不仅在十七世纪前半叶,而且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仿佛是清帝国的贡民²⁸。但是这与满汉文献稍后时期记载的,认为就来源而言,虎尔哈部向为“满洲”部落的说法,大相径庭。

在历史文献里,其中包括中国历史文献,几乎找不到任何论述²⁹,尤其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用来多少能够证实 В. О. 多尔基赫在当时提出的虎尔哈部属于满洲氏族的想法。

在考证十七世纪这些虎尔哈部落同现代民族的相互关系时,我们可以同意凌纯声的意见,他认为“东海虎尔哈部”应当是指松花江的那乃人〔见 226, 卷 1, 第 56 页〕。对作者的这个结论可以表示赞同。

满洲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所谓索伦人和萨哈尔察人,系指索伦人本身,但最常见的是指东北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达斡尔人和其他鄂温克部落。

文献资料谈及 1639—1640 年间的几次军事行动时,提到某几座索伦人城堡的名称,对这些城名所作的考证表明,索伦人的居址^[54]在诺尼江流域、阿穆尔河上游和结雅河流域南部。刘选民把阿穆尔河以北直到斯塔诺夫山脉为止的大片地区划归索伦部落,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同样,这个出自作者偏见而产生的民族主义

错误的根源也是非常明显的。

乌扎拉部。在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满洲文献中,关于乌扎拉的资料贫乏得令人无法对该部分布地域作出任何结论。然而,根据在1682年被秘密派到阿尔巴津城下的满洲人细作郎坦和彭春所作的疏报,可以把乌扎拉部住地同叶·哈巴罗夫在1652年建立阿枪斯克城堡并首次同满洲人发生冲突的地区联系起来³⁰。因此,可以把乌扎拉部同俄国档案文件提到的阿枪人联系起来,即同那乃人联系起来〔见94,第558页〕³¹。

第三节 阿巴海对东北各部族的军事远征

第二代满洲汗阿巴海统治时期(1627—1644年),是满洲人同东北各部落和各部族接触最为频繁和满洲人对这些部落进行军事远征的时期。历次军事远征的主要目的仍如从前一样,在于大批迁徙俘虏和在当地掳获居民,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将其迁入满洲国领土,用这些俘虏来补充满洲八旗军的队伍。

我们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在叙述满洲人军事远征的同时,还记载了这些部落的个别代表志愿归附满洲的很多事例,以及东北当地各部落的首领和酋长向满洲朝廷派遣大量使团等事。

满洲国在各相邻小部族之间的威信之所以日益增长,是因为满洲人在稳定本国内政和经济方面,以及巩固自己的对外政治地位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而它的对外政治地位得以巩固,则是由于对明帝国战争的胜利和在1626—1627年与1636—1637年两次对朝鲜军事征讨的胜利,以及征服察哈尔汗国的结果。

[55]

一、满洲人对东部和东北部的远征

在东部,满洲人对瓦尔喀部的最初几次征伐,是在1629年8月和1633年12月进行的〔见8,卷5,页17下—18上;卷8,页16下〕³²。

遗憾的是，该文献对瓦尔喀部居住区域和进行远征的地区没有引用任何资料。值得指出的是，也如同在关于那堪泰氏族来归一事的记述中一样〔见 8，卷 8，页 30 下〕，在 1629 年的文件中也出现了“宁古塔”这个名称，看来宁古塔当时已是固定的居民点了。从这时起，应该注意到宁古塔作用的增长，宁古塔是进行单独远征时使用的位于东北边缘地区的基地，进行这些远征时正是同这个居民点逐渐开始发生关系。

阿巴海在其统治初期也曾组织过对乌扎拉部的远征。在满洲文献资料中，“乌扎拉”这个名称既是地方名（“乌扎拉路”），又是部落名（“乌扎拉部”），——看来这是指那乃人（“阿枪人”）的一个氏族。满洲人侵袭乌扎拉的历史充满着征服者的残暴行径。

1633 年《太宗实录》记载道，奉命远征乌扎拉的巴图鲁（“勇士”）吴巴海遣人回报，内称，满洲军得悉乌扎拉部之人正在握黑河上捕鱼，便向他们进攻，打死三百三十八人，俘获七百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夺得三百七十三匹马、一百零二头牛、七十八张貂皮和大量其他毛皮〔见 8，卷 12，页 41 下〕。

满洲人意欲征服住在朝鲜边界上的个别部落群（首先是瓦尔喀部）的意图，在以后数年间一直遭到朝鲜方面的抗议〔见 8，卷 18，页 21 上—22 下；卷 21，页 12 上—12 下；卷 28，页 41 下及后面几页；卷 51，页 20 下—22 上及后面几页〕。

1635 年 2 月 8 日，满洲人再次往征瓦尔喀部，领兵者为吴巴海和荆古尔代。出发前，他们接到汗的谕旨，嘱令各将领谨慎从事，尽心竭力完成所托。谕旨具体地指明进攻目标为尼满地方。据满洲文献资料记载，此地城乡共住有一千余人。谕旨中称：“尔等力能擒获者，务须擒获之”^①。阿巴海谕令，满洲军应首先占领当 [56]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其可取者，量力取之”（卷 21，页 22 上）。——译者

地首领分达里所居之屯，满洲人应在该屯找到向导^①。

虽然谕旨内称，当地居民疏忽大意，满洲军启行后仍奉命在执行任务时须严加防范，对俘虏尤须严加看押和照管，而且在这方面援引了满洲军将领达朱户和军官董鄂和魁满的悲惨事例，他们都是被逃出监押的瓦尔喀部俘虏打死的。这道谕旨〔见 8，卷 21，页 21 下—23 上〕²³ 证明，满洲人的侵袭并非总是顺利无阻，满洲人在同瓦尔喀部作战时也遭受过挫折，造成了满洲将领和军官的死亡。

1635 年 6 月 9 日编年史载有关于这次远征结果的奏折：“奉命往征东海瓦尔喀部之吴巴海、荆古尔代自宁古塔遣噶尔珠来报，奏称收抚壮丁五百六十人，妇女五百人，儿童九十人。又掳获妇女六十六人，马六十匹、牛百头，各种毛皮六百六十余张，毛皮大衣三十八件”²⁴〔见 8，卷 23，页 8 上，34 下—35 上，36 上—36 下〕。接着，文献资料记载道，7 月归来的将领带回了虎尔哈(ᡤᡤ)部人。由此可见，满洲人混淆了这两个部落。

1635 年 11 月〔见 8，卷 25，页 25 下—28 下；另见 24，卷 12，页 23 上；16，卷 8，页 4 下〕以及 1637 年 2 月和 8 月〔见 8，卷 35，页 20 下—22 下；卷 37，页 1 下—2 下〕也对瓦尔喀部进行了远征²⁴。

满洲编年史中记载征伐瓦尔喀部的材料都是千篇一律的：总是列举奉派远征的将领的名字、满洲汗对出征者的训示，以及作为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有分达哩所居之屯，宜率向导往前先取”（卷 21，页 22 上）。——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往征东海瓦尔喀吴巴海、荆古尔代自宁古塔遣噶尔珠报捷，奏称收抚壮丁五百六十人，妇女五百口，幼稚九十口。又俘获妇女六十六口，马六十匹，牛百头，貂、猞猁裘、虎、狐并水獭、青鼠、黄鼠等皮六百六十有奇，貂裘、貂镶灰鼠裘、猞猁裘、貉裘、黄鼠、灰鼠等裘三十八领（卷 23，页 8 上—8 下）。——译者

每次远征结果的——关于俘虏数字和军事缴获物的资料。上面列举的历次侵袭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只在于被满洲人带回本土和编入八旗的俘虏数字不同而已。文献资料中丝毫未曾提及由于这些远征而在东部获得领土之事。

1636年在满洲人政治聚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事件：1636年5月5日，阿巴海正式采用皇帝称号，并改国号为大清。

《太宗实录》指出，吴巴海因往征瓦尔喀部获胜，并掳获大量编入户口的俘虏，被擢升为三等梅勒章京〔见8，卷30，页12上—12下〕³⁵。《八旗通志初集》中的《吴巴海传》证实，他确曾参加这次远征，并记载，远征之后，吴巴海奉命驻守“边城宁古塔”^①〔见5，卷150，页10下〕。文献资料中的这些记载极为重要，因为这些资料^[57]可以使我们确定，在宁古塔首次设置常驻满洲驻防军是在1636年末，而其第一任驻防军长官是吴巴海〔另见31，卷2，页2上〕³⁶。

自1638年以后，满洲文献资料中便再也没有提到征伐该部之事，甚至连“瓦尔喀”这个名称也不见了。满洲人在该地区的注意力已转向了库尔喀部和乌扎拉部。

满洲文献中关于历次远征——其中包括对瓦尔喀部的远征——的资料，主要记载的是迁徙当地居民的情况，这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满洲人进行这些远征的基本目的，并不在于侵占毗邻的领土和将其并入满洲国版图，而只是为了掳获有生力量。未能躲开满洲军的当地居民都被迁往满洲领土。

1639年9月，将领萨尔纠等人奉命往征库尔喀部。在阿巴海给他们的指令里，第一次提到可以把部分库尔喀居民留在原地。该指令还指出，必须把居民编入户口，并课以轻微的贡赋——这种作法在十七世纪后半叶更为盛行。现将这一指令援引如下：“今派

^① 《八旗通志初集》中的原文是：“寻奉命驻防边城宁古塔地”（《吴巴海传》，卷150，页10下）。——译者

遣萨尔纠、英图^①、纳尔泰及席图等率兵往征库尔喀部。皇帝降谕曰：‘尔等应于喇法地方养壮马匹，之后立即前进。尔等兵少，因此宜合为一队。获胜后，尔等不得劫掠与凌虐当地居民，亦不准滥捕俘虏。抗拒者，尔等应劝其归降我方；杀伤我方士兵者，应予以处死。归附之人，应编为户口，令贡海豹皮。又须劝彼等弃恶从善，成为良〔民〕。获胜后，尔等只须派人奏报朕一次，因多次奏报，须遣许多士兵，而尔等士兵甚少。又谕：切勿途经朝鲜领土，以免节外生枝’。”^②〔见 8，卷 48，页 4 下—5 上〕。

由此可见，对库尔喀实行的是另一种办法：没有象对待瓦尔喀部和虎尔哈部等其他部落那样，迁徙他们，而是让他们留在原来住地，但是令他们纳贡〔见 8，卷 51，页 33 下—34 上〕^③。

在以后数年间，直至 1645 年以前，没有再征伐住在东部或东
〔58〕北部的任何部落。文献中关于这些部落以及他们同满洲人接触的资料，极其贫乏；而且按照传统，仅有的资料也只是简略地提一下进贡和满洲人方面对进贡者给以慷慨馈赠之事。各文献资料里都没有提供稍微详细些的关于被满洲人征伐过的那些部落的领土分布的资料。

二、满洲人对北部和西北部的远征

据 1634 年 2 月《太宗实录》记载，从“黑龙江地方”，羌图里、嘛尔干率六个氏族的代表前来纳贡，进献貂皮六百六十八张〔见 8，卷 17，页 5 上〕。继这段记载之后，编年史援引了下述皇帝谕令：

① 原文如此，系“英古”之误。——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遣萨尔纠、英古、纳尔泰、席图等率兵征库尔喀部落，谕曰：尔等可于喇发地方饲养马匹，即行前进。尔等兵少，宜合为一队以行。如得胜时，勿贪得而轻杀，勿妄取以为俘。抗拒者，谕之使降；杀伤我兵者，诛之；其归附者，编为户口，令贡海豹皮。又须劝谕伊等弃恶从善，共为良民。安辑既毕，止可遣人来报一次。若频报，则恐兵少力烦。又军行往返，俱不可经朝鲜之地，致有侵扰”（卷 48，页 4 下—5 上）。——译者

“天聪年二月己祖^①（1634年3月11日——格·麦·）皇帝宣召来自黑龙江地方之嘛尔干与羌图里入宫，谕之曰：‘虎尔哈部举止不驯，拒不朝贡，朕即将发兵征讨。尔等切勿与之交往，以免误遭杀害。从征士卒中倘有尔等相识之人，尔等可去探望。此番出征士卒较诸以往为多，人数甚众’³⁹。谕毕，皇帝赐嘛尔干鞍马一匹，赐羌图里妇女一名，盖因彼等归附满洲人以来，按期进贡，从未间断。后，伊济纳送弟喀住、喀达送弟波济里至宫廷，皇帝因之恩赐彼等布匹等物，并设宴招待”^②〔见8，卷17，页34上—34下〕。

然而，在开始远征以前，在1634年6月，自“黑龙江地方”又有以巴尔达齐⁴⁰为首的四十五人组成的使团来满洲朝廷入朝，进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见8，卷18，页20下〕⁴¹。

这样，从遥远的、以前不为满洲人所知的“黑龙江地方”也开始进献最珍贵的礼物，来自这些地方的使者介绍了散居在小城镇和村落中的人数众多的居民的情况。所有这一切必然促使满洲人组织向这里的远征。此外，组织远征还有其另外的、已经是经济性质的原因：虎尔哈人不愿按满洲人所希望的规模和等价物同其进行贸易，交易时虎尔哈人的执拗态度和他们的拒绝向满洲朝廷进“贡”，这一切都是引起战端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635年1月28日，满洲将领霸奇兰和萨穆什喀奉命率兵二 [59] 千五百人前往“黑龙江地方”。文献资料中没有指明究竟往征哪些地方和哪些当地部落。然而，在出征之前，曾有一些“黑龙江地方”的使者——杜莫讷、南地攸、贾尔机达、喀拜和郭尔敦率从者六十

① 原文仅写“天聪年”，且误将“己巳”写作“己祖（Сызу）”。——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天聪八年二月己巳。上召黑龙江地方来归之嘛尔干、羌图里入中殿，谕之曰：‘虎尔哈慢不朝贡，将发大兵往征。尔等勿混与往来，恐致误杀。从征士卒有相识者，可往见之。此次出师，不似从前兵少，必集大众以行也。’谕毕，以嘛尔干、羌图里自归服以来，贡献不绝于道，赐嘛尔干鞍马一匹，羌图里妇女一口。又以伊济纳送喀住弟至，喀达送波济里弟至，各赐布匹等物，仍赐之宴”（卷17，页34上—34下）。——译者

九人来到阿巴海宫廷，此外还有松阿里⁴²地方“摆牙喇氏族”的喇东格率从者五十人来贡貂皮。这些人都随同霸奇兰和萨穆什喀从征，充当向导。

颁给往征黑龙江的将领的谕令非常耐人寻味，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满洲人对东北各部落施行的两面性政策和他们软硬兼施的手法。现将这份谕令援引如下：

“上谕曰：尔等此行须经遥远地区。尔等务须一往直前，不畏险阻，尽心〔用命〕。所俘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与共。

如此，则彼处人民无所疑惧，必将成群结伙相率来归。且该地人民所操语言与我相同，若携之而归，于我大有裨益。攻伐之前，尔等应晓谕彼等：‘尔等祖先本与我同居一国，此事明载〔史〕籍（？：——格·麦·）⁴³。然而，尔等至今不知此事，自然未肯与我联合。我皇上久欲遣人来见尔等，详述一切，然因〔事务〕繁忙，至今未能顾及。我等此来，全然为尔等计也⁴⁴。’尔等若如此向彼宣谕朕旨，彼等岂能不肯归附我方！诸将领均应善体朕意，仰即遵行……

如尔等就一应事项达到既定目的，则无论报捷，抑或送俘，朕意必令途经锡伯〔部〕之绰尔门地方为便；将来朕遣人往迎尔等及运送军粮，亦必经由此地。尔等前去往征之地情况，可询诸向导。现有〔随同〕夏姓武因屯长喀拜〔前来之〕二人，随库鲁木图屯长郭尔敦前来之三人，及来自纳屯之一人。刻下皆已至此，已令彼等随军同往。尔等可率之以行。行经路线，皆可询问向导。凡已归附^[60]我方之屯落，尔等不得稍有骚扰。应将〔伴送尔等之〕人，留于彼等故乡，并向之晓谕：朕之所以令其还居故土者，乃因彼等忠诚，且已归附我方。自后，彼等应更加恭顺。倘若意存叛离，朕必予以严惩。

倘若尔等不能达到既定目的，则切不可留此三屯之人于彼，当尽数带回我处。凡属有用之物，及可资军需之〔装备〕，亦不得遗弃。班师时，应结队而行，不得漫无秩序。此令尔等应严加遵守。

谕毕……”①〔见 8, 卷 21, 页 14 下—16 上〕⁴⁵。

文献资料里接着写道：“是日，上召屯长喀拜、郭尔敦等及其从人进宫，设宴款待。宴毕，彼等出宫，沙尔虎达、穆成格等传谕喀拜等曰：‘尔等身居边远地方，甚至不知纪年⁴⁶。若率所属之人，来居我国，共享我国荣誉及文化，岂不更好？朕久有此望，并欲遣人往谕〔尔等〕之人，但因国务缠身，未克遂愿。

众所周知，凡为人君者，皆应统理属民，此乃万古不渝之理。尔等曩昔为我所属，此皆载于古籍（?1——格·麦·），惜尔等不知耳（1——格·麦·）。

今尔等志愿来归，朕本可留尔等居住此地。但朕望尔等忠顺，故遣尔等归。尔等可充我军向导，凡各屯寨〔位置〕，均应准确告知’。喀拜答称：‘将竭诚遵旨行事’。遂即登程”②〔见 8, 卷 21, 页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章京四十一员，兵二千五百人，往征黑龙江地方。谕之曰：‘尔等此行，道路遥远，务奋力直前，慎勿惮劳而稍怠也。俘获之人，须用善言抚慰，饮食甘苦，一体共之，则人无疑畏，归附必众。且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尔等向未之知，是以甘于自外。我皇上久欲遣人，详为开示，特时有未暇耳。今日之来，盖为尔等计也。如此谕之，彼有不翻然来归者乎？尔等其勉体朕意。……’谕毕，赐食。又谕曰：入略之后，或招捷，或送俘，必令由席北绰尔门地方经过为便；将来遣人往迎及运送军粮，亦必于此处相待。其应略地方，须问向导人。有夏姓武因屯长喀拜，从役二人，库鲁木图屯长郭尔敦，从役三人，及纳屯一人，适已偕至，今俱令其从军矣。尔等可率之以往。经行道路，询彼自知。若彼处已经略定，此归附三屯，不可稍有侵扰，宜令留于本处，仍谕以：因尔等输诚来归，故使复还故土，自后宜益修恭顺；倘往来稍间，必谴责立至矣。若所略不获如愿，则不必留此三屯，当尽携来；凡器用之属，有资军实者，亦无使遗弃。军还，务令结队而行，不可分散。尔等其凛遵焉。谕毕……”（卷 21, 页 14 下—16 上）。——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是日，召屯长喀拜、郭尔敦等及其从人进宫，赐食。既出，命沙尔虎达、穆成格传谕喀拜等曰：‘尔地方僻陋鄙野，不知年岁。何如率众来居我国，共霁声教？朕久欲遣人往谕尔部，但国务殷繁，未得暇耳。人君各统其属，理也。尔等本我国所属，载在往籍，惜尔等未之知耳。今尔诸人率先归附，若不遣尔还，留居于此，亦惟朕意。朕知尔等贤，故遣归。此行可引我军前往，凡各屯寨，其善指示之’。喀拜对曰：‘诚如上谕’。遂受命而去”（卷 21, 页 16 上—16 下）。——译者

16 上]。

上面援引的谕旨，是满洲统治者不仅对东北各部落，而且也是对其周围四邻施行的虚伪诡诈的外交伎俩的明显例证。然而，此次阿巴海提出的同宗共祖，以及这些部落（自由猎人）过去似乎隶属满洲人的无稽之谈，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获得实际效果的不是外交手段，而是侵略者的军事优势。霸奇兰和萨穆什喀就此次出征结果提出的报告，最好不过地揭示出满洲人向阿穆尔沿岸地区各部落表示的“友谊”，究竟有何真正价值，这份报告也使我们想象出满洲人劫掠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民族的规模。《太宗实录》中在 1635 年 5 月 29 日这一天援引了这份报告。

“臣等招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三人，人口共计七千三百零二人；所获牲畜，计：马八百五十六匹，牛五百四十三头，驴八头。此外，又俘获妇女儿童一百一十六人，马二十四匹，牛十五头，以及貂皮和其他毛皮三千一百四十余张”^①〔见 8，卷 28，页 7 下——8 上〕。根据谕旨，把后一半战利品分配给两翼的军官。凡归附满洲人者，均分得房屋、耕地、衣服、什物和粮食。

1635 年 6 月 6 日，将领们凯旋而归。贝勒阿巴泰奉命率众军官迎接。一天之后，“黑龙江索伦部落头目”巴尔达齐来到满洲宫廷，进贡貂皮。他受到特殊礼遇：礼部代表到距盛京五里之外的地方去迎接他〔见 8，卷 23，页 8 上；另见 5，卷 152，页 5 下——7 下〕。

阿巴海命令将霸奇兰和萨穆什喀带回的二千四百八十三名壮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天聪九年夏四月癸巳）“是日，出征瓦尔喀之霸奇兰、萨穆什喀，令白奇及兵部启心郎颜色黑、伊木布贵捷音至，奏报：收服、编户壮丁二千四百八十有三，人口共七千三百有二；所有牲畜：马八百五十六，牛五百四十三，驴八。又俘获妇女幼稚一百一十六人，马二十四，牛十七，及貂皮、狼皮、狐皮、猞猁皮并水獭、骚鼠、青鼠、白兔等皮三千一百四十有奇，皮裘十五领”（卷 23，页 7 下——8 上）。——译者

丁，编入各新成立的牛录之内。由于军队掠来大量儿童，命令拨给每个牛录二百名儿童，可不入册。

虽然此次出征告捷，但据文献资料证实，满洲人并不相信归附者忠诚可靠，因而把他们带回。尽管军队撤走，被掳的当地居民也被迁离了他们住惯了的地方。《太宗实录》中有一种说法，说正是经过这次远征，满洲人才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整个“黑龙江地方”。该文献资料指出：“往征黑龙江，其地悉被征服，所获之人均编入民户，〔军队〕班师时，将其尽数携回”^①〔见 8，卷 23，页 9 下一 10 上〕。如前所述，“黑龙江地方”极其辽阔，因此只靠一次远征不能将其征服。而且遗憾的是，文献资料中丝毫没有指出此次远征“黑龙江地方”究竟指何地区，究竟对哪些部落（看来，极可能是虎尔哈部）进行了远征。

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首先只能用满洲人对阿穆尔河流域及其实际面积全然无知来加以解释，即使“黑龙江”仅仅是指松花江流入地区的阿穆尔河中游。其次，该文献资料所提供的后一部分 [62] 情况，与前一部分有一定的矛盾。该地区大部分当地居民被驱赶、迁徙到征服者的领土上，在被“征服”的领土上既未设置哨所，也未屯兵戍守，同时亦未采取任何开发该地的措施，总之，并未留下任何此地区隶属满洲国的痕迹，那么，这样的地区，未必可以认为是已被占领（征服）的地方。最后，文献资料记载说，后来对这些“被征服的”领土又曾一再组织军事征伐这一事实，又怎能与“征服”二字协调一致呢？

经我们对满洲人的几次远征进行研究后，我们认为，不能证明征服任何领土的事实。如果考虑到，若把当地居民留居原地，而满洲人在客观上又不拥有控制他们的实际力量，那么所谓“征服”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征黑龙江，尽克其地。所获人民，全编氓户，携之以归”（卷 23，页 9 下）。——译者

的事实也无法加以解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必须在此保持常驻的满洲驻防军，保证向他们按期供应所需，着手开发疆土，等等。看来，满洲人在这方面不仅没有足够力量，而且也不想去做此事；既没有在满洲军队进入的领土上建立其国家机构，也没有留置驻防军。就连满洲人也承认的当时的国际法来看，对任何土地的征伐（也如同临时占领一样）都不能给予入侵一方以领有该领土的权力〔见 135，第 302 页〕。例如，1618 年 5 月努尔哈赤侵入明辽东领土并占领这里的一系列中国城市后，尚未覬覦这块中国领土；就是在 1619 年粉碎二十万中国联军之后，也未覬覦这块领土。只是后来，在 1621 年，攻占盛京、辽阳和包括七十余座大小城镇的整个辽东领土之后，努尔哈赤才起意把这个地区全部并入满洲国版图，通过迁入新获得的土地和把自己的首都先是迁到辽阳，后来又迁到盛京等步骤，才实现了这一想法。看来他意识到，进行一次军事远征的事实，并不能给予入侵一方以占有任何领土的权力。

况且，除了上述满洲文献资料提到“征服”黑龙江地方之外，就再也找不到任何征服这一块领土的其他资料了；相反，文献资料中 [63] 明确谈到捕获尽量多的俘虏的必要性。我们在前面全文援引的阿巴海颁给其将领的谕令里，甚至没有暗示必须夺取黑龙江土地，其中只提到必须迁徙居民和掠夺属于他们的财物。

凡此一切使我们有充分根据得出如下结论：对并不隶属满洲人的“黑龙江”居民首先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控制，乃是此次远征的主要目的。

我们的观点可以用《太宗实录》中的下述文件来证实。紧接着关于远征的记载之后，《太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重要记载：“来自黑龙江贡貂者，有塞布奇屯巴尔达齐等十六人，噶尔达苏屯四人，戈博尔屯二人，额苏里屯萨岱等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股屯四人，乌鲁苏屯二人。以上诸人，皆系往日曾经来朝并已遣还之

人。又首次来朝者，计有榆尔根屯一人，海轮屯二人，固浓屯一人，昆都轮屯一人，吴蓝屯一人，又索伦部游牧民八人等，这些人皆因马匹羸弱留于科尔沁地方。今彼等已不再对我仇视，携来貂皮，意欲与我交易。〔今〕彼等已知相让原则，已不似先时执拗（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①〔见 8，卷 23，页 27 上—27 下〕。这显然是满洲人施加军事压力的结果。从这段记载中可十分清楚地看到，黑龙江无论在当时，还是在远征之后，始终处于满洲人实际控制范围之外；之所以决定组织对黑龙江的远征，是因为企望保障与当地各部落的物物交换不致间断，而通过物物交换，满洲人可以从该地区在对自己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得到珍贵的毛皮。在文献资料里提供这种用来交换的毛皮，被记载为进“贡”（“虎尔哈慢不朝贡”），这是对于外货输入的最通行的表现形式。

最后，关于霸奇兰和萨穆什喀的远征，必须指出对被征部落的记载中的极为奇怪的混乱现象。文献资料记载，此次准备远征的是虎尔哈部；汗的谕旨中却说，令霸奇兰和萨穆什喀往征“黑龙江地方”，没有指明究竟征伐哪个部落；接着，文献又记载说，这些将领“出征瓦尔喀”〔见 8，卷 23，页 7 下〕。往下，在只隔几行的地方，又说“往征虎尔哈部落将士凯旋”〔见 8，卷 23，页 8 上〕。这真是混乱已极，在满洲人的概念中这个“黑龙江地方”竟住满了实际上住在与朝鲜交界和日本海沿岸等地的“瓦尔喀部”。这一切对于弄清满洲人关于北方领土和他们在北部和东北部远邻的地理概念，都是极为重要的笔录。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天聪九年六月壬午）“又黑龙江贡貂者，塞布奇屯巴尔达齐等十六人，噶尔达苏屯四人，戈博尔屯二人，额苏里屯萨岱等二十四人，阿里岱屯八人，克服屯四人，吴鲁苏屯二人——此皆旧日往还之人。又新至者，榆尔根屯一人，海轮屯二人，固浓屯一人，昆都轮屯一人，吴蓝屯一人，又索伦部落游牧八人内至者四人，其余因马瘦留于科尔沁地方。先后共六十七人。阵获新人及来贡貂皮者，俱在彼地，已释其暴戾之心，以貂皮来与我等贸易，皆知相让，不似先时执拗矣”（卷 23，页 26 下—27 下）。——译者

这些地区后来发生的事件表明了满洲人对上述“黑龙江地方”的“征服”实际上达到了何种程度。下述事实便可证明：在满洲人远征此地的次年，即1636年，当地鄂伦春部落⁴⁷进攻和抢掠了科尔沁蒙古人，而满洲人却一筹莫展，无法保卫自己的贡民。

在叙述以后事件之前，非常有必要指出在满洲军大规模强行迁徙当地居民之际，经常发生被迁者逃回故土之事。满洲人千方百计地尽力抓捕逃跑者，并残酷地予以惩治。由于广泛吸收俘虏加入八旗军服役的结果，逃跑之事更加不断发生。因此，满洲人不得不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并制订一定的追捕策略，而且这种追捕策略是由满洲汗本人钦定的。这无疑地证明在阿巴海统治时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见8，卷48，页8上〕。

满洲人追捕叶雷一事，也许是最典型的。《太宗实录》在1636年3月31日这一天记载，一支满洲队伍在追捕蒙古茂明安部逃人时，“乘便”俘获三十五户，其中有喀木尼汉壮丁一百一十人，以及某席达里处的人〔见8，卷27，页30上—30下〕。在1636年6月4日这一天又记载，满洲人阿赖达尔汉又至使鹿部⁴⁸喀木尼汉地方，俘获十八名男人，其中包括酋长叶雷和十一名妇女，并把他们献给阿巴海〔见8，卷29，页2上〕。阿巴海于6月6日^①赐阿赖达尔汉“收服”之叶雷及其下属十七人衣帽等物。

然而，该文献资料在1636年12月28日这一天却记载道，叶雷率本部人员，携妻子儿女（共八十二人），并赶着牲畜从多博库地方逃跑〔见8，卷32，页19下—20上〕。

阿巴海下令立即追赶逃人。带头前往追捕的是吴巴海率领的[65]宁古塔兵，席特库、噶尔纠率领的挂尔察部兵，以及两位蒙古汗及其部众。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此事为“崇德元年六月丁丑”，当为1636年7月6日（卷30，页6上）。——译者

满洲人俄尔多木和托果代追捕叶雷至黑龙江。当俄尔多木行至博穆博果尔处时，召博穆博果尔也参加追捕逃人。一个月以后，满洲人发现了逃人行踪，于是，俄尔多木留下博穆博果尔，亲率十名兵丁继续追赶。他从叶雷手中夺回一百七十匹马。过了二十天，被追捕者^①回到博穆博果尔住处。又过了十七天，俄尔多木再次同吴巴海、席特库会合后，到达温多河，在此终于追上逃人，将他杀死〔见 8，卷 36，页 6 上—6 下〕。之后，吴巴海奏称：“臣等率宁古塔兵一百，科尔沁盟蒙古兵六百，出边界（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经五十日（闰 6 月至 7 月期间），行抵温多河，追及叶雷，将所有逃人就地殄灭”^②〔见 8，卷 36，页 4 上—4 下〕。各文献资料中根本没有提及在追捕叶雷的时候“征服”当地各氏族之事。

看来似乎一切都很清楚，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太宗实录〉中却出现了下面这样一句没有任何根据的话：“席特库追捕他（指叶雷——格·麦·）至北海，将其斩首”^③〔见 8，卷 48，页 9 上〕。

根据满清文献资料无法确定温多河的位置。博穆博果尔的主要驻地，看来是爱浑西北的乌鲁苏屯（见附录）。至于满洲人对“北海”以及前面提到的“东海”和“南海”这些名称，实际上究竟如何理解，可以根据官修满洲文献资料中的下述具体记载来加以判断。

《太祖实录》中，在叙述三位天女和清朝祖先是“神女”所生的神话之前，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努尔哈赤祖先的故乡（直译为

① 原文如此。按此处系指俄尔多木等追捕者，而非被追捕者叶雷。详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 36，页 6 上—6 下。——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二年六月辛丑）“是日……增吴巴海敕辞曰：‘追喀木尼汉部落叶雷时，率宁古塔兵一百，科尔沁盟土谢图亲王、卓礼克图亲王兵六百人，出边行五十日，至温多地方追及叶雷并同叛之人，皆杀之……’”（卷 36，页 4 上—4 下）。——译者

③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后叶雷遁去，席特库追至北海，斩之”（卷 48，页 9 上）。——译者

发祥〔地〕——格·麦·)为长白山……〔此〕山之巔有一大湖名曰
闕门，方圆八十里，其水源极深。〔由此湖〕流出三江——鸭绿江、
混同江、爱淙江。鸭绿江自西南山坡流下注入辽东之南海。混同
江〔自北山坡流下〕注入北海(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爱
淙江东流入东海……”①〔见 8②,卷 1,页 1 下〕⁴⁹。

在这里混同江指的是松花江，虽然当时这个术语是表示松花
江流入阿穆尔河之后的阿穆尔河下游。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北海
〔66〕是现今鞑靼海峡地区；东海是爱淙江(今图们江)流入的现今的日
本海；南海是黄海的西朝鲜湾。

首先应该指出满洲文献资料中关于叶雷的记载的某些混乱情
况。第一、从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追捕逃人的
主要“功劳”应归于俄尔多木和吴巴海，根本不能归于席特库，虽然
他们是联合一起追上叶雷的。其次，喀木尼汉部落，确切些说，喀
木尼汉氏族(看来是当地的一个鄂温克氏族)的游牧地，肯定当在
阿穆尔河上游某处，俘虏正是从那里迁来的。同样自然的是，叶雷
力图逃离满洲人，不是随便逃到什么地方去，而是要返回他被强迫
离弃的故乡。同样可以断定，叶雷为了摆脱追捕者，几乎是在同一
一个地方，即在博穆博果尔居住地区某处转来转去。而博穆博果尔
居住地区位于阿穆尔河中游流域，可能在结雅河注入阿穆尔河处
以西的地方。因此，这不可能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在“北海”附
近)，尤其不能象何秋涛断定的那样，在贝加尔湖附近。何秋涛写
道：“目前这些地方(哪些?——格·麦·)属于俄罗斯。综观〔对

①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穆尔哈齐先世发祥于长白山……山之
上有潭，曰闕门，周八十里，源深流广。鸭绿、混同、爱淙——三江之水出焉。鸭绿江自
山南西流入辽东之南海；混同江自山北流入北海；爱淙江东流入东海”(卷 1, 页 1 下—
2 上)。——译者

② 原书参考书目编号 8 是《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但查《太宗实录》中无此记
载。——译者

此问题]之研究,可以认为,俄罗斯自崇德四年(1639年,——格·麦·)起,刚刚获得贝加尔湖附近之地。而这些地方在崇德元年(1636年——格·麦·)尚未属于俄罗斯。由此北行数月(?!——格·麦·),可直达濒临北海之地^①[见241,卷2,页4上]。接着他在其著作中试图使人相信,席特库此次出现在“北海”以后,便“使濒临北海之全部领土尽归满洲人”,而且直到“北海”的“索伦人”(?!——格·麦·)悉数被清人征服,并接受了满洲的全部制度”^②。实际上,文献资料里只谈到席特库追捕叶雷时,曾到达北海,只字未曾提及席特库此行还征服了濒临北海的什么领土。

由此可见,何秋涛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地理基础知识是一无所知,或者说,这也是他作为研究者明显暴露出的极不认真、抱有偏见的态度的又一例证。

与何秋涛相反,日本作者稻叶岩吉在叙及叶雷事时,得出的结论说:“满洲统治者远在太祖(努尔哈赤——格·麦·)统治时期,便已开始黑龙江使用武力,但根本未把攫取该地领土作为自己的目的”[见256,第2卷,第107页]。他正是用了满洲人追捕叶 [67] 雷的实例来论证自己的见解的。

《太宗实录》中还有一篇记述1638年1月27日喀木尼汉逃离满洲人的文件。对逃人曾组织过追捕,但未能抓到。追捕者只报告说,喀木尼汉“向原籍”逃去。文献资料中对进行追捕的地区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彼等(指逃人——格·麦·)若西逃,尔等(指满洲将领——格·麦·)可至博穆博果尔住地;若北逃,尔等可到黑龙江地方(?!——格·麦·),若东逃,尔等则至额尔德木尔地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今其地属俄罗斯。考总记言,俄罗斯于崇德四年始得白哈儿湖附近之地,则当崇德元年,尚未属俄罗斯也。由此北行数月,直抵北海。按之方朔、道里,无不密合”(卷2,《索伦诸部内属述略》,页4上)。——译者

② 《朔方备乘》中的记载是:“于是黑龙江全境索伦诸部皆称臣妾,奉正朔,我疆我理尽东北海矣”(卷2,页6下)。——译者

方”^①〔见 8,卷 40,页 8 上—8 下;256,第 2 卷,第 107 页〕。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喀木尼汉与叶雷都是逃往同一地区,即逃往博穆博果尔居住的地区。

1643 年,当满洲国国势显著加强,它的对外政治地位已经巩固的时候〔见 8,卷 63,页 15 下^②〕,以及在五十年代,当根特木尔,以及图伊多浑、宝岱、温都^③等一些以前看来曾承认名义上隶属满洲人,并接受满洲人赐给的佐领这样高级军职的达斡尔和鄂温克酋长投向俄国方面的时候,文献资料中仍然经常提到从满洲人处逃跑之事。

根特木尔是鄂温克酋长。当俄国政府部队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刚一出现,他便立即加入了俄国国籍。从 1651 年起便开始缴纳实物税。据根特木尔本人讲,在此之前,除了自己的氏族和乌卢斯外,他还拥有石勒喀河两岸的“许多达斡尔耕民”,而且从未向任何人缴纳过实物税。

清政府直至 1689 年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一直坚持要求交还根特木尔。在准备实现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征服计划时,清政府把争取当地居民脱离俄国国籍作为自己的目的〔见 35,第 49—52 页〕。

在谈到这些事件的时候,还应该详细谈谈一个值得注意的文件。这一文件清楚地证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当地居民对同满洲国建立对外政治联系是有明确的目的的,据我们看来,这首先是由于他们需要同满洲人进行物物交换所决定的。《太宗实录》中在 1637 年 3 月 13 日这一天有如下记载:“俄伦扎尔固齐和克讷布鲁达尔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彼如西走,臣等当至博穆博果尔地方;彼如北走,臣等当至黑龙江地方;俄如东走,臣等当至额尔德木尔地方”(卷 40,页 9 上)。——译者

② 查《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 63,页 15 下无此记载。——译者

③ 此三人名按俄语音译。——译者

汉率九人自黑龙江地方额苏里屯来此，奏称：‘距额苏里屯东约六日行程处有前此未通我国（即满洲国——格·麦·）之三十九屯。〔68〕如今彼等希望贡献方物，但不谙纳贡礼仪，特请我等会同皇上使臣一人往见彼等。届时彼等备齐方物，随〔该〕使臣来贡。为此，特遣人来，献上礼物，计有貂皮、狐皮二百零六张，貂皮桶七袭。谨奏’^①〔见 8，卷 34，页 10 上—10 下〕。然而，后来在文献资料中却没有关于这些屯落的任何材料，因此可以断定，满洲人始终未派出使者去同这些人建立联系。

1637 年 6 月 4 日，文献资料中再次出现博穆博果尔的名字。他是黑龙江索伦部落首领，自动来满洲朝廷向汗贡献马皮和貂皮^②〔见 8，卷 35，页 3 下—4 上〕。正如以后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博穆博果尔及其他当地索伦人首领是率领独立的索伦部落使团来访满洲人的。这一时期，由这些索伦部落形成索伦族的聚集过程已可略见端倪。博穆博果尔、褚库尼等来访的索伦首领，在满洲人那里度过一个半月多时间，于 1637 年 7 月 26 日携带阿巴海的慷慨馈赠，返回本土去了〔见 8，卷 36，页 8 上〕。

1638 年 1 月，文献资料记载道，命令将领叶克书和星纳率领大批军官及六百名士兵往征挂尔察部〔见 8，卷 39，页 28 下—29 上〕^③。文献资料中没有指明该部居住地点，但从以后的有关此次远征的记述中可以弄明白，这两位将领往征的是“黑龙江”和“萨哈尔察地方”。文献资料记载道：“崇德三年四月甲午（1638 年 5 月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二年二月丁亥）“是日，黑龙江地方额苏里屯内俄伦扎尔固齐、克纳布鲁达尔汉率九人至，奏言：额苏里屯东约六日程，有从未通我国者三十九屯。今欲来贡，不知纳贡礼仪。求我等同皇上使臣一人至彼，即备方物，随使臣入贡。为此特遣人来。其所献之物：貂、狐皮二百有六，貂、狐衣服七领。谨奏”（卷 34，页 10 上—10 下）。——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黑龙江索伦部落博穆博果尔，率八人来朝，贡马匹、貂皮”（卷 35，页 3 下）。——译者

14日——格·麦·），大军征伐喀尔喀返回后，收到往征黑龙江（?1——格·麦·）之叶克书、星讷等人之捷报。将领们报称，彼等率兵行至萨哈尔察地方⁵²，俘获男人六百四十名，其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零四头（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⁵³〔8,卷41,页8上—8下〕。胜利者凯旋归来，受到隆重接待，战功卓著的军官和士兵得到赏银。此外，文献资料中特别提到奖赏星讷之事。

1638年8月和11月，满洲文献资料记载黑龙江索伦人（奉博穆博果尔、瓦代和噶凌阿等首领派遣）来“贡”〔见8,卷43,页10 [69]上〕⁵⁴。然而，阿穆尔沿岸地区各部落绝非满洲人推行对外政策的消极对象。同满洲人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显然并未使索伦人感到满意，于是他们断绝了同清廷的关系。日本作者稻叶岩吉完全因袭满洲文献资料的用语，也把博穆博果尔和他在阿穆尔河上建立的抗满部落同盟的武装斗争，称为反满“起义”和对清廷的“叛变”〔见256,第2卷,第116页〕。

这一地区以后发生的事件是直接同满洲人反对索伦人（博穆博果尔）和在其庇护下在阿穆尔河上形成的当地部落的强大反满同盟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1639年末，满洲人发动了讨伐索伦人的残酷战争。1640年4月28日，满洲将领萨穆什喀、索海等奏报，大军已到达库马尔河。满洲人在此地分兵，规定每族各按固定方向进攻。镶兰旗被派往乌兰海伦屯，命令伊孙去喇里阑地方。满洲将领萨穆什喀和伊孙逼近筑有木墙的索伦四城（铎陈、阿撒津、雅克萨⁵⁵和多金）时，遭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三年夏四月甲午朔）“……又闻叶克书、星讷等征黑龙江地方捷音……又叶克书、星讷等师至萨哈尔察，俘获男子六百四十名，家口一千七百二十名，马一百五十六匹，牛一百四头。一并附奏”（卷41,页8上—8下）。——译者

② 按应为《太宗实录》卷44,页10上。——译者

到顽强的抵抗。满洲人冲击四城失利，因而请求增援。右翼梅勒章京叶克书、拜、阿哈尼堪、谭布、兰拜和吴巴海率大批满洲披甲兵前来相助。全部力量都投入攻打雅克萨城的战斗。猛攻之后，满洲人焚毁了该城南门塔楼，八旗章京各率二十名披甲兵，再次攻打雅克萨。和託率先冲入该城，朱玛喇相继冲入。他们一面费很大劲向前推进，一面在进攻时纵火焚烧城市房舍。

这时其他满洲将领已把七个索伦屯的人驱赶到乌库尔城，在那里决定集中全部俘虏。

铎陈城居民对满洲军队进行了英勇抵抗。满洲人强攻该城，竟日未能攻下。次日，满洲侦察兵报告说，博穆博果尔之索伦军队主力正向铎陈附近集结，于是侵略者决定后撤。接着，满洲将领的奏章中写道：“〔属于〕俄尔吞、奇勒里等〔氏族〕之乌鲁苏屯博穆博果尔索伦人，会同来自两河——结雅河（兀赖布丁屯^①以东、乌木讷克^②、巴哈纳等〔屯〕以西〔各地〕）和黑龙江（额尔图屯以东、阿里喇^[70]以西〔各地〕）之士兵，计六千人，突然来袭〔我等〕”^③〔见 8，卷 51，页 8 上—8 下〕。

文献资料中的这段记载，使我们可以想象出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民族在这一时期的反满斗争的巨大规模。除了阿穆尔河中游流域以外，还包括结雅河流域南部在内的广阔地区上所有的当地部落，一致奋起抗击入侵的满洲人。集结在博穆博果尔旗帜下的六

① 《清实录》中的原文为：“精奇里兀赖布丁屯”（《朔方各乘》卷 1，页 5 上所载作“精奇哩乌拉布丁屯”），其中“精奇里兀赖”系满语，意为“精奇里河”或“黄河”；“布丁屯”为屯名，是江东六十四屯之一，位于精奇里江南岸。本书作者将“兀赖”冠在“布丁屯”前面，显然是错误的。——译者

② 原文误为“乌鲁纳克”。——译者

③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五年三月己丑）“……兀鲁苏屯之博穆博果尔、索伦、俄尔吞、奇勒里、精奇里兀赖布丁屯以东、兀木讷克、巴哈纳以西，黑龙江额尔图屯以东，阿里喇以西——两乌喇兵共六千，来袭正蓝旗后队”（卷 51，页 9 上）。——译者

千名士兵，就当时而言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

然而，满洲军使用了比较周密的策略，装备也比较精良，因而使博穆博果尔领导下的“民军”终于遭到失败。索海和萨穆什喀所属的军队设下埋伏，在紧急关头从后方向索伦军队发起进攻，使其仓皇失措，慌乱逃窜。索伦人死亡很多，四百名士兵被俘。奏章中写道：“博穆博果尔军队被击溃后，我等遂攻克其营”^①〔见 8，卷 51，页 9 上〕⁶⁵。

当萨必图、卓布退等往援萨穆什喀时，途中遭到铎陈和阿撒津二城四百名士兵的拦截。文献资料中记载道：“我军将彼等击溃，斩杀五十人。萨穆什喀令伊孙率五名章京及一百三十名士兵于铎陈地方设伏。杀敌七十人”^②⁶⁶。

同时，阿哈尼堪，巴山郎图^③和萨祿率两甲喇(团)士兵，攻击由五百名索伦兵守卫的挂喇尔屯。满洲人夺栅入屯，斩守兵二百人，生擒一百三十人〔见 8，卷 51，页 9 上一 9 下〕⁶⁷。文献资料中接着记载道：“八旗共俘获男子二千二百五十四人，妇女儿童四千四百五十人，掳获貂皮、猞猁狲皮、狐皮、狼皮、水獭皮、青鼠皮等共三千一百余张，皮桶二十袭”^④⁶⁸。

1640 年 5 月 8 日，巴尔达齐来见满洲将领，禀称：“唯我多科屯人未参与暴乱。各小河沿岸其他地方士兵皆支援博穆博果尔”。接着，文献资料中援引满洲将领的奏章：“我军大捷后，七屯之人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既败博穆博果尔后，随攻取其营”（卷 51，页 9 上）。——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又萨必图、卓布退、吴班、宜尔格得率兵九十人，往助萨穆什喀。时有铎陈、阿撒津二城兵四百人阻截，我兵击败之，斩五十人。萨穆什喀令伊孙率章京五员，兵一百三十人，于铎陈地方设伏，斩敌七十人”（卷 51，页 9 下）。——译者

③ 按《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巴山和朗图是两个人（卷 51，页 9 下）。——译者

④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八旗共获男子二千二百五十四人，妇女幼稚共四千四百五十名口；貂、猞猁狲、狐、狼、水獭、青鼠等皮共三千一百有奇，貂、猞猁狲、狐、狼等裘共二十领”（卷 51，页 10 上）。——译者

(看来是酋长——格·麦·):果博尔屯之温布特、博和里屯之额尔喷、噶尔达逊屯之科奇纳,木丹屯之诺奇尼、都孙屯之奇鲁德、兀尔喀屯之博卓户,得都尔屯之科约布鲁,皆归附额驸巴尔达齐。其他各屯之人虽已逃散⁶⁹,但据巴尔达齐称,逃者不久即可归来”①〔见8,卷51,页10下〕⁶⁰。

胜利后,满洲军返回盛京。阿巴海颁发特旨,强调归途中必须^[71]采取最严格的防范措施,不可放松警惕,指出此次满洲军是在远离他们国界的领土上作战的。谕旨中说:“进入我国领土时,〔尔等〕须经法库门〔关口〕⁴¹入,不可取道叶赫〔地方〕。途中须提防〔俘虏〕逃跑。朕恐彼等熟谙路径,趁尔等疏忽之际,重又逃走”②〔见8,卷51,页10上一11下〕。

1640年5月14日,萨穆什喀和索海又遣人奏疏至,奏称:

“臣等前奏,俘获二千二百五十四人。后又于额苏哩屯以西,额尔图屯以东俘获九百人。共俘获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人,妇女二千七百一十三人,儿童一千八百一十九人⁶²,总计六千九百五十六人⁶³;获马四百二十四匹,牛七百零四头;先后掳获貂、貉、獾、狐、狼、青鼠、水獭等皮五千四百余张,貂、貉、獾、狐、狼等皮桶共二十袭”③〔见8,卷51,页14下—15上;5,卷152,页8上—8下〕。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额驸巴尔达齐于三月十八日来会云:‘惟我多科屯人未曾附逆。’其小兀喇各处兵皆往助博穆博果尔。及我兵大捷后,果博尔屯之温布特、博和里屯之额尔喷、噶尔塔孙屯之科奇纳、木丹屯之诺奇尼、都孙屯之奇鲁德、兀喇喀屯之博卓户、得都尔屯之科约布鲁——七屯之人已归额驸巴尔达齐。别屯之人皆逃。据巴尔达齐曰:逃者亦必来归,无劳再举耳”(卷51,页10上—10下)。——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五年三月癸巳)“谕之曰:……回兵时……当沿途严加提防,不可少懈。入境时,须从法库门入,不可由叶赫一路来。途中谨防逃人,恐彼习知路径,乘间再逃”(卷51,页11上)。——译者

③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五年三月乙巳)“往征素伦部落萨穆什喀、索海遣党习、郭查等奏至。疏云:臣等前奏,获二千二百五十四人。后自额苏里屯以西,额尔图屯以东又获九百人。共获男子三千一百五十四人,妇女二千七百一十三口,幼小一千八十九口,共六千九百五十六名口;马四百二十四,牛七百有四。又先后获貂、貉、獾、狐、狼、青鼠、水獭等皮,共五千四百有奇,貂、貉、獾、狐、狼皮等裘,共二十领”(卷51,页14下—15上)。——译者

1640年6月14日，军队凯旋回至盛京。军队进入都城之前，皇帝亲率高级官员往迎他们。

关于使用索海和萨穆什喀所获俘虏一事的记载，文献资料中出现过两次——1640年8月：“索海、萨穆什喀捕获之新满洲（——格·麦·）壮丁二千七百零九人，妇女儿童二千九百六十四人，共计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将其平均分入八旗，编为牛录”^①〔见8，卷51，页23上—23下〕；同年12月27日：“索海、萨穆什喀招来之新满洲，计男子二千七百五十一人，妇女三千九百八十九人，著编入八旗，赏赐衣服、布匹等物”^②〔见8，卷53，页13下〕。索伦军队一次又一次地遭受挫折，这迫使某些索伦氏族暂时停止了对满洲人的武装抵抗。当年八月，阿巴海再次遣席特库、济席哈等将领率满洲军征讨博穆博果尔。被击败的博穆博果尔逃入蒙古。席特库跟踪追击。他在送回的奏疏里说：“我等于甘地擒获男子一百七十四人，处死十一人，〔战斗中〕斩杀七人，逃一人。于齐洛台地方擒获博穆博果尔及八十名男子，处死二人，斩杀二人。总计俘获^[72]二百三十一名男子，加上妇女儿童，则共七百二十五人。于〔上述〕两地获马七百一十七匹，现仅存六百五十匹，役畜一百二十七头”^③〔见8，卷53，页20上—20下〕。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五年秋七月癸未）“以索海、萨穆什喀所获新满洲壮丁二千七百零九人，妇女幼小二千九百六十四口，共五千六百七十三人，均隶八旗，编为牛录”（卷52，页12上—12下）。——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五年十一月壬辰）“先是索海、萨穆什喀携来新满洲男子二千七百五十一名，妇女三千九百八十九口，编入八旗，至是，均赏衣服、布匹”（卷53，页13下）。——译者

③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五年十二月己未）“出征索伦部落席特库、济席哈遣归痕戴青、孟格图、艾达汉、迈图等，以擒获博穆博果尔奏报：于甘地获男子一百七十四名，斩十一人，死者七人，逃一人；于齐洛台地方获博穆博果尔及男子八十人，斩二人，死者二人，共计现存二百三十一人。现在妇女幼稚共七百二十五名口，二处共得马七百一十七匹，今止存六百五十匹，牛一百二十七头”（卷53，页20上—20下）。——译者

时过未久，于1641年2月25日，文献资料记载席特库和济席哈旋师归来。将领们加官晋爵，并获得丰厚赏赐。

1641年6月，索伦部落的蒙塞尔、瓦代和巴尔达齐率家人、仆从，共二百零四人“来降”（文献资料中的用语）。他们受到隆重欢迎。几天之后，索伦部落又有一千四百七十一人来到满洲人处，他们也受到盛情接待^①〔见8，卷55，页30上—30下〕。

总之，满洲人于1640年曾采取了大举入侵阿穆尔中游地区的行动，当地居民对侵略者给予坚决抵抗。满洲军不得不长期作战，战事席卷了相当大的地区。这场战争使索伦人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较先进的军事组织和较精良的武器装备决定了清军的胜利。

在1640—1641年期间，即在同索伦人进行战争时期，文献资料记载说，满洲朝廷还广泛地施展了外交策略，尤其对“来贡”的索伦人，对“返回满洲人处”的某些索伦氏族首领，以及对萨哈尔察部和虎尔哈部的首领更是重加赏赉。通过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满洲人对其相邻部落和氏族推行的仍是那一套“皮鞭加蜜糖”的政策。

由此可见，满洲文献资料本身就推翻了关于满洲军远在1635年就已“占有”和“征服”“黑龙江”的最初资料。既然在1639—1640年间满洲军又在这些领土上进行了积极的军事行动，而且其规模就当时而言颇为巨大，那么，在满清官修文献资料关于“黑龙江”地位的记载里便可发现明显的矛盾。

事实上，正如后来满洲人同索伦人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所表明的那样，不仅在1635年，就是在1639—1640年间，也并不存在满洲人征服“黑龙江”，并使当地各民族归顺满洲人的事实。满洲人后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六年五月丁亥）“索伦部落蒙塞尔瓦代之子巴尔达齐率其户二百四人来降。命迎至北驿馆，宴之。”（崇德六年五月己丑）“索伦部落一千四百七十一人来降，命迎至北驿馆，宴之”（卷55，页30上—30下）。
——译者

来又在 1640 年当年〔见 8, 卷 51, 页 33 下〕, 1643 年 5 月〔见 8, 卷 64, 页 25 下—26 上〕和 1645 年 1 月⁶⁴〔见 11, 卷 5, 页 4 上〕多次侵袭“黑龙江”,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1643 年 9 月 10 日, 阿巴海崩逝。被指定辅佐年幼的顺治皇帝〔73〕的摄政王是他的叔叔多尔袞, 1644 年, 当满洲人准备再次侵袭中国时, 中国将军吴三桂派使者来见多尔袞, 请求满洲人派兵经山海关进入中国内地, 帮助中国封建主粉碎当时已攻克明帝国首都北京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多尔袞深恐陷入什么圈套, 予以回绝了。于是, 吴三桂不得不先后八次向满洲人提出这一请求⁶⁵。

清人进行的征服性远征开始了新的阶段——满洲人侵夺中国本土和镇压中国人对异族侵略者的反抗。从此时起, 忙于在中国进行长期的艰苦战争的满洲人, 不得不把自己的主要兵力投入中国战场, 因而再未对东北各部落进行任何远征。阿穆尔河和滨海地区各族人民遭受满洲侵略者奴役的危险暂时减缓了。

各种历史文献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考证该地区遭受满洲人侵略的各部落和部族的分布地点和弄清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满洲人历次远征所达到的地理区域的可能性。满洲人远征的主要地区是松花江及其支流——诺尼江和牡丹江流域。有几次侵袭也曾到达阿穆尔河的上、中游右岸地区以及乌苏里江及其支流流域。文献资料中提到的西北部边上的点是雅克萨城, 此城后来被毫无根据地考证为在该地区修筑的阿尔巴津城; 东北部边上的点是乌苏里江下游的乌扎拉地方; 东部边上的点则是绥芬河附近的额黑库伦和厄勒约索地方。

由于满洲人历次远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取和牢牢控制新土地, 也不是要通过远征来扩展满洲的疆界, 所以满洲军所到达的上述地点也绝对不是那一时期满洲国的什么边境地区。

满洲人深入这些地区的程度, 以及他们对这些地区的了解,

极不相同。在这方面可以指出例如这样一个情况，即十七世纪前半叶的满洲编年史从未载有关于象费雅喀(阿穆尔河下游那乃人、乌里契人、尼福赫人的总称)和达斡尔这样两部分基本居民的任何 [74] 资料，甚至都没有提及这两个名称。而在十七世纪后半叶的编年史中，大约从六十年代起，这两个名称才开始出现。

援引的《太宗实录》及其他文献的材料，也推翻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作者何秋涛、顾颉刚、刘选民、蒋廷黻等人所提出的观点，即把满洲人对远东诸部落和部族的军事征伐看作满洲人对这些部落居住的领土的征服。这一观点与实际情况不符，因为这些远征只是偶然性的侵袭，不是为了要建立满洲人对上述领土的某种经常控制的形式，满洲人进行这些远征只是为了迁徙居民。把当地居民赶到一起并把他们迁到满洲领地这个事实本身，便排除了把清军到过的领土并入满洲国和开发该领土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作者中谁也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实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对所有这些人来说，“远征”的概念与“征服”的概念是相同的，他们所作出的领土归属的结论，仅仅是根据满洲军曾经远征过那里，然而入侵的事实并不能给入侵者方面以任何占有领土的权力。

还可以用下述事实来驳斥关于“征服”的说法，即满洲人曾对同一部落的同一地方曾进行两次甚至三次远征。从征服领土的观点看来，这个事实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满洲第一次远征就已经在这里战胜了彼此隔绝的当地各民族)，但如果考虑到进行这些远征所追求的实际目的——掠取当地部落的人力资源，那么这一事实却是完全可以解释得通的。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的远征之后，在满洲文献资料里依然找不到该具体地方已被征服和并入满洲国版图的资料。前面提到的编年史对“征服”黑龙江地方的记载，是唯一

的属于这一类的论点。

各文献资料中的上述证据，客观地反映了在当地形成的实际情况：满洲军对当地某一部落进行一次侵袭之后，仍循原路而归，
[75] 没有留下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该地区并入满洲国版图和该地居民归附满洲国君主统治等等。相反，满洲人没有采取把这些领土固定为已有的任何措施。满洲人没有试图向这些地方殖民和开发这些地方，没有在这些地方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构，没有留下自己的驻防军；从来没有在此地建立哨所或边卡以确定满洲国任何“势力范围”的界限。

在我们看来，这一重要情况提供了一个弄清十七世纪满洲国疆域以及这个国家在东北的领土边界的线索。

满洲统治者阿巴海根本没有认为，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实际上划入了满洲国版图。他就此问题发表的言论，显然最具有权威性。

相反，他把这些地方看作是位于满洲国界外的领土，但受到某种“良好教化”。例如，1635年12月，在评述一个蒙古人在萨拉穆连河地区捕获一只黑狐这件事时，阿巴海说：“黑狐产于长白山以东至滨海之倭哲（可能是窝集——格·麦·）、虎尔哈部落之地，当地人每年持以进贡。我国（指满洲国——格·麦·）不产黑狐。又辽河不产鲟鳇鱼，此鱼产于乌喇江（即松花江中游——格·麦·）和黑龙江（即阿穆尔河）……”①〔见8，卷26，页2上—2下〕。

诚然，为了外交目的，阿巴海有时也随心所欲地宣布，凡同他的国家有联系的民族，都是他的“臣民”。这是效法中国中心主义的对外政策，建立清国的满洲中心主义的对外联系的一种尝试。例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天聪九年十一月癸丑）“有图默特者，于西拉木伦河地方，遇黑狐，为犬所啖，获之，持以献上。黑狐产于长白山遼东滨海倭哲、虎尔哈部落之地，土人岁以进贡，非我国所产。又辽河向无鲟鳇鱼，惟乌喇江、黑龙江有之”（卷26，页2上—2下）。作者所引的这段话并不是皇太极说的。——译者

如，1642年7月，阿巴海在致明帝国统治者的外交照会中写道：“余继承皇考太祖皇帝（指努尔哈赤——格·麦·）事业。自皇考登极以来，蒙上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岸（？——格·麦·），其间使犬〔人〕、使鹿〔人〕之邦，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76〕种、〔居民〕以渔猎为生之地，以及厄鲁特部落（准噶尔部落之一——格·麦·），到斡难河（鄂嫩河？——格·麦·）河源，所有远近之地，皆向〔余〕称臣”①〔见8，卷61，页3上〕。

该文件使用的汉语术语：“臣服”，这里尽可译作“称臣”或者甚至可译作“称藩属”，这种说法具有十足的郑重声明的性质。如果考虑到满洲国甚至对紧靠它的地区的统治也只具有名义上的性质，那么就不应把这个术语看成是上述各地统治者隶属满洲皇帝的藩属关系的真实证据。东北诸部同清国并没有藩属关系；应该指出，在太宗统治时期，甚至没有远征过该文件提及的使犬、使鹿两部，而使鹿部代表在阿巴海统治的十八年间也仅仅到满洲朝廷来过一次。

在一年以后（1643年9月）的另一文件里，在谈到满洲国的征战时，阿巴海的语气却谦虚得多：“〔它〕征服虎尔哈部及其他黑龙江原有诸部……〔之后〕自东海至北海极边之间使犬、使鹿诸国，输诚向化（俄语译为诚心接受〔满洲王朝〕之良好影响——译者）”②〔见8，卷65，页42下〕。

“输诚向化”这个概念同“征服”的意义根本不同。就这道谕旨而言，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满洲统治者没有对任何固定领土提出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崇德七年六月辛丑）“……予继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貂、黑狐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迹诸国，在在臣服。……”（卷61，页3上）。——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取黑龙江虎尔哈等之旧部……自东海暨于北海极之使犬、使鹿诸国，输诚向化”（卷65，页42下）。按这里的引文不是皇太极说的话。——译者

要求；至于提到对虎尔哈及“从海至海”（应当指出，所谓的西北海，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之间的其他诸部的征服，这只不过是通常的公文套语，应用这种套语，乃是为了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炫耀自己的威力，以自己的战功恫吓明帝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文件也必然包含一些固定的、从当时无论是中国的，还是满洲国本身的外交实践标准来看完全合法的公文中的夸张成分。

在我们看来，上述文件十分清楚地证明，在文献资料中始终被单独划出的东北领土的上述地区，甚至在阿巴海统治时期也不属[77]于满洲国，并未划入它的版图，而这一时期是对分散的邻近各部推行暴力政策的最厉害、最专横的时期。

因此，十分明显的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个部落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既不是满洲国的藩属，也不是它的臣民。这些部落居住的领土，至多不过是满洲人侵略性袭击的对象，是距离满洲人国界最远的掠取有生力量的源泉。

在作出这种结论时，充分考虑到了这样的客观事实，即满洲人对直至遥远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各个邻部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军事和政治影响，这种军事政治影响导源于满洲国的巨大军事潜力，满洲人对当地部落进行的多次毁灭性侵袭，八旗军对从中国人那里传入的火器的使用等等。满洲国的这一侵略政策，威胁着远东各族人民自身的生存，从而便产生了保卫和拯救他们自己的客观上的必要性。

承认满洲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各部落和各部族具有某种军事和政治影响，同满洲人在此时期未能实际征服当地诸部和未把他们的土地并入满洲国版图的提法并不互相矛盾。

在十七世纪中叶，现今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未划入清帝国版图，清帝国的边界远在阿穆尔河以南的地方，但当地各部落的使团经常入朝满洲朝廷。在这些部落尚无须反击满洲军入侵

的年代里，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族人民显然试图以简单的外交手段遏止满洲人的逼压：与其遭受强邻的劫掠，不如用毛皮和其它方物贿免。虽然满洲文献资料自行强调说，这些来朝廷进贡的使团大多数是完全出于志愿，但是这种“志愿”常常是由下述想法使然的：“宁可财物两空，也别丢掉性命。”然而这种方式的“外交交易”往往不能使满洲统治者满意。满洲统治者首先需要的是当地部落的有生力量，用以进行新的征伐的士兵，俘获的男人和妇女。因此，满洲人甚至在那些本来可以征收到贡品或实物税的地方，也直接采用了军事暴力。

然而，仍然有必要指出，在满洲人没有对远东诸部建立任何 [78] 实际控制的条件下，所谓进贡—赏赉制度在满洲人同这些部落的相互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应该强调指出，这种进贡制，正如 A. A. 鲍克夏宁在其著作中所证明的那样，对于明代中国，实际上只是虚假的隶属关系，即所谓“蛮夷部落”名义上藩属关系的一种反映〔见 58, 第 42 页〕。在满洲人与其“贡民”的关系上，这种进贡制在大多数情况下也起着完全相同的作用，因此重又建立一个满洲中心主义的“满夷”世界，即满洲人同其周围的“蛮夷”的世界。

然而，远东各族人民的祖先根本不是什么“蛮夷”，与满洲人相比，更是如此。正如苏联研究者——历史学家、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民族有自己最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文明有其真正独特发展的高度成就和特征〔可参看 155, 第 1—2 卷; 200; 112, 第 1 卷, 第 2, 4 页〕。远东某些部落(达斡尔人、索伦人、阿枪人、吉切尔人)的组织，到十七世纪中叶时，已经具有自己国家组织的雏型。他们互相之间的，以及同满洲人的来往都带有外交关系和对外政治联系的性质。对于这些部落和部落组织的联系，不能仅仅因满汉编年史按照后来的官方术语把他们派

往满洲朝廷的使团记载为“来贡”，而有其他的看法。尽管用了这种现代化的说法，我们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却相当经常地客观地指出，许多使团到满洲朝廷的目的并不是“纳贡”，而是向满洲皇帝“献礼”。通常为了表示敬意，第一次来朝时，要向满洲统治者献礼。而且各文献资料记载，这种来朝并不是经常的，多半是出于当地首领的政治考虑和物物交换的需要而进行的。

因此，可以把当地首领入朝满洲朝廷看作是一般的出使活动。

巴牙喇和革依克勒(克宜克勒)各“部落”(确切些说，是氏族)的代表朝见满洲朝廷最为经常。而且巴牙喇是定期来见满洲人的唯一代表，其朝见次数，大致可以确定为每四年一次。

[79] 其他部落代表的朝见极不经常。例如，从1633年起，在巴海及其他满洲将领远征乌扎拉部和当年11月某个名叫绰奇的虎尔哈人自乌扎拉地方来朝(此事与1633年的远征直接有关)以后，各文献资料在五年期间内再也没有提到该部。从1638年至1644年止，乌扎拉部就再没有进“贡”、献礼，它的代表也一直没有来朝满洲朝廷。应该指出，虽然1638年7月乌扎拉部曾经来“贡”，但满洲人于1640年却仍然远征该部。可见，向满洲朝廷主动进献方物，并不能保证满洲人不入侵和从各地迁徙居民。

东方各部派出使团，同满洲人远征这些部落往往没有直接联系。这一点通过巴牙喇氏族以及克宜克勒、托科罗和其他来自“东方”的、在阿巴海时代未曾遭受征伐的氏族的实例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这些事实再次证实了下面的结论：东北诸部首领相当广泛地运用了向满洲人微妙地“贿免”的政策——主动去献礼或进贡，以防止满洲人的军事侵袭。使我们注意到当地部落同满洲人的对外政治关系的这个方面的是B. C. 米亚斯尼科夫。

使鹿部和使犬部派人出使也属于这种情况。阿巴海时代，满洲军没有远征这些部落，也没有到达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各文献

资料证明，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内，使犬部同满洲人的交往，极其稀少，极不经常。在阿巴海在位的最初的七年半时间里，只字未曾提及该部，直到 1633 年 7 月，文献资料中才出现了一个名叫僧格的人来见满洲人的记载〔见 8，卷 14，页 30 下〕。下面这个事实很值得注意：僧格的名字首见于窝集部首领名单，这些首领是在 1610 年满洲将领远征宁古塔、尼马察、绥芬、那木都鲁等地时，自动归附满洲的。《八旗通志初集》中所载的《僧格传》证实，他生在宁古塔地方，于“国初”率三百户归附努尔哈赤〔见 5，卷 201，页 9 下〕。在这些事件之后，过了二十三年，僧格在满洲文献资料中已被称作使犬部代表了。这可以证明：第一、住在宁古塔地区的窝集部的一些部分也驾驭狗；第二、使犬部这个名称本身指的就是宁古塔部落或宁古塔氏族；最后第三、“归”（归附、归并）这个术语在 [80] 当时根本不表示所有“归附者”都必须和全部迁入满洲地区。1635 年 1 月文献资料中再次提到僧格来朝，而且确切指明他的住处是“使犬部盖清屯”〔见 8，卷 21，页 10 上〕。3 月，该部又有一个名叫索琐科的人来到满洲人这里〔见 8，卷 22，页 3 下〕。“来自东方”的僧格再次来朝，已是 1639 年 3 月，在此之后在长达十五年之久（至 1654 年）的时间里，满洲文献里便再也见不到有关使犬部的任何资料了。

在阿巴海统治的整个十八年期间，只提到瓦尔喀部、使鹿部和那堪泰“部”（此名系指一个那乃人氏族）各来朝一次。

还应该指出，文献资料中对许多“东方”部落和氏族的居住地点的记载都含混不清。不仅如此，满洲文献资料还往往把这些部落和氏族弄得混乱不清⁶⁶。

从 1627 年至 1644 年间，北部和西北部的各部落也经常派使团来满洲朝廷朝见。满洲文献资料证明，满洲人对北部和西北部的这些部落并没有明确的概念。满洲人在其文件中常常把这些部

落统称之为虎尔哈、索伦、萨哈尔察、挂尔察等名称，并且把它们相互混淆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满洲文献资料中每当谈到西北时，总要提到“萨哈尔察部落”（该部名称来自萨哈尔察地方的名称）和“索伦”。

我们在《太宗实录》里 1633 年 12 月 4 日这一天首次见到关于“萨哈尔察部落”的记载：“萨哈尔察部落首领费扬古和满代率领四十六人来朝，进献礼物：貂皮一千七百六十九张，赐布二千六百三十匹”^①〔见 8，卷 16，页 11 上—11 下〕。为使团举行了筵宴，对所有来者赠送了衣、帽、银器等物。

“黑龙江地方”各氏族也相当频繁地向满洲人派出使团，但根据《太宗实录》的记载，我们不能得出他们定期来朝的结论。虎尔哈的情况也是如此。至于挂尔察部落来朝，文献资料中只记载了一次。

在文献资料中，对于“萨哈尔察”和“索伦”记载得极为混乱，同 [81] 时，在满洲朝廷经常“代表”这两个部落的总是同一位达斡尔酋长巴尔达齐，看来，满洲人把上述两个名称首先是同巴尔达齐氏族联系在一起。巴尔达齐的住处可以根据俄国文件加以确定⁶⁷。

巴尔达齐来朝满洲朝廷相当频繁。他每次来朝（其中包括 1634 年 6 月的首次来朝）都是完全出于自愿。巴尔达齐和他的亲戚的出使可以作为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族人民同满洲国的对外政治联系的最典型的例子。

满洲人出于其政治目的考虑，对巴尔达齐给予特别慷慨的馈赠，为他举行豪华的宴会。1638 年 12 月，巴尔达齐派自己的弟弟萨哈莲率领大批随员到满洲朝廷来朝。满洲皇帝对他也同样予以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天聪七年十一月壬辰）“萨哈尔察部落之头目费扬古、满代率四十六人来朝，献貂皮千七百六十九张，赐布二千六百三十疋”（卷 16，页 11 上—11 下）。——译者

盛情接待〔见 8, 卷 44, 页 19 上〕。

对任何其他“部落”或氏族，我们在记载中没有见到满洲统治者给予象对巴尔达齐氏族代表那样慷慨的馈赠。这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满洲人对满洲军队从未进入其居住领土的遥远部落或氏族遣使来朝，对远居满洲国界外的部落遣使来朝，极其重视，并极力鼓励他们遣使来朝。十分明显，满洲人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使达斡尔酋长巴尔达齐成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传播满洲影响的传导者。

对满洲人同索伦人的相互关系⁶⁸，我们应当稍微详细地谈一谈。满洲编年史只是在 1635 年 6 月 7 日在记载索伦人派到满洲朝廷来朝的使团抵达盛京时，才第一次提到名副其实的索伦人（“黑龙江索伦部落”）。

满洲人同索伦人的关系，与他们同虎尔哈的关系，性质相同。前面已经指出过，满洲人曾不止一次地扮演了残酷的征服者的角色，企图以武力使索伦人降服清国。1639—1640 年间同满洲人进行武装斗争的结果，使索伦各部同盟遭到了失败。然而，这是满洲人同索伦人艰苦作战所取得的唯一成果。索伦人的土地并没有并入满洲国领土。满洲人在这些地方既没有建立军事管理机构，也没有设置民政管理机构。

然而，同满洲人斗争遭到的军事失败，对索伦人却产生了严重后果。首先，这次失败毫无疑问延缓了刚刚开始索伦部落和氏族聚集为索伦部族的进程。同满洲人进行的损失惨重的战争，大量居民被赶走，索伦屯落遭到洗劫，凡此一切使索伦人更加分散，阻碍了他们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他们的氏族制的解体过程。^[82]

其次，满洲人入侵以后，部分索伦人被迁到盛京地区，其中有些人被编入满洲八旗。然而，应当指出，满洲人同化索伦人的规模（八旗中只有两个牛录补充了部分索伦人）并不很大⁶⁹。

另一部分索伦人(三百三十七户)被迁到蒙古郭尔罗斯盟;满洲人试图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这批索伦居民,也将其编成牛录,不过这是特殊的牛录,既不属于满洲八旗,也不属于八旗蒙古。这批索伦居民的这种组织形式,纯粹是徒具形式。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上述牛录并未编入满洲八旗,同时这些索伦牛录必须通过自己的牛录章京向满洲人进贡。

各文献记载的有关索伦牛录章京(即被满洲人编入这种牛录的那批索伦居民的牛录章京)进贡的无数证据,十分明显地证明了那个强加给索伦人的组织,只是徒具外表形式。还应当补充一点,这些索伦牛录不从国库领取薪饷,其手下人员也没有什么俸禄。相反,这些索伦人还必须定期向满洲人进贡。

从1641年至1682年期间,满洲文献资料里只是偶而提到索伦人前来进贡之事。直至清帝国开始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准备对俄国领地采取军事行动(1682年)之前,文献资料中都没有提到满洲人同索伦人通过任何其他方式进行接触。依我们看来,这一情况只能证明一点:在对满洲国表示忠顺之后,索伦人便不再引起满洲人的注意了。

正是由于这一情况使满洲人丧失了同索伦人及其地区的直接联系,因而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洲人不得不重新寻找通往阿穆尔河的途径。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极为复杂的过程。

只要对《太宗实录》记载的有关满洲人军事远征的资料加以分析(文献资料中没有关于满洲人试图开拓上述领土的任何记载),便可得出结论:住在该地区东南部的满洲人对自己的邻居(特别是对居住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部落和部族)了解得很差,因而常常混淆了关于他们的资料。

满洲人对派来使团的地区记载得极其含混,甚至不指出是什么部落的代表来“贡”。例如,只说使团“来自东部”、“来自黑龙江

地方”或者“来自黑龙江”。

我们在《太宗实录》记载的关于当地部落到满洲朝廷来朝的使团的材料里，还经常发现关于某一部落居住地点的自相矛盾的记载。例如，文献资料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巴牙喇氏来自“东部”；然而《太宗实录》却具体指出该氏族的居住地点是松花江，即北部地区〔见 8，卷 21，页 14 上〕。

另一些清代文献资料证明，象克宜克勒和虎习哈礼这样一些虎尔哈氏族，实际上属于窝集部，住在三姓（“三个氏族”）地方，即在今牡丹江江口处的三姓城地区，就是说也在北部〔见 31，卷 3，第 46 页；168〕。

还应指出，在其他一些部落的名称上也有极其混乱的情形。譬如，巴牙喇、克宜克勒和虎习哈礼诸部，文献资料中时而称作独立的部落，时而又称作“虎尔哈部氏族”。克宜克勒和虎习哈礼两个氏族经常被称为“革依克勒”和“拈什喀礼”。

还往往见到把同一个人说成是不同部落代表的现象。例如，赖达库（赖塔库）时而是虎尔哈部代表，时而又是在库尔喀部代表；羌图里时而是“黑龙江地方”某部代表，时而是“黑龙江地方虎尔哈部”使者，时而又只是说来自“虎尔哈部”。

说到这里，还应该提到满洲人把“萨哈尔察部”和“索伦部”（实际上是达斡尔人）相混，以及多次把“索伦”同“虎尔哈”混为一谈等情况。

满洲文献资料中的这些混乱现象，只能解释为满洲人不了解这些部落，因为满洲人同这些部落的接触，或者是极其短暂的，或者只是对这些部落住地进行过偶然的侵袭。 [84]

满洲编年史里关于住在东北外围各部落的所有资料，都不外乎满洲人远征这些部落以及这些部落遣使到满洲朝廷入朝这两项内容，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与此同时，我们在满洲文献资料里却没

有发现任何有关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地区的阿尔巴西、拉夫卡依、图隆恰、托尔加等达斡尔酋长，在什么时候曾经入朝过满洲朝廷的记载，而这些酋长的名字在俄国档案文件里却被提到了。这也证明，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主要居民(达斡尔人)根本没有同满洲国保持联系。

说明到十七世纪前半叶末，满洲人同东北各部落和各部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就是如此。

第二章 东北和阿穆尔沿岸地区 (1645—1682 年)

[85]

第一节 满洲人侵入中国后东北的状况

满洲人侵入中国内地，迁都北京后，盛京被“尊”为故都或者留都，仍然保留了努尔哈赤于 1625 年给它起的名称——盛京（意为“神圣的都城”^①）。盛京的辖地——“盛京疆域”——开始被视为清朝的“神圣故乡”，而这片土地的大部分原先是中国的领土——辽东和辽西地区。

从顺治（1644—1662 年）亲政的最初几年起，盛京疆域即已荒无人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几乎所有满洲人都携家带口入山海关去征服中国，从而使东北生产力的发展在很长的年代里陷于停滞。在盛京仅留下了一支只有七百七十四人组成的满洲驻防军（见 2，第 1 卷，第 21 章，第 247 页）。

据史书记载，在东北境内除了盛京外，只在下列十五个战略要地留有满洲驻防军：熊岳^②、锦州、宁远、凤凰、兴京、义州、新城、牛庄、岫岩、东京、盖州、海州、鞍山、广城和耀州〔见 11，卷 7，页 5 上—5 下〕。但是在上列据点里竟没有提及宁古塔城¹，虽然在 1645 年 8 月《实录》中曾简略地提到关于赏赐宁古塔、熊岳和凤凰三地驻防军各级官佐之事〔见 11，卷 18，页 11 下〕。这说明在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写作“雄耀”。——译者

1645年在宁古塔还保有一支满洲驻防军。

据杨宾（流徙东北的汉族移民）撰写的《柳边纪略》记载，在1653年宁古塔仿佛属盛京昂邦章京管辖，城内驻有专门委派到此[86]的副都统〔见31，卷2，第22页〕。然而杨宾在这里所记的时期，并非他亲身经历的时期，因此，他的记载引起了我们一定的怀疑。这位副都统是谁？关于这位副都统的资料甚至在包括有大批满洲国重要活动家传记的卷帙浩繁的《八旗通志初集》里也付诸阙如。从1646年到1653年的《实录》中也没有关于宁古塔的任何记载。在这部极为重要的官修文献资料中，在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完全没有关于宁古塔的记载，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从1646年起，宁古塔这一满洲国的东北边哨可能被满洲人弃置了几年的缘故，因为当时清朝的政治和军事利益都集中在南方，在中国本土。这一情况再一次强调说明了下述事实：满洲人入侵中国后，并不认为盛京以北的土地具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从前对这些地方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些地方是补充有生力量的泉源。

对于千方百计巩固自己在中国地位的满洲人来说，尽管盛京在行政上的作用逐渐下降，但在盛京除了兵部外，仍然保留了先前的满洲各部，只是其活动范围现在只限于东北地区（“盛京疆域”）的事务。

在盛京各部中应当指出的有：礼部、户部、刑部和工部；兵部只是在1691年才在盛京恢复。

礼部掌管每年祭祀陵寝中的最初几位满洲君主及其祖先之事。他还管理园苑、养鱼池、牛羊群等²。此外，礼部掌管地方典礼、仪式，在皇帝临幸盛京时组织一切迎驾活动。

户部掌管接受相邻部落和部族的“贡品”以及回赠礼品，招待前来的这些民族的代表等事。它还管理征收各种赋税之事，监督官家田庄和官家的各种种植圃的经营，管理海关和熬盐场。

刑部掌管与编入分布在东北的满蒙八旗军的当地居民的地位和各种犯罪行为有关的事务。

工部掌管各种建筑工程和制造武器弹药诸事。各种工场手工^[87]业,如采矿、陶器、蒲席等业也归它管辖〔见 63,第 12—13 页〕。

这些部门是由隶属盛京昂邦章京(后为盛京将军)的专门官员主持的。

据官修文献记载,从顺治元年(1644 年)起,撤销了东北境内所有先前明朝设置的军区(卫)和哨卡(所),设立了昂邦章京及其副手——副都统的共同管理体制〔见 28,卷 6,第 36 页〕。

这样,辖区内的全部军政大权便都集中在昂邦章京手里,其中包括指挥各军和管理军事驿路、狩猎地以及八旗的各种营生:采参、捕鱼、收集桦树皮等等。

盛京昂邦章京的辖地当时只包括盛京本土。文献资料中没有引用过关于盛京管辖宁古塔及其地域、特别是黑龙江地区的任何资料。

从 1653 年起,清政府对东北的行政设施开始进行第一次改革。在盛京境内置辽阳府³,为州的中心,下属辽阳和海城两县〔见 28,卷 6,第 36 页〕。

第一次正式设置了宁古塔昂邦章京和副都统的职位,驻地也在该城〔见 28,卷 6,第 36 页〕⁴。随着宁古塔划为独立的行政单位,该城便成了同名地区的中心。然而,我们在直到 1684 年的文献资料中仍没有发现关于这一地域的任何资料。

满洲人对自己东北南部疆土的政策是极不一贯的。从顺治临朝的最初几年起,满清统治者为了保持辽东和辽西肥沃土地上的农业,曾大力鼓励发展该地区的农业。起初,清人力求使满洲人在“盛京疆域”的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没有如愿。于是清政府便开始大力鼓励汉人来开拓这一地区,基本上采取吸引中国内

地移民的办法。同时，清人看到汉人在东北影响的加强又非常嫉[88]妒，卒于1668年断然制止汉人流入东北开拓，从而使东北陷于孤立，从此移民不能自由从中国内地来此。

满洲人之所以竭尽全力保持自己“神圣的故乡”，首先是由于他们希望保障自己的大后方，完全控制自己的疆土，一旦在中国本土的事件发生逆转时（不应忘记，这里在很长的时间里进行着残酷的武装斗争，满洲人征服者的地位很不稳定），能有地方退却。

稍后，随着满洲人在中国地位的稳定，管理这一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大量问题，大大地分散了清人对东北边陲的注意力，因而国内这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至于象宁古塔这样的一些据点，在我们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中，根本没有关于满洲人在这里进行经济活动的任何记载。我们只能设想，由于在这里驻有常备驻防军，满洲人便开始耕种城堡附近的土地，以便供应驻防军粮食。

从1655年起，宁古塔成了汉族政治犯和刑事犯⁵的流放地。杨宾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一个名叫陈敬尹的人作证，在陈某于1655年流放到宁古塔时，那里尚没有一个流放的汉族移民〔见31，卷3，第57页〕。但是，就是在清政府于1668年明令禁止汉人开拓东北以后，汉人仍被流放到这里〔见11，卷87，页5上—5下；另见298，第一册，第365—366页〕。于此可见，满洲统治者对东北的政策不是始终一贯的。

到1676年宁古塔将军的衙署迁往吉林时，在宁古塔已有四百多户流放的汉族移民。其中大部分沦为当地满洲军人的家奴。中国历史学家谢国禎〔见235〕写的小册子曾专门记述了在东北极边的这些第一批汉族移民。看来，这一饶有兴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予以阐明。

流人在宁古塔周围种菜园，种庄稼。然而不应忘记，宁古塔此

时尚处于半适于居住、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的边区。这里的严寒使流人(大部分来自中国南方各省)惊恐万分。谢国禎实际上并未能引用关于宁古塔流人经济活动具体结果的材料。这本小册子只写了他们中一些人的传记资料以及流露在书信和诗文中的对所受痛苦^[89]的怨诉,即以我们的观点看来,宁古塔这类移民最有代表性的那些东西。这些足以说明他们到了流放地以后的极为艰难的处境。

顺治皇帝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宁古塔的重视,在1659年2月因沙尔呼达之死颁布的圣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圣旨中写道:“宁古塔乃边界重地(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昂邦章京沙尔呼达长期〔在此〕驻防,深得〔所有当地〕居民爱戴。今已病故。其子巴海天资敏悟,足当此任。着即派其子袭父职驻防宁古塔,授昂邦章京衔”^①〔见11,卷123,页7下—8上〕。

事实上盛京疆域在此期间已完全被人遗忘,甚至关于它的土地的地理概念也多半消失。在这方面奉天府府尹张尙贤于1661年6月呈给北京的奏疏值得十分注意⁶。

张尙贤上疏顺治皇帝,奏陈帝国东北边陲的地理形势以及关于提高其防御能力的设想。在这份奏疏中还有关于“盛京疆域”边界的一些重要说明。现在援引于下:

“至若盛京疆域形势,则东自兴京起,西至山海关止,有一千余里⁷;北自开原起,南至金州止,亦为一千余里,〔这片土地〕分东西〔两〕部分,位于〔辽河〕两侧。若论边外疆土,〔则〕先前明代的边界防御工事线是在辽河以东〔的土地上〕,北自开原起西南至黄泥洼和牛庄。〔边界线〕自牛庄,由三岔河起南至盖州、复州、金州、旅顺,然后转向东至红嘴、归复、黄骨岛、凤凰城、镇江和鸭绿江江口。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宁古塔系边疆要地。昂邦章京沙尔呼达在彼驻防年久,甚得人心,今已病故。其子巴海,素著谨敏,堪胜此任,著即代其父为昂邦章京,前往驻防”(卷123,页7下—8上)。——译者

所有〔这些地方〕明代为海防线。以上为河东边界与海岸之大略情形。

河西边界在山海关和它以东的中前所、前卫、后所、沙河、宁远、连山、塔山、杏山、松山、锦州、大凌河等〔据点〕北面；南面则为〔90〕海。〔此处陆界〕——是所谓‘一条边’。自广宁城至位于南面的居民点阎阳驿、拾山站和右屯卫海港有一百余里。北去〔这些据点〕数十里为当朝（清朝）新定之边界线。往东为盘山驿、高平沙岭，再往东为三岔河畔之牧马场。此为河西边界与海岸之大略情形。

若极目远眺河东河西之边界与海岸，则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黄沙，荒无人烟。倘有奸贼落脚此地，或海盗突至，则〔我们〕将猝不及防，难以击退其进攻。此外患之可虑者。

至若边内疆土，河东虽有许多城堡，但皆已荒废。唯有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具府县之规。而在辽东半岛和海岸上仍无城池和居民点；在盖州、凤凰城和金州之居民人数不过数百人。

铁岭和抚顺有流放之人。他们不能〔在此〕耕种土地，又无任何生活资料。只身者逃去大半；有家口之累者只有老死此地。这些地方实无任何裨益可言。以上所述为河东边内疆土之大略也。

河西城堡更多，居民仍然稀少。仅宁远、锦州、广宁人民湊集，但此地仅置佐领⁸一员，不知他如何管理这些地方。此为河西边内疆土之大略也。

综观河东河西之边内疆土，尽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地无人，全无可恃。此种状况引起臣极大之忧虑。臣朝夕思维，欲弭外患，必当制定防御措施；欲消内忧，必当加固〔原来之〕基础，并制订久远之策⁹〔见 12，卷 2，页 25 上—26 下〕。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盛京形势，自兴京至山海关，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金州，南北亦千余里。又有河东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东北起开原，由西南至黄泥洼、牛庄，乃明季昔日边防。自牛庄，由三岔河，南至盖州、复州、金州、旅顺，转而东至红嘴、归复、黄骨岛、凤凰城、镇江、鸭绿江口，皆明季昔日海防。此河东边海之大

在我们看来，这份奏疏十分准确地描述了在此之前盛京境内^[91]经济萧条的情景。由此可见，清帝国的这一边陲当时衰败不堪，荒无人烟，不能防卫外部的侵袭。没有任何军事哨卡线作标志的边界状况，不能不使地方行政当局感到严重不安。

在张尙贤的这份奏疏中，清朝的官修文献第一次引用了关于盛京疆域实际边界的十分明确的资料。但应当注意下述重要情况：这一地区的东部边界指明了具体据点——兴京城（现名新宾，在抚顺东面），而北部边界是开原。另外，下述情况也值得注意：文献资料明确记载，这一地区南北长一千里（约五百公里），东西的距离也是一千里。盛京的实际边界，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谈得很概略，只是说在个别段上用插入地中的树条来做为标志，而且没有满洲军队来守卫。看来造成关于帝国东北边界概念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该地区的地理形势缺乏了解。

这一奏疏虽然非常简短，而且不完备，但是它第一次描述了盛京疆域及其地理形势，说得确切些，它提醒了居住北京几乎已二十年，同自己的故乡已丧失直接联系的清朝统治者注意该地⁹。

张尙贤的奏章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上疏后不到一年设置了

略也。河西自山海关以东，至中前所、前卫、后所、沙河、宁远、连山、塔山、杏山、松山、锦州、大凌河，北面皆边，南面皆海。所谓一条边耳。独广宁一城，南至闾阳驿、拾山站、右屯卫海口，相去百余里，北至我朝新插之边，相去数十里，东至盘山驛、高平沙岭、以至三岔河之马圈。此河西边海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好贼暴发，海寇突至，猝难捍御，此外患之可虑者。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观，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唯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湊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此河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此内忧之甚者。臣朝夕思维，欲弭外患，必当筹画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本，以图久远之策”（卷2，页25上—26下）。——译者

盛京将军职务，奉天昂邦章京改名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见 28，卷 6，页 4 上〕¹⁰。这意味着清人开始加强东北的军事权力。这项改革也波及到宁古塔：同年宁古塔昂邦章京也改名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见 28，卷 6，页 4 上〕，这无疑也反映了宁古塔对于清人来说首先是军事意义提高了。在康熙皇帝临朝的头几年，在东北也实行了一些其它的行政改革。1664 年，锦州改名为锦县，广宁改为广宁府；在盛京地区置广宁县和广宁州。一年后，撤销广宁府，置锦州府取而代之。对该府的管辖集中于锦县。同年在奉天府置一新县——承德县，并又第一次设置三个县——盖平县、开原县和铁岭县。

据史书记载，“为方便计”，宁古塔城堡于 1666 年迁到城东南五十里的虎尔哈河（现名牡丹江）北岸〔见 28，卷 10，页 18 上—18 下；31，卷 1，第 18 页〕。

从宁古塔划归特派昂邦章京（后为将军）管辖时起，该城便成了周围地区的中心。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宁古塔对满洲人对清帝国东北边陲的整个政策始终不渝地起着主导作用。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宁古塔对满洲人的这种作用呢？

据我们看来，其原因有二：其一，是这一地区的地理位置。宁古塔位于同向满洲人提供兵源的诸部落交界的地方，满洲人靠抓他们的俘虏来补充自己的军队。从 1636 年起，宁古塔成了满洲军队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军事远征的军事基地。

其二，从俄罗斯哥萨克和移民出现在阿穆尔河上之时起，宁古塔作为满洲人在东北的前哨，成了清人反对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斗争的前沿阵地上的主要据点。

宁古塔后来的全部历史也都同这两个因素有密切联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其制约。

1671 年，康熙皇帝在巡幸盛京地区时，曾谕令一次发给宁古

塔驻防官兵二万两的巨额赏银〔见 12, 卷 36, 页 22 上〕。他从宁古塔召来巴海, 详细询问了瓦尔喀、虎尔哈和宁古塔各部族的风俗习惯, 对宁古塔将军周详而睿智的回答甚为满意。康熙皇帝听了巴海的陈奏, 指出: “瓦尔喀〔部〕和虎尔哈〔部〕之人粗暴, 狡黠。尔巴海应教化此边鄙民族(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以副朕切望安康之至意”^①〔见 12, 卷 37, 页 2 上〕。

1671 年 11 月 15 日, 宁古塔将军巴海接到如下圣旨: “朕向闻尔具有才能, 而今识尔后, 知之益深矣。费雅喀与赫哲¹¹ 虽已来附(格·麦·), 然彼等鄙陋无文。尔应防备留神, 诲之勿懈, 诱导须勤, 以示朕关怀边鄙部落(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之至意”^②〔见 12, 卷 37, 页 3 上—3 下〕¹²。

上面引用的文件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满洲文献资料中第一次提^[93]到了赫哲人(那乃人、奥罗奇人和尼福赫人)的名称, 以及康熙皇帝表示愿意“关怀边鄙部落”。然而, 最重要的是在圣旨中把宁古塔、瓦尔喀和虎尔哈各部落同满洲人本身截然分开, 并且强调指出这些部落鄙陋无文, 生性狡猾。十分明显, 假如瓦尔喀、宁古塔和虎尔哈(吉切尔人)是“满洲人”, 或者同满洲人有相近的血缘关系, 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康熙皇帝也绝不会如此鄙视他们。但是, 他们属于阿穆尔沿岸地区鄂温克诸部落的另外一支, 所以圣旨中用了那样的语气。这道圣旨向我们提供了证明 Б. О. 多尔基赫的观点是错误的补充佐证, Б. О. 多尔基赫认为这些部落都是满洲人。

从七十年代中叶起, 清人开始积极准备侵略阿穆尔沿岸地区,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瓦尔喀、胡尔哈, 人皆暴戾奸诡; 尔其善布教化, 以副朕绥远至意”(卷 37, 页 2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朕向闻尔贤能, 今侍朕左右, 朕益知尔矣。飞牙喀黑折虽服, 然其性暴戾, 当善为防之, 尤须广布教化, 多方训迪, 以副朕怀远至意”(卷 37, 页 3 下)。——译者

矛头首先指向俄国边区殖民中心——阿尔巴津城。

为了进行军事行动，满洲人需要一个比远离阿穆尔河上游的宁古塔更为方便的进攻基地。因此，在 1674 年建成的位于松花江岸上的小城吉林便具有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座小城的所在地从前是一个屯子，还在 1661 年就曾在该屯建造了船厂，专门建造与俄人作战的兵船〔见 31，卷 2，第 8 页〕¹³。1674 年建立的吉林河船队由三百一十九人（二百五十名水手、四十五名编制内的工匠，其余为军官和官吏）组成〔见 168，第 1 卷，第 563 页〕。

吉林同盛京和北京由新驿路联系。两年后，即 1676 年，宁古塔将军的衙署也由宁古塔迁到这里，并且仍保留了先前的“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的职称。

第二节 阿穆尔河上最初的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和 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开端

最初的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出现在阿穆尔河流域和他们开始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正是大多数满洲人为了征服中国而前往中国内地之时。

1632 年，在勒拿河中游建成的雅库次克堡对俄罗斯人向远东 [94] 推进起了巨大作用。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末时，雅库次克堡成了在东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大俄罗斯国势力的中心。1638 年，雅库次克已经是东西伯利亚督军辖区的正式行政中心。

1639 年秋，为了探察新土地和征收实物税从雅库次克派出了几支哥萨克队伍。其中一支由伊凡·莫斯科维京率领的队伍到达了鄂霍次克海。在这里，在乌利亚河河口奠定了一座俄罗斯城堡的基础。伊凡·莫斯科维京的队伍到达太平洋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在远东所做出的伟大地理发现之一。

伊凡·莫斯科维京的哥萨克们积极地勘测了乌斯特-乌利亚

南北的鄂霍次克海海岸，收集了关于这一带居民、他们的人数和生计的珍贵资料。据官方文件证明，他们带来了关于阿穆尔河、善塔尔群岛和萨哈林岛^①的第一批资料〔见 170，第 52 页〕。

苏联历史学家 П. Т. 雅科夫列娃关于这一地区写道：“俄罗斯人遇到了从事狩猎的鄂温克人部落，这些部落不从属于任何国家，并在俄罗斯人最初试图使他们归顺时进行了抵抗。军役人员在战胜了这种抵抗之后，就以武力或以和平手段向鄂温克人各部落征收实物税”〔见 216，第 19 页〕。

与此同时，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还从布里亚特人那里获得了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所谓达斡尔地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居民的第一批资料〔见 95，第 3 卷，第 51 页〕。

为了寻找这块“土地”，从雅库次克派出了一支由书记官瓦西里·波雅尔科夫率领的哥萨克队伍。波雅尔科夫总共带领一百三十二名哥萨克和“志愿”人员于 1644 年沿结雅河下驶，进入阿穆尔河，经过达斡尔人和吉切爾人的土地，于同年秋到达该河河口。队伍在这里过冬后，于 1645 年到达鄂霍次克海，然后“向北”航行了一个夏天，秋天抵达乌斯特-乌利亚——伊凡·莫斯科维京建立的城堡。瓦·波雅尔科夫的远征表明俄罗斯人直接发现了阿穆尔沿岸地区。瓦·波雅尔科夫光荣地完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探明不为人所知的新土地，向阿穆尔河上的居民征收实物税，找到银矿、铅矿和铜矿〔见 95，第 3 卷，第 50—60 页〕。瓦·波雅尔科夫归来后，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自观察写成了第一份记述阿穆尔河及住在那里的各部族和他们的营生以及该地区经济情况的报告。波雅尔科夫称，阿穆尔的居民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邻国。

继波雅尔科夫之后，以叶洛菲·哈巴罗夫为首的一支由七十

^① 即库页岛。——译者

[95] 名“志愿”人员组成的队伍前往以其财富、毛皮和粮食¹⁴吸引了西伯利亚猎人等注意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叶·哈巴罗夫的队伍于1650年沿乌尔卡河（乌尔坎河）到达阿穆尔河。叶·哈巴罗夫试图“不经格斗”用和平手段在阿穆尔河站稳脚跟，但是在一些地区遇到抵抗后，便用武力使既不属于蒙古人、也不属于满洲人的当地诸酋长，归附莫斯科沙皇的“崇高统治之下”。

1651年，叶·哈巴罗夫带领大批援兵回到暂时留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队伍，并在阿尔巴津小城住下后，继续向达斡尔和吉切儿各部落顺利地征收实物税〔见 32, №31, 第 71—77 页；95, 第 3 卷, №102, №103, 第 359—373 页〕¹⁵。同年秋，叶·哈巴罗夫的队伍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在乌苏里江口下面停下来，开始在这里建造设防的冬营，以“阿枪斯克堡”命名这座冬营（以当地部族——那乃人——“阿枪”人的名称命名）。据 1946 年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学院历史民族人种志学考查团查明，阿枪斯克堡位于贾奥里岬、那乃人地区特罗伊次屯上面三公里的地方〔见 176, 第 32 页〕。

1651 年秋，这座由叶·哈巴罗夫在阿穆尔河下游修建的城堡被当地阿枪人和吉切儿人部落的士兵包围，而 1652 年春，装备有火器和大炮的满洲军队在海色的指挥下逼近该城堡，关于发生的这场战斗，叶·哈巴罗夫报告说：“3 月 24 日凌晨，在光荣的阿穆尔河上面，博格德的军队从掩蔽处攻打阿枪斯克城，袭击我们哥萨克，他们全都是披甲骑马的。我们的哥萨克大尉、军役人员安德烈·伊凡诺夫在城中叫喊起来：‘哥萨克弟兄们！赶快起来，披挂上厚甲！……’接着我们哥萨克便从墙后同他们博格德人，同他们的军队打起来，从凌晨一直打到日落。该博格德军队奔向哥萨克帐篷，不让我们哥萨克在那时候穿过城堡。而博格德人用旗帜遮住了我们的城墙。他们博格德人从上到下砍倒了我们的三处城墙。

博格德王的亦失涅将军在他们的博格德大军中向全军喊道：‘不要焚烧，也不要砍杀哥萨克，要活捉他们！……’我和安德烈·伊凡诺夫大尉也对我军说道：‘哥萨克弟兄们！我们要为……而死，我们全体官兵要象一个人一样反击我国的敌人，只要我们哥萨克活着，就不能落入博格德人之手……’说完后，便开始炮轰博格德军队，同时从城里开始用枪射击博格德人……他们感到非常恐慌……他们以为我军有无数人员，所有剩下的博格德人在我军打击下离城四散奔逃……于是……在阿枪斯克城周围看到，博格德人及其军队一下子被打死六百七十六人。而我们的哥萨克只被他们打死十人……另外，在此次搏斗中有七十八名哥萨克受伤……这些受伤者已经康复”〔见 172, 第 135—136 页〕。

俄国人在阿枪斯克城下予满洲人以重创，缴获了他们的所有大炮。在这次同满洲人的第一次交锋以后，叶·哈巴罗夫便溯阿穆尔河而上，于 1652 年在库马拉河（阿穆尔河右支流，现名呼玛尔河）河口修建了库马拉堡。

在这一时期，每年从阿穆尔沿岸地区流入俄国国库的实物税达“一百袋^①貂皮”——价值一万五千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款项¹⁶。

1653 年，德米特里·季诺维耶夫奉沙皇阿列克谢派遣来到阿穆尔河，以便收集关于新区的更为详尽的资料。他授予哈巴罗夫一枚沙皇的金质奖章，以表彰他对阿穆尔河的征服〔见 216, 第 38 页〕。在哈巴罗夫去莫斯科之后，从 1653 年 8 月起，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罗斯队伍由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指挥。从 1651 年起，俄罗斯人不仅使当地诸部落臣属俄国，而且积极着手进行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经济开发。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土地上迁来了俄罗

^① 袋(сорок)是貂皮的计量单位，一袋貂皮为四十张，够缝制一件大衣。——译者

斯农民，他们开始在这里种庄稼。清朝当局从这时起转入对俄罗斯移民的公开斗争。

满洲人的行动显然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

1. 满洲人开始为自己在东北的“神圣”土地的命运而担忧，因为这些土地是他们反对中国人民斗争中的唯一可靠的后方。他们力求通过获取“无主”土地和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罗斯领地来扩大这个后方。

2. 俄罗斯人深入阿穆尔沿岸地区，他们在经济上在这里扎根，以及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这便有可能消除满洲人在该地区保持的影响，即实际上使满洲人丧失继续捕捉俘虏和从这里获得珍贵毛皮的来源。

3. 俄国在该地区所实行的政策是成功的，它使日益众多的当地居民的代表归附俄国。满洲人生怕，象根特木尔、图伊多浑和宝冈等这样一些达斡尔和鄂温克首领带领自己的人自愿投奔俄罗斯人之后，不仅阿穆尔河上游和阿穆尔河左岸，而且阿穆尔河右岸即现在的东北地区的其他部落和民族也可能起而效尤。这使满洲人^[97]在这一辽阔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并可能影响清朝在全中国的地位。

1654年，阿法纳西·巴什科夫在石勒喀河的支流——涅尔查河上建立的涅尔琴斯克堡从1658年起成了独立的督军辖区的中心，督军辖区的地域包括整个外贝加尔地区和贝加尔沿岸地区。不久阿穆尔沿岸地区也归新的督军辖区管辖。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建立的全部城堡：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堡（1650—1651年）、阿尔巴津堡（1651年）、库马拉堡（1652年）全都归它管辖。

在1653年的夏秋期间，斯捷潘诺夫率领自己的队伍沿松花江顺利航行，并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然而，在1654年，满洲军队

挡住斯捷潘诺夫的队伍溯松花江上行的航路。1654年和1655年之交的冬季，他在库马拉堡过冬。1655年春，一支装备精良的有一万人的满洲军队在副都统明安达礼的率领下，携带十五门大炮，若干攻城云梯和特制的流动盾牌逼近这个城堡。满洲人攻打了三个礼拜未能拿下该堡，于是便退回自己盛京境内的基地。阿穆尔历史的发轫期，如苏联历史学家 П. И. 卡巴诺夫有充分根据地指出的那样，显示了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的卓越的英勇精神〔见113，第11页〕。

1655年，奥·斯捷潘诺夫又带领自己的队伍沿阿穆尔河上下行驶，并且沿松花江上行，甚至到了乌苏里江，同时顺利地向当地吉切尔居民征收实物税。他把自己的成就记入极为珍贵的文件——《163年达斡尔、吉切尔和基里亚克地区实物税册》里，这份文件由苏联历史学家 Б. О. 多尔基赫第一次在科学界传播开来。

Б. О. 多尔基赫开列了一个1655年奥·斯捷潘诺夫向当地乌卢斯征收实物税的完备的清单，清单中注明实物税的数额和送交实物税的人员〔见94，第593—595页〕。例如：在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上从下列吉切尔屯落征收了实物税：位于“乌斯特-松加里”的乌利耶沃屯——1655年6月25日；位于“乌斯特-乌苏里”的伦季基尔屯——1655年7月9日；乌苏里江上的纳姆多尔屯——1655年7月17日；松花江上的涅尔比茨屯——1655年7月23日；乌苏里江上的伊尔贡屯和阿冯屯——1655年7月23日和24日；乌苏里江上的马里茨屯、莫尔恰文屯和尤尔孔屯——1655年7月25日；松花江上的基尔京屯、戈勃扎伊屯和达奇基耶沃屯——1655年7月26日；“在松加里对面小岛上”的莫申诺屯、马坎屯、乌克希明屯和伊尔基耶沃屯，在乌斯特-松加里的哈尔基耶沃屯和耶福弗杰尔基耶沃屯——1655年8月1日；“松加里江上勃拉日

诺夫乌卢斯稍下面一点”的乌克辛乌卢斯和松花江上的霍通乌卢斯以及雅古、富季耶夫、舍尔巴达耶夫、阿乌明等乌卢斯——1655 [98] 年 8 月 1 日；上述地方的莫格任乌卢斯和乌斯诺夫屯——1655 年 8 月 7 日；“松加里江上游”的曼津乌卢斯、“曼津乌卢斯稍上一点”的延顿乌卢斯和基尔康乌卢斯以及“松加里江上游”的班金乌卢斯（1655 年 8 月 8 日）；“曼津两个乌卢斯稍上一点”的芬杰尔乌卢斯和松花江上的麦延乌卢斯、凡乌卢斯、布扬乌卢斯、卡姆雷姆乌卢斯（1655 年 8 月 17 日）；“乌苏里、贝卡河上”的库比屯——1655 年 8 月 25 日；“乌苏里、乌斯特-诺尔”的乌米屯、恰格达屯和“乌苏里上游”的马基乌卢斯以及卡苏金乌卢斯——1655 年 8 月 27 日；乌苏里江上的图马林乌卢斯、乔尔图尔乌卢斯、耶鲁卢斯科夫乌卢斯、鲁赫查米斯科夫乌卢斯、马坎斯科夫乌卢斯、穆伊拉屯和布林斯科夫乌卢斯——1655 年 8 月 29 日¹⁸。上述材料说明当时征收实物税的广阔范围和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开发的成就。

1656 年 3 月 3 日，以费奥多尔·巴伊科夫为首的第一个俄罗斯使团到达北京。费·巴伊科夫使团的失败，象 H. Ф. 杰米多娃所指出的那样，是和当时在中国出现的对满洲人不利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而俄罗斯人迅速占领并顺利地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他们使满洲军队遭到一系列失败也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威信问题对满洲人来说的确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见 91, 第 93—94 页〕。关于此事在满洲文献资料中直言不讳地写道：“先是，俄罗斯白沙皇，于顺治 12 年（1655 年——格·麦·），遣使（П. 雅雷什金——格·麦·）请安，贡方物，未具国书，因其首次进贡，特施恩遣返，并命予以嘉奖，令其每岁入贡。后于顺治 13 年（1656 年——格·麦·），又遣使（费·巴伊科夫——格·麦·）贡国书而来。但来使按彼国风习递交国书，立而不跪。于是部议：来使不

谕朝仪，不宜令陛见，却其贡物，遣之还”^①〔见 11，卷 135，页 2 上；172，第 550 页〕。就这样让俄使离开了北京，外交关系因而未能建立。

在这一时期，满洲人驱赶居民的政策有了新的用意。满洲人实行驱赶政策已不仅是为了增加其八旗中的兵力（虽然这一任务仍然十分迫切），而且是为了企图剥夺俄罗斯人以及新归顺的缴纳实物税的居民在阿穆尔河上的粮食之源。这样，便确定了如下的宗旨：使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意义全部丧失（当然这符合满洲人的设想）。在进行反对阿穆尔沿岸地区俄罗斯领地的公开的军事行动的同时，宁古塔的满洲地方当局企图用剥夺粮食之源的办法迫使俄罗斯人离开阿穆尔河。这是通过 1654 年——1656 年间强迫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从阿穆尔河和松花江迁移的办法实现的，而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的乌卢斯在前一年曾向斯捷潘诺夫缴了实物税。达斡尔人和所谓的果古尔人（上游的吉切尔人）住在诺尼江流域，吉切尔人住在宁古塔堡地区。 [99]

当 1656 年奥·斯捷潘诺夫再次来到松花江时，他在那里已经找不到吉切尔人了。他获悉“博格德皇帝下令将达斡尔和吉切尔异族人从阿穆尔河和松花江江口移往自己的领土乌尔哈河（虎尔哈河，现名牡丹江），他们的财物和帐篷被博格德皇帝的地方长官萨儿吴代（沙尔呼达——格·麦·）纵火焚烧，破坏无遗”〔见 95，第 4 卷，第 31，第 80—83 页；172，第 213 页，№82〕。П. Т. 雅科夫列娃指出：“通常当地居民，甚至流动性最大的居民，即从事游牧和畜牧的居民，也不会自愿离开自己的故土。对定居于阿穆尔地区的居民会自愿离去，这尤其难以想象。众所周知，这种居民好象是

^① 《大清世祖章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先是，鄂罗斯国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其始行贡礼，贲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请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卷 135，页 2 上—2 下）。——译者

用最牢固的枷锁钉在土地上的”〔见 216, 第 32 页〕。

满洲史料中没有专门记载这次强迫迁移及其原因的任何资料。我们推测这样的迁移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的措施，勿宁说是地方当局的“创议”。

这一时期俄国在远东的历史作用，在于它保卫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民族免遭满洲人的劫掠和进一步被他们从故土上强迫赶走。

与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上的出现和阿穆尔地区居民的迁移以及哥萨克同满洲人的最初几次冲突相联系的各种事件，在象《大清历朝实录》和《八旗通志初集》这样重要的清朝官修文献资料中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反映。来自地方当局的关于这些事件的报告，满洲统治者自然不能不有所注意。毫无疑问，这些关于俄罗斯人的以及关于满洲人征伐俄罗斯人遭受失败的最初的详尽报告，在后来编纂这些《实录》时是有意地被删去了，因为清人不愿意将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成功消息收在官修的编年史中。

《世祖实录》只包括关于满洲人于 1652 年攻打阿枪斯克堡，1655 年攻打库马拉堡未获胜利的最为一般的记述，而海色和希福 [100] 溃败之事写得极为简略：“宁古塔章京海色遣牛录长官希福等，率兵前往黑龙江征战。进行了鏖战，但（我们）遭到失败。海色被惩罚，希福被革职并被打一百鞭，然而彼等仍被留在宁古塔”①〔见 11, 卷 68, 页 24 上〕。在《八旗通志初集》第 171 章明安达礼的传记里，凡涉及他远征库马拉堡失利之事全都被删。传记中只记载，明安达礼在兵部尚书（长官）任内曾“坐事”，为此被革去尚书职，并大大地降职〔见 5, 第 171 章, 页 7 下〕。然而在《实录》中有下述记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卷 68, 页 24 上）。——译者

述：“都统明安达礼率官兵赴黑龙江地方征讨俄罗斯人”^①〔见 11，卷 87，页 18 上〕。

虽然清朝的史官们企图掩盖(主要是出自对威信的考虑,也是由于想避而不谈俄国对阿穆尔的权利)满洲军的失败,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事实在清宫中知之不详。1682 年 9 月,被派到阿尔巴津城下进行军事侦察的满洲侦探郎坦和彭春在其奏疏中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满洲军在军事上的失利。他们在呈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中写道:“先前俄罗斯人于乌扎拉筑木城,居其中(指阿枪斯克堡——格·麦·),宁古塔副都统海色击之失利。后俄罗斯人又于库马拉河河口处建一城,明安达礼攻之不克。从此,俄罗斯人对木城极为重视,认为可据守无虞”^②〔见 5,卷 153,页 13 上—14 上〕。

康熙皇帝本人认为,明安达礼及其他满洲军统帅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军队缺乏训练,粮食匮乏,也就是说他承认军事行动是在离满洲人给养基地很远的地方进行的。然而,对满洲人最初几次征讨俄罗斯人的这个评论,康熙皇帝只是在 1685 年 7 月才公开作出的〔见 12,卷 121,页 12 下;241,卷(首)1,页 15 上—15 下〕。

1653 年,沙尔呼达被任命为宁古塔特命军事总督^③后,满洲人对俄罗斯诸领地的军事行动便频繁起来。1658 年夏,满洲兵船在松花江口附近袭击了斯捷潘诺夫的一小队船只,并把他的队伍击溃。1658 年 8 月,《世祖实录》中引用了沙尔呼达关于战胜俄罗斯人的疏报:“击败俄军,擒获了俄人,卤获铠甲等物”^④〔见 11,卷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礼,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于黑龙江”(卷 87,页 18 上)。——译者

② 《八旗通志初集》中的原文是:“昔罗刹于乌查拉作木城居时,宁古塔副都统海色击之失利。后罗刹复于呼马立河口立城,都统明安达礼往攻之未下,从此罗刹倚木城为重,以为坐待无虞”(卷 153,页 14 上)。——译者

③ 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当时沙尔呼达被任命“为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地方”(卷 75,页 7 下)。——译者

④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卷 119,页 5 下)。——译者

[101] 119, 页 4 下—5 上]。兵部奉命审查宁古塔总督的疏报。以所俘获分赐满洲军有功将士〔见 11, 卷 119, 页 4 下—5 上〕。然而,这一军事失利并没有阻止俄罗斯农民和猎人等于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对达斡尔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土地的大规模的经济开发。

1659 年 5 月, 宁古塔梅勒章京尼噶里也奏陈他击败俄罗斯队伍, 擒获数名费雅喀部落庄屯屯长(其中包括塔布他弩和克尔格孙), 并试图扩大满洲人对这个部落其它屯的影响〔见 11, 卷 124, 页 6 上〕。

费雅喀部落进贡之后, 礼部建议把贡品送至宁古塔, 而无须送至北京。这首先说明清朝行政当局意图将接待东北地方部落使团这样新的重要的职权移交给宁古塔。然而, 礼部对费雅喀的这个建议未得到顺治皇帝的同意。在他的谕令中曾指出, 满洲人只是在 1659 年 5 月²⁰才“同费雅喀部落第一次接触^①。然而还在此之前, 1655 年, 费雅喀便开始向奥努弗利·斯捷潘诺夫缴纳了实物税——这一事实, 连对俄罗斯人深入阿穆尔沿岸地区历史的叙述带有很大片面性的日本作者稻叶岩吉也是承认的〔见 256, 第 2 卷, 第 112 页〕。

1659 年 2 月, 巴海抵达宁古塔。后来满洲人试图用武力从阿穆尔排挤走俄罗斯人的行动, 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660 年 8 月 22 日, 《世祖实录》记载了巴海的下述疏报: “臣等率兵至萨哈连(阿穆尔——格·麦·)、松噶里(松花江——格·麦·)两江汇合处, 探明俄罗斯贼众(格·麦·)在费雅喀〔部落〕土地西面。然后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统兵前进, 至使犬部落〔住处〕, 伏兵船于两岸。待俄罗斯船只驶近时, 出而袭之, 俄罗斯人当即掉头后退, 我兵追击, 俄罗斯人被打死六十余人, 淹死者甚众,

^① 俄文原文此处只有半个引号。这段引文在《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今该部初经降附, 有欲赴京来朝者, 从其便”(卷 124, 页 6 下)。——译者

获妇女四十七名，并大炮盔甲军事装备等物”^①〔见 11，卷 138，页 16 上—16 下〕。巴海接着陈奏，他招抚费雅喀部落十五村——一百二十余户使之归附清帝国。居住在满洲国界外的锡伯部落移居宁古塔也在这一时期〔见 11，卷 138，页 16 下〕。^②

尽管满洲队伍力图侵入阿穆尔沿岸地区，俄罗斯人对这一地区经济开发的规模却越来越大〔参看 34，第 45—46 页〕。大量的 [102] 十七世纪俄、满文史料都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人在那个时期在阿穆尔河流域开始起的重大作用。俄罗斯人管理该地区的成就愈大，则满洲人最初借以企图从阿穆尔沿岸地区排挤走俄罗斯移民的军事措施的成效就愈小。在六十——七十年代，满洲人开始加紧反对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河流域的武装斗争。

1665 年，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带领队伍重建并加固了阿尔巴津，从此以后，阿尔巴津便成了阿穆尔沿岸地区俄罗斯移民点集中的中心。

据吴振臣所记，1669 年，俄罗斯人出现在宁古塔附近的黑龙江“黑斤诸处，抢走〔当地居民的〕貂皮；他们的武器很厉害……满洲人非常害怕。将军将此事奏闻国君，乞救^③（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引文见 1，第 83 页〕²¹。

关于 1668—1669 年到北京的在俄罗斯供职的“布哈拉人”谢伊特库尔·阿勃林和谢伊佳什·库尔马麦托夫的贸易使团，在《圣祖实录》中有如下记载：“俄罗斯国白沙皇遣使进贡（？——格·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臣等率兵至萨哈连、松嘴里两江合处，侦闻罗刺贼众在费牙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伏发，贼即回遁，我兵追袭，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卷 138，页 16 上）。——译者

②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刑部尚书社立德疏言：席北虽属国地方，然在边外；今后有应徙席北者，俱改徙宁古塔，从之”（卷 138，页 16 下）。——译者

③ 《宁古塔记略》中的原文是：“（到黑龙江）黑斤诸处抢貂皮，锋甚锐。……满洲人皆畏之。将军上疏求救”（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第 3 页）。——译者

麦·), 盛宴来使, 赏赉如例。”^①〔见 12, 卷 31, 页 13 上—13 下〕。

同时, 在这一时期康熙皇帝的敕令中始终不渝地强调继续反对俄罗斯人深入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必要性。例如, 清帝在 1671 年 11 月 15 日颁给将军巴海的谕旨中称: “俄罗斯人虽已真诚宣告向我投诚(?——格·麦·)²², 然应注意〔在与彼等交往时〕采取防范措施。为此, 尔应操练兵马, 整备军械, 以免彼等施展诡计, 使尔猝不及防。至于管理(地方)措施, 尔应具奏, 勿存疑惧。尔膺边防重任, 故应殚精竭虑, 克尽职守, 以报朕(对尔)知遇之恩”^②〔见 12, 卷 37, 页 3 上—3 下〕。宁古塔将军的衙署于 1676 年迁到吉林, 说明满洲人已开始准备采取在阿穆尔反对俄国的更大规模的行动。

[103] 1676 年 5 月 15 日, 俄罗斯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使团到达北京。清朝文献资料中把使团也视为进贡者, 在记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国书时, 使用了有损于俄国尊严的辞句。《实录》中写道: “俄罗斯国白沙皇遣使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入贡方物, 赉送国书, 国书内称: ‘俄罗斯国地处远方〔远离中国〕, 俄罗斯人从未与中国²³ 交往, 不谙中国语文, 不知致中国之国书应为何种格式, 而今真诚倾心于贵国文明²⁴, 愿着手派遣进贡使团〔前往〕’”^③〔见 12, 卷 61, 页 3 下—4 上〕。

康熙皇帝答称: “白沙皇特遣其臣贡献方物, 殊属可嘉。”^④〔见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鄂罗斯察汉汗, 遣使进贡, 宴赉如例”(卷 31, 第 31, 页 13 上—13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罗刹虽云投诚, 尤当加意防御, 操练土马, 整备器械, 毋堕狡计。至于地方应行大事, 即行陈奏, 毋得疑畏。尔膺边防重任, 尚其勉勉, 以报朕知遇之恩”(卷 37, 页 3 下)。——译者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鄂罗斯察汉汗, 遣其臣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入贡方物, 奏称: ‘鄂罗斯僻处远方, 从古未通中国, 不识中国文义, 不谙奏疏仪式, 今特向化输诚, 愿通贡使’”(卷 61, 页 3 上—4 上)。——译者

④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鄂罗斯国所处甚远, 诚心向化, 特遣其臣贡献方物, 甚属可嘉”(同上)。——译者

12, 卷 61, 页 4 上]。然而斯帕法里使团结果却失败了, 这大半是由于清帝国在此时期已经开始准备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打仗这一情况所造成的〔见 216, 第 111 页〕。这一情况说明了清朝官员的粗暴挑衅行为和执拗态度, 以及硬要讨论根特木尔问题的坚决意图等等, 这也就决定了斯帕法里使团的失败〔见 216, 第 111 页〕。

第三节 满洲人关于东北的地理概念和 清帝国的东北边界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七十年代末的整个时期, 清人关于东北周围和毗连地区的地理概念仍然十分模糊。这使清政府不得不于七十年代末组织了一系列的考察队, 以便了解东北的地理环境。所谓吴默讷探险队便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考察队之一。这个考察队是于 1677 年为了了解现今吉林省的东南部分, 确切些说, 与朝鲜交界的长白山地区而组织的。

在谈到长白山的时候, 首先必须提一下, 在满清统治者定鼎中国之后, 宫廷史官遵照他们的谕旨编造了清朝祖先仿佛是“神女”所生的奇异神话。这些神话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其来源都 [104] 与长白山有关。其真实原因还是由 B. 戈尔斯基揭示的〔见 80〕。这些原因是: 按照中国历朝的成例, 满洲人为了赋予自己的名字以威严、显赫的色彩, 也力求将其与某一个令人景仰的, 尤其是“神圣的”地方或山岳联系起来。长白山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山区的巍峨山峰在若干世纪里一直使邻近诸部落迷信地望而生畏, 肃然起敬〔见 80, 第 116—117 页〕。实际上, 象上面所证明的那样, 满洲人是由各部落聚集而成的, 与长白山风马牛不相及, 他们的故乡在长白山以西很远的地方。

满洲统治者庄严宣称长白山是他们的故乡, 只不过是掩盖清王朝真实来源的烟幕和力求令人对定鼎中国的新朝肃然起敬。在

满洲人实际了解了长白山地区的情况后，所有这一切便都昭然若揭。因而可以有充分根据把认识这一地区的历史称之为对满洲统治者莫名其妙的“神圣”来源的揭露。

吴默讷探险队的目的，康熙皇帝在他临行时颁给他的训旨中是这样表述的：“北京无人确知(格·麦·)我祖宗发祥之地，故遣尔等四人前往该地详加测绘，以便祭祀山中诸神”^①〔见 12, 卷 49, 页 11 上; 31, 卷 1, 第 10 页〕。

实际上组织吴默讷探险队还有一个比康熙皇帝所指的更为重要得多的原因。在这一时期同朝鲜发生了领土争端，需要解决长白山地区的土地划界问题。祭祀诸神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也应当如实了解这一地区的地理，这对清帝国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吴默讷一行于 6 月从北京出发前往吉林。但是无论在这里，还是在整个宁古塔地区，康熙皇帝的特使连能够指给他们通向圣山的道路的向导也没有找到。最后，找到一个祖居额赫讷阴的年迈的老人，他从前曾听他父亲说过，他们部落的猎人曾在离长白山不远的地方猎过鹿。

吴默讷的探险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历尽艰辛到达莽林地区额赫讷阴。这里已从宁古塔先期运来了旅人们所需要的粮食。吴默讷〔105〕从这里派出自己的人，在密树茂林中开路，并探测到长白山的距离。先遣人员归来后，探险队即向山麓进发。旅人们轻而易举地登山百里，然后攀登陡壁悬崖，白雪冰川，备尝艰辛。最后，他们终于登临山颠，在山颠原先的火山口有一池，五峰环绕，池方圆约四十里，有山泉数眼从中流出。探险队在这里祭祀了山神〔见 5, 卷 185, 页 16 上; 31, 卷 1, 第 10—12 页〕。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长白山乃祖宗发祥之地，今无确知之人，尔等……详视明白，以便酌行祀礼”（卷 69, 页 3 上）。——译者

原来，事实上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地方上也是无人知晓清王朝的祖宗究竟“发祥”于何处。这次考察所收集的事实和情况都证明，长白山与满洲人的真实故乡没有任何瓜葛。吴默讷关于他的探险队行经的完全未开拓的荒野地区的证明具有很大意义。根据有关吴默讷此行的资料，可以断定，满洲人只是在1677年才获得了关于长白山的第一批真实资料。关于这一点，吴默讷的话可资证明。他曾满有根据地、骄傲地宣称：“臣发现在我之前，〔无人〕知晓之道路；所过之处人踪绝迹，过去也未有涉足”^①〔见5，卷185，页16下〕。在此次探险期间，陪同吴默讷的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测定，长白山最高峰高出潭面二百五十丈〔见31，卷1，第10页〕²⁵。稻叶岩吉曾指出，吴默讷的探险队确定了松花江的源头。关于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概念仍然模糊不清²⁶。

从1678年起，初于宁古塔，后于吉林开始按时祭祀长白山之神，为此还委派了专职的官吏〔见31，卷1，第12—13页〕。

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满洲人对吉林东南疆域领土的皮毛了解是与下述情况有关的：关于“盛京疆域”实际边界的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例如张尚贤的疏报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七十年代中叶。

清帝国的东北边界在此之前不仅丝毫没有在行政上正式固定下来，而且也没有哪怕是使用设哨所和边卡线予以固定。因此，那里的边界完全不能防御任何入侵或者来自界外的渗透。到七十年代末，清人感到必须在行政上将自己的东北领地固定下来。采取巩固边界的紧急措施的必要性是由下述情况促使的：首先清政府对俄罗斯人规模越来越大地深入阿穆尔沿岸地区深以为忧，俄罗斯人开发这一地区获得成功，俄罗斯政府招抚阿穆尔地区当地居民

^① 《八旗通志初集》中的原文是：“臣等遵旨于人所不能行之处，新开路境得见长白山”（卷185，页22下）。——译者

的政策也获得成功。中国历史学家魏源认为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发动斗争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清人认为存在着仿佛威胁盛京的来自俄罗斯人方面的危险；第二，向清人缴纳的来自阿穆尔河的“貂贡”停止了〔引文据 65，第 130 页〕。我们可以指出，魏源从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上的活动中并没有看到任何说明“侵入”属于清帝国领土的东西。

况且，如上所述，从 1655 年起，清人已将东北的遥远地区变为从中国内地流放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流放地。到七十年代中叶，这里已经集中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流人，因此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以便把流人置于可靠的监督之下。为了保卫盛京疆界，开始修建新的边界防御工事线。授命盛京将军满洲人安珠瑚主持这一工程〔他的传记，见 5，卷 150，页 3 下—7 下〕。这一边界线获得了柳寨，或者柳边的名称。

在安珠瑚的传记中记载，新任将军在开始视事的时候，首先亲临边界进行了视察，并提议将帝国东北领土疆界平均扩大二十里〔见 5，卷 150，页 4 下〕。防御工事线是在最适当地利用了地势的情况下用当地现有的材料建成的，绵亘几达九百公里。这一接连不断的边墙有几段是用石头、碎石堆、圆木和砖建成的；而有几处边墙则是掺有草的泥墙或者用木桩围墙〔见 257，第 322—323 页〕。有几段边墙是用长柳条做的双层栅寨，由此边界便获得了“柳条边”的名称。这两排柳条之间的空隙填满了土，在栅寨的外面掘一深壕，因此，新边界决不是什么象征性的，而是在当时来说非常牢固的防御线，这条线持续数年始建成。

柳条边自山海关西南起，北至威远堡，在东南大大地扩大了原先的明代辽东边界，而将原满洲都城兴京和前建州疆域包括于清帝国的边内疆土，柳条边南至凤凰山止。宁古塔也和吉林一样是留在其所绘领土轮廓图的界外的（见地图五）。

是边外疆土，是“位于界外的土地”（边外）。在许多官方文件和谕令中都是这样说的。

柳边固定了在八十年代初正式划入清帝国版图的帝国东北边陲的领土，并在柳边全线布置驻防军和边哨，此后还定出了相当严格的出边界线的规章。甚至满洲八旗官兵被派出界从事某种营生（狩猎、捕鱼、采参等），亦须事先从奉天将军处领取专门的通行证〔见 5，卷 21，页 6 下—7 上〕。

到 1684 年，在柳条边建成和到第一部盛京志书编纂、问世的时候，关于清帝国东北边界的概念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说法。在《盛京通志》中有专门的一卷（卷 8），讲清帝国盛京疆域的边界，这一卷的资料有一定的价值。据这份文献资料记载：“盛京（疆域）西接畿辅²⁷。南、东濒海，北止于大荒漠，从辽河向左右两侧延伸”^①〔见 28，卷 8，页 1 上〕。

接着，在该卷中综述了“盛京疆域”的范围（指出离都城盛京的距离）〔见 28，卷 8，页 1 上—1 下；并见这一文献资料卷首中的《盛京舆地全图》：“东至海（？——格·麦·）四千三百余里，东海界”^{②28}，“西至山海关²⁹ 八百余里，山海关界”^③；“往北二百六十余里为〔国〕界”^④；“南至海七百三十余里，海界”^⑤；“东南至希喀特山二千余里，朝鲜界”^⑥；“西南至海八百余里，海界”^⑦；“东北至费雅喀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盛京西接畿辅，东南滨海，北控大漠。而辽河左右率铺二郡攸分（1684 年刊印，卷 8，页 1 上）。——译者

②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东至海四千三百余里，东海界”（同上）。——译者

③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西至山海关八百余里，山海关界”（同上）。——译者

④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北至边二百六十余里，边界”（同上）；乾隆元年，宋筠等修的《盛京通志》的记载是：“北至黑龙江外兴安岭五千二百余里，鄂罗斯界”。——译者

⑤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南至海七百三十余里，海界”（同上）。——译者

⑥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东南至希喀特山二千余里，朝鲜界”（同上）。第 10 页。——译者

⑦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西南至海八百余里，海界”（同上）。——译者

〔部落住地〕四千余里,东海界”^①;“西北至九宫台边门四百五十余里,蒙古界”^②。

在引用了上述资料以后,这份文献作了如下的总括:“在上述〔109〕界内东西长五千一百余里(格·麦·),南北长一千余里,而东南至东北〔盛京疆域长度〕较诸〔东西长度〕长数倍”^③〔同上〕。

对于在1684年刊印的《盛京通志》中记载的所有上述这些说明“盛京疆域”范围的距离,首先应当指出,这与张尚贤于1661年在其疏报中所指出的盛京疆域(见前)相比,是不合法地、无根据地把这片疆土向东和东北大大地扩大了。然而,《盛京通志》中将东和东北“至海”的辽阔领土补充划入“盛京疆域”的这种记载,决不能视为这片土地归属清帝国的重要补充理由。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文献资料的论点没有根据。《实录》中记载的历史事实证明,满洲国在其正式存在的时期(1616年—1644年),从未对这一东部地区建立任何形式的政治或者行政管辖,更没有将其划入自己的疆域。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1645年—1684年期间的清帝国对这一地区也未行使过管辖。清人对这片土地没有进行过任何军事征伐;在1661年“盛京疆域”的边界,据满清方面自己承认是极其有限的;根据吴默讷等的探察,我们已有可能确信,就连长白山地区对满洲人来说也是不甚了解的地区,更不用说现今日本海沿岸的地区了。看来,满洲人不可能也不能够援引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片土地确实属于清帝国。

然而,如果仍然设想该文献资料的这种论点有什么根据的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东北至飞牙喀四千余里,东海界”(同上)。——译者

②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西北至九宫台边门四百五十余里,蒙古界”(同上)。——译者

③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以上东西广五千一百余里,南北袤一千余里,而东南东北其袤数倍于西”(同上)。——译者

话,那么当你对上述距离略加分析之后,就会发现这些距离不准确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因而使你会立即放弃这种设想。

首先,从盛京往东和所谓东南的距离不符合实际情况是显而易见的。《盛京通志》中指出,“东南”至希喀特山(锡霍特岭),“朝鲜界”²⁰,距离是二千余里(一千余公里)。但是从盛京到朝鲜北界的实际距离是六百公里,而到锡霍特岭的实际距离是八百公里。

[110] 往东的距离,该志书中写的是四千三百余里(二千一百五十余公里),但是盛京东至海(朝鲜沿岸一带)的实际距离约为五百五十公里(),而如果计算往东北的距离,则稍微超过盛京至锡霍特岭的距离,即为九百五十一——一千公里。

“东北至费雅喀住地”的距离,该志书中写的是四千余里。这一记载是非常含糊的。如果如该志书中所记是四千余里,那么就把“盛京疆域”的边界挪到遥远的乌第河和善塔尔群岛后面的十七世纪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所熟知的并由他们开发的地区去了,而满洲人是从未到过那里的;“往东四千三百里”的距离则把“盛京疆域”移到太平洋水域,遥远的……日本列岛后面去了!

显然,当满洲人把关于“盛京疆域”东和东北长度的这样数据写入自己的志书的时候,他们没有关于远东领土的任何真实的概念。

毫无疑问,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清朝官修著作中出现了这样毫无根据的论点,只能解释为清人力图将远东的俄罗斯领地攫为己有。为了准备侵占俄罗斯国领地,清人试图从思想上为自己的侵略辩护;为此,他们力图建立对这片领土的某种“历史权利”。

与这种伪造的关于清帝国向东和东北扩展疆界的数据相反,北和西北方向的边界记载得比较符合实际。应当注意共在这两个方向的极限(“往北二百八十余里〔一百四十公里——格·麦·〕为

〔国〕界”^①；“西北……四百五十余里〔二百二十五公里——格·麦·〕为蒙古界”^②）。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盛京疆域”仍然按照传统包括了满洲人多少知道一点的全部东北领土；而在1684年刊印的《盛京通志》中在这片领土上已经划分了两位将军（奉天将军和宁古塔将军）各自的管辖范围。

然而，尽管笼统地指出“盛京疆域”东“至海”，东北至费雅喀部落住地也“至海”的广袤相当长的边界，但实际上属于清帝国版图的只是这一辽阔领土的中心部分——隶属奉天等地将军³¹管辖的地区。正是在这一地区的边缘，清人修筑了柳条边防御工事线。^[111]《盛京通志》的这一记载值得严重注意，因为满洲人自己在这里正式承认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清帝国东北的实际边界。

著名的亚洲边界问题专家拉铁摩尔认为柳条边是“西部满蒙之间的边界”〔见322，第225页〕。他指出蒙古人从自己方面也保卫柳条边，从法库门起有一条军路通向诺尼江和阿穆尔河。在这方面，拉铁摩尔根据《蒙古游牧记》的资料，写了沿这条路居住的锡伯族。他写道：“据史书记载，锡伯……公开抢掠，但因其在蒙古人统辖之下，〔满洲人〕不能控制他们，这充分说明满洲人在蒙古境内的影响是有限的”〔见322，第226页〕。

稻叶岩吉在谈到柳条边的时候，指出清人感到需要把属于清帝国的东北边陲领土固定下来，为此目的修筑了上述连绵不断的边界防御工事线。同时，作者认为修筑这样强大的防御工事线完全是为了阻止渴望开发边区的中国和平移民深入“满洲”〔见257，第322页〕。依我们看来，这仅仅说明了柳条边的用途之一。另一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北至边二百六十余里，边界”（同前）。——译者

②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西北……四百五十余里，蒙古界”（同前）。——

位日本历史学家矢野仁一说得比较正确。他写道，柳条边既是与蒙古的边界，也是与朝鲜的边界。他认为将清朝的真正故乡(原建州府治)围以柳条边，修筑边堡，是为了防御朝鲜人入侵。矢野仁一在确定了柳条边的位置以后，十分正确地断定，这一条防御工事线证明了“满洲(即满洲人或者满洲国)扩展的边界”〔见 278, 第 167—169 页〕。

由此，这位日本作者把 1726 年修筑的第二“条”柳条边直接同满洲人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加强联系起来。他写道：“柳条边的东北支线保卫着吉林、满洲人的故乡，免遭蒙古人的侵犯”〔见 278, 第 167 页〕。作者在概括关于柳条边的资料时，作出了如下的结论：“在清朝统治初期，满洲人的〔势力〕局限于以柳条边线为轮廓的边界内”〔见 278, 第 171 页〕。

[112] 从所有这些资料看来，有些作者在所探讨的时期内随心所欲地扩大清朝在这一地区领地边界的做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例如，刘选民在 1938 年曾写道：“从清人入山海关前所并服的东北诸部落的位置，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开国初的边界就象伸开五指的手掌那样宽广。这些边界西至蒙古土默特、科尔沁、喀尔喀诸盟，北达外兴安岭(斯塔诺夫山脉)南坡，南达明辽东边墙，与朝鲜接壤，东临海滨并将整个库页岛(萨哈林岛?——格·麦·)全部并入其边界内”^①〔见 230, 第 282 页〕。文·陈在 1966 年(继陈芳芝之后)也鼓吹这种赤裸裸的扩张主义观点：“可以断言，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的东北边界(γ₁——格·麦·)是沿雅布洛诺夫和斯塔诺夫山脊到鄂霍次克海。如果说满洲人没有再向北推进，那仅仅是因为他

① 中文原文为：“清人入关前所并服东北诸部落之位置既明，则其开国初之疆域亦了如指掌矣。大抵西界蒙古土默特、科尔沁、喀尔喀诸部，北抵外兴安岭山阳，南达明辽东边墙，接朝鲜，东临海滨，并领有库页岛全部也”(见《燕京学报》，第 23 期，第 182 页)。——译者

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巩固清朝在长城以南〔领土上〕的地位”〔见 284, 第 115—116 页; 285, 第 21 页〕。

勿庸置疑, 刘选民和文·陈以及其他一些作者的这种意见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因而在与文件原件核对之后便不攻自破了。产生这类意见的根源不仅在于没有充分研究基本的史料, 而且在于力图歪曲关于中国东北历史的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 并且不惜伪造, 以便适应这些作者政治观点的需要。

因此, 对我们来说十分明显, 尽管如上所述满洲人在宁古塔和吉林活动频繁, 但是整个宁古塔地区和吉林及其疆域仍旧没有正式划入清帝国的版图。一直到 1726 年这些地方仍然是边外疆土, 国内所实行的行政区划(划分府、县等)并没有波及到这些地方。在官修文献资料中仍被称作: 位于边界外的疆土。

《盛京通志》引用了关于东北的第二位将军——宁古塔将军³²所辖地区边界的资料并且将关于吉林³³和宁古塔³⁴所辖领土的资料列入单独的篇章。但是这些疆土是包括在我们前面所分析的“盛京疆域”里的。

该文献资料中所指出的这些“距离”数字突出地说明了我们已^[113]在前面所指出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不准确之处。

对这一地区的北部边界问题, 我们在这部文献资料里发现了下面的重要记载。其北界和西北界上有两个具体的据点: 宁古塔以北六百里的“边关”法特哈门和宁古塔西北四百五十里的黑尔苏门。

在吉林和宁古塔疆域之间的边界上有一据点名曰阿勒楚喀(今名阿城)。此外, 具体指出了“宁古塔疆域”的北界是混同江, 东北界是费雅喀部落的居住地, 后一记载清楚地说明, “费雅喀土地”不属于宁古塔疆土。

因此, 根据这部官修文献资料关于宁古塔将军所辖疆土的记

载,可以做出下述结论:位于法特哈和松花江以北以及黑尔苏门西北的地区,即今之中国黑龙江省和苏联的阿穆尔沿岸地区不属于清帝国控制范围内的疆土,并且位于清帝国与之直接接壤的疆土边界以外。

清朝的官修文献资料根本没有关于现今黑龙江省疆土的任何记载。M. Ⅱ. 赫拉波维茨基是注意到此事的第一个人,他有充分根据地写道,所说的宁古塔东北边界三千里的长度,“使宁古塔东北疆域的边界线只能到耶稣会士所绘制的中国地图所标的虎儿哈河(今名牡丹江——格·麦·)从东南注入混同江的地方。因此,大清疆土的边界……是沿松花江右岸到虎尔哈河注入混同江的地方为止。显然,在康熙 23 年(1684 年——格·麦·)以前,不仅整个阿穆尔河左岸,而且从松加里乌拉和诺尼江(即嫩江——格·麦·)汇合处起,在伯都讷城附近向北包括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呼兰等城和全呼伦贝尔地区的大片土地也都在满洲领土界线外。同样,从虎儿哈河直接向东至海的右岸土地也不属于满洲人”〔见 194, 页 450 下—451 上〕。

阿穆尔沿岸地区不仅不属于清帝国,而且对满洲人来说,在八十年代初就已是名副其实的空白点^①,因为清人同这一地区的直接接触(指 1627—1644 年的军事征剿),早已不复存在。

[114] 在这方面,我们虽然完全同意 П. Т. 雅科夫列娃把清帝国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事行动看作是侵略〔见 216, 第 13 页, 第 125 页〕,但是我们不能同意作者的下述看法:在俄罗斯人出现在阿穆尔河上以后,“俄罗斯的边界便紧紧地靠近了中国领土”〔见 216, 第 125 页〕³⁶。遗憾的是,П. Т. 雅科夫列娃没有能够利用满清文件,这些文件说明了到十七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满洲人开发东北边陲的程度以及清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

① 空白点(белое пятно)指未经考察的地方。——译者

就是在俄罗斯人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以后，在两国领土之间仍然有一片辽阔广大的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包括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嫩江流域、阿穆尔河右岸地区到乌苏里江和乌苏里江流域。所有这些土地无论是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还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都未纳入清帝国的版图。

1684年刊印的《盛京通志》所引用的资料特别是每次再版时所附的图，也使我们能够弄明白满清人关于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就已形成的东北和毗邻地区领土的地理概念，并使我们明确了解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知识的进步情况。

我们现在拥有《盛京通志》1684年（康熙23年）、1736年、1770年、1776年以及1782年的“钦定”版本。1684年的版本（1820年的重版本）已附有十分完备的图，然而这些图在1684年的第一版里不可能有，因为这些图显然是在比较晚的时期绘制的。第一版或者完全没有图，或者十七世纪的图在后来的版本中被替换。

在《盛京通志》1684年版的现代化重印版本中有六幅附图。《盛京輿地全图》占展开的两页。图的上下左右页边上有如下的字句：“东至海四千三百余里，东海界”；“西至山海关八百余里，山海关界”；“北至二百八十余里界为‘国界’”；“南至海七百三十余里，海界”^①。以上所说的距离从盛京——该区行政中心算起。该图北面没有画方格网和坐标网，因此这幅图非常不成比例；但是基本上准确地描绘了盛京疆域的轮廓、最重要的河流和最大的居民点的位置。

《盛京輿地全图》除了盛京疆域本土以外，还包括盛京以东直至海的领土，并没有把宁古塔和吉林的领土单独分出来，虽然当时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东至海四千三百余里，东海界；西至山海关八百余里，山海关界；北至边二百六十余里，边界；南至海七百三十余里，海界”（1684年版）。——译者

这些土地已经是由自己的将军管辖的将军专辖区。由此可见，这里存在着一种把满洲人所知的帝国东北边陲的全部土地都包括到盛京疆域的明显倾向。这种倾向在《盛京通志》比较晚的版本的图中也很突出。这种倾向说明满洲的政治家和学者力图确立作为清帝国整个东北疆域最古老的行政中心——盛京的主导地位。同时，这样“总的”标明实际上并不属于清帝国版图的幅员辽阔的领土，不可能不证明这些地区地图的绘制者给满洲人的领土直接“多丈量了土地”，并说明了为满足满洲博格德汗的要求而对历史地图稍微加以修改的企图。

盛京疆域边界在这幅图上画的是柳边边界线。柳边边门没有指出名称。从柳边北面据点到注入吉林以北的混同江的无名河流〔看来是嫩江〕绵延着一条时断时续的单独的边线——所谓柳条边。

“盛京疆域”海岸线描绘得非常简略，显然这幅官方地图的绘制者对海岸线知之不详。在这幅图上甚至没有指出辽东半岛，连一个海岸线上的岛屿都没有画出。

在图上用双层的正方形标明“盛京疆域”十四个最大的行政点：盛京、辽阳州、铁岭县、开原县、兴京、凤凰城、海城县、盖平县、金州（最南端的行政据点）、广宁县、宁远州、宁古塔、乌喇城、船厂（后两座城是独立的城池）；山海关和牛庄只用汉字标明。

图中占中心位置的是辽河及其支流。该河在柳边界内的流向标的是正确的——由北而南。该河由开原县以西，在该河左支流——清河注入该河的地方上面出柳边界。在柳边界外的辽河在图中完全没有任何反映。图中标出了下列辽河支流：左支流——清河、溶河^①、浑河（在和太子河汇合以后）以及几条无名河流；右支流——杨怪木河。

^① 此河名系根据俄语 Жуикэ 音译，疑为柴河之误。——译者

东北其它河流在图中标明的有东沙河、六州河、渊台河、女儿河、汤河、小凌河、清河(下游名大凌河),杨即河和南沙河在汇合处^[116]以下标为东沙河。

丘陵和山脉具有中国制图术所特有的远景描绘,其中标有名称的只有于山^①、凤凰山、永陵、福陵、昭陵、沙岭、虹螺山和医巫闾山。

在《盛京輿地全图》中只详细地标明了柳条边内的疆土,而对柳条边外的土地几乎没有引用任何实际资料。这证明不仅清帝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土扩展得有限,而且其影响所及一般说来也是有限的。

象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柳条边以北和以西的领土在图中没有任何反映。不仅现今的阿穆尔河流域和嫩江流域,而且还有辽河上游和松花江以北的土地,官方地图绘制者对这些领土是完全不知道的。毫无疑问,清朝的制图家们没有掌握关于这些领土的足够数量的资料。

与吉林(今黑龙江省)毗邻的土地,象从上面引用的《盛京通志》的记载中所看到的那样,满洲人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只把它叫做清帝国界外的“大荒漠”[见 28,卷 8,页 1 上]。

1682—1683 年间,满洲人第一次试图立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他们在这里修建了爱浑堡——黑龙江将军辖地的中心,作为进攻阿尔巴津的基地。1683 年 12 月,设置黑龙江(阿穆尔)将军(详见第三章)。关于当时黑龙江将军所辖疆域在 1684 年的《盛京通志》中没有任何记载,虽然这一文献资料提到了设置该将军专辖区的事实[见 28,卷 8,页 1 上]。显然,当时满洲人对这片领土根本无知。《盛京通志》是这样描写爱浑的:“爱浑位于界外[宁古塔]城北。康熙 23 年(1684 年——格·麦·)颁旨在此地筑城池,设将军

^① 疑为“千山”之误。——译者

和副都统镇守。从边界到此地有一千余里。在此修筑驿路之事尚未规划，尚未确定。尚未颁旨详细查明〔这一地区〕山川和居民点的位置，进一步的记载只能待诸将来（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①〔见 28，卷 10，页 20 上—20 下〕。

[117] 《柳边纪略》关于所谓属于这一东北第三将军——黑龙江将军³⁶ 辖区（1683 年设置）管辖范围内的领土有如下记载（按照十八世纪上半叶的状况）：“爱浑将军所属疆土，〔其边界〕东〔至〕海，西至涅尔琴斯克俄罗斯界，南至宁古塔界，北至海（? ——格·麦·），在所有这些（既属宁古塔将军管辖，也属爱浑将军管辖——格·麦·）土地上未设郡县，未入帝国版图，其大部分为鞑靼国所占（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②〔见 31，卷 1，第 5 页〕³⁷。

杨宾在其著作中曾两次确定宁古塔和黑龙江的疆域为“鞑靼国”。关于爱浑，他写道：“黑龙江爱浑城或作艾虎城。大清天命 2 年 8 月（1616 年 9 月——格·麦·），努尔哈赤命达尔汉和顺科落巴图鲁往征此地（? ——格·麦·），征服十一座屯寨，后作为鞑靼国朝贡”^③〔见 31，卷 1，第 5 页〕³⁸。

如所周知，在 1616 年的这次征伐之后，满洲人旋即班师，在“所征服的十一个屯寨”既没有留下军队，也没有留下管理的官吏。因此，这次远征只是一个偶然的插曲，对当地居民的命运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后者仍为自由民。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爱浑城在城北边外黑龙江岸。康熙二十三年奉旨筑城于此，设将军、副都统驻防。自边至此千余里；其站道设立未定，其山川城池未奉详查，尚俟续载”（1684 年版，卷 10，页 20 上—20 下）。——译者

② 《柳边纪略》中的原文是：“爱浑将军所属，东至海，西至你木格阿罗斯界，南至宁古塔界，北至海。以上不设郡县，无版图，鞑靼之人居多焉”（1936 年版，卷 1，第 5 页）。——译者

③ 《柳边纪略》中的原文是：“黑龙江爱浑^{一作艾虎}城，……大清天命元年八月，太祖命达尔汉顺科落巴图鲁征之，……取屯寨十一。后朝贡为鞑靼国”（1636 年版，卷 1，第 10 页）。——译者

以上所引的文献资料中关于宁古塔和黑龙江的疆域甚至在十八世纪头十五年事实上还是所谓“羁縻”疆土的记载，是非常重要的。《柳边纪略》的记载从下述事实中也可得到证实：将这片领土（而且绝非全部，只是吉林疆域的一部分）纳入清帝国版图的第一次尝试只是在1726年才进行的〔见30，卷215，页18下〕，即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的长时期内，这片土地事实上尚未纳入清帝国版图。

绘制《盛京輿地全图》及其它图的确切日期不得而知，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图是在《盛京通志》成书以后绘制的。下述事实可资佐证：松花江的分支只是到1690年，在组织了几次长白山的专门勘察以后才确定的，而且在《盛京通志》中的长白山图中标的松花江诸支流的顺序与《柳边纪略》中所列举的顺序相同。图上也标明了“柳条边”（1726年）。对图中标的居民点所进行的考证也说明该图绘制较晚。^[118]

1736年版《盛京通志》附有下列地图：《盛京輿地全图》、《奉天将军所属形势图》、《奉天府形势图》、《锦州形势图》、《宁古塔将军所属形势图》、《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长白山图》、《医巫闾山图》和《千山图》。

在《盛京全图》“柳寨”和“柳条边”上都标明各门。东面的海岸线没有标出。阿穆尔河河口只是用下面的汉字标明：“诸江汇合（?——格·麦·）和注入海的地方”^①。

松花江上游标为“混同江”，但是在嫩江从东北注入混同江以后，该江又标为松花江。松花江和阿穆尔河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弄清：“松花江”在入海之前与由北流入它的黑龙江几乎成直角，黑龙江的上游向北出了图界。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诸江合流入海处”（见《盛京通志》所附《盛京輿地全图》）。——译者

在这幅图上将松花江和阿穆尔河汇流处从其实际位置远向东移,甚至在它后面直接画上了海岸(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是十八世纪满汉地图绘制者极其严重的缺陷。

图中一些实际上位于西北——黑龙江的居民点,移到了东北,甚至移到了东面。例如伯都讷城标在了伊屯门以北;在其东北标出齐齐哈尔;再往东是墨尔根,其后,偏东北一点是黑龙江城(爱浑)。这样,在这幅图上齐齐哈尔便位于松花江以北,松花江的流向这里绘为从西向东,从……法特哈起向东北;爱浑在三姓……东北;所有这些大错误在《黑龙江将军所属形势图》中,又照样出现。

[119] 从关于盛京东北和西北的领土概念的观点来看,《皇朝一统志省府厅州县全图》图册中的《盛京全图》也是非常有趣的。这部图册共出版了四卷,包括中国各省图,各卷没有统一页码编号,没有分章;作者和出版时间、地点等也未指出。据德国研究者 B. 富克斯在其著作中简略地提到,这部图册于 1734 年出版〔见 305,第 136 页〕(这里的年代与下句中的年代是矛盾的。——译者)。

这部图册中的东北诸图重复 1736 年刊印的《盛京通志》中各官方图的总轮廓。制图上用来表示位置的识别线也是将今黑龙江省全部疆域移向(盛京)东北,而不是在(盛京)西北,由此便导致一系列的位置变动。

这一地区的主要河流在图中标得不准确:混同江画在今松花江和阿穆尔河下游这一支流注入它以后的位置上,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地图的一个总倾向:认为阿穆尔河是松花江的支流。但是在图中还标出了一条江——松花江,其发源地画在兴凯湖以南。江与湖通,继续流向东北,与乌苏里江下游合流。

没有一幅图有几分准确地反映了所谓东海海岸,没有一幅图标出萨哈林岛。

可见,当时的满洲人和汉人是把松花江当作该区域最大的河

流,而将阿穆尔河只标为它的支流,这不仅表现在地图上,而且也表现在许多地理志中。例如,《柳边纪略》中记载:“混同江绕船厂城(吉林——格·麦·),向东南流。出界受诺尼江(嫩江),向东流。北受黑龙江,南受乌苏里江”^①〔见 31,卷 1,第 5 页〕。混同江所指的不仅是现今的松花江,而且包括这一支流注入阿穆尔河以后的阿穆尔河下游。对于这一概念有其自然而然的解释:满洲人只熟悉松花江,自然觉得该江比阿穆尔河大得多,他们把阿穆尔河只当作松花江的下游支流——这样的认识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但是问题的实质绝不在此。对这两条河流分布的错误认识,造成了清朝地图绘制者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例如,由于对实际距离和地势的无知便导致:在《盛京通志》各 [120] 官方图中阿穆尔河从北注入松花江,在距其“江口”非常之近的地方几乎成直角。由此可见,当时清朝的地图绘制者不知道阿穆尔河是一条纬度流向的河流。

再者,应当指出,这些图的绘制者不知道,在乌苏里江注入阿穆尔河以后,阿穆尔河便转向东北,根本不是流入“海”,而是再经九百余公里(1),已经是在很北的地方流入鞑靼海峡,与海岸成比较大的锐角。因此,在各图中便去掉、改变了实际上完全不为满洲人所知的全部海岸线。这一错误也导致了关于索伦土地位置的错误概念,把索伦变成赫哲和费雅喀的近邻了。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个别错误,而是一大堆错误概念。

这一形成固定地理概念的关于远东疆土的种种错误概念在当时以及在很晚时期的许多地理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例如:《柳边纪略》记载:“爱浑位于宁古塔东北(实际上是西北——格·麦·)一千余里处”^②〔见 31,卷 3,第 54 页〕。《满洲源流考》关于

① 《柳边纪略》中的原文是:“北流绕船厂城东南,出边受诺尼江,东注,北受黑龙江,南受乌苏里江”(卷 1,第 14 页)。——译者

② 在《柳边纪略》中找不到这段引文的原文。——译者

奇勒尔(尼福赫)部落有如下记载：“自宁古塔东北行三千里为奇勒尔的土地，即(当地部落)使鹿鄂伦春人(鄂温克人——格·麦·)游牧地；距齐齐哈尔城一千余里(?)”^①[见 16, 卷 39, 页 8 上]。

由上述关于阿穆尔河自北在松花江“江口”附近流入松花江的错误概念(这在清代当时许多地图中是常见的)，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既然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城筑在“黑龙江地方”，那么在不十分清楚它们的实际位置的情况下，在图中将它们分布在去宁古塔不远的某地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这一错误又得出了清朝的制图家关于远东各部族居住地的错误概念。

在《盛京通志》的官制舆图中，只是在 1782 年的版本中才³⁹第一次正确地标出了阿穆尔河的流向是纬度方向。

满洲中国人关于这些疆土的错误概念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地道的满洲人分布在距上述地区非常远的地方，分布在我们所研究的区域的东南部。

[121]

第四节 清人和东北当地诸部落的相互关系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清人非常重视招抚北方和东北方诸部落居民的政策。清人力图使他们迁入盛京或者宁古塔土地，并用他们来补充满洲八旗军的队伍。

在十七世纪下半叶，清人对居住在柳边外的居民也实行这一政策，但其形式和方法略有改变(在十七世纪中叶以前满洲人照例将居民从满洲军在其奔袭期间所到之处强行赶走)。清人仍旧力图使当地居民迁入满洲人实际控制的领土，但是基本上采取了怀柔手段：规劝，赏赐，向表示愿意迁移的人给予各种优待，提供各种物质帮助等等。这种政策上的方法的改变，首先是由于俄罗斯人

^① 《钦定满洲源流考》中的原文是：“自宁古塔东北行三千里曰奇勒尔，即使鹿鄂伦春游牧处所，距齐齐哈尔城千余里”(卷 8, 页 3 上)。——译者

和平开发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成功和满洲人惧怕当地人民（其中大多数已自愿向俄国称臣）残酷无情地反对自己而引起的。根特木尔及其氏族迁入俄罗斯境的事实，使满洲人常常想起强行驱赶政策的不良后果。但是，应当指出，在此时期内，也有强行驱赶的情况发生，例如在 1654—1656 年间，达斡尔人、果古尔人（上游的吉切尔人）和吉切尔人迁移时，情况就是如此。

在 1644 年以后，表示愿意归附满洲人的那一部分自由居民也如同先前归附满洲人的那些部落的个别次要分支的代表一样，已经不算作“满洲人”，不能同满洲人权利平等，因此获得了“伊彻满洲”（“新满洲人”）的名称，以区别于“旧满洲”。清人竭尽全力招服“新满洲”，理所当然地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后备力量。

弄清楚谁是这种“新满洲”的问题，是有一定意义的。A. B. 鲁达科夫非常彻底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完全正确地将“新满洲”分为两类：“1. 对巩固满洲的强盛未起显著作用的次要的氏族：这一类“新满洲”在迁都北京以前的时期即已存在；2. 在顺治和康熙年^[122]间被聘请的和屈服于和平〔我们可以加上：和军事——格·麦·〕影响的一些部落（例如，三种窝集）的成年居民”〔见 168，第 9 页〕。除了窝集外，A. B. 鲁达科夫没有指出在此时期获得“新满洲”名称的其他部落。这一空白我们试图在下面予以弥补。

在女真各部中，还在明代就有“生女真”或者“女真野人”，即“野人女真”和“熟女真”——“有文化的女真”之分。“旧”满洲也分为“北关”——“定居者”和“布特哈”——“游牧民”，“打牲人”〔见 169，第 22 页〕。这一区别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以后新旧满洲的划分。我们在《中国使臣往见卡尔梅克阿玉奇汗旅行记》^①所引的对话中可以找到关于“新”、“旧”满洲的明显佐证。

“阿玉奇汗问道：你们何故称旧满洲和新满洲？我等答曰：旧

① 即图理琛著的《异域录》。——译者

满洲指其祖、父辈在盛京时扈从我最初君主太祖太宗之满洲，而新满洲则为由盛京边界随当今大皇帝迁居京师者”^①〔见 189，第 116 页〕。

在满洲王朝定鼎中国之后，积极推行了对自由打牲人的政策，采取了各种行动，以使其归附帝国或者使其承认对帝国某种形式的藩属。稍后，正是为了对这些部族施加影响而与顺利地兼并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罗斯人进行了斗争。这些居住在位于俄罗斯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清帝国边界之间的辽阔地带的部落仍旧按照他们所住过的山川峡谷的名称称呼自己。应当注意，“新满洲”的名称只用于那些同意为满洲人供职并且迁移到盛京或者宁古塔的那些部落的代表。当然，首先使满洲人感兴趣的是与他们有血缘关系的东北通古斯诸部落，其中可以指出名称的有我们已熟悉的三种窝集——努尔哈、革依克勒和帖什喀里〔见 169，第 8 页；31，卷 3，第 12 页〕和总名为“鱼皮鞑子”（“着鱼皮的野蛮人”）的虎尔哈和黑金（或者赫哲）〔见 31，卷 3，第 12 页；1，第 90—91 页〕以及札努喀、马尔遮赖等氏族〔见 5，卷 167，页 8 上〕。

康熙皇帝特别重视招降“新满洲”。1662 年，皇帝批准对从宁古塔出发远征招降一百户“新满洲”者授予一等军功，而招降八十户者授予二等军功，六十户者授予三等军功，四十户者授予四等军功，最后，招降二十户者授予五等军功。但是，如果军事长官被派去邀请这些部族入籍或者后者自己来归，则不能为此而授予军功〔参看 168，第 372 页〕。

迁入盛京或者宁古塔土地的这些部落的代表受到了优待和鼓励。国库供给他们一应所需，其中包括住房和家庭用具。在第一

^① 《异域录》中的原文是：“阿玉奇汗又问，满洲何以有新旧名色？我等答曰：初在盛京时扈从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人之子孙俱称旧满洲，其在盛京边界地方居住后，因我大皇帝迁居京师者皆系新满洲”（见《小方斋斋舆地丛钞》，第三帙《异域录》，十四，页 247 下—248 上）。——译者

次收获前保证供应他们粮食。所有这一切都是无偿发放的，而且定出了细则，并在《会典》的有关部分用法律予以固定。例如，规定：“从乌喇、宁古塔和索伦诸地迁来之新满洲，应供给燃料、饭锅、大桶、饭碗、草席、犁、铧，并应为其修盖房舍。为此所需款项应由指定部门（指盛京工部——格·麦·）拨给”〔见 10，卷 57，未指明页码；另见 168，第 372 页〕。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如《会典》中还规定：“凡携家迁至〔盛京〕之新满洲人中之官员（人数不限）统统发给头等粮（大米），其余人等发给糙米。每人每日发半升（一升约等于一公升——格·麦·），发到他们获得第一次收成为止”^①〔见 30，卷 217，页 18 上〕。

这些规定不仅适用于服役阶层，而且适用于所有居住在盛京的新满洲人〔见 30，卷 215，页 26 下—27 上〕。然而从原先的居住地迁移到盛京或者宁古塔正是“新满洲”转而为清朝宫廷效命的必要的条件。实行着下述严格的原则：“你要想和我们在一起，就请迁到我们的土地”。关于此事我们有浩如烟海的史料可资佐证。

据史书记载，沙尔呼达的继任者巴海于 1674 年 12 月带领原先居住在松花江的马尔遮赖氏族“新满洲”四十个牛录入觐皇帝^②〔见 30，卷 215，页 30 上〕。对于巴海迁移了扎努喀氏族“新满洲”，皇帝颁特旨嘉奖他的功劳：“众所周知，子臣之天职在于竭诚效忠君主，为共同事业之利益进良言献良策；而君主对此应按古制晋秩酬庸。据此，朕今特表彰宁古塔将军巴海，彼处如此危险之边界，使所部完整无缺，向朕献计献策，悉心理事，克尽职守，诚属难能可 [124]

^① 《御制大清会典》中的原文是：“凡新满洲官员人等迁家眷来者，不限人口，系官给糙米，余人给糙米，每日各半升，给至收获一次时”（卷 215，页 26 下—27 上）。——译者

^② 按《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镇守宁古塔将军巴海，率松阿里吴喇、诺罗河、吴苏路乌刺、木伦居住之墨尔折勒氏新满洲佐领四十员并佐领下人等，入觐行礼”（卷 50，页 21 下）。（本书作者将“佐领”〔牛录章京〕误译为“牛录”）。——译者

贵。并巧妙地使扎努喀新满洲迁至宁古塔地方：将其编入牛录，供给一应所需，施以仁政。一言以蔽之：大有裨益于祖国；朕对巴海之功绩甚为赞赏；着即赐彼殊恩，授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以资鼓励”^①〔转引自 2，第 11 卷，第 167 章，第 126—127 页〕。

为此，当时任宁古塔梅勒章京的安珠瑚也被授予高官〔见 2，第 2 卷，第 150 章，第 73 页〕。这方面的嘉奖是不胜枚举的，总之，凡使当地部落迁至宁古塔或者吉林者概予加官晋爵。

满洲人对各小部落的代表迁移到他们实际控制的领土，并转而为他们效劳很重视，这一点不仅从上面所列举的对移民的优待和奖励办法可以得到证明，而且康熙皇帝颁发的一系列圣旨，例如 1678 年关于授予世袭官职条例的圣旨也可以证明。1678 年的圣旨中写道，只在下述情况下授予各氏族“新满洲”世袭官职：他们几代人都尽忠皇室，进献贡品，并从自己最初的游牧地迁至宁古塔或者乌喇〔见 168，第 373 页〕。此外，还考虑他们归服满洲的时间〔见 168，第 373 页〕。

1671 年，圣上恩准发给隶属宁古塔或者其它地方驻防军的年满六十岁的官兵军事津贴——每月一两白银。而留在“游牧地”居住者，则不发给这样的“养老金”。

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们能够断定，满洲人几乎不认为盛京以北的土地有任何意义，不关心对这些土地的开发。这些事实还证明清帝国在边陲地区的实际势力范围有多大，它的边界在何处。显然，清人在宁古塔界外的势力已经很弱，而在当地进行控制的能力也微乎其微。

^① 《八旗通志初集》中的记载是：“宣献效力，臣子之常经；晋秩酬庸，国家之大典。镇守宁古塔将军巴海，莅任以来，弹压巖疆，展布宜略，实心任事，筹画周详，允为称职。出其智谋，将札奴喀等新满洲移居宁古塔，分佐领，授室家，成令得所，怀柔远人，有裨军国，殊属可嘉，应给世职，以示鼓励。优赏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袭罔替”（卷 167，页 26 下）。——译者

同从前一样，文献资料中记载着首先是利用“新满洲”在八旗军中服役。例如在 1676 年的纪载中我们看到康熙皇帝的下述敕令：必须将“伊彻满洲”和“旧满洲”混合编在一起，登记入册，用他们建立八旗牛录〔见 5，卷 17，页 6 下〕。

尽管清人始终不渝地对招抚“新满洲”，使他们迁移到宁古塔^[125]和吉林予以极大注意，但是十七世纪七十年代的这种迁移已经不像努尔哈赤和阿巴海时代带有那种强制性了，留在地方上的居民有义务向满洲人纳“贡”。

值得注意的是对上述许多部落来说，满洲人向他们课“贡赋”已经是在俄罗斯征税之后，第二次课税了。如前所述，在 1655 年所有阿穆尔河、松花江下游和乌苏里江的达斡尔和吉切尔乌卢斯都被奥·斯捷潘诺夫课以实物税，他写的《163 年达斡尔、吉切尔和基里亚克地区实物税册》〔详见 94，第 592 页，第 595 页和本书第 97—98 页〕可以证明此事。

然而，仅仅根据关于各部落纳“贡”的记载还丝毫不足以将他们无条件地归入清帝国的“贡民”。让我们来看一看，满洲人对史料中记载的向宁古塔纳“贡”的部落的影响实际上达到了什么程度。

前面我们已经引证了可以用来判定清帝国东北疆域边界的资料。在这一疆域边界外几乎感觉不到满洲人的影响。对于沿海地带和阿穆尔河下游地区，我们拥有耶稣会士张诚的证据，他曾在康熙帝侧供职，并在十八世纪初亲自到过这些地方。他写道，据当地居民称，“满洲部落”分布在距海不少于八日（1）路程的地方，内地的满洲人对这些土地几乎一无所知〔见 313，第 44 页〕。在《宁古塔纪略》中引用了关于虎尔哈、黑金、费雅喀居住地分布的资料：“此三处政府既未设官也未设酋长管理”^①〔见引自 1，第 92 页〕。

^① 《宁古塔纪略》中的原文是：“此三处俱无官长约束”（商务印书馆，1939 年版，第 8 页）。——译者

象上面指出的那样，杨宾把宁古塔地区和黑龙江将军所属疆域的领土确定为“羁縻土地”〔见 31, 卷 1, 第 5 页〕。最后，十九世纪中国历史学家魏源写道：“今纳貂贡之赫哲(那乃人——格·麦·)各部皆不编入佐领系统(满洲军事组织——格·麦·)，不列入满洲八旗”^①〔见 219, 卷 6, 页 4 上〕。这些记载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记的，因此无疑地证明，虽然大清国对柳边外的疆土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限于满洲税吏有时来这里向个别氏族征收贡税。看 [126] 样子，满洲商人有时也到这里来⁴⁰。但是，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上半叶以及稍后的时期，各部落的代表本人照例也向盛京或宁古塔输贡。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表现于纳贡—赏赉制度中的帝国和当地各部落关系的特殊性质。

在清帝国对宁古塔堡界外辽阔领土纯粹是空有其名的控制的情况下，上述各种使居住在这片领土上的各部落归附满洲人的方法便具有巨大的意义。在这些方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满洲人从中国全盘借用的东北各部落向清人纳“贡”的制度，这一制度同满洲宫廷的赏赐制度和规定了细则的对“贡民”的各种优待和特惠制度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那么，“纳贡”包含什么内容，进献的东西是什么呢？大部分东部各部落作为“贡品”送往宁古塔的是貂皮、海獭皮以及其他皮张，甚至还有马皮。但是主要的“贡品”当然是貂皮。非常重要，是“贡品”的数额和缴纳的日期到十七世纪末，清朝律例中未加规定，没有规定出细则。

满洲人认为海獭皮最值钱。譬如，库尔喀部落在进“贡”以后，留下来的海獭皮，满洲人甚至不准许在与朝鲜交界地区的年集上出售〔见 30, 卷 105, 页 16 上〕。缴一张一等皮，当局即发给猎人

^① 《圣武记》中的原文是：“今与贡貂之赫哲诸部皆不编佐领不列满洲八旗”（聚珍板，卷 1, 页 7 上）。——译者

两块蓝布、一套衣服、帽子、各种日常用品，其中包括梳子和扇子〔见 30, 卷 215, 页 37 上〕。

在清朝律例《御制大清会典》(1732 年版)和《大清会典事例》(1899 年版)中,我们没有发现关于应当给予向清朝宫廷纳“贡”的某一部落的使者赏赐什么东西和数量多少的资料。看来,这是按照每一种具体情况个别决定的,并取决于所送皮张的数量以及市场的行情。当时,对边远部落如象萨哈尔察的使者都非常慷慨地给予赏赐。

通常赏赐之物是全套的礼服、袍褂、帽子、腰带、靴鞋、袜子、各种布匹、绸缎、日常穿的衣服、马鞍和带挽具和笼头的马匹、小物品(梳子、扇子、器皿等)①〔见 30, 卷 106, 页 24 下—25 下〕。

在京城接待进“贡”的各部落代表的礼节规定为在清朝各机关^[127]中举行多次筵宴。从 1638 年起,严格规定了接待进“贡”者的制度,根据这一制度为进京(后来到宁古塔)的各部落代表举行一次迎接筵宴,在各旗中举行八次酒宴和一次钱送筵宴〔见 30, 卷 108, 页 7 下〕。此外,凡贡“贡”入京者不论他们何时进京,概由满洲宫廷供应非常丰盛的饮食等物。《御制大清会典》中写道:“对索伦、萨哈尔察、虎尔哈、库尔喀以及其他东方部落贡进京(盛京——格·麦·)者,从崇德三年(1638 年——格·麦·)起规定:每日发给各首领:肉二斤、酒一壶、烤肉一盘、灯油一碗、盐一两;三天发一次蒸饼;在归途中每天发给半斤肉”②〔见 30, 卷 109, 页 12 下〕。1644 年,这些标准有了修改和增加〔参看 30, 卷 109, 页 13 上〕。提高了的标准是为“额駙”(“君主的女婿”)规定的〔见 30, 卷 109, 页 13

① 《御制大清会典》中的记载是:“赏朝衣、袍、帽、带、靴、袜、缎、细布、玲珑鞦韆、漆鞍全备一副”(雍正 10 年版,卷 106,页 24 上—24 下)。——译者

② 《御制大清会典》中的原文是:“凡东方索伦、萨哈尔察、虎尔哈、库尔喀等部落贡貂来京,崇德三年定,头目每日各给肉二斤、酒一壶、肉一盘、灯油一钟、盐一两,每三日给蒸饼一次,同时给路费,每日肉半斤”(雍正 10 年版,卷 109,页 12 下)。——译者

上]。马饲料免费供给，而且进贡人的逗留日期不限〔见 30，卷 215，页 30 下；10，卷 523，页 14 下〕。这些标准事实上实行到十九世纪中叶。

在献“贡”以后，正式准许来的人出售或者用他们带来的毛皮交换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会典》中写道：“在顺治皇帝临朝的年代（1644—1661 年——格·麦·），在圣上恩赐外国领地各代表以后，准许他们在所住的客栈在三——五天内进行拍卖。对朝鲜和琉球则没有日期限制”^①〔见 30，卷 105，页 16 上—16 下〕。在《宁古塔纪略》中，在记述了当地各部落进“贡”之后，写道：“来者的其余东西准其交换”^②〔引自 1，第 91—92 页〕。

这些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我们来看，东北各部落进“贡”和满洲人对他们赏赐以及准许来者出售自己的物品，应当看作是一件完整的事情，是双方规定的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固定制度。满洲人对保持这种关系很关心，因为他们可以获得作为“贡品”的珍贵毛皮，同时，这种“贡”，从他们的观点来看是象征着各部落对满洲国的固定的从属地位。对仅知道国家组织萌芽的邻近部落来说，进这种“贡”并不繁难，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什么耻辱的事情。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部落宁愿干脆向满洲人赠送这种“贡品”，以便能够到盛京和北京进行广泛的互市。而满洲当局为他们定的制度则是一种固定的必需的手续，只有通过这种手续，才能获准用他们带来的毛皮去换取日用必需品。因此，商品交换是体现纳贡—赏赉制度的一种固定形式。与此同时，对满洲人来说最重要之点仍然是那些政治上的考虑，而对各部落的代表来说，主要的

① 《御制大清会典》中的原文是：“顺治年间定，凡外国朝贡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雍正 10 年版，卷 105，页 16 上—16 下）。——译者

② 《宁古塔纪略》中的原文是：“余听彼货易”（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第 7 页）。——译者

始终是这种互市的机会。而且满清人对这种互市制度也非常感兴趣。

饷宴、馈赠、充分供应进“贡”者饮食以及途中由官家供应饮食——所有这一切都是对部落显贵的代表的很有效的补充诱饵，因此，毫无疑义在颇大程度上促使日益众多的新“贡民”志愿踊跃而来，这再好不过地符合满清政策的基本利益，由此完全可以得出结论，绝大多数进京者只是相对地，在所谓名义上的藩属⁴¹的范围内可以视为清帝国的“贡民”。

有哪些部落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上半叶，已贡贡前来宁古塔呢？《宁古塔纪略》中举出其中的三个部落：虎尔哈、黑金和费雅喀〔见1，第90—91页〕，并且记载了这些部落的居住地离宁古塔的距离。

在分析反映关于东北各部落的代表前来顺治和康熙皇帝宫廷的官方资料的文献时，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下述特点：来的次数较诸先前阿巴海统治时期大为减少，并且开始不那么经常了。

基本的“贡民”现在是从阿穆尔河迁来的索伦，而且“贡品”既来自满洲人试图将其编入牛录的索伦，也来自未被满洲这种象征性的组织所列入的索伦。这些索伦“贡民”的“类别”在文献资料中都各有单独的记载，并且很容易看到，留在任何牛录之外的索伦派人前来输贡之事，在这些文献资料中屡见不鲜。

在顺治皇帝临朝时期，索伦经常派人来贡，其原因可以解释^[129]为：满洲人同索伦不久之前进行了激烈紧张的战争，满洲人需要为“平定”索伦而竭尽全力。自然，好不容易地在军事上战胜了索伦的满洲人，初期极为热切地关心及时送来“贡品”，并将此首先视为索伦从属的表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康熙皇帝临朝时期，索伦已很少出现在清廷。

与此同时，在清军征伐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国领地时期，《实

录》中出现了关于这一地区清帝国新“贡民”的资料，其中可以举出费雅喀、奇勒尔、库雅拉。

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是，在 1644—1682 年的《实录》中，仍然完全没有关于任何达斡尔和阿穆尔地区的酋长来见满洲人（除了巴尔达齐来过两次以外）的资料，连“达斡尔人”这个名称也不见诸记载。

可以有充分根据地断言，在满洲人进入山海关以南的领土后，由于忙于中国的各项事务，他们同许多东北各部落的联系或者大为减弱，或者趋于断绝。例如，满洲人从前所熟知的东北许多部落和氏族的名称在顺治朝和康熙朝的编年史中大大地走了样，常常被歪曲，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譬如，有名的佟喀喇氏族（窝集部落）在《实录》中被称作“东夷托科罗氏”〔见 11，卷 107，页 12 下〕；那木都鲁氏族被称作“那木都喇”〔见 12，卷 11，页 9 上〕等等。

第三章 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 地区的领土扩张 (1682—1689 年)

第一节 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 成就和满洲军队对阿穆尔河的人侵

到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俄国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经济开发和行政管理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1654年，在石勒喀河的一条支流上兴建的涅尔琴斯克，从1658年起成了独立的涅尔琴斯克督军辖区的行政中心。它管辖着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在十八世纪^①八十年代之前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修建的所有城堡：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堡(1650—1651年)，阿尔巴津堡(1651年)，库马拉堡(1652年)，上结雅斯克堡(1677年)，西林穆迪斯克堡(1677—1678年)，多隆堡(1680年)，额尔古纳堡(1681年)等。

B. И. 顺科夫非常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外贝加尔地区的俄国城堡的性质和作用：这些城堡“决非仅仅是军事和行政的设防据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了农业基地，这些城堡为该地区新建农业（如在外贝加尔地区），或者在原先曾有农业，但已遭破坏的地区（如阿穆尔沿岸地区）复兴农业”〔见 208, 第 200 页〕。

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肥沃土地，吸引来愈来愈多的俄国移民。他们开始在此处开垦生、熟荒地，种庄稼，繁殖牲畜。在阿尔巴津周

^① 原文如此，当为十七世纪之误。——译者

围和它以下的地方,沿着阿穆尔河出现了一些新的小村落、自由村和村庄。到满洲军队进攻这些地方的时候,此地已经有了二十多个居民屯落。1671年修建了斯巴斯基修道院。在修道院附近出现了修道院村。1672年建立了士兵村;不久,在阿穆尔河上(从石勒喀河至库马拉河)出现了伊格纳申诺、奥泽尔纳亚、波加达耶瓦、波克罗夫斯卡娅、帕诺沃、安德罗什金纳、申加洛瓦、上修道院、伊利英斯克等村屯〔见 95,第12卷,第2期,第2—3页,第5—6页;第10卷,第57期,第204—206页;第8卷,第109期,第345—346页;〔131〕216,第61—62页;34,第52—54页〕。“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农民、军役人员和渔猎人等的农业村屯,自额尔古纳河河口起至阿尔巴津以远为止,沿着阿穆尔河两岸绵延近三百俄里。阿穆尔河上游以及一部分中游地区,是人烟稠密的,适于居住,而且经济上得到积极开发的地区”〔见 35,第30页〕。在 B. A. 亚历山大罗夫的专著里,援引了广泛的事实材料,说明俄国移民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多种多样的经济活动。

随着对阿穆尔沿岸地区领土的经济开发,接着是对这一地区的领土从行政上加以固定和从法律上将其纳入俄国版图。从1682年起,正式将阿尔巴津督军辖区划分为独立的行政单位,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辽阔领土则划归雅库茨克督军辖区管辖〔见中央国立古代文献档案馆,西伯利亚衙门,第九卷宗,第一部,第54页;216,第119页〕。

到八十年代,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耕农和军役人员已经相当多了〔见 216,第62页;153,第63—64页;94,第581页〕。B. A. 亚历山大罗夫推断说:“俄国居民的总数,仅就外贝加尔的成年男人而言,就已超过了一千五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和平居民”〔见 34,第54页〕。

俄国移民在阿穆尔河上经济活动的成就,为进一步开发它的

左岸各支流，首先是最近的和最大的支流——结雅河流域创造了条件。在这条河上建立了西林穆迪斯克堡、上结雅斯克堡和多隆堡，以及结雅冬营（1681年），这些地方的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各种手工业、商业和矿物开采业〔见 34，第 53—54 页〕。П. И. 卡巴诺夫指出：“这样，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时，阿穆尔河左岸，从其上游直至阿姆贡河^①，连同自阿尔巴津起沿河上下的主要一批俄国移民点，便成了莫斯科国的一个边陲省份，其情况与雅库特相同，同时这一地区较诸与阿穆尔河接壤的外贝加尔地区更适宜居住……莫斯科国有一切根据把阿穆尔土地看作自己的领地，不仅事实上如此，在法律上也是如此”〔见 113，第 15 页〕。

俄国移民开垦的阿穆尔沿岸土地产量很高。到 1680 年，阿尔巴津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自己的粮食需要，而且可以向涅尔琴斯克供应粮食〔见 35，第 31 页；153，第 59 页；208，第 355 页〕。1685 年，阿尔巴津县的播种面积是：哥萨克和农民耕地一千俄亩以上，所谓的皇家耕地五十俄亩以上〔见 35，第 30 页；216，第 65 页〕。

П. Т. 雅科夫列娃指出，十七世纪的俄国农民以其顽强的劳动，在阿穆尔河一带建立了就当时说来颇为可观的农业经济。俄国耕农垦殖大面积土地，采用对当地来说还是新颖的耕作方法和 [132] 利用土地的方法——用铁犁开垦处女地，用耙松土，实行保证获得较高产量的三区轮作制等等。“割晒干草，修建粮库，安装达斡尔地区居民过去所不知道的水磨，以及用陷井和鹿砦的更完善的打猎方法，这些都是新事物。所有这些都给阿穆尔河流域各部落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些部落逐渐接受了比较高的俄罗斯文化”〔见 216，第 68—69 页〕。因此，雅科夫列娃得出结论：“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俄罗斯政府认为达斡尔地区是自己的合法领地，并认为蒙古诸汗国和中国觊觎达斡尔地区是妨碍俄罗

^① 即恒滚河。——译者

斯的合法权利”〔见 216, 第 70—71 页〕。我们完全同意这一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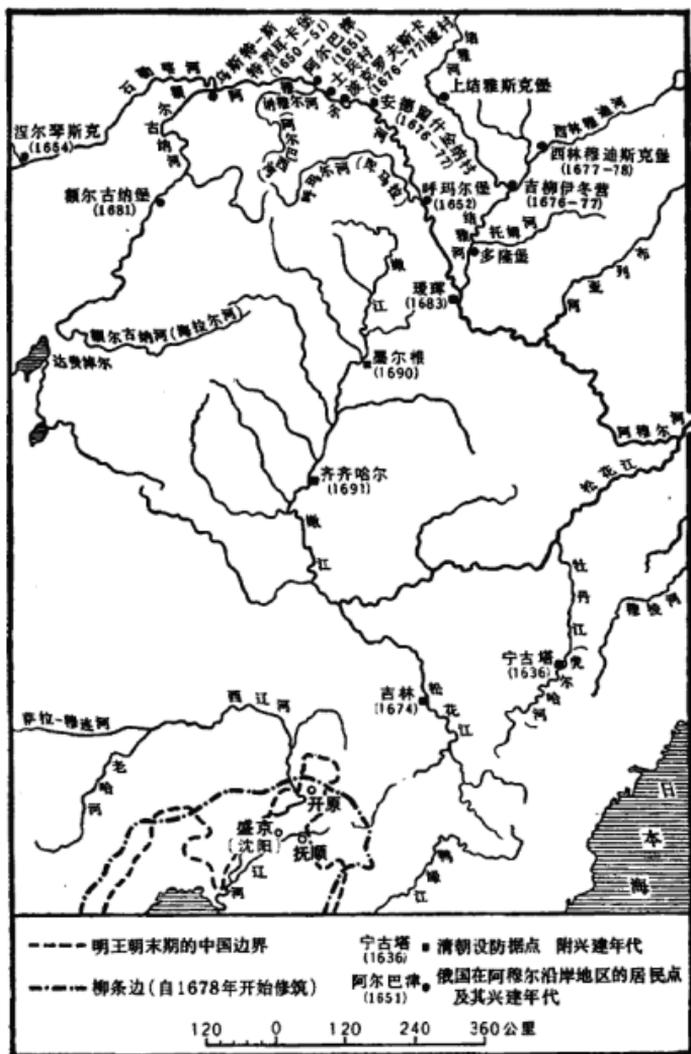
俄国移民开发阿穆尔河流域的成就, 引起了满洲人对自己在东北的世袭领地(他们认为盛京疆域是他们的世袭领地)的命运愈来愈大的担心, 由于在中国领土的战略要地上需要保持八旗军的主要力量, 因而在世袭领地上没能留下足够的兵力。

清廷对俄国开发这些地区的成就只占有一般的资料。关于这些资料的性质, 可以根据 1682 年 9 月 16 日康熙皇帝的谕旨来推断, 该谕旨中说: “初, 俄罗斯国所属俄人屡屡抢掠阿穆尔河边地, 并深入至结雅河流域, 在此建造居室, 开垦土地。朕命大臣明爱等〔传〕谕〔彼等〕, 令其〔返回〕故土。但彼等盘踞雅克萨城〔指阿尔巴津——格·麦·〕, 毫不从命。在〔此城〕周围耕种、渔猎……彼等烦扰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²等当地部落, 抢掠居民……俄人犯我〔? ——格·麦·〕阿穆尔河, 侵扰猎人, 戕害〔当地〕居民, 朕曾发兵进讨, 但未克平定。时过数年, 近闻俄人已分别迁到了沿布列亚河及阿姆贡河流域, 直抵赫哲、费雅喀〔所居之地〕”^①〔见 12, 卷 104, 页 80—90〕³。

因此, 俄国汉学家 M. Д. 赫拉波维茨基在其著作中援引我们上面所引文件的最后一段时, 作出结论说, 这道谕旨承认, 俄国人当时已经占据了阿穆尔河的整个北岸, 因为布列亚河^②注入阿穆尔河的地方远在爱虎城或爱浑城的下面, 而阿姆贡河从西面流入阿穆尔河的地方已经距离河口不远了〔见 194, 第 453 页〕。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初, 鄂罗斯所属罗刹时肆掠黑龙江边境, 又侵入净溪里乌喇诸处, 筑室盘踞。上命大理寺卿明爱等谕令撤回, 犹迁延不去; 而恃雅克萨城为巢穴, 于其四旁耕种、渔猎, 数扰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居民, 掠夺人口……‘罗刹犯我黑龙江一带, 侵扰虞人, 戕害居民, 昔发兵进讨, 未获蕝除, 历年已久。近闻蔓延益甚, 过牛满、恒滚诸处, 至赫哲、飞牙喀虞人住所, 杀掠不已’”(卷 104, 页 8 下—9 下)。——译者

② 即牛满江。——译者



地图六 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发阿穆尔河流域图

应该指出，在这道谕旨里，看来是为了为满洲人即将入侵俄国移民点的行动辩解，竟三次提及似乎是俄国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当地居民进行了抢掠。在清帝的这道谕旨里，事情第一次被说成，似乎阿穆尔土地早已属于满洲人所有。

在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俄国人对额尔古纳河和结雅河流域的积极开发，奥·斯捷潘诺夫的船队和尼基弗尔·切尔尼戈夫斯基队伍的哥萨克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出现，为俄罗斯国开发中间地带——即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边界上两国实际领地之间的相互渗透的地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样就会把俄罗斯国的边界直接推进到满洲人领地境域，清朝统治者于此看到了非常现实的威胁。清人为了消除这一威胁，便开始准备同俄国人大战一场，他们有鉴于几次失败的教训，没有指望可以轻易获胜。

清政府深感在阿穆尔河上旧的斗争方式已不适用，便开始寻找新的、更有成效的方式，继俄方之后，它也采取了在经济上开发领土的方法，把这种方法看成是能使清人立足于阿穆尔沿岸地区，并使清军能够常驻此地的唯一措施。

清政府这一计划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酝酿侵略的外交准备。中国在保卫其领土和侵略邻族土地的斗争中有其自己的传统〔见 282，第 24—25 及以后各页〕。这些传统包括各种伪造历史的手段。在准备战争的三年（1682—1685 年）当中，清政府编造了一系列历史文件。在这些文件里，已经属于俄罗斯国四十余年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土地，竟被宣称是“被侵占的”，“被偷偷占领的”等等，总之，似乎是以前从清帝国手中夺去的。

专门研究俄中外交关系史问题的 B. C. 米亚斯尼科夫注意到这是一种蓄意的、精心策划的外交伎俩，这种外交伎俩是清政府意图侵占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把它从俄罗斯国手中夺去的计划的组成部分〔见 173，第 45—47 页〕。这样，由康熙开始的清帝国在阿穆

尔河上进行侵略的外交准备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把事情说成是似乎阿穆尔沿岸地区早就属于清帝国，而俄国人把它夺去了，因而清王朝的“历史”使命便是“解放自己的”土地。然而当清人一旦暂时在阿穆尔河上取得军事成功时，这一套装腔作势的伪造把戏便收场了。为了证明这点，我们可以援引1700年康熙皇帝的谕旨。这道谕旨是前次远征全部结束后颁发的，经常记住这道谕旨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可以根据这道谕旨来研究在此之前清政府发表的历次声明和我们将要阐述其历史上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这道谕旨中说：“上曰：‘俄罗斯，地方遥远，僻处西北海隅；然〔俄人〕甚诚敬：噶尔丹陷于困境时，曾向之求援，彼等拒之。曩者，〔彼等〕曾遣人分划边界，向朕献涅尔琴斯克迤东之地。涅尔琴斯克及其周围原居布里亚特-乌梁海部落；彼等居林中，猎貂为业，故称之为“林中人”。后，俄罗斯国强盛——遂并吞之，迄今已五、六十年。远邦倾慕朕躬德化，划界之时，向朕献地，出自忠诚。即此，朕心甚为欣慰’”^①〔引自241，卷（首）1，页24下；另见194，页451上〕。

到1683年，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已经稳定。这使清人终于能够继续对邻国进行领土掠夺。清政府首先在阿穆尔地区进行扩张。康熙皇帝最后决定阻止俄国人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然而，当时清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形成的实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清人对此地的地理形势也知之不详。为了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发动积极的行动，清人必须先对该地作细致的侦察，研究它的自然条件、地形、交通路线等等。但是，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与满洲人主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上曰：鄂罗斯地方遥远，僻处西北海隅，然甚诚敬。噶尔丹窘迫求救于彼，曾拒而不答。曩者，遣人分划边界，即献尼布湖地以东为界。尼布湖等处原系布拉忒吴郎海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为业，人称为树中人。后，鄂罗斯强盛，遂并吞之，已五、六十年矣。远服声教，划疆献地，出自忠诚。即此允当珍念也”（卷首1，页6下）。——译者

要基地(如吉林地方)接近的地区的自然条件。

康熙首先从密派满洲细作郎坦和彭春率队去阿尔巴津入手。中国文献资料记载：“上遣副都统郎坦、公彭春等至达斡尔⁴、索伦
[136] 居住之〔地〕，佯作捕鹿，〔实则〕侦探俄人情形”^①〔见 12，卷 104，
页 8 下—9 上；5，卷 153，页 13 上—13 下；另见 173，第 690 页〕。

前面引用的关于俄国人扩展领土的上谕，正是郎坦和彭春临行前奉召陛见时，皇帝对他们说的。此外，康熙皇帝还授给其密使下述指令，这些指令反映了满洲人对所要侦探地区的了解程度：

“尔等至索伦、达斡尔地方后，应先遣专使赴涅尔琴斯克，报告此来捕鹿之故（ \uparrow ——格·麦·）。同时，一面沿阿穆尔河岸行围，一面详视距离远近取最近途径，径薄阿尔巴津城下。细察此城形势及城内情形。朕望俄人不袭击尔等。若俄人竟赠尔等食物，尔等可接受并答谢之。万一俄人进攻尔等，则尔等勿与交锋，但引入还，因朕自有特别区别。

尔等还时，须详视自黑龙江（ \uparrow ——格·麦·）至额苏里水路。自额苏里有路直通宁古塔（ \uparrow ——格·麦·），尔等应择数名从征之参领、侍卫（校级军官——格·麦·），令其会同萨布素寻得此路”^②〔见 12，卷 104，页 9 下—10 上；5，卷 153，页 13 上—13 下；173，第 690 页〕⁶。

稍后，1683 年 1 月 5 日，给宁古塔将军巴海颁发了命令，令其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遣副都统郎坦、公彭春等率兵往打虎儿、索伦，声言捕鹿，以覘其情形”（卷 104，页 8 下—9 上）。——译者

②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往打虎儿、索伦，一面遣人赴尼布潮，谕以捕鹿之故，一面详视陆路远近。沿黑龙江行围，径薄雅克萨城下，勘其居趾形势。度罗刹不敢出战。若以食物来馈，其受而量答之。万一出战，姑勿交锋，但引众还，朕别有区别。尔等还时，须详视自黑龙江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已至额苏里，其路直通宁古塔者，更择随行之参领、侍卫，同萨布素往视之”（《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页 13 上—13 下）。——译者

必须严重注意内河兵船的修缮和制造。命令中提到“宁古塔地方距俄人甚近”^①，证明这道命令也是为了准备对俄国移民点采取军事行动而发的。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在这里关注制造兵船事宜。康熙皇帝非常重视在东北建立舰队。为协助巴海，户部尚书伊桑阿奉派带领优秀的造船工匠前往已经建起船厂的吉林。

为造船和训练水手，还把投降了满洲人的原明朝将领林兴珠从福建调到了宁古塔〔见 12，卷 106，页 16 下—17 上〕。

1683 年 1 月 24 日，郎坦和彭春归来，带回了对满洲人来说重要的侦察资料。《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 刊载的《郎谈传》里，全文引述了他们的疏报。

疏报中说：“臣等遵旨，自达湖里（达斡尔？）之边地墨勒根〔屯〕〔137〕出猎，经十六日，臣等抵达俄人之阿尔巴津城。途中细察该地〔地形〕。此处并无难以逾越之山岭，四周皆是茂密森林……此即自兴安岭至阿尔巴津之地形，料想冬季此处皆为白雪覆盖，穿行此地实无可能；夏日此地大雨滂沱，〔雨后〕淤泥阻路难行。只可不携重载，轻装行进，所有輜重，一概难行。臣等沿阿穆尔河顺流而回，经十五日至爱浑……”。

接着，细作们陈奏了阿穆尔河两岸的便利：“两岸俱可拉纤拖船”。“自爱浑至阿穆尔河、松花江汇合处，骑马而行，半月可到。由此地至阿尔巴津，骑马须一月，船行（逆水而上）则须三月。船行虽费时日，然粮秣、重炮——一切皆可直接运抵阿尔巴津。当俄人在乌扎拉筑木城时，宁古塔副都统海色攻之失利。后，俄人复于库马拉河河口筑城；都统明安达礼往攻，但未能拿下。自此之后，俄人倚重〔护以〕木墙之城堡，以为居于城中，可有恃无恐。”最后，郎坦和彭春陈奏说：“臣等窃以为，攻毁阿尔巴津，非荷兰炮（红衣炮）不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宁古塔地方与罗刹甚近”（卷 106，页 16 下）。——译者

可”^①〔见 5, 第 153 卷, 页 13 上—14 上; 另见 173, 第 690—691 页〕。

康熙皇帝阅过郎坦和彭春疏报后, 决定积极调动驻在东北的满洲军, 将其调至阿穆尔沿岸地区。就此事曾给国务会议颁发了一道谕旨。

谕旨中称: “据郎坦等奏, 捕获俄人甚易(——看看他们的疏报吧; ——格·麦·), 为此发兵三千人, 足敷使用。朕亦以此〔决定〕为然, 但派遣军队——本非善事(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 征讨之事应暂缓进行。须自乌喇、宁古塔调兵一千五百名, 发往阿穆尔沿岸地区, 着手造兵船, 并将大炮、鸟枪及〔军事〕教官发往该地。于黑龙江、库马拉二地修建木城, 以与俄人对垒。待适
[138] 宜时机开始行动。军伍所需粮饷, 应由科尔沁十旗及锡伯、吉林之官屯供应。彼等总计可供应一万二千石⁷, 此数可敷三年食用。

此外, 我军一至汛地, 即应立即耕种。黑龙江城位于距索伦各屯不远之处, 途经五宿, 即可到达该地。在此二地之间, 应设一驿站。一俟我军到达结雅河, 即应要求索伦供应其牛羊。这将对我有裨益。如此, 则俄人将不能再纳我逋逃之人, 而彼之逃人将络绎来归。彼时, 自不待言, 俄人将难于持久”^②〔见 12, 卷 106, 页 23

①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 “臣等奉旨从达湖里、墨勒根诸边围猎而行, 凡十六日, 至罗刹雅克萨城。途间细察地形, 虽无险山, 而林木丛杂, 冰坚沙结, 自兴安至雅克萨城, 大概如一。料冬雪之时, 未可前进; 夏月雨潦, 淤泥阻路, 除轻装疾行外, 凡百重载, 一概难行。臣等从黑龙江顺流回, 凡十五日至爱浑城。观水势, 从爱浑至雅克萨, 舟楫可通, 无险阻之患, 两岸俱可牵纜而行。从爱浑至黑龙江、松阿里江会合处, 马行可半月程。从两江会口至雅克萨城, 马行可一月程, 舟行逆流可三月程。舟行虽稍迟时日, 凡军情、重器, 皆可致于雅克萨。昔罗刹于乌查拉作木城居时, 宁古塔副都统海色击之失利。后罗刹复于呼马立河口立城, 都统明安达礼往攻之, 未下。从此罗刹倚木城为重, 以为坐待无虞。今臣等愚意, 欲取雅克萨诸城, 非红衣炮不可破”(《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 页 13 下—14 上)。——译者

②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 “据郎谈等奏, 攻取罗刹甚易, 发兵三千足矣。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 宜暂停攻取。调乌喇、宁古塔兵一千五百, 并置造船舵, 发红衣炮、鸟枪及演习之人。于黑龙江、呼马儿二处建立木城, 与之对垒, 相机举行。所需军粮, 取诸科尔沁十旗及席北、乌喇之官屯, 约可得一万二千石, 可支三年。且我兵一至, 即行耕种, 不致匮乏。黑龙江城, 距索伦村不远, 五宿可到。其间设一驿。俟我兵将至净溪里乌喇, 令索伦接济牛羊, 甚有裨益。如此, 则罗刹不得纳我逋逃, 而彼之逋逃者, 且络绎来归, 自不能久存矣”(《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 页 14 下—15 上)。——译者

下一24上;5,第153卷,页14下—15上;另见173,第691页]。

在《八旗通志初集》里,这道谕旨至此猝然中断,但在《圣祖实录》里,后面还有一项重要的实际指示:“令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率军队,将其分别安置于黑龙江〔城〕及库马拉〔地方〕”^①〔见12,卷106,页24上—24下〕。

康熙皇帝在派遣满洲军前去阿穆尔的同时,还下令采取一切措施巩固后方,看来这是为了预防万一出现什么意外情况。康熙皇帝对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祜的答复可资佐证:瓦礼祜请求派他到阿穆尔和库马拉,以便能有机会效命疆场,建立战功。

康熙皇帝答复说,将领有这种愿望,使他非常高兴,但是“吉林、宁古塔(由瓦礼祜负责保卫——格·麦·)有重要意义。巴海、萨布素应率大军前行,瓦礼祜仍着驻守所属地方,加意注视地方情况,加强岗哨与侦察,协调军民〔之间〕关系,促进该地农业之发展”^②〔见12,卷107,页19下〕。

在前面援引的康熙皇帝的谕旨里,应该注意我们强调的地方,那里说,派遣军队,即发动战争,本非善事。在康熙皇帝后来的一些谕旨里,这句话也不止一次地出现。于此,我们应当指出其两种意图,这两种意图在历代满清统治者——从努尔哈赤和阿巴海起——的政策中都是同样突出的:对自己的邻人发动侵略性的掠夺战争,与此同时却装扮成“和平爱好者”的模样。例如,阿巴海一面征讨朝鲜,一面却宣称:“战非善事,朕亟愿与各国和好相处”^③〔见^[139]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其命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兵往驻黑龙江、呼马尔”(卷106,页24上—24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得旨:瓦礼祜奏请军前效力可嘉。但乌喇、宁古塔地方,甚属紧要。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既领兵前往,瓦礼祜仍着驻守本处,严辑地方,加意哨探,抚绥军民,勤力田亩”(卷107,页19下)。——译者

③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盖兵非善事,实欲与诸国共安太平耳”(卷2,页7上)。——译者

8,卷2,页7上〕。满洲人对明代中国、朝鲜、蒙古、东北各部,即正是对不断遭到满洲国侵略的那些国家和民族所发出的爱好和平的虚伪言词,经常见于满洲编年史。而且象历史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类漂亮的空话正是在满洲人准备对某一邻邦采取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行动时出现在满洲官方文件中的。

满洲人在阿穆尔发动侵略行动后,遵循的也是这套策略。康熙皇帝在1682—1687年间颁发的谕旨里,关于爱好和平,不愿战争,渴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等的辞句,多极了。这样,满洲人的正式说法是指望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清帝国在全力谋求与自己的邻邦——俄罗斯国和平相处,力争和平地解决变得越来越迫切的划分两国远东领地边界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清军却在扫荡俄国居民,摧毁阿穆尔沿岸地区和结雅河流域的俄国城堡,而这些地区在当时已经在法律上归入了俄罗斯国版图。由此可见,康熙皇帝的“和平倡议”、和平“理论”与他所推行的实际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康熙皇帝才同意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问题呢?正如叙述以后事件时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些条件是要求俄国人自动撤出由他们开发并已经安居的地区,毁掉阿尔巴津和阿穆尔河上的所有城堡,将所有俄国移民从这些地方撤回涅尔琴斯克,而后来甚至要求撤回到雅库次克,因为据康熙皇帝宣称,涅尔琴斯克似乎也在清国领土之上。

俄国居民自动撤离阿穆尔河之后又将如何呢?假如俄国人履行了这些“条件”,清政府就同意在涅尔琴斯克或雅库次克开始划定两国边界的谈判,但是谈判仍须在清政府提出的条件下进行。这正是康熙皇帝的“和平”建议的实质所在,而这种装腔作势的爱好和平的姿态也是策划周密的外交手段的一部分:造成一种印象,好象清人全力谋求和平,而俄国人却不愿这样和平解决阿穆尔问

题，因此清帝国被迫对俄国人开战，“惩罚”他们。

康熙皇帝一面作出这样的声明，一面却在加紧进行军事准备。他所提出的“条件”是不切实际的，是不能实施的，因为俄国人四十年来持续不断地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进程不能向后转。俄国人既然开发了这些地方，并使其适于居住，就不打算再离开。

在清人准备在阿穆尔河上进行战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客观困难，要求他们花费三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一切措施。在此全部期间，由和平宣言和主张编织成的透明纱幕只是用来作战争准备的伪装和迷彩。

清朝外交的手腕是如此巧妙，以致对有关此问题的满清文件不够熟悉的某些当代历史学家竟流露出一些说法，似乎康熙皇帝真心诚意致力于用和平方式解决阿穆尔问题（顺便说说，这个问题恰恰是他造成的）。譬如，葛·加恩就曾写道：“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不愿打仗，”相反，“都希望和平”，并说，为了答复俄国的历次使团，从中国发出过很多函件，然而这些函件照例都没能送到收信人手里〔见 282，第 24 页，第 25 页〕。文·陈也完全轻信了清朝外交的狡猾手段，他指出了康熙皇帝的“爱好和平”的倡议，认为康熙皇帝在 1681 年和 1682 年两次遣使赴涅尔琴斯克似乎是带着举行谈判的提议的〔见 285，第 76—80 页〕。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蒋廷黻，根据阿尔巴津事件，这位作者认为康熙皇帝最初本不打算通过武力解决与俄国人的冲突，所以他才不止一次地向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发去公文，要求俄国人自动离开他们已经安居的地方〔见 242，第 14 页〕。

历史资料却证明，康熙皇帝对俄国人深入阿穆尔河的反应一直是强烈的，而从八十年代起，开始在这一地区积极准备军事行动，同时用和平辞藻来加以掩饰。康熙皇帝假装“爱好和平”的真实原因在于满清对立即在阿穆尔河发动军事行动还没有准备就

绪。

从上面援引的康熙皇帝的谕旨中可以看到，他原指望不费特殊周折便可解决进军阿穆尔带来的诸如供应派往那里的军队、整顿交通等问题。然而，由于他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据点之间的距离以及索伦人供应满洲军的能力等并不十分清楚，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异常困难的，尤其难于解决的是军队的供应问题。

第二节 解决供应问题的种种困难和满洲人 对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的准备

满洲军刚一向北方调遣时，立即出现了供应他们粮食和补充军事装备的问题。1683年4月4日，康熙皇帝批准了他的近臣大学士觉罗勒德洪制定的吉林驻军的军粮供应方案。按勒德洪的意见，粮食应溯辽河运至位于辽河上游地区的等色屯，然后利用从当地蒙古居民处收来的役畜，把粮食从陆路运到柳条边的一个关口伊屯门，接着再沿伊屯河运至松花江。

当时的计划是，军队所需的粮食由“内府佐领”管下各屯，即清帝国内地的村屯供应，因为康熙皇帝认为那里的粮食储备绰有余裕。这些地区的居民应使用自己的运输工具将这批粮食运到上面提到的辽河上的转运点。

在等色屯、伊屯门、伊屯河口与峨河口等处，计划构筑仓房。当船只在满洲境内——柳条边内——行驶时，应由满洲兵护送，在边界外，船只则应由蒙古士兵护送。

康熙皇帝还指示说，每船应少载粮米，多备纤夫，以保证这些船只能迅速行进。看来，这一情况也有很重要的意义。为了陆路运输粮食，必须备有足够数量的车辆和役畜〔见12，卷108，页3下一4上〕。

责成勒德洪会同户、工二部以及理藩院的负责官员，并和郎坦

本人详议所提出的计划，并且就运粮船只的载重量、筑仓，向当地居民征收的租赋数额等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澄清是否可将粮食储存于吉林副都统处等问题以及安排好研究当地地理形势和绘制地形图等事项〔见 12，卷 108，页 4 上〕。^[142]

勒德洪在与上述各部官员几经会商之后，就向他提出的问题陈奏了自己的想法。他建议在巨流河渡口造货船六十艘。每船长三丈，宽一丈⁸。每船可载粮一百石；船上人员应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水手六名。每名水手规定每月发给饷银一两。粮米应运至巨流河口的等色屯，在该屯造粮仓。造仓工程及储粮事宜，交付盛京将军和监督管理此项事务的官员办理。勒德洪的奏章里说：“在我领土内，应自盛京派拨所需数量官兵护送船只；边界以外自等色屯至伊屯门〔途中〕运粮车辆应由蒙古官兵护送，指派蒙古官兵将粮食分批运往指定地点”^①〔见 12，卷 108，页 4 上—4 下〕。理藩院应上疏请旨，说明运粮需派多少蒙古官兵。吉林副都统奉命研究在伊屯门关口及其他地方造仓和建造往松花江运粮的船只等问题〔见 12，卷 108，页 4 上—4 下〕。

所有这些建议和设想，尽管康熙皇帝认为“所议尚未周详”〔见 12，卷 108，页 4 下〕，但后来在满洲人加紧推行其在北方的侵略政策时，还是略作修改后被采用了。

清政府暗派郎坦和彭春去阿尔巴津后，同时还派内府营造司郎中佛宝和户部侍郎宜昌阿等用灏台和通州的船只按规定路线试航。盛京刑部侍郎噶尔图奉命测量自巨流河至等色屯一段河流的航道，宁古塔副都统瓦礼祐等奉命测量自伊屯口至伊屯门一段河流的深度，并测定伊尔门河流速，绘制松花江水系图。

噶尔图奉旨考察之后，回奏说，辽河可通行三丈长的船只。在^[143]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船在边内，酌派盛京官兵卫送；边外自等色屯至伊屯门，派蒙古官兵车辆陆续运往”（卷 108，页 4 下）。——译者

此之后，便在巨流河口开始建造六十艘这种尺寸的船〔见 12，卷 108，页 4 下—4 上；17，卷 1，第 8—10 页〕。

过了一些时候，瓦礼祜奏陈：伊屯河上可航行三丈五尺长以下，吃水量相应的船只。他奏称，粮食经伊屯河可直接运至松花江，因此他建议在伊屯门和伊屯口等关口建仓贮粮，而在吉林地方用当地采伐的木材造船一百艘。这两份奏章皆获准执行〔同前〕。

指挥满洲军先头部队，并且此时已在阿穆尔河上夺得战略基地的萨布素可以携带储备数量能够供全军食用到第二年——1684 年 8 月—9 月的粮食。为了及时将所需粮食运至萨布素军前，清政府决定在吉林地区建造五十艘大船，以供运送从蒙古和锡伯调给萨布素的粮食或盛京拨给军队的粮食之用〔见 12，卷 108，页 5 下〕。

这样，清人在向俄国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土地进军时，决定首先利用东北的水路，因而加紧在此地建立相当强大的舰队。

清政府为了使留在吉林和宁古塔驻防的兵丁不中断军事训练，建议在一年內，利用属于席特库管辖的吉林当地猎户来运输粮食〔见 12，卷 108，页 5 下〕。

然而，由于存在着一系列客观原因，实行这些措施相当困难。这些原因是：军事行动的场所距离清国基本领土太远，满洲人对地形不熟悉，没有交通线，地方上的工作安排得不好等等。

例如，在清军侵略阿穆尔初期，康熙皇帝颁发的谕旨里曾提及，可从吉林沿松花江顺流而下至阿穆尔河与松花江两河汇合处，而萨布素等从自己的营地沿阿穆尔河顺流到此处，两条水路远近几乎相等〔见 12，卷 108，页 5 下〕。满洲人凭经验获得这些资料，看来不会早于 1684 年，这些资料再次证明，清政府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概念并不精确。

[144] 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那样，吉林和宁古塔的军队应开往库马

拉河和爱浑。在大军开拔之前，将军巴海应说明对面临的战争的计划 and 关于军队开到阿穆尔河以后如何分布驻扎的想法。

巴海陈奏说，爱浑和库马拉距离阿尔巴津甚远，倘若兵分两部，则他将难于抵御俄国人。接着，巴海在奏疏中强调指出：阿尔巴津后面是涅尔琴斯克和其他俄国城堡，一旦需要，俄国人可以从那些地方得到增援，那时满洲人将会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巴海预计，他指挥的完全从宁古塔和吉林的满洲人中招募的军队，将于1683年8月末抵达阿尔巴津城下，乘俄国人还没有准备好粮食和装备之时，立即对该城发动进攻。但是，如果不能立即攻打阿尔巴津，则须将军队留在墨克顶地方，而派一支部队在俄国投诚者的陪同下至阿尔巴津城下，向该城居民宣谕康熙皇帝谕旨，号召他们投降，归附清朝。此外，这支部队应进行军事侦察，满洲人进军抑或留驻原地，将取决于这次侦察的结果。巴海还建议，在索伦边界上准备五百匹精选良马，然后将马送至库马拉河口，分给满军士兵，因为路远难行〔见12，卷109，页7上—9上〕^①。国务会议成员讨论了巴海的建议之后，表示同意。

康熙皇帝则断然反对巴海的计划。巴海在奏疏里阐述的建议和设想，被他说成“殊为踈略”。他首先指出，吉林和宁古塔的兵丁先前从未参加过军事行动，在战斗中不会保持应有的行阵纪律。上谕里说：“此外，将军巴海与副都统〔萨布素〕所属官兵之间缺少必需的团结。”^①可能，冲突的实质即在于此。康熙皇帝对所提计划表示不满之后，毅然决然地免除了巴海继续指挥阿穆尔河上军事行动的领导职务。巴海被派回驻守吉林城。而在阿穆尔河上指挥军队的大权完全落到了副都统萨布素和瓦礼祜身上。

抵达阿穆尔河以后，将领们奉命首先仔细熟悉情况和地形，如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将军巴海及副都统官兵又彼此不合”（卷109，页8上）。——译者

果具备保证进攻顺利的条件，则驰奏京城，等候圣上对下一步行动 [145] 的指示。倘若决定进攻，则拟由京城每旗各选五十名精兵，派赴阿尔巴津增援；康熙皇帝认为，只有在此之后，才能予该城以打击。

上谕认为，往攻阿尔巴津的大军的最有利的进军时间，不是 8 月末，而是冬季。上谕说：“如果今冬我军不能获胜，则来夏应令吉林、宁古塔军队再度来此，或者可召回军队，届时再行告知彼等进军”^①〔见 12，卷 109，页 8 上—8 下；卷 14，页 22 上；另见 173，第 664 页〕。

上谕指出，据郎坦奏，从蒙古不能很快调得马匹，因此必须从兵部管理的上驷院精选肥马二千匹，在当年 8 月内驱赶至索伦地区，以替换满洲人进军阿穆尔河所乘的疲羸马匹。上谕再次着重强调在有利时机到来之前，必须暂缓对俄国人发动进攻。

接着，谕令吉林、宁古塔军队无须开往墨克顶。上谕称：“应探明爱浑与呼马拉之间的额苏里地方，那里便于停泊船只，而且有荒废的耕田。大军抵达目的地后，可在此修建木城，驻扎士兵”^②〔见 12，卷 109，页 8 下—9 上；241，卷 14，页 22 下；另见 173，第 664 页〕。

在额苏里和索伦各屯之间，计划修筑驿路，设驿站四座。命理藩院负责官员前往索伦地方主持此项工程〔见 12，卷 109，页 8 下—9 上〕。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修建驿路问题上，最明显地暴露了满洲人不了解这一地区的实际面积和不知道从宁古塔或吉林到阿穆尔河上游的陆路；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清政府就此问题竟然作出大量的错误命令了。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若今冬不便攻取，来夏令乌喇、宁古塔兵仍驻彼地，或撤还，至期酌行”（卷 109，页 8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勘得黑龙江、呼马尔之间额苏里地方可以藏船，且有田陇旧迹。即令大兵建立木城，于此驻扎”（卷 109，页 8 下—9 上）。——译者

康熙皇帝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总的供应问题以及向阿穆尔河调遣大军所产生的其他问题颁发了许多谕旨。我们还可以援引其中的一道谕旨。这道谕旨颁发于1683年4月30日：“今我军已移驻黑龙江，应趁此机会，自乌朱穆秦（蒙古的一个盟——格·麦·）发兵，佯作捕鹿，以迷惑俄国人。另须派遣一名大臣前往索伦地方，准备军需用品——亦须佯称捕鹿……令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前往乌朱穆秦，阿达哈哈番马喇前去索伦地方”^①〔见12，卷109，页3下〕。

据中国文献资料记载，不久兵部奏称：“宁古塔将军巴海未收割宽州、叟登等地田禾，应革去其将军之职。”康熙皇帝就此御批：“巴海迁移新满洲有功，不可遗忘。因此著保留其世职（阿达哈哈番。——格·麦·），余爵及将军衔悉革去”^②〔见12，卷110，页3下〕。

康熙皇帝就是这样冷酷地制裁了未能遂他心意的阿穆尔河上的最高指挥官的。然而，巴海的继任者——萨布素不久也招致了清帝对他的愤怒，也暂时被撤离了所担任的职位。十分清楚，未能及时收割宽州和叟登的田禾只不过是引起康熙皇帝愤怒和裁撤巴海的原因之一，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理由。看来，巴海还犯有另外一些职务上的过失，其中毫无疑问，巴海所提出的思考欠周详的进攻阿尔巴津的军事计划有相当大的关系。其他原因，看来还有巴海的个人品质。这一点的证明，可以在《实录》里找到：在给新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康熙二十二年夏四月丙子）“谕议政王、大臣等：今我兵移驻黑龙江，当乘此发乌朱穆秦兵，声言捕鹿，以疑罗刹。复遣大臣一员至索伦，预备军需，亦声言捕鹿人将至。其令理藩院尚书阿穆瑚琅往乌朱穆秦，阿达哈哈番马喇往索伦”（卷109，页3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宁古塔将军巴海奏叟登等处田禾未收，应革去将军世职。上曰：巴海迁移新满洲，不可全谓无功。著留其阿达哈哈番世职，余世职及将军悉革去”（卷110，页3下）。本书作者误将《清实录》原文中的“班奏”当成地名，译成了 Куанизоу（宽州）。——译者

任宁古塔将军的上谕里，同时也给巴海作了如下的评价：“巴海粗暴，残忍，贪婪，对待士卒不好，故被革职”^①〔见 12，卷 112，页 8 下〕。

我们有权作出结论：当已经下令大军出征之后，撤换总指挥官之事，无疑反映了满洲人的信心不足和他们在阿穆尔河上的地位不稳。

1683 年 7 月 24 日，接到了奉天将军伊巴汉所上奏疏，他奉清政府之命对东北各区情况、自然资源和地理形势进行了考察。奏疏里说：“臣等遵旨，遣官员确勘浑河、太子河〔流向〕及其河源，以确定在何处山中采伐木料，并勘定自伐木场地至水路之距离。该官员等回报称，杉木厂采伐场〔地〕距太子河为三十余里。栗家口、哈尔山、索尔扩等处亦在采伐木材，这三处距苏子河六十多里。木材可经苏子河流送至界凡城，由那里再运至浑河〔河口〕……”^②〔见 12，卷 110，页 7 下—8 上〕。

[147] 稍后不久，于当年 10 月 26 日，伊巴汉上奏说，他从金州和宁远调拨八百名水手去巨流河，请求在运送粮米期间豁免他们的地丁钱粮。户部批驳了这一提议，但是康熙皇帝却支持伊巴汉的请求，指出运送粮食，甚属劳苦〔见 12，卷 112，页 4 上〕。军队的供应问题一直使清政府不安。

1683 年 9 月 19 日，经由两名被满洲人擒获的俄国俘虏给阿尔巴津居民送来了康熙皇帝的语气严厉的谕旨，要求不得收纳逃出的大量当地居民，并且交还投向俄国人的根特木尔。俄国方面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九月戊寅）“巴海暴戾贪污，不恤士卒，遂至失所。”——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臣等遵旨，差官三路勘验浑河、太子河根源，应砍木植之山及所砍之木，离水路远近情形。据称，杉木厂木植离太子河三十余里；栗家口、哈尔山、索尔扩木植离苏子河六十余里。自此运至界凡，方入浑河”（卷 110，页 7 下—8 上）。——译者

受到毫无根据和毫无证据的指责，说俄国方面破坏了似乎从前某一个孟额德¹¹ 访问阿尔巴津时签订的一些什么协议，违约的表现是什么俄国人似乎侵入了清帝国边地，“扰害”了达斡尔人和索伦人，焚劫了费雅喀人和奇勒尔人。并称，满洲大军已经发来，并且将“永驻”额苏里。提出阿尔巴津的俄国移民要回返自己的本土，把在俄国方面的当地部族逃入交还满洲人。如若不履行这些毫无道理的要求，清政府威胁说，它也将接纳俄国逃入，并且亦必定擒戮“往来〔我土〕之人”^①〔见 12，卷 111，页 17 上〕。

在满洲军进入阿穆尔，满洲戍兵永驻此地，以及继此之后结雅河流域的各俄国城堡被摧毁之后，住在阿穆尔河中游的一些小部族的个别氏族被迫承认了满洲人对自己的统治权力。满洲史官们看来意识到把这些当地居民投向满洲人的证据记入清帝国史册保存的全部重要性，所以力求把一切事实，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载入其编年史，而通常能载入这些编年史的只有极其重要的对外事件的报道。譬如，在《圣祖实录》里，在 1683 年 9 月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理藩院奏：‘达斡尔哈纳乌尔偕三人来，自称贫寒，难以聊生，恳求允准〔彼等〕进入内地。应将其编入旗籍’。得旨：‘达斡尔哈纳乌尔……恳请准予进入内地，对此殊堪同情。著于妥善之处安置’”^②〔见 12，卷 111，页 21 上—21 下〕。然而，在满洲编年史里却没有收入有关象根特木尔这样重要的鄂温克首领投向俄国 [148] 人的资料：

在 1683 年间，侵入阿穆尔的满洲军把俄国移民驱逐出结雅河流域和阿穆尔中游沿岸地区，摧毁了他们的城堡、移民点和村屯。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否则，我亦纳尔遁逃，即往来之人，亦必擒戮”（卷 111，页 17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理藩院题，打虎儿哈纳乌尔等三人，告称贫苦，难以聊生，恳入内地，应编入旗下。得旨，哈纳乌尔等以贫苦无聊，来投内地，甚为可悯。务令安插得所”（卷 111，页 21 上—21 下）。——译者

驻扎在额苏里的满洲兵还截击航行在阿穆尔河上的俄国船只。满洲当局千方百计唆使阿穆尔沿岸地区部族的个别代表人物起来反对俄国人。这些事实，以及满洲方面对过去在阿穆尔河上发生的许多事件故意加以歪曲解释，这一切在 1683 年 10 月 28 日给理藩院的圣旨里都有所反映〔见 12, 卷 112, 页 4 下—6 上〕。

这道圣旨，以及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康熙皇帝名义颁布的一些其它圣旨都具有一个特点，就是满方完全不愿对当时已在阿穆尔河上形成的现实形势作出客观的评价。满洲政府故意不去考虑这种现实形势，相反却不遗余力地实现它在这一地区的既定目标：千方百计迫使俄国人撤离阿穆尔河。清人在阿穆尔河发动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不能用任何现实的“威胁”来加以辩护，他们竟然认为俄国农业经济在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和结雅河流域的巩固会造成对满洲人世袭领地的威胁。清人企图求助于大量的政治上虚伪报道和直接伪造等手段，来掩饰其赤裸裸的侵略行径。这一次，侵略政策是以“保护”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小部族免遭仿佛是俄国人对他们的迫害、凌辱的某种愿望，来加以伪装的。然而，在我们所使用的全部满清官修文献资料中，丝毫没有任何暗示可以说明阿穆尔沿岸地区各民族在什么时候曾请求清人援助他们或保护他们免受俄国人的迫害。

相反，相当大量的事实证明，阿穆尔沿岸地区各部族根本不愿听从满洲人在阿穆尔河上建立的统治，因为他们对满洲人有非常深刻的了解¹²。他们逃离满洲人控制，努力保持俄国国籍〔见 216, 第 48—51 页〕。

从 1683 年 10 月末开始，萨布素只是采取了消灭结雅河上和阿穆尔河下游的个别俄国城堡的小规模行动，在执行中央的指示时，他情愿避免对阿尔巴津采取任何积极行动。而且，他还开始在 [149] 给北京的疏报里说明必须改变进攻阿尔巴津时间的理由。10 月

28日,萨布素奏称,如果今冬进攻此城(如圣旨中计划的那样)〔见12,卷109,页8上一8下〕,则很难把大炮和军需品及时运到战场,而且雪深也使以骑兵为主力的满洲军无法行动。萨布素建议,暂将军队驻扎在额苏里,待等五月雪溶冰化时,再行攻打阿尔巴津〔见12,卷112,页6上〕。

国务会议支持萨布素的建议。鉴于军队装备准备不足,决定暂缓对阿尔巴津发动总攻。在来自北京的命令里有一种想法,即在额苏里的满洲戍兵应该“永戍”该地〔见12,卷112,页6上一8下〕。为了在新领土上站稳脚跟,清政府坚持调五百—六百名吉林和宁古塔的新满洲兵和四百—五百名尚未编入八旗军的新征募的达斡尔人来此更积极地开发额苏里地区,按清政府的想法,这些人应携家眷迁至额苏里,以便能在此地从事耕作。规定在额苏里驻防军中设将军、副都统、协领、佐领等官职,即建立起满洲军事辖区(不是民事行政管理机构)的一般的各级官职。此事在官方文件里还是首次提及。应从锡伯地方运粮米去额苏里以供来年——1684年所需。为保证经济稳定,严禁进行任何军事远征。为了就地查明当地情况并与萨布素会商,特遣郎坦急速前往黑龙江。

萨布素反对向额苏里立即迁送补充兵丁,尤其反对携带家小。据我们看来,萨布素所提的理由是完全正确的;在额苏里地方9月即已降雪,时近严寒,新来之人将无处安置,亦无粮可食。萨布素提议,只把达斡尔人迁来此地,以便他们于春初就能开始耕地。据他的看法,待等秋收之后,才可以着手迁移士兵家属〔见12,卷112,页6上一6下〕。

康熙皇帝虽然对萨布素的这些言之有据的理由表示同意,但仍然感到不满。在回复的上谕里指出,这一建议并非长久之策。他再次强调对面临的战争进行周密准备的必要性:预先运达大 [150] 炮,修建船舰,在阿穆尔河上库马拉地方修筑城堡。

此外,还谕令:鉴于“黑龙江地势辽阔”,自吉林至爱浑城的驿路上应置十(十——格·麦·)驿,规定其编制为五十名驿夫,用来传递急件。着重强调了向阿穆尔河运送粮食和在此地建立经水路运来的粮食储备的必要性。依康熙皇帝看来,上述各项措施的彻底实施,将会使俄国船舰难于在阿穆尔河上行驶和迫使因此而陷入困境的俄国移民归降〔见 12,卷 112,页 6 上一—7 下〕。为了对所提的各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特派遣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往见萨布素面议。

萨布素和额尔塞商议后奏称,为了实现上述向新地方移民,修建城堡,耕种阿穆尔河上的土地等措施,人力不足。为此,请发吉林和宁古塔戍兵五百名来此。协力筑城,工竣即回。

康熙皇帝不同意这一计划。清朝统治者认为,近来吉林和宁古塔戍兵调动频繁,不宜再调遣他们前去新地方。但他同意阿穆尔河人力不足这一点,所以命令由盛京副都统穆泰率盛京驻防士兵六百名前去那里。这些人应于 1684 年 4 月赶到那里,并在那里着手完成必要的工程〔见 12,卷 112,页 6 下—8 上〕。

康熙皇帝在这一时期的行动和所下的命令非常不一致。据我们的看法,这首先是由于对当地情况缺少充分情报所造成的。还应指出,北京和阿穆尔河上清军总指挥官之间的行动也互不协调。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原定的进攻阿尔巴津的期限一再拖延。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萨布素指望康熙皇帝随时、首先在由于供应问题遇到重重困难之时,会把派到阿穆尔河的满洲军召回盛京或吉林。毫无疑问,萨布素之所以产生这种希望,是因为清朝统治者对与俄罗斯国军事冲突的抉择,态度犹豫不决。

[151] 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指挥官借口必须更为周密地进行准备,又无所事事地呆了两年。在此期间,满洲军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不肯进攻阿尔巴津。

在此期间，吉林和宁古塔起着向满洲军先头部队供应一切必需品的根据地、以及为这支军队提供补充兵力的基地的作用。康熙皇帝不止一次地专门强调吉林的这些作用。他在接见新任宁古塔将军殷图时谈道：“我军在此地（在吉林——格·麦·）离俄人甚近，因此须经常训练士兵，以提高彼等武备水平”^①〔见 12，卷 112，页 8 下〕。

在宁古塔将军面前还提出了一项招抚当地居民——即所谓新满洲——归顺满洲人的专门任务。上谕中说：“所有(?)新满洲皆请求允准归附〔我方统治〕。应接纳彼等，温和相待，施以教化，俾安其生”^②〔见 12，卷 112，页 8 下—9 上〕。

在给殷图的同一上谕里，在前面还有一段话：“吉林地方暂无军事冲突。当地居民性喜暴乱。尔到任之后，应〔向该地居民〕广施教化，令其明了道德准则，改正固有缺陷，洁身从善。尤其必须爱惜士兵，关怀彼等，应使彼等皆感满意”^③〔见 12，卷 112，页 8 下〕。这道上谕再次证明：吉林地区的居民根本不是什么“满洲人”，而在八十年代中叶还根本不被看作是在精神道德水平上与满洲人平等的人。上谕还证实：吉林地区的当地居民对满洲人不怀好感。

从上面引用的这道上谕里，也可以作出结论：从 1683 年满洲人直接进入阿穆尔河后，吉林，尤其是宁古塔的作用不仅没有消失，相反，更加增大了，首先这些已经开发了的后方领土成了以后开展侵略活动的进攻基地。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我兵逼近罗刹，须时加操练，以修武备”（卷 112，页 8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其新满洲，皆求主来归，理应抚绥慰劳，施以教化，俾安其生”（卷 112，页 8 下）。——译者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乌喇别无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诟讼。尔至当敷布教化，俾识理义，令俱改过迁善，尤宜爱养兵丁，令各得所”（卷 112，页 8 下）。——译者

与此同时，还必须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建立和巩固新满洲人的中心。《圣祖实录》援引了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于1683年12月13日被擢升为黑龙江将军的资料。这是首次提到任命阿穆尔河〔152〕上的满洲军事总督之事。看来，在1683年12月之前，满洲人还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军事管制。与设置阿穆尔总督^①职位的同时，还设置了两员黑龙江副都统的职位。这两个职位分别任命满洲人温岱和雅齐纳担任〔见12，卷112，页28上一—28下〕。

遵照清政府关于在吉林和爱浑之间修筑有十个驿站的驿路的指示，户部开始采取实际措施踏勘这条驿路的路线。事实上，总结起来说主要还是对这一陌生地方进行最基本的勘探。这一点在户部所上的下述奏疏里说得很明显：“自爱浑至乌喇可设置十个〔驿〕站。然而此事详情须待〔臣等〕亲自巡视上述各地之后，方可奏明。为此目的，来年3月（即4月——格·麦·）雪溶之后，须令户、兵二部和理藩院（即外务衙门——格·麦·）各派一名官员。应令宁古塔将军挑选熟知上述地方形势之人，一同偕行，此外，尚须从二郭尔罗斯旗和一杜尔伯特旗各拨二名向导，责成该考察队详勘此路”〔引自168，第542页〕。《圣祖实录》中说：“为此目的，特遣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前往”^②〔见12，卷112，页26下一—27上〕。

对在阿穆尔地区修筑驿路的这种草率的准备，进行得异常缓慢。直到1684年3月29日，在文献资料中才看到记载，说受委的

① 即黑龙江将军。——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康熙二十二年十月乙丑）“户部题：黑龙江至乌喇须设十驿，但设驿之地不行相度，难以悬议。应俟来年三月雪消，遣户、兵二部，理藩院官各一员，并令宁古塔将军选熟知地势者偕行，就近派郭尔罗斯二旗，杜尔伯特一旗向导各二人，详加丈量。上命：户部郎中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前往”（卷112，页29下一—30上）。——译者

满洲官员临行前奏请康熙皇帝训旨。皇帝在训旨中强调说：这条驿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精确确定所需物料数量及驿站服役所需人数。尤其要精确确定此项工程所需的粮食数量〔见12,卷114,页15上—15下〕。

1684年8月中旬，包奇奏称，吉林至爱浑的距离为一千一百九十五里，在这条路上应建立十四座驿站〔见12,卷121,页22上—22下；168,第543页〕。后来，康熙皇帝又特别强调：“确立驿递〔联系〕——乃十分重要之事。测量道路以丈（3.2米——格·麦·）为测量单位。今……应命包奇等人再次急速前往上述各地，^[153]进行必要的测量……”包奇在第二次测量道路之后，奏称：“臣等以五尺的小沙绳测量，得知自乌喇——吉林至爱浑〔城〕的距离为一千三百四十里，此路可设十九座驿站”^①〔引自168,第543页；另见173,第678页〕。

上面援引的资料，再次证明满洲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各处距离的概念，不准确到什么程度，甚至在他们已经调进大军，并且对之进行了经济开发的初步尝试之后，还是如此。1682年曾决定在此建立一座驿站，可是到了1684年8月，已经指出必须在此地建立十九座驿站了！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修筑驿路，遇到了巨大困难。从以后发生的事件中可以看到，不论在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1685年）开始之前，还是在未能成功的第二次围攻（1687年）之后，这条计划中的驿路都未能竣工，满洲人在这一地区开辟的唯一的通路仍旧是沿阿穆尔河的交通线。驿路工程只是在1689年《尼布楚条约》签订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先是郎中包奇等奏：自吉林乌喇至黑龙江，计丈量共一千一百九十五里，应设十四驿。上谕：驿递关系紧要。凡丈量当以五尺为度。今程途太远，令包奇等再驰驿前往，详加丈量。至是，包奇等奏：自吉林乌喇城至黑龙江城，以五尺细丈，共一千三百四十里，应设十九驿”（卷121,第22上—22下）。——译者

之后才竣工。

1683年12月23日，礼部尚书^①伊桑阿建议在吉林再造船五十艘。其使役人员，除萨布素派来的一百五十名水手外，还计划从吉林招募二百人，另加四百名当地猎人〔见12，卷113，页5上〕。为了在1684年和1685年初运输粮米，还须补充六百名吉林士兵。

康熙皇帝对伊桑阿的这个建议答复说，增加所用船只的数量和制定计划，都应该只以在两年期间内运输粮食的需要为依据，因为在1685年“已无必要运送粮食”^②〔见17，卷1，第24页〕。最后这个指示有点费解。看来，康熙皇帝希望在第二年，即1684年军事征战能告结束，或者他希望满洲人在阿穆尔耕种田地能取得迅速成功，即希望满洲军队的粮食能够自给。然而他的打算都落空了。

伊桑阿遵照所奉指示，建议把船只数量增至八十艘，每艘船上拨十五人服役，为了运输使役，从吉林招募六百九十名猎人和从宁古塔征招三百六十名士兵〔见17，卷1，第24页〕。康熙皇帝批准了这些建议，只是缩减了猎人的数目。所有士兵、水手和猎人都预支给一个月的俸饷。

[154] 在此期间还试图在蒙古科尔沁漠尔浑屯增建粮仓，计划在漠尔浑屯藏粮一万石，这批粮米打算由包衣屯^③附近的官庄拨给〔见12，卷113，页22下—23上〕然而，这批粮食是否拿到了，以及此地的粮仓是否建成——都不得而知。

1683年12月28日，满洲人获悉，阿尔巴津守兵得到了增援。这个消息使清政府万分不安。额苏里的满洲驻防军奉命立即采取最严格的防备措施，经常进行侦察，并把阿穆尔河上发生的一切事

① 按应为支部尚书。——译者

②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不必运送”（卷首5，页4下）。——译者

③ 俄作者误将“包衣屯庄”当作地名。——译者

件奏闻北京〔见 12, 卷 113, 页 7 下—8 上; 17, 卷 1—25〕。马喇再一次被派往阿尔巴津。

新的一年, 1684 年初, 满洲军队在阿穆尔河上, 首先在阿穆尔河下游地区的活动频繁起来。萨布素奏称(《圣祖实录》里所注上奏日期是 1684 年 3 月 4 日): “俄人自布列亚河窜至阿姆贡河, 在那里与来自北海的队伍会合, 共同骚扰费雅喀人。费雅喀人退入江岛隐藏。若不急速痛击俄人, 则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人定遭失败。而且, 俄人很快即可得到增援。应趁所形成之形势, 于 4 月(4 月—5 月——格·麦·)冰解时, 派遣将佐二员, 率士兵三百名, 携炮四门, 令彼等于阿姆贡河河口附近安营扎寨。费雅喀人噶克当阿可将彼等引至俄人驻地。我方先行招抚俄人, 令其投降, 如若不从, 则进兵歼灭。如果俄人及时退去, 则我军抵达阿姆贡河河口后, 应安抚〔当地居民〕, 并招抚尚未依附于我之赫哲人众”^①〔见 12, 卷 114, 页 3 上—3 下; 17, 卷 2, 第 1 页〕。

由于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 远离自己的主要基地, 所以尽管在此地已集中了大批兵力, 而且依仗数量上的优势取得了一定的军事胜利, 康熙皇帝却仍然一直担心俄国方面反攻。于是仍继续不断地向阿尔巴津派遣满洲军侦察人员。

1684 年 6 月, 马喇自阿尔巴津城下归来, 奏称:

“臣等数次前往索伦人处, 详询俄人情况。〔所问之人〕皆称, 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二城, 各有五百一六百人。彼等得以在此^[155]支撑多年, 惟赖自额尔古纳河河口至阿尔巴津一带之十数居民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言: 牛满罗刺抵恒滚, 同来自北海之罗刺与飞牙喀战, 退居河洲。若不速计剿抚, 则赫哲、飞牙喀、奇勒尔人民必被残害。且恐罗刺复增发前来。宜乘四月冰解时, 即遣夸兰大二员, 率官兵三百人, 并发红衣炮四具。令附近恒滚口飞牙喀噶克当阿等向导抵罗刺所据地。先行招抚, 不即归降, 则进兵剿灭。如罗刺闻风先遁, 所发之兵即乘机安辑赫哲等处人民, 未经来附者, 亦招抚之”(卷 114, 页 3 上—3 下)。——译者

点。自阿尔巴津至布尔马夫河河口¹³亦有十数处〔俄人〕居民点。俄人在此筑舍居住，以耕种为生。彼等有时亦猎貂。

在涅尔琴斯克地方不事耕耘，俄人只向纳米雅尔各氏族征收实物税，赖以为生。喀尔喀人与巴尔虎人有时来涅尔琴斯克贩卖牲畜及其他物品。涅尔琴斯克人亦猎貂，经商，以〔此〕取得衣食所需¹⁴。

得冷白地方，耕地甚少，且无水路可通此处，粮米及其他物品皆以兽力拖载来此，不足所需。据逃自涅尔琴斯克城下来归之布赫德称，‘新、旧纳米雅尔〔氏族〕，以及遁逃之根特木尔和他的部众，皆在根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和其他地方游牧’¹⁵。

臣恭请陛下降旨，令喀尔喀车臣汗收本盟人众，严禁〔彼等〕与居于涅尔琴斯克四郊之〔俄人〕交易。并请陛下令黑龙江将军调动大军，水陆并进，佯作我军欲攻取阿尔巴津，实则刈取俄人所种田禾。俄人很快便会陷入困境，而受其统治之索伦、鄂伦春人也必将难于在原地经营。应同时先遣骑兵擒获彼等^①〔见 5，卷 186，页 10 上—11 上；12，卷 115，页 19 下—21 上；241，卷 14，页 22 下—24 上；17，卷 2，第 34 页〕。

毫无疑问，马喇所获得的相当周详的情报，对满洲人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后来的事件证明，引起清政府和康熙皇帝本人的最大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臣至索伦，屡密询罗刹情形。皆云现在雅克萨、尼布潮二城，各止五、六百人。其得以盘踞多年者，惟赖额尔古纳河口至雅克萨十余处，雅克萨至布尔马夫河口十余处，筑室散居，耕种自给，因以捕貂。尼布潮田亩不登，但取资纳米雅儿诸姓贡赋。喀尔喀巴尔呼人时贩牲畜等物至尼布潮，尼布潮人亦捕貂与之交易，得以生存。至得冷白地方，耕种田亩无几，且不通水路，面食等物，虽零星负载，亦不足恃。及闻从尼布潮逃回之布赫德云，旧纳米雅儿、新纳米雅儿、托空卧儿、彻尔克吉儿、巴林喀吉儿、夸诺儿、破搭噶儿、巴牙噶儿等八姓之人，并我根特木尔党内逃人亦同彼游牧民河、额尔古纳河等处。臣请敕喀尔喀彻臣汗，收其所部附近尼布潮者，兼禁止交易。再请敕黑龙江将军水陆并进，作攻取雅克萨状，因取其田禾。则罗刹不久自困。而伊属索伦、俄乐春诸姓人，亦难以窃据。再遣轻骑剿灭似易”（《平定罗刹方略二》，卷首六，页 1 上—1 下）。——译者

注意的是这个细作疏报的后一部分,即他提出的进行佯攻的建议。于是,开始了这一行动的准备工作的。

在给兵部的上谕〔见 12,卷 115,页 20 下—21 上〕里称,马喇所提的刈取阿尔巴津城外田禾的建议,将军萨布素亦表赞同。萨布素应详议此问题:满洲军应取陆路,抑或取水路进发。“我军可取陆路至俄人处,但我军刈取之田禾应沿河顺流送回;即使我军水陆并进,至〔俄人〕处,所取田禾仍须以船载回……”^①〔见 12,卷 115,页 20 下—21 上〕。

与此同时,满洲人决定采取各种措施,以恫吓阿尔巴津保卫者。康熙皇帝认为必须向阿尔巴津发出书信,要求俄国人自愿放弃该城。在这道上谕里接着写道:“我军未发之前,应先遣人往见俄人,向彼等宣谕:‘尔俄人据我阿尔巴津与涅尔琴斯克(ᠠᠢ——格·麦·)。多年以来,朕要求尔等撤离该地,然而尔等竟未遵行,且收我逃人,扰我边民。今我军已然出师,歼灭尔等,正在水陆并进。尔等应速离〔这些地方〕,以保全生命’”^②〔见 12,卷 115,页 21 上〕。

正如从所引的上谕中看到的那样,康熙皇帝不仅要俄国人放弃阿尔巴津,而且也放弃涅尔琴斯克,他在谕旨里直言不讳地称涅尔琴斯克为满清所有。这道谕旨的论点没有任何历史事实或其他事实为依据,实际上,这些论点使我们不仅可以用来判断清帝国对上述地区的“权力”,而且也可以用来分析清政府外交所采用的方法。在这一具体情况下,清政府的外交是希望以此为准备中的侵略行径辩护。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由陆路进,以所刈之禾,投江下流。水陆并进,以所刈之禾,船载以归……”(卷 115,页 20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于未进兵时,先遣人传示罗刹云:尔等据我雅克萨、尼布湖,多历年所。屡令撤还,迁延不去,且收我逃人,侵我边民。今大兵水陆进剿,尔其远退,以保余生”(卷 115,页 20 下—21 上)。——译者

在这道谕旨的末尾提到必须正式移文喀尔喀车臣汗，将马喇疏报的内容告知他〔见 12, 卷 115, 页 21 上〕。康熙皇帝这样作，看来是指望在反俄斗争中在蒙古人中间，首先是在喀尔喀的某些盟中间，为自己寻找同盟者。

俄国人收到康熙皇帝送到阿尔巴津的“威吓”信件后，便开始加固城防。不久，满洲人便获悉此事。清政府再次感到不安，便又把马喇派到了阿尔巴津。

满洲人为了尽快获得有关阿尔巴津城防部队名额增加以及城中增建工事的情报，没有等待马喇的报告到来，便审讯了阿穆尔沿岸地区当地各部族的逃人和俘虏。有关俄方为加强阿尔巴津防务而采取的某些措施的消息，满洲侦察队是从投向满洲人方面的当地达斡尔氏族个别代表人物口中获悉的。

马喇的报告中说，1684 年 8 月 27 日，达斡尔首领倍勒儿的助手奉派带领队伍到了阿尔巴津城下。途中他们遇到了俄国人，打死二人，擒获一名名叫费奥多尔的俄人。俘虏供称，在满洲军尚未到达阿穆尔河之前，阿尔巴津城内已经修葺了城墙，而在 1683 年，城周围又增建了一道木栅栏。城郊各地的农民已迁居城内。停止了捕貂，还未完全成熟的庄稼也收割回去。但是，春天，满洲军并未进逼阿尔巴津，所以农民又播种谷物。在城郊山顶设立了一座了望所，有五个人昼夜轮流观察地面。今夏，从涅尔琴斯克派来阿尔巴津四百人，目前此城居民已接近九百人了〔引自 241, 卷 14, 页 24 上—24 下〕。费奥多尔没有提供关于涅尔琴斯克居民的资料，因为据他说，他对此并不知晓。

因马喇很好地组织了侦察，后来他被任命为副都统，同时，指出他“殊为效力”，而且“颇知阿尔巴津地理形势”，为此，今后拟用他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参赞军务。

俄国俘虏提供的情报使满洲人感到非常不安。康熙皇帝甚至

为此颁发了一道特旨，内称：“阿尔巴津兵力有所增加。可能俄人准备加害于(1)我方之人。应致书萨布素等，〔令〕其继续侦察，相机行事”^①〔引自 241，卷 14，页 25 上〕¹⁷。

得悉关于阿尔巴津守城士兵人数增加的消息后，满洲人立即从中国内地各省增派补充部队前往阿穆尔河。阿穆尔河上满洲军数量的增加，使军队供应问题更加尖锐起来。

满洲人进攻阿尔巴津的决定在各级取得了一致意见，并遵照清帝谕旨定于 1684 年夏进行。然而，萨布素深知阿尔巴津设防情况和它的守城士兵增加的数量，所以违背北京所作的决定，未肯进攻此城。黑龙江将军不但没有立即着手实现得到赞同和批准的计划，反而按兵不动，放过了所有有利时机。只是到了 1684 年 8 月 12 日，萨布素才上疏北京。在疏报中，他没有讲这样做的原因和理由，只疏言：“今年应暂停征剿阿尔巴津地方叛逆(？——格·麦·)的军事行动。待来年 4 月(1685 年 5 月。——格·麦·)，再行遣 [158] 兵征剿”^②〔见 12，卷 116，页 1 下〕。

萨布素不服从圣旨的原因，在清代编年史中没有解释。根据《平定罗刹方略》，可以理解为：萨布素解释自己按兵不动的原因是他的军队所需的粮食供应耽搁了，只是在 1684 年 7 月 14 日至 21 日(6 月 3 日至 10 日)才得到粮食，而当时，据逃人提供的情报，俄国人已开始收割自己的“早熟”(看来是冬小麦)的庄稼。此外，萨布素写道，雨季已到，阿穆尔河水急剧上涨，陆路已泥泞难行，他最快只能在一个月之后才可到达阿尔巴津，而那时已经来不及从俄国田地里抢收庄稼了。最后，他还强调说，如果进军远征，则满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上谕：雅克萨增发罗刹，或欲侵害我虞人。其移文萨布素等，时加侦探，相机以行”(《平定罗刹方略二》，卷首六，页 2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疏言：今年雅克萨地方，暂停进剿，俟来年四月遣兵”(卷 116，页 1 下)。——译者

洲人将来不及在天冷之前修葺好自己(在额苏里)的住处。总起来看,这些解释非常象用客观原因来辩解自己的无所作为的意图。值得注意的是,萨布素在这份疏报里甚至没有提及满洲人占领阿尔巴津的可能性〔见 17,卷 2,第 39 页〕。

自然,黑龙江将军的这种完全出乎康熙皇帝意料的消极态度,虽然可以用出现的困难来辩解,但不能不引起清帝的不满和愤怒。康熙皇帝在 1684 年 8 月 12 日颁发给萨布素的特旨中强调指出,马喇建议的进军阿尔巴津旨在夺取俄人所种田禾的计划会使满洲人得到莫大利益,而这种利益的取得只需花费最少的人力和物力,使用较少的精锐部队;而对俄国人说来,损失所种的庄稼会造成莫大的困难,甚至会迫使他们撤离这些地方。康熙皇帝强调说,他对此事的旨意表达得十分清楚。使他愤慨的是,当时在与侍卫关保会商时,萨布素本人曾表示完全赞同这些计划。康熙皇帝写道:“而现在萨布素等坐失良机”^①〔见 12,卷 116,页 1 下—2 下; 17,卷 2,第 39—40 页〕。

按照满洲人的惯例,任何军事失误,哪怕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都会使指挥官遭受最严重的后果。萨布素的过失是十分严重的。10 月 19 日,国务会议上奏说,将军萨布素由于按兵不动,贻误使敌人遭受损失的良机,遵旨,应交法庭议处^②〔见 12,卷 116,页 22 [159] 下〕。然而,看来在此时期清廷产生了理所当然的担心,深恐召回并惩处第二个总指挥官会更加损伤驻扎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本来就不高的士气,从而会长期拖延在这一地区的任何积极行动。在当时的官方文件里直言不讳地强调了这些考虑:“现彼(萨布素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今萨布素等坐失机会”(卷 116,页 2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甲戌)“议政王大臣等议:将军萨布素等,以失误军机,上疏请罪,应即严加议处”(卷 16,页 22 下—23 上)。(俄作者将“上疏请罪”误译为“遵旨”)——译者

——格·麦·) 正统率大军, 驻于俄国边界附近(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 因此应俟事情结束之后……”^① 由于这些原因, 萨布素未被撤免黑龙江总督的职位, 但已被剥夺了对军队的指挥权, 将指挥权移交给他的助手——彭春[见 17, 卷 2, 第 39—40 页]。

将军萨布素受到指责说, 还在 1683 年他抵达阿穆尔河时, 只要遵行上谕, 本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打败俄国人的[见 12, 卷 116, 页 22 下—23 上]。依我们看来, 这种指责是完全不合情理的。

1684 年秋, 康熙皇帝就所有这些事件亲自颁发的谕旨中称: “现在正是攻取阿尔巴津的大好时机, 此次[攻取]意义重大。着都统公瓦山、侍郎郭丕一同前往黑龙江, 与该将军会见。应详细探明回奏: 应否攻取阿尔巴津地方, 为取得胜利, 应采取何种措施”^② [见 12, 卷 119, 页 4 下]¹⁶。

上面援引的各种证据, 依我们看来, 毫无疑问证实了康熙皇帝有些信心不足, 这种信心不足是由阿穆尔沿岸地区发生的一些突然事件引起的; 同时也证实, 在 1684 年 10 月, 他甚至对与俄罗斯国在阿穆尔开战是否明智和这场战争会给满洲人带来什么前景产生了一定的动摇。在此时期(以及稍后时期)康熙皇帝大概对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 以及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直接对阿尔巴津发动军事行动, 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尽管在兵力上占有巨大优势, 但满洲人只是在最后确知俄国人在达斡尔地区的兵力甚少并且在足以保证他们无疑能取得胜利的各項必需的筹备措施已经完成之后, 才决定围攻阿尔巴津。

新的 1685 年到来时, 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黑龙江的军事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但现领大兵, 临罗刹境, 姑俟事竣再议”(卷 116, 页 23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上命都统公瓦山、侍郎郭丕往黑龙江与萨布素等详议: 应否攻取雅克萨城, 并作何举行。择其有裨于事者, 奏闻”(卷 119, 页 4 下)。——译者

行政机构的措施。鉴于对这些遥远的疆土进行实际统辖和对驻守
[160] 这里的满洲军先头部队进行指挥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这些措施就是迫切需要的了。

1685年1月16日，国务会议提议，任命一员大臣“去黑龙江地方进行管理”^①，并遣户部专差官员一名，“监督耕种”〔见12，卷118，页6上一6下〕。此事实质上应看作是对在此之前萨布素独揽大权的行动建立某种监督的尝试。按照康熙皇帝的命令，委任当时已在黑龙江的大臣瓦山去进行统辖，佟宝和佛可托则成了他的参赞。特派萨海去监督该地区耕种事宜〔见12，卷118，页6上一6下〕。

瓦山与萨布素会商后，在1685年2月25日上疏京城，内称：“我军于〔今年〕4月（5月——格·麦·）末水陆并进。我等将招抚俄人，令其归顺。彼等如若拒绝我方所提条件，我等即行攻城。倘若我等不能攻克此城，则努力完成前旨——夺取俄人田禾，然后归来”^②〔见12，卷119，页4下一5上〕。象从这份奏疏中所看到的那样，满洲将领认为攻打阿尔巴津完全可能遭到失败。这份奏疏经国务会议讨论并得到了赞同。瓦山和萨布素提出的计划被通过。

从1685年2月起，开始了阿尔巴津战役的积极准备工作。主要注意力用在以内地训练有素的戍兵来补充满洲黑龙江军队。及时选拔和调遣这些部队，供应这些军队的军需装备——成了清人的首要问题。

还在1月18日，就向兵部下达了康熙皇帝的谕旨，令其特派一名官员去山东、河南、山西和福建，为黑龙江军队选拔五百名最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黑龙江地方将士应遣大臣一员统辖”（卷118，页6上一6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我兵于四月杪，水陆并进，抵雅克萨招抚，不行纳款，则攻其城。倘万难攻克，即遵前旨，毁其田禾以归”（卷119，页4下一5上）。——译者

忠诚的士兵^①，为送往阿穆尔河使用，令从福建运四百个双层坚实藤牌和必要数量的滚被片刀至京师〔见 12，卷 118，页 8 上—8 下〕。看来，是直接应萨布素所请，国务会议还为其在康熙皇帝面前斡旋，从直隶、山西和河南等省各抽调二百五十名熟习火器的优秀射手，增派到黑龙江去〔见 12，卷 119，页 5 上〕。康熙皇帝就这一请求答复说：“尔等疏内未请发京师禁旅往援〔黑龙江〕，实属得当。但直隶等省绿旗兵（由汉人组成的部队——格·麦·）从未^[161]曾参加过征战，且黑龙江军火器已很齐备，无需再加补充。朕意，补充此军，宜抽调一部分福建军中向我方投诚之官兵……和八旗兵及安插山东、山西、河南三省之驻防士兵五百人，交付台湾投诚于我之左都督何佑指挥率往^②”〔见 12，卷 119，页 5 上—5 下〕。

康熙皇帝在其谕旨里表示了对黑龙江将军的不满，严厉申斥他的行动，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有必要把他撤离这一职位。上谕中说：“萨布素等在其历次奏疏中提出各种毫无根据的理由，以此为借口，进行拖延。至于所提仿佛 4 月进军阿尔巴津，夺取俄人田禾，事必无成的说法，此乃因罪遣赴黑龙江军中之愚蠢之徒的见解，此种人干预此事，意在败坏。萨布素出身于贫苦家庭，十分器重此辈愚人，不敢反对彼等议论。为确保成功计，军事计划应筹谋周详。如若贸然进军，日后仍会象明安达礼那样^③，撤回军队，则俄人将越发胆壮。今应自京师选派一员能统帅军队之干练大臣”^③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应分遣官员至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于安插垦荒福建投诚官兵内，选择五百人”（卷 118，页 8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谕：议政王大臣等疏内不请发禁旅，良是。但直隶各省绿旗兵未历战阵；且黑龙江火器甚多，不须增用。朕意选福建投诚善用藤牌官兵，现在八旗及安插山东、山西、河南者，五百人，付台湾投诚左都督何佑等率往”（《圣祖实录》，卷 119，页 5 上—5 下）。——译者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萨布素一应咨题，多属支吾，借端延滞。度四月进兵，不过刈取田禾，事必无成。此皆谗遣黑龙江狂悖之人，从中沮议，不欲成事。而萨布素出身微贱，高视若辈，毋敢有违。用兵所关甚巨，宜周详筹画，期于必克。倘谨事草率，复似明安达礼等退兵，罗刹将益肆披猖。今自京城遣一贤能大臣，总领军事，俟克取雅克萨之日班师”（卷 119，页 5 下）。——译者

〔见 12, 卷 119, 页 5 下〕。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当满洲人在阿尔巴津城下取得胜利——康熙皇帝切望如此——之后,康熙皇帝仍然计划将满军后撤至盛京境内。只是后来他才决定向阿穆尔沿岸地区派遣一支不大的清朝驻防队伍,这些士兵除守卫外,还要种地。上谕中说:“将来,克取阿尔巴津和我军撤回之后(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应自盛京派往黑龙江五百名士兵,彼等应在该处耕种土地,以供应城内驻防官兵食粮”^①〔见 12, 卷 119, 页 5 下—6 上〕。

满洲人之所以打算把军队撤出阿穆尔河,很可能是由于他们的粮食经常不足。看来清人在 1685 年前在黑龙江建立的农业基地,并不能保障军队的需要。军队的供应还只能依靠盛京地区的农业村屯。

这道上谕里还对解决仍属十分迫切的交通联系和阿穆尔河军[162]队供应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实际的设想:“今我军应多播种春麦、大麦和黑麦,因为这些粮食可以在寒冷降临之前收获”^②〔见 12, 卷 119, 页 6 上〕。

为了解决供应问题,康熙皇帝被迫采取极端措施。1685 年 2 月末,康熙皇帝谕令十个科尔沁盟不必将贡物送至北京,而直接交给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队。蒙古人所贡的牛、羊等物,应细加清点〔见 12, 卷 119, 页 12 上—12 下〕。

为了证明正在酝酿的对阿尔巴津的进攻是理所当然的和提高自己军队的不振的士气,清朝皇帝于 1685 年 2 月 5 日颁发了一道谕旨,把满洲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的针对该地区俄国居民的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谕:……俟克取雅克萨之日班师。又发盛京兵五百人,代黑龙江兵守城种地,出征兵还,亦令还盛京”(卷 119, 页 5 下—6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今我兵亦多种春麦及大麦、油麦,于阴霜之前,六月皆可收获”(卷 119, 页 6 上)。——译者

所有军事行动，一律说成是为了“保卫”当地弱小部族。这道谕旨充满了对俄罗斯国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看来主要是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鼓动满洲军队。谕旨里再次肯定说：“战争非善事，只有〔对此〕不得已时才〔应〕为之。往者，俄人毫无〔我方造成的〕原由侵犯边境（？——格·麦·），收纳逋逃。后来，〔彼等〕越过边界（？——格·麦·），扰害索伦、赫哲、费雅喀、奇勒尔等〔部落〕之地，使当地居民不得安居。〔俄人〕抢掠〔当地〕居民和他们的村落，劫夺貂皮，肆虐多端。朕屢遣人宣谕，并经该国使者送去咨文，然而俄人竟不听从朕谕。彼等反而深入赫哲、费雅喀土地，扰害〔边境〕更加猖獗。于是我军开往黑龙江，以阻其过往。〔但〕俄人继续侵占我疆土，不肯交还逃人。因此，应立即殄灭彼等。今谨遵天命，大军进抵阿尔巴津，遣使再次宣谕朕旨：‘前者，朕屢次行文，要求尔等撤回所属人众，还我逋逃。然而时过数年，竟不作复。尔等反深入我内地，抢掠我子女。于是，朕命将出师，制止尔等入侵，招抚阿姆贡河各地居民归附我方。因尔等仍不肯撤离阿尔巴津，今朕特遣劲旅，讨伐尔等。以此兵威，何难殄灭尔等？然而，朕始终不渝地维护我土居民之安宁，对其境遇惻然垂悯，愿其安居乐业。因此，朕未立即使用武力，未曾消灭〔尔等〕。朕屢次告诫，唯望一切皆得和平解决。尔等俄人应急速返回雅库次克，该处应为边界〔？——格·麦·〕。在彼捕貂收税，再勿侵入我内地，还我逃人。朕亦遣还尔逃来我方之俄人。

如此，则朕可于边界与尔等贸易，两国边民皆可安居，兵戈不兴。倘若尔等执迷不悟，不听朕命，则我军将攻打阿尔巴津，消灭尔众”^①〔见 12，卷 119，页 6 下—8 上；另见 173，第 673 页〕。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兵非善事，不得已而用之。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掠村庄，攘夺貂皮，肆虐多端。是以屢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爰发兵黑龙江，扼其来往之路。罗刹又窃据

在这道上谕里，康熙皇帝一再蛊惑人心地讲俄国人侵犯“边界”之事。俄国人并未侵犯清帝国的边界，而且这些边界与阿穆尔没有丝毫关系。清朝统治者清楚地知道，他们国家的边界实际上在哪里，但是，他们出于政治目的，反复地宣称阿尔巴津以及涅尔琴斯克，都是“自己的”领土。在象谕旨这样的官方文件里反复提及边界，这本身就表现了清人对俄罗斯国疆土的领土野心；同时，康熙皇帝努力向自己的士兵灌输这样的思想，说他们是为了“自己的”领土而战。

在这道谕旨里，康熙皇帝第一次提出了沿雅库次克地区确定清帝国和俄罗斯国之间的边界这个毫无根据的建议，而对雅库次克，康熙皇帝本人未必有多少实际概念。

关于雅库次克，满清人只能从俄国俘虏口中知道一些情况。可能他们只知道：雅库次克是距离最近的俄罗斯国的大行政中心。

清朝皇帝把直到雅库次克为止的西伯利亚说成是什么清帝国的“内部领土”的意图，是康熙皇帝伪造历史的一个例证。与此同时，清朝皇帝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论断没有说服力，因此也没有指望自己的建议会被采纳。因而在谕旨的下一部分，他建议国务会议成员考虑，在俄国人拒绝撤离阿尔巴津时应采取何种措施。下面援引的康熙皇帝对国务会议成员所说的话证明，即使是已经决定进攻阿尔巴津之后，康熙皇帝对他选择的战争方法和以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企图是否会有好的结果，仍然怀有一定的疑虑。康

如故，不送还遁逃。应即剪灭。今仰副天心，大兵逼临雅克萨城，姑再以朕谕旨，遣人宣布罗刹。谕之曰：‘前屢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遁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遣劲旅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奉土之民，朕无不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加开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乱。归我遁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晏居，兵戈不兴。倘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卷119,页6下-7下)。——译者

熙皇帝写道：“如宣布此谕后，俄人听命，返回雅库次克，则我军立即驻扎黑龙江，在阿尔巴津设置哨卡，以确〔保〕边境安宁。倘若俄人仍如前顽固，则我将军应考虑，下一步应采取何种对策。如果我方不制定详细计划，则可能造成此种局面：今日我军攻占阿尔巴津，俄人退走；而当朕召还〔我军〕时，彼等会〔再次〕向前推进。如此，则战事连绵永无尽期，边境地区居民将永远不获安定。我方能否如此行事？尔等应周详讨论这个问题”^①〔见 12，卷 119，页 6 上—8 下；另见 173，第 673 页〕^②。

除我们在上面指出的几点外，在这道谕旨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康熙皇帝承认满洲人在黑龙江的势力薄弱，承认此地实际上没有任何清朝的根据地，没有开发该地区的基地（“当朕召还我〔军〕时，彼等会〔再次〕向前推进”）。康熙皇帝懂得，如果满洲人没有开发黑龙江地区的基地，那么他们就难于在远东划定有利于他的疆界。

此时，满洲军在阿穆尔河上的处境非常困难。《圣祖实录》中披露了日期为 1685 年 3 月 1 日的这样一份有趣文件。户部奏称：“黑龙江佐领鄂色等正式报称：耕畜全部倒毙，农具亦不堪使用；但已时近春耕。必须遣派理藩院官员一名，偕同马喇，购置必要数量耕畜，将其送往〔黑龙江〕。应命令萨布素备办农具。”

“得旨：‘萨布素故意毁坏农具，使耕畜尽数倒毙。其目的在于以各种手段拖延〔进攻〕，因彼希望不久能将其从黑龙江召回’”^③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如此宣谕后，罗刹果能遵旨即回，以雅库为界，我兵即驻扎于黑龙江，设斥埃于雅克萨，令疆圉帖然。倘仍行抗拒，则大兵相机而行。若不如此周详区画，今纵克取雅克萨城，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可否举行，尔等其详议之”（卷 119，页 7 下—8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户部题：黑龙江佐领鄂色等咨称：耕牛尽毙，农器损坏。今时近东作，应遣理藩院官一员，同马喇如数购买耕牛送往。农器令萨布素等营造预备。得旨：萨布素等故意毁农器，尽毙耕牛，其意在多方迟延，冀撤离黑龙江耳”（卷 119，页 10 下—11 上）。——译者

[见 12, 卷 119, 页 10 下—11 上; 17, 卷 2, 第 46—47 页]。

[165] 上谕谴责黑龙江将军玩忽职守, 甚至指责他故意破坏农具, 但是使黑龙江的不太好使的庞大的满洲人的供应机器各个环节发生损坏和故障的罪过, 仅仅在萨布素一个人身上吗?

满洲人在准备积极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 仍然极其注意搜集各种各样的侦察资料。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最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对敌人的恐惧。1685 年 3 月 11 日, 马喇自阿尔巴津附近上奏称: “臣等于 1 月 28 日(3 月 2 日——格·麦·)命达斡尔副头目倍勒尔率领三十人前往阿尔巴津以北地区, 令其务必擒获一‘舌头’, 并详视该地形势回报。3 月 5 日(4 月 8 日, 大概是《实录》中的笔误。——格·麦·), 倍勒尔率众还, 带回俄人俘虏七名。彼报称, 阿尔巴津城内一切如前。俄俘加夫里拉等供称: ‘还在去年阿尔巴津即已筑起双层木墙, 中填泥土。当城内得悉额苏里驻有大军时, 便向各地派人求援。来援者应有千名士兵。2 月(3 月), 俄军先头部队已抵该地, 其余部队尚未到达。去岁来此之新任俄人长官阿列克谢(托尔布津——格·麦·)宣告所属人等: ‘〔满洲〕大军来此, 全由尔等杀戮, 抢夺所致。今后, 尔等如若再敢扰害索伦人和达斡尔人, 我一经得知, 必将罪犯处以死刑。’ 因此, 目前俄人来往已不敢携带武器。’ 我方前次所释之二名俄国俘虏, 已送往〔俄罗斯国〕京城, 目前尚未获得彼等君主之任何指示。阿尔巴津内士兵数目为千人左右²¹。新来之补充部队人数, 我等不得而知。所俘俄人中, 有一人逃跑, 今将其余六人派人押解送京”^①[见 12, 卷 119, 页 19 下—20 上]。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副都统马喇等疏言: 臣等今年正月二十八日遣打虎儿副头目倍勒尔等率三十余人往雅克萨城北, 务擒其生口, 并详勘情形以报。三月初五日, 倍勒尔等生擒罗刹七人回云: 雅克萨城垣庐舍如故。又据生擒罗刹噶瓦力喇等云: 去岁雅克萨城内设立重木, 中实以土。闻大兵至额苏里, 即遣人各处求援。援兵千人, 今年二月前队已至, 后队未来。去岁新到头目额里克舍传谕人众: 大兵

虽然清政府花费了不少气力，企图加强补充黑龙江军队和供应武器装备，然而此事进展极慢。这些问题便成了各部之间公文往来频繁的原因。

3月2日，兵部询问：为黑龙江自上三旗拨出之一百七十名士兵，以及从山东等三省调拨的一百零五名军官和三百九十五名士兵为何至今未见到来？〔见12，卷119，页12下—13上〕。康熙皇帝解释说：就是这样，派往黑龙江的军官已嫌过多，那里“兵少，^[166]而管辖之官多”。据康熙皇帝的看法，向黑龙江派兵四百人已足敷使用：这样便可不过费军粮。清帝一贯强调关心为军队建立粮食储备的必要性。例如圣旨中说：“粮食问题对黑龙江来说最为重要（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必须经常寻求保障军队有充足粮食的办法”^①〔见12，卷119，页3上〕。在这一时期的康熙皇帝谕旨里一直有这种思想，务使阿穆尔沿岸地区不要有多余的吃粮人口。

根据清政府的指示，派往阿穆尔河二十名军官和三百八十名士兵，由林兴珠和何佑统领。何佑在临行前受到了皇帝召见〔见12，卷119，页13下，页20上，页20下；17，卷2，第51页〕。

3月17日，自福建送至京城三十个双层藤牌、三百七十个单层藤牌和四百把片刀。这些武器经修理后，转发至吉林。

差不多在围攻阿尔巴津开始之前，康熙皇帝再次想加速驿路的修建工程，以便能够毫无阻碍地从战场获得消息。他在给国务会议成员的特旨里说，黑龙江军队可于5月（1685年）开始远征，

来此，皆尔等杀掠所致。自后再闻有侵扰索伦、打虎儿者，定行诛戮，是以我等往来，不敢持军器。前者释回二人，已送往国主处，迄今未得主命。雅克萨兵众不满千人。后增发者，未知其数等语。生擒罗刹，逸去一人，现在六人，递送至京”（卷120，页19下—20上）。——译者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谕：黑龙江兵食所关最为重要，必当谋恒足之道”（卷119，页13上）。——译者

6月12—21日(在5月中旬)可抵阿尔巴津城下。为了毫不延迟地将军事情报传递至朝廷,皇帝命令理藩院侍郎明爱自蒙古杜尔伯特和扎赖特等盟调拨五百名士兵和索伦人,前去修筑阿尔巴津、额苏里和黑龙江城之间的驿路²²。

当明爱来到现场观察情况时,才发现筑路人员粮食不足。他建议调用索伦藏粮,缩减每个驿站的修建人员,同时为了鼓舞索伦人,以皇帝名义许以“恩典”〔见12,卷120,页17上—17下〕。

看来,满洲人为了在驿路工程中更加积极地利用索伦人,决定改进对索伦地区的管辖。1685年5月9日,颁发了康熙皇帝的一道特旨,内称:“管辖索伦人和达斡尔人之事,非常重要。必须选贤能之人,才能进行管理。今命理藩院所属善骑马之拨什库一名,急[167]速循驿路驰行,至马喇处。马喇现在自己任所,彼手下有能够有效管辖索伦人和达斡尔人之贤能人材。其令马喇具奏此等人之情况,遣该拨什库奏。该使者往返期限为二十天。将此传谕理藩院”^①〔见12,卷120,页17上—17下〕。

这样,清政府得到瓦山与萨布素会商结果的报告之后,便开始加紧准备进攻阿尔巴津。和从前一样,康熙皇帝又蛊惑人心地宣称,战争不是善事,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应进行;他的行动完全是出于对阿穆尔沿岸地区弱小部族的关怀,等等(例如,见前面所引的1685年2月5日的谕旨)。而与此同时,他却继续准备,并且终于发动了对俄国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行政中心——阿尔巴津城的军事行动。康熙皇帝利用巨大的优势兵力,企图以武力从俄罗斯国手中夺取其远东土地,企图将这片土地变成横在两国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谕大学士等:索伦、打虎儿总辖之任,甚为重要,必得贤能之人,始能管理。今著理藩院拨什库善骑马者一人,由驿递速遣至马喇处。马喇身在彼土,有贤能之人堪任索伦、打虎儿总辖者,马喇以其名,明白具疏,即付遣往拨什库奏。所遣拨什库,限往返在二十日之内。可传谕理藩院”(卷120,页17上—17下)。——译者

之间的半荒芜的缓冲地带。

第三节 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和清人在 黑龙江采取的下一步措施

据满清文献资料记载，清军在都统公彭春指挥下抵达阿尔巴津城下是在6月23日。6月25日，开始炮轰城堡，6月26日拂晓，发动了进攻〔见12，卷121，页9下〕。《八旗通志初集》里的《郎谈传》〔见5，卷153，页11上—32下〕²¹说得更为确切，认为在6月25日傍晚，满洲军就已经攻打阿尔巴津城了，进攻一直持续到“次日日落”^①。事实上，满洲人攻打阿尔巴津城是在围城后过了约十天才开始的（详见〔35，第131—133页〕）。阿尔巴津被团团围住。副都统雅钦和胡布诺^②把自己的军队集中在城堡南墙之下，使之完全进入战斗准备，给被围者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主攻正是要从这里展开。副都统温岱、瓦哈纳^③和绿旗汉军指挥官刘兆奇^④奉命调动外国式的大炮（红衣炮），从北面进攻阿尔巴津。博里秋、乌沙、何佑等从两翼推出满洲人所特有的所谓将军炮，从各自的出发阵地进攻阿尔巴津。与此同时，副都统雅齐纳、白克^⑤等从东南方河流一侧攻城。然而，满清军队的进攻被阿尔巴津保卫者击退了，而且这些保卫者自己还进行了几次出击。

文献资料记载说，作为满洲一个军的指挥官²⁴郎坦确信此城不能攻取之后，便提议用火焚城。阿尔巴津被围上一堆堆的乾柴木料，用火点燃了。城中一片火海，守城官兵的处境变得难以忍

①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攻至次日巳时”（《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页16下）。——译者

② 据《郎谈传》，胡布诺当时是营门校尉，并非副都统。——译者

③ 据《郎谈传》，瓦哈纳当时是护军参领，并非副都统。——译者

④ 据《郎谈传》，刘兆奇为汉军提督。——译者

⑤ 据《郎谈传》，白克当时是镇守打虎儿提督，并非副都统。——译者

受，于是托尔布津开始与满洲军指挥部谈判投降条款。满洲军指挥官们遵照康熙皇帝授予的指令，允许俄国人返回涅尔琴斯克，而且副都统班达尔沙和温岱把他们送到“厄里古纳地方”（额尔古纳河）。阿尔巴津城房舍被付之一炬，城堡被夷为一片平地。中国文献资料还记载说，满洲人“刈其（俄国人——格·麦·）田禾”〔见5，卷153，页16下—17上〕。

关于参加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的清军人数，这些文献资料都没有精确指出。

在官修清代编年史中，关于阿尔巴津守城官兵投降的最初消息，记载为1685年7月5日〔见12，卷121，页4下；18，卷2，页15下〕。

康熙皇帝此时正在前往拜察山的行宫途中。当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告知他胜利的消息时，清帝宣称：“消灭俄人，由于路途遥远，一直是件难事。惟朕一人决定出师征讨，以示惩罚。今蒙上天眷佑，得以战胜俄人。朕心甚悦。可将我方胜利消息，传知所有人等”^①〔见12，卷121，页10下；18，卷2，页16下〕。

为庆祝胜利，为国家高级文武官员举行了陛见仪式。诸王和大臣们来到行宫，各自站在规定的位置。向皇帝庆贺的仪式由代表全体出席者的恭亲王常宁率众开始。

阿喇尼和兵部侍郎佛伦宣读了上谕，其中曾提到：

“目前剿灭俄人一举，似乎并非特别重要，然与之有关之一切，则实属重要。俄人三十余年来骚扰我黑龙江、松花江等地区，其所占据之地，距我朝发祥之处甚近。若不剪除彼等，则边民常年不得安生。朕自十三岁开始管理国家，一贯对此〔问题〕严加注意。〔朕〕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顾阿喇尼曰：征剿罗刹，众皆以路远为难。朕独断兴师致讨。今荷天眷，遂尔克之，朕心喜悦。尔以捷音传知诸王大臣”（卷121，页10下）。——译者

仔细探询俄人所占土地之地理形势，通向彼处之道路远近，以及该地居民之性格、风习。在此之后，方根据精密筹划，决定〔进军〕日期……运输粮食，遣发大军，利用有利时机……^[169]

我军精锐强大，我方武器优良坚利，故俄人势难抗拒我军，彼等被迫献地还城”^①〔见 12，卷 121，页 11 下〕。

接着，宣读了诸臣颂词，歌颂康熙皇帝的“睿算”和“好生之德”。进奏毕，诸王大臣再次聆听上谕：

“朕考虑一切事情，必须周详审度一应细节，如此方可取得最良成果。不可轻率从事。向者，尚书明安达礼轻装进军〔讨伐俄人〕，结果粮饷不继。将军沙尔呼达、巴海亦失算，被迫中途而返。俄人因之骄恣，而我索伦、奇勒尔、鄂伦春等民族亦因之心怀疑贰。朕熟思历次失败之因，制定计划，赖此方获军事胜利”^②〔见 173，第 677 页〕。诸王和大臣们聆旨后再次表示自己的忠贞之情并颂扬康熙皇帝。

接着，康熙皇帝在这一天颁发的第三道特旨里着重谈了一些祥兆，这些祥兆似乎在围攻阿尔巴津开始之前便已预示满洲军必定会取得胜利^③。

群臣复进奏说，根据这些祥兆，可以断定，国祚绵永，国家承平，万年无疆。

皇帝允准行礼。于是诸王大臣行了三跪九叩礼〔见 12，卷 121，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即今征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最鉅。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朕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师，深入讨伐。……以我兵马精强，器械坚利，罗刹势不能敌，必献地归城”（卷 121，页 11 上—11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朕思凡事必周详审度方获实效，不可轻率从事。向者，尚书明安达礼轻进，至粮饷不继；将军沙尔呼达、巴海等失计，半途而归，遂致罗刹骄恣，而索伦、奇勒尔、鄂罗春等心怀疑贰。朕询其失机情由，一一详计，今始奏功”（卷 121，页 12 下）。——译者

页9下—12下；18，卷2，页16下—19下；另见173，第676—678页]。

彭春的功绩深得康熙皇帝嘉许。《圣祖实录》里在1685年11月19日这天记载道：“兵部议定(核定)：都统彭春征服阿尔巴津俄人，应叙为头等军功。”“皇帝批示：‘此军功与明安达礼等人之功绩不同。我方多年未能驱逐〔俄人〕……此番胜利，叙为一等功尚轻，应将其叙为头等第一军功。将军萨布素亦应〔与彭春一起〕具奏〔自己的功绩〕’”^①〔见12，卷122，页24下—25上〕，即按军功等级提出自己应得奖赏的疏报。这证明萨布素已得到了康熙皇帝的宽恕。

拆毁阿尔巴津之后，满洲军立即撤到黑龙江城。在该城只留下一支人数不多的驻防军，而主力则返回盛京境内。

涅尔琴斯克督军伊·弗拉索夫命令来到涅尔琴斯克的阿尔巴津人返回去，“以免丧失达斡尔地区和落下从涅尔琴斯克逃跑的名声”。阿尔巴津人在1685年春种的庄稼安然无损，满洲军队实际上并没有毁掉它。俄国人收割了庄稼，重新修筑起阿尔巴津。此次重建的城堡四周围上了高达一俄丈半的土墙，土墙是用草土块和粘土垒成的。

满洲人认为，随着攻陷阿尔巴津，俄国人深入阿穆尔沿岸地区之事已告结束。康熙皇帝在接到关于拆毁阿尔巴津的捷报之后，看来已经认为，战争已告结束，俄国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主权已被消除。在半年多的时间(至1686年2月11日以前)里，康熙皇帝对俄国人重返阿尔巴津和重建城堡之事一无所知，只是制订了在黑龙江立脚的种种计划。满洲政府为了进一步开发这一地区，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兵部议：都统公彭春等招抚雅克萨城罗刹，应作头等军功。上谕大学士等曰：此番军功，与明安达礼等不同。以历年不能删除之意，不久奏绩，尤属可嘉。此等招抚之功，议作头等尚轻，著为头等第一军功。将军萨布素，亦著议叙具奏”(卷122，页24下—25上)。——译者

打算首先修筑驿路和发展农业。

首先，康熙皇帝注意到改善驿递工作。降旨规定新建驿路上的每个新驿站应有役伏三十人，由一名拔什库率领，此外，还要有二十四匹马和三十头犍牛²⁶。使役人等应从盛京将军和宁古塔将军所辖各驿站抽调，以及在柳条边外的领土上招募。驿站所需马、牛，令盛京户部保证提供。

在此时期，满洲大臣的奏疏里不止一次地强调黑龙江和该地区为对抗俄国人而新建的满洲据点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正是在这一时期墨尔根（今嫩江城）成了满洲在阿穆尔河上的行政中心。选择墨尔根，并非偶然。嫩江的位置对满洲人十分便利，因为此城较黑龙江城更靠近南方，位于诺尼江上，距离满洲人在东北的旧开发中心比较近。

在这方面，1685年10月24日国务会议上呈皇上御览的一份^[171]奏疏是具有一定意义的：“墨尔根地方十分重要，应在此地筑城，驻扎军队，同时应命令将军萨布素和一名副都统将自己的衙署设置于此。规定，在黑龙江〔置〕副都统一员。该城驻防军应由吉林和宁古塔兵五百名组成。遣戍于此的流放犯应收编入伍，派赴该地。既然于墨尔根处将驻扎大军，故此地也应增设驿站。令户、兵二部及理藩院各遣一名官员前往〔墨尔根勘察〕。在吉林乌拉与墨尔根之间，以及墨尔根与黑龙江地方之间尚应修筑多少〔驿〕站。上述事宜应行商议，作出决定，然后具奏。令铸印信交给派往黑龙江驻防军之副都统。著副都统温岱、纳素率边境驻防军戍守黑龙江，并在此筑城。恭候圣旨”^①〔见12，卷122，页14上—14下〕。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议政王大臣等遵旨议复：查墨尔根地方最为紧要，应筑城设兵，令将军萨布素及副都统一员驻扎于此。黑龙江设副都统一员，其驻防五百兵，以乌喇、宁古塔兵参用。先流徙宁古塔、乌喇罪人，俱入兵数发往。既于墨尔根设兵，自须增驿。令户部、兵部、理藩院各遣官一员，自吉林乌拉至墨尔根，自墨尔根至黑龙江，宜增几驿，定议具奏。驻防黑龙江副都统，铸印信给之。副都统温岱、纳素，孰令驻防黑龙江，孰令筑城，恭候钦简”（卷122，页14上—14下）。——译者

对这份文件里提到铸造官印授予黑龙江军事总督的事实，应予特别注意。这一举动在清代中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授印表示正式任命该人担负所据职位，从此授予他与此一正式任命有关的一切特权，同时把其职位纳入清代官职等级表。这一事件只是到了1685年10月末才发生²⁷。这证明清人打算把黑龙江地区纳入军事总督——将军管辖的边外疆土。

从这份奏疏还可清楚地看出，当时驻有满洲驻防军的北方的最远据点是黑龙江城。这也可以看作是满洲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扩展势力范围的真正边界的证明。

康熙皇帝允准上面援引的国务会议的建议。令温岱和纳秦率军留驻黑龙江城，副都统博定应筑墨尔根城。康熙皇帝再次提出关于增调驻扎在阿穆尔河上的军队服劳役的问题，同早先的历次圣旨一样，他坚持要求满洲士兵全力以赴地在阿穆尔河发展农业〔见12，卷122，页14上—14下〕。

[172] 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农业状况使康熙皇帝感到不安，这不是没有因由的。阿穆尔河上的农业发展得很不好，首先，大概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实际技能的缘故。1685年11月7日户部提议，只发给黑龙江城和墨尔根城官兵来年1686年秋收之前的口粮，秋收之后，停止其粮食供应，当时康熙皇帝反对这一建议，并御批，发放给阿穆尔河上的军队以应得的全份口粮〔见12，卷122，页19下一20上〕。

1686年2月9日，康熙皇帝派遣马喇前往阿穆尔河，令其在那里发展农业。临行时给马喇的训旨中说：“农事与获得军粮直接有关。应储备充足的粮食。当地驿站人员，亦〔应〕令全力以赴耕种田地。尔等前往，务期振兴农事，获取丰收”^①〔见12，卷124，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差副都统马喇等往黑龙江督理农务。因谕之曰：农事关系兵饷，须积贮充足。其在驿递人夫，亦令合力播种屯田。尔等前往，务期农政修举，收获饶裕”（卷124，页3下—4上）。——译者

页 3 下—4 上]。

1685 年 11 月 21 日，任命原奉天将军安珠瑚为黑龙江的索伦总管〔见 12，卷 122，页 26 上〕。但是，直至 1686 年 3 月 17 日，清朝当局才决定发给索伦总管和蒙古各盟盟长印信，即正式将这些官职列入清帝国官职等级表，同时确定这些官职相当于内地的都统（一旗之长）级别〔见 12，卷 124，页 20 下—21 上〕。

所有这些措施证明：满洲人极其重视招抚阿穆尔沿岸地区当地居民。另一件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户部曾建议不给进贡劣质貂皮的黑龙江索伦人和达斡尔人赏赐（回赠礼品）；但是，康熙皇帝非常尖锐地驳斥了这一建议，命令仍旧赏赉如例，哪怕所交毛皮质量不好，也须如此。他指出：“索伦人和达斡尔人为黑龙江大军修筑驿路，应念其功绩，对其宽容，仍照例给赏”^①〔见 12，卷 122，页 18 上〕。所有这些经济措施和行政措施，都是在得知关于俄国人重建阿尔巴津的消息之前付诸实施的。

拆毁阿尔巴津后，康熙皇帝大概已断定，俄国人侵入之事已告结束，看来他计划要与俄罗斯国签订和约，规定沿涅尔琴斯克县土地划分两国领土间的边界。在清帝的谕旨中称：“大军往征俄罗斯〔国〕，摧毁阿尔巴津……禁止俄人重返。其时，我军尚未取得涅尔琴斯克土地。应沿涅尔琴斯克土地确定边界，严禁俄人在此犯界，已获悉，在〔此〕界外生彼等捕猎之所”^②〔见 12，卷 124，页 4 上—4 下〕。

这个确定两国边界的第二“方案”仍旧忽视了当时已在远东形成的现实的历史情况和俄国人对该地区经济开发的巨大成就。康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索伦、打虎儿为黑龙江大兵安设驿站，效力可念，从宽免议，仍照例给赏”（卷 122，页 18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大兵往征鄂罗斯，破雅克萨城，释鄂罗斯不诛，赦之使生还。其时不并取尼布潮地者，盖以尼布潮地为疆索，使鄂罗斯不得越尼布潮界，界外听其捕牲也”（卷 124，页 4 上）。——译者

熙皇帝继续采取粗暴地施加压力的方法，他对这些领土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是不能为俄方所接受的，这些要求由始至终都具有掠夺和侵略性质。

第四节 满洲人对第二次攻打阿尔巴津的准备 及其毫无成效的围攻

1686年2月11日，清政府从萨布素的疏报中得知，俄国人已重返阿尔巴津并恢复了城堡。康熙皇帝接到这一消息后的第一个想法是，立即消灭这支卷土重来的队伍。看来，他已准备颁旨立即征讨阿尔巴津。谕旨中称：“今萨布素等奏：俄人重建阿尔巴津。应立即往征，予以殄灭”^①〔见12，卷124，页4上一4下〕。

尽管这道圣旨开头语气坚决，但后面却说在官兵家属迁来黑龙江和墨尔根地方之前应暂缓进兵，待官兵家属迁来后再行发兵。为讨论再度出现的阿尔巴津问题，康熙皇帝谕令召开有参赞国务的贝勒、大臣以及先前曾参与征伐俄国人军事行动的彭春、佟宝、郎坦等人参加的扩大会议^②〔见12，卷124，页4上一4下〕。

可以证明清政府如何坚决地着手准备第二次远征阿尔巴津的是，康熙皇帝于1686年3月3日颁给兵部和工部的谕旨。谕旨中说，一俟青草露出地面，应以二百峰骆驼为阿穆尔河上的先头部队急速送去火药和大炮，其中包括新铸的大炮。还规定向阿穆尔河
〔174〕派遣补充部队，著班达尔沙和郎坦率领前往，并令其他军官借行〔见12，卷124，页12下〕。

然而，情况要求特别谨慎，于是康熙皇帝决定采取一切必须的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春正月甲戌）“今萨布素等奏言：鄂罗斯复来城雅克萨地。今当即往征而灭之耶？”（卷124，页4上一4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记载是：“令议政王、贝勒、大臣及与鄂罗斯之役彭春、佟宝、班达尔沙、郎谈同尔等会议以闻”（卷124，页4下）。——译者

预防措施。对收集侦察情报的问题又给予严重注意。在满洲文献里，在1686年3月6日这一天，即在第一次获得有关重建阿尔巴津的消息不到一个月之后，披露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可以使我们弄清，满洲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得知俄国移民重返阿尔巴津的。我们在这里全文援引黑龙江将军从当地发往北京的疏报。内称：“先前萨布素奏称，骁骑校²⁸顾格色等奉彼之命前去侦察俄人情况。顾格色归来后，复命说：‘我等行至与阿尔巴津毗邻之地，因我人少，且马已疲乏，我等未能抵达阿尔巴津。归途中遇奇勒尔人勤定吉尔，该人称：俄人又返回阿尔巴津，重建城堡，待我围攻。臣请圣上俯允，于雪溶之时遣新造船舰往〔俄人城堡〕，臣将亲率官兵往歼〔敌人〕’。”

康熙皇帝未料到俄国人会重返阿尔巴津，看来，他没有相信这一疏报。《圣祖实录》里说：“览萨布素所奏，圣上认为，此奏所据乃系传闻，萨布素并未遣人侦探阿尔巴津城内情形，获取确实情报。因此，在没有充分根据的情况下，不可调兵前往。圣上令萨布素及郎中满丕获取确实情报奏闻”^①〔见12，卷124，页15上—16上；241，卷14，页29下—30上〕。

满洲侦探带回了哪些关于阿尔巴津恢复的情报呢？在满丕的奏疏中说：“臣遣索伦副头目乌木布尔代等前去阿尔巴津，彼等擒获俄人鄂克索木果（阿克先卡——格·麦·）。该俄人在审讯时供称：去岁涅尔琴斯克长官伊凡〔弗拉索夫〕派遣军队，送俄人〔返回阿尔巴津〕。阿列克谢〔托尔布津〕率领五百人再次来到阿尔巴津，于旧址筑城。我等询问俄人粮食可供几月之需，〔该俄人〕对此答称：彼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先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奏：骁骑校顾格色等往探罗刹情形。至旁卧地方，因人少马疲，未抵雅克萨而返。途遇奇勒尔勤定吉尔云：罗刹复来雅克萨，筑城盘踞。臣请于冰消时，督修船舰，亲率官兵，相机进剿。上以萨布素所奏，乃传闻之言，并非遣人亲抵雅克萨，侦取确音，不便遽用兵。因令萨布素及理藩院郎中满丕等，确探情形以闻”（卷124，页15上—15下）。——译者

等粮米足可食用二年”^①〔见 12, 卷 124, 页 15 上—16 上; 241, 卷 14, 页 29 下—30 上〕。

康熙皇帝最后证实俄国人确已重新移居阿尔巴津之后, 便接
[175] 连颁发谕旨, 准备对该城发动新的进攻。关于阿尔巴津防守坚固
的消息, 迫使康熙皇帝对待这次准备十分认真。

1686 年 6 月, 康熙皇帝谕令将军萨布素率领宁古塔, 吉林及
中国内省的士兵出动并围攻阿尔巴津〔见 17, 卷 3, 第 73 页〕。竭
尽全力加强了满洲军在阿穆尔河上的指挥机关。郎坦、班达尔沙
和马喇等“谙悉地形”的人被派赴军前, 参赞军务〔见 12, 卷 125, 页
15 下; 5, 卷 153, 页 18 上〕。

郎坦临行前陛见时, 皇帝面谕他在新情况下应如何行事: “尔
等此番出征, 行动切宜小心。应仍如前次俄人投降时那样, 晓谕彼
等: 彼等俄人乃异邦之人, 为谋利而甘冒生命危险, 扰我边境。今
大军再次来此, 尔等应立即归顺, 否则必将尔等全数歼灭。攻克阿
尔巴津之后, 应立即进兵涅尔琴斯克。事成之后, 返回阿尔巴津,
在〔彼〕驻兵, 过冬, 勿毁俄人城垣, 亦勿损其田, 因俟庄稼成熟之
后, 我方可刈取之, 以供应我〔军〕”^②〔见 5, 卷 153, 页 18 下〕²⁹。

6 月 11 日, 满洲军将领们来到阿穆尔河, 兵分两路, 水陆并
进, 前往阿尔巴津。

7 月 6 日, 满洲军在距阿尔巴津不远的查克丹会合。此次阿
尔巴津的武器弹药和粮食供应远比前次为好〔见 216, 第 124 页〕。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 “至是, 满丕奏: 臣遣索伦副头目乌木布
尔代等抵雅克萨城, 生擒罗刹鄂素木果。讯之, 云: 去岁尼布潮头目宜番令大兵释归
之额礼克谢率五百余人复至雅克萨, 依旧址筑城。及讯以粮米可食几月。又云: 所获
足支二年”(卷 124, 页 15 下)。——译者

②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 “尔等此行宜慎之。当如前降旨晓谕: 尔罗刹外国人,
贪利弃命, 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 当速降。如不降, 则尽诛之。若得雅克萨城, 即往
尼布潮。事毕, 还驻兵于雅克萨过冬。勿毁其城, 亦勿损其田禾, 俟禾熟收为我饷”
(《八旗通志初集》, 卷 153, 页 18 下)。——译者

派往阿尔巴津城向其保卫者“宣谕”的满洲军队伍遭到了枪炮射击。满洲人多次企图攻占阿尔巴津，但都未能得逞。满洲军被迫开始长期围困该城，但围困也未明显奏效，尽管满洲军在数量上占优势。

在《郎谈传》里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战争进程的有趣的详情细节〔见5,卷153,页19上—20上;173,第693—694页〕。这一文献资料记载,8月18日,俄国人进攻满洲人的炮垒,意欲夺取它,在此之后,似乎阿尔巴津的保卫者再也没有从城内出击。而满洲人,在几次攻城未能奏效之后,便开始用大炮轰城,看来,他们的攻势基本上也就只限于此了〔见5,卷153,页19下—20上〕。

满清文献资料在9月10日这一天记载:“我军已围困阿尔巴 [176] 津城,俄人陷入困境”^①〔见12,卷127,页8下〕。

满洲军需要补充武器装备,于是皇帝谕兵部和理藩院,令其组织当地索伦人和达斡尔人力量,准备武器装备,为此免除索伦人和达斡尔人一年的所有其他徭役,其中包括提供作为贡赋的马匹饲料〔见12,卷127,页8下—9上〕。

修筑自墨尔根至阿尔巴津驿路的工程尚未告竣,役畜的饲料不足,驿站数和各站的编制尚未确定。正是这一时期(1686年9月),当地的索伦人和达斡尔人肩上又增添了驿递的徭役,而且他们须自备马匹。令索伦总管洪吉监督完成这一切繁重徭役的执行情况〔见12,卷124,页8下—9上〕。为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服役成了当地居民的沉重负担,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在此时期,康熙皇帝继续坚持自己对俄罗斯国的领土要求。在其1686年9月14日颁给国务会议的谕旨里,他没有援引任何证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我兵围困雅克萨城,罗刹势迫死守”(卷127,页8下)。——译者

据,便再次肯定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从前都属于满洲人所有。谕旨里再次出现了这样的词句,似乎俄国人是从清帝国手中夺去了这两个据点;其中还提到由荷兰使臣转交俄国国书之事。在国书里说,清政府意欲“收回”阿尔巴津和涅尔琴斯克,并建议“沿雅库次克地区”划定两国之间边界。双方今后都不得逾越这条边界〔见 12,卷 127,页 10 上—11 上〕⁹⁰。

然而,这只是一些空话。满洲方面一面口提“和平”倡议,一面对俄罗斯国在阿穆尔河上的行政中心——阿尔巴津城继续进行侵略。围城的满洲军的数量,据满洲文献资料记载,为二千一百人(只指士兵,不算奴仆和勤务人员),而且援兵还不断开来。例如,文献资料中在 1686 年 10 月有如下记载:“以前副都统博定提议率筑城(在墨尔根——格·麦·)官兵二百人前去征伐俄国人。奉旨将此[177]问题提交将军萨布素等讨论。今萨布素等奏称:‘臣等现统率二千一百人,但防御时仍感兵力不足。博定兵来此正适时机。’于是,皇帝命令博定从筑城、种地的士兵中选拔二百人,发给其二月食粮,急速前往萨布素军前。此外,命令博定协助萨布素指挥战事”^①〔见 12,卷 127,页 15 下—16 上〕。

阿尔巴津的围困旷日持久,严寒日近,这使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面临着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这些困难,无论是在皇帝的谕旨里还是在黑龙江将军从驻地发出的疏报里,都有所反映。为了说明这些困难的性质,只需从当时——1686 年 10 月份的往来公文中援引两个文件就足够了。

在康熙皇帝给黑龙江将军的谕旨里说:“天气渐寒,江河即将封冻。为此,尔等应仔细地预先虑及一切。看来,俄人自回阿尔巴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先是,副都统博定请率筑城官兵二百人进剿。事下将军萨布素等议。至是,萨布素等奏:臣等统率二千一百人,所在防御,兵力尚单。得博定增兵前来,殊有神益。上因命博定精选筑城及种地官兵二百人,赏二月食粮,速赴萨布素等军前,令其参赞军务”(卷 127,页 15 下—16 上)——译者

津之后，在等待援兵到来；彼等希冀河封时我军撤离。目前，除尔等掘壕防御外，仍须详细制定一切必要措施，以便河冻之后保护我方船舶，保障马匹饲料，一旦〔涅尔琴斯克〕援兵来到时，击退敌人进攻”^①〔见 12，卷 127，页 15 上〕。

不久，萨布素奏称：“臣等凜遵谕旨。今已于城堡三面掘壕，筑起墙垒。壕外复设置木栅、鹿砦。各处俱布以警戒岗哨。城西河对岸处驻扎一支部队。若将我船泊于东岸或西岸，则此处流急，恐将船冲下。臣等深恐，河未冰封之前，涅尔琴斯克来人增援俄人。因此，臣等拨兵驻于停靠我船之两岸。由此城上溯约六、七里处，有许多方便河湾，待河冻之后，我船可至彼停泊，特专拨一支队伍前往守护，并责成该队伍在〔涅尔琴斯克〕派人来援俄人时，予以拦截。疲羸马匹，一半送至黑龙江城，另一半送至墨尔根，令盛京官兵饲养”^②〔见 12，卷 127，页 15 上一 15 下〕⁹¹。

对分送马匹的请求，康熙皇帝答复说，若照此建议办理，势必多费粮秣，因此应将疲羸马匹送往索伦总管洪吉处饲养。这样，康熙皇帝就又打算把饲养这些马匹的开支转嫁到当地索伦人身上。至于盛京官兵，则令自黑龙江返回。发往阿穆尔河军前的马匹，令由当地官兵自行饲养〔见 12，卷 127，页 15 下〕。^[178]

从所援引的文件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满洲人注意的中心，仍然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谕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今天时渐寒，河流将结，宜每事筹划，预为之备。观罗刹复来雅克萨城，必待援兵之至，且冀我兵于流澌时撤回耳。目前我兵虽掘壕防御，至隆冬冰合后，船舰若何收藏，马匹若何饲养，敌兵来援，若何捕剿，勿令人城，尔等其详加筹划，密以奏闻”（卷 127，页 14 下—15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臣等凜遵谕旨，已于城三面掘壕筑垒，壕外置木桩，鹿角，分汛防御。城西对江，另设一军，若敌江之东西以泊船，水险难堵。恐未流澌时，江路有罗刹逸出，尼布湖来援，复派剿御之兵于东西两岸，泊船备之。离城六、七里，上流有港，流澌时，即藏船于内。另设一军守护，兼令堵尼布湖援兵。至军中马匹有疲羸者，一半发黑龙江，一半发墨尔根，令驻彼盛京官兵饲养”（卷 127，页 15 上—15 下）。——译者

是防范俄国人可能的进攻和粮秣供应问题。在1686年10月—11月间,饲料情况尤其严重。此事在康熙皇帝的谕旨里曾多次提及。

驻扎在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经常要求增援。国务会议和兵部不断奏请因“盛京等处地方广阔”,为了防戍的需要,须扩充盛京满洲军额,并再从宁古塔和吉林拨出一千五百名士兵移驻阿穆尔河〔见12,卷127,页18上—18下〕,康熙皇帝对这些建议一概加以否决。对最后一次这样的请求,他御批:“秋前缓行,俟秋后再行奏闻”^①〔见12,卷127,页18上—18下〕。

调动军队换防,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一切都首先遇到了粮秣的困难。秋季到后,大学士等再次恳请康熙皇帝允准移驻军队,对此清朝统治者谕曰:“盛京,虽象有些人说的那样,土地肥沃,但居民稀少,粮食丝毫没有余裕。朕恐此处屯驻大军,粮价势必遽涨。国务会议成员所提建议远非完善。着侍郎郭丕、学士禅布急速往见将军明该和副都统会商,所议结果,具以奏闻”^②〔见12,卷127,页18下—19上〕。

不久,郭丕等回奏:“臣等已与明该会同商议。吉林和宁古塔之补充部队应立即发往驻防。不必自盛京分拨补充兵丁……十分清楚,粮米不足,而农业发展落后。所需粮食应令该将军等设法预先于兴京等地购买”^③〔见12,卷127,页18下—19上〕。

这一具体建议,再次遭到拒绝。康熙皇帝答称:“现在天气寒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此本著存贮尔衙门,俟秋后再奏”(卷127,页18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至是大学士等复行请旨。上曰:遣兵防戍,所系最要。盛京虽云沃壤,但人民稀少,米粮未必饶裕。恐大兵移驻,米价一时腾贵。议政王大臣等所议未悉。著侍郎郭丕、学士禅布速往问明该将军、副都统来奏”(卷127,页18下;俄译竟将“未悉”误译为“远非完善”,将“明该”误译为人名)。——译者

③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臣等会同酌议,乌喇、宁古塔所补兵数,应即将在京兵丁发往驻防,不必又将盛京兵分拨。余应如前议。但目下粮食未足,耕种不及。一应口粮,应令该将军等于兴京等处,采买预备”(卷127,页18下—19上)。——译者

冷,应暂缓派兵驻防。应俟来年收获之后,再行遣兵。令兵、户二部会同商议〔发展〕农业措施奏闻”^①〔见 12,卷 127,页 19 上〕。

上面援引的奏疏和谕旨,使我们可以判断出粮食问题的尖锐程度,并且证明了在黑龙江,以及整个东北,满洲人的农业发展极其薄弱。上面援引的材料还可以使我们得出结论,围困阿尔巴津的满洲军忍受了相当大的困难。没有显著的战功,拖延四个月之久的围困,每时每刻对从涅尔琴斯克方面来的俄国人进攻的担心,以及在满洲军中蔓延起来的流行病——这一切都使满洲军的士气日益衰落。

在 1686 年末和 1687 年初清帝颁发的许多谕旨里,都坚持强调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发展农业的重要性,对这方面取得的一切——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绩十分关注。譬如,在一道特旨里指出了博奇经营的地区获得的丰收,因之谕令将博奇的功绩记载入册〔见 12,卷 128,页 12 下〕。

由于对集中于东北的军队的供应越来越困难,康熙皇帝乃于 1687 年 1 月 19 日颁发谕旨,严禁从这一地区外运粮米。谕旨中说:“朕获悉,自盛京外运粮米至山海关内(至中国本土——格·麦·)之事屡有发生;偶而亦有将粮米经海路运往山东者。建立粮米储备,一向为我严重问题,况今〔东北〕驻防官兵人数增多,这就更为重要,为使粮食不致匮乏,必须增加粮米数量。应行禁止贩运粮米。尔等(指大学士等——格·麦·)应令属下行文户部侍郎等,仰其遵行”^②〔见 12,卷 127,页 23 下—24 上〕。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此时天气寒冷,这派往驻防兵丁,暂行停止。俟来年秋收后,陆续发往。耕种地亩事务,著户、兵二部议奏”(卷 127,页 19 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闻有运盛京粮米于山海关内者,又泛海贩米于山东者多有之。粮米所系,最为紧要,况今防戍官军,人口众多,粮糈可以足用,不致缺乏耶,未必可也,宜止其贩卖粮米。其下所司,密咨移盛京将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以己意禁之”(卷 128,页 13 上;俄译所标卷次、页码有误)。——译者

《圣祖实录》记载，1686年11月13日收到了莫斯科政府的国书（发自1685年12月10日的国书）。这份国书的汉语译文是这样的：

[180] “俄罗斯沙皇遣使赍疏而来，奏称：〔清〕帝所赐之书，下国（指俄罗斯国——格·麦·）无人能通读。当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斯帕法里）归来时，我等曾问彼，〔彼〕答称：清帝国大臣〔声称〕，俄人不还逃人根特木尔，骚扰边境；近来俄罗斯边民搆衅作乱。清帝发兵边境。我等坚请查明作乱之人，并遣来我处（即遣回俄罗斯国），以便按律惩处。同时，我等遣使臣前去会商，划定两国国界。今先遣尼基弗尔·维纽科夫和伊凡·法沃洛夫等赍书火速前去〔中国〕。请撤阿尔巴津之围，并〔望皇上〕详细作书，晓谕我国”^①〔见12，卷127，页23下—24上〕^②。

译文的语言可以使我们了解对发往清代中国的外国外交文件所作的修改的性质和风格，和这些文件所遭到的无耻歪曲，以及清朝有关各部官员按照千篇一律的格式对这些文件所作的改造。

在《实录》的这一天的记载中还有，康熙皇帝对这份国书的答复：“俄罗斯沙皇遵守礼仪，声言和好，遣使请求撤阿尔巴津之围。朕无意毁灭此城，今愿表示大度宽容，令萨布素等：‘将军队撤离阿尔巴津，集中于一地。靠近战舰安〔自己的〕营，晓谕城内俄人，允彼等出城与入城，不得恣肆掠夺’”^②〔见12，卷127，页23下—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俄罗斯察汉汗遣使上疏言：皇帝所赐之书，下国无通解者。及尼果赍归问之，述天朝大臣以不还遁逃根特木尔等，骚扰边境为辞。近者下国边民搆衅作乱，皇帝遣师辱临境上。恭请察明作乱之人，发回正法。除遣使议定边界外，先令米起佛儿·魏牛高、宜番·法俄罗斯瓦等星驰赍书以行。乞撤雅克萨之围，仍详悉作书，晓谕下国”（卷127，页23下—24上）。——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谕大学士等曰：俄罗斯察汉汗以礼通好，驰使请解雅克萨之围。朕本无屠城之意，欲从宽释。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掠夺”（卷127，页24上—24下）。——译者

24 上〕。对阿尔巴津旷日持久的围困和准噶尔汗国与喀尔喀之间相互关系中业已迫近的紧张局面，使康熙皇帝深感不安。这些才是清帝立即答应与俄罗斯大使举行和谈的真正原因。

问题并不在于康熙皇帝的什么“大度宽容”，而在于旷日持久的围困打破了清帝的一切计划。满洲军在阿尔巴津城下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满洲人没能迅速取得胜利，开始忍受饥饿的残酷折磨。由于“粮食不足”，他们开始患瘟疫。满洲人损失总数已超过二千五百人〔见 35, 第 144 页〕。

萨布素接到康熙皇帝关于撤除对阿尔巴津的包围的敕令后，看来又等待了一个时期。满洲人仍旧驻扎在紧靠阿尔巴津的地方。只是到了 1687 年 5 月 13 日，大军才撤到离城二十里的查克丹地方〔见 5, 卷 153, 页 20 下〕。满洲人实际上只是在 8 月 19 日〔181〕满洲军撤回爱浑和墨尔根之后，才撤除了对阿尔巴津的封锁〔见 17, 卷 3, 第 83—84 页〕。

康熙皇帝继续喋喋不休地强调阿穆尔沿岸地区军队粮食问题的迫切重要性，指出只有靠盛京境内的供应，才能保证必需的粮米，并要求定出严格的供应标准，不准浪费〔见 12, 卷 131, 页 12 上一—12 下〕。1687 年 11 月 5 日的敕令里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指出必须用当地没有固定营生的人建立官庄，令其着手开垦荒地〔见 12, 卷 131, 页 12 上一—12 下〕。

供应军队粮食的问题，在 1687 年这整整一年中，仍使清人深感不安。在康熙皇帝于 1687 年 11 月 28 日给兵部尚书的谕旨里谈到了留驻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的处境。

“黑龙江于我至为重要。驻守该地军队经受严重困难，朕对此知之甚详。俄人侵入该地，占据我达斡尔人与索伦人土地，骚扰我边境四十余年；该地秩序未曾确立。后来，我备足粮米，以便派兵永戍黑龙江，庶可驱逐俄人。俄人陷于窘境后，屡次向我求和。今

俄使已来〔会谈〕，但尚未到达。

我方若无足够粮米储备，则会象沙尔呼达、塔海³³ 往征俄人一样，不能获得胜利。此事历时未久，为众所熟知。朕采取一应措施，自盛京地区供给粮米，并于当地发展农耕，俾使我军所需粮米得到保证。然而，当地官员不思撙节粮食。彼等竟滥给〔于事〕无用之人粮食，对所司职守草率从事，希冀贮粮罄尽时，彼等可因所形成之局势，而被召回。倘若这些当地官员诚能以身家性命担保俄人不再侵犯我〔土地〕，则朕确可召回彼等。我军撤回，俄人也不能立即大批前来〔阿穆尔河〕，此事我地方将领皆已熟知。但，俄人完全可能如此行事：一、二人或十余人，陆续聚集于黑龙江与松花江地区，在彼处构筑木城，盘踞其中。彼时，我方将难于战胜彼等，因俄人将占据主位，而我军反处〔外来人之〕客位〔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

如果我努力建立起大批粮食储备，永戍官兵，则我军地位将能稳固，而俄人反而会陷入艰难处境。由此可知，俄人以区区兵力断不能侵入，若遣大军来此，则彼将如何运输粮食以供应如此庞大军队；我若不在黑龙江地区永戍官兵，则松花江、阿穆尔河流域，以及以外土地，包括这些地区居民，我将不能统治（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

尔等身肩特殊使命，抵彼处后，尔等应详细认真考虑，如何方得在彼地长期驻扎必需数量之军队，并使粮食供应充足。应就此问题磋商，以免今后遣尔等再往^①〔见 12，卷 131，页 16 下—18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谕兵部尚书那尔多等：黑龙江至为要地，兵丁劳苦，朕罔不知。曩者，鄂罗斯斯次人犯，占据我打虎儿、索伦等处，扰害边疆四十余年，未经安辑。后备足军食，永戍黑龙江以困逼之，鄂罗斯逃窘迫至极，乃屢次求和。今彼之使臣已来，尚未曾至。苟粮储不足，则如沙尔呼达、塔海等之往征而不能成功矣。此事尚未年远，朕亲所闻知，且亦众所共悉也。朕所委曲区画，自盛京等处运输粮食，及令所种米谷积贮至裕。依地大臣官员皆不思撙节，滥给与无用之人，苟且草率，希图军储罄尽，势必将彼等撤回。彼等诚能以身家性命力保鄂罗斯断不来犯，朕自

上)³⁴。

这道谕旨,无疑是令人感兴趣的。在这道谕旨里,康熙皇帝十分明确、毫不含糊地承认,在1687年,不仅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而且在松花江上都沒有满洲人的居民点,或者哨卡和满洲驻防军。从这道谕旨里可以看出,康熙皇帝认为对松花江流域的占领直接取决于满洲人在阿穆尔河上是否能站稳脚跟,这就说明阿穆尔沿岸地区在清朝政治家的计划中所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了。

依我们看来,联系到满清方面在皇帝的谕旨里,以及在涅尔琴斯克的谈判中都对俄罗斯国提出颇大的领土要求,康熙皇帝的这一表白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而且这也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而且是满洲方面提出的),证明这些要求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从这份谕旨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在八十年代派到阿穆尔河上的满洲军供应粮米的问题,具有何等重要的、决定成败的意义。康熙皇帝正是把粮食情况看成是直接决定满洲人在阿穆尔河右岸地区和它的中游地区的地位是否能巩固、在阿穆尔河两岸是否能站稳脚跟的问题。上谕还承认,由于满洲军距离他们在东北的根据地越来越远,粮食问题也越来越棘手,而到1687年末,发展成为非常现实的威胁,并且成了能够迫使满洲军撤离阿穆尔河及松花江下游,即放弃他们前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的地位的主要原因。这一切首先客观地反映了在当时清帝国边界——柳条边之外,满洲人地位的总的薄弱状况。 [183]

在这方面,指出下述情况不是沒有意义的:谕旨中承认长期围撤之回也。我之官兵撤回,鄂罗斯大众难以齐来,彼地将军官兵固皆稔知。然或一、二人,或十余人,陆续聚集于黑龙江、松花江之间,构造木城,盘踞其地,则我取之维艰,是俄罗斯为主兵,而我反为客兵也。今我惟多贮粮食,永戍官兵,则我兵得逸,而鄂罗斯兵为劳矣。如此,则鄂罗斯轻兵来犯,断所不能;欲大队侵入,则彼粮食何能搬运耶?若黑龙江我兵不行永戍,自松花江、黑龙江以外所居民人皆非吾有矣。尔等皆系选择差遣,往至彼处殫心竭虑,务期为久远充裕之计,详加筹议,惟此一举也,亦无事再遣矣”(卷131,页16下—18上)。——译者

困阿尔巴津的庞大的满洲军情绪低落，士气不振，康熙皇帝还不止一次地指出，满洲军将领有意欲停止对阿尔巴津的继续围困，尽快地撤离阿穆尔河的想法。类似的事实，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指出过。

谕旨中指出，驻在阿穆尔河上的军队经受着重大困难，而这些困难在1687年初传染病蔓延起来之后更加重了⁸⁵。这一切才是迫使康熙皇帝立即同意停止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事行动的真正原因，而他却以什么“大度宽容”之类的动听言辞来掩饰。康熙皇帝乘俄罗斯国提出和平倡议之机，在对该城进行了五个月的毫无成果的围困和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战事进行了三年以上的准备之后，终于下令满清军队撤离阿尔巴津。

最后，值得注意的还有在谕旨里指出的这样一个情况：康熙皇帝不仅认为满洲军实际上可能放弃这一地区，而且他还清楚地想象到，满洲人走后，俄国人有可能返回并进一步推进，不仅沿阿穆尔河推进，而且可能进入松花江流域。而在松花江流域的广袤领土上，直至吉林为止，满洲人没有任何基地，实际上根本不能抵抗俄国人的这种推进。

康熙皇帝的这道谕旨是又一个重要证据，证明沿阿穆尔河、松花江及其支流的土地，在俄国人到来之前，是完全未经开发，也未并入清帝国版图的中间领土。

然而，尽管有这些承认，在谕旨里，仍然可以看到与之相矛盾的词汇，譬如，俄国人“入犯”，“占据”，“我达斡尔、索伦”等人住处等等的说法。

这就是完全根据满清官修文献资料再现出来的清帝国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了三年准备，然后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以及满洲军撤除对阿尔巴津的第二次包围前清人扩张政策所得结果的情景。十七世纪阿穆尔史诗的下一幕是涅尔琴斯克和

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满洲外交官员依仗占领阿尔巴津县领土并直逼涅尔琴斯克城下的清军武力，把和约中的令人沉痛的领土条款强加给了俄国方面。

结 语

满清军队从阿尔巴津城下撤离之后，开始了就划分俄罗斯国和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领土边界进行和谈的准备阶段。这次谈判是满清方面在阿穆尔河继续进行侵略的情况下，于1689年在涅尔琴斯克举行的。

苏联历史学界早已把清帝国在1683—1686年间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发动的军事行动，看作为掠夺战争和侵略行为，我们同意这一看法，我们也完全赞同我们的前辈——Л. И. 杜曼、B. A. 亚历山大罗夫、B. C. 米亚斯尼科夫、П. Т. 雅科夫列娃〔见96；35；173；216〕等人的观点，即《尼布楚条约》是在满清方面对俄国使团进行讹诈和施加军事压力的情况下签订的，这种讹诈与军事压力使俄罗斯国方面作出相当大的有利于清帝国的领土让步。

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指出，1689年俄中《尼布楚条约》是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后半叶时双方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达到的力量对比的反映。

我们觉得B. C. 米亚斯尼科夫的上述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指出：研究涅尔琴斯克会议历史的主要史料基础，应该是俄国的档案文件。这个签订于1689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的历史，以及对它的评价，无疑是需要专门研究的课题，对于这些问题，近年来的苏联历史著作中已有专著阐述〔见173，第5—54页〕。

我们在此只涉及这个问题的与本著作主题直接有关的几个方面。我们从所使用的满清史料里发现的材料，可以使我们对我们的前辈的著述作某些重要的补充。例如，核定清政府用了很长时间

才组成的参加涅尔琴斯克谈判的清国使团的组成人员。尽管康熙皇帝正式同意由相同数量的汉人和满洲人组成使团，但是满洲人在使团中仍占绝对多数。首席使臣是公索额图，该人是议政大臣，〔186〕领侍卫内大臣。位居第二的使臣是康熙皇帝的舅舅，都统佟国纲〔见 5，卷 153，页 21 下；12，卷 134，页 15 上〕¹。第三位使臣是八旗蒙古的都统——郎坦。

除了这三位主要使臣外，使团成员还包括阿喇尼(阿尔尼)、马齐、班达尔沙，马喇、萨布素和汉人张佩玉^①与陈世安等²。

II. T. 雅科夫列娃对清使参加涅尔琴斯克谈判是否奉有书面训令表示怀疑〔见 216，第 159 页〕。然而满清文献的材料却使我们肯定，满洲人奉有两个训令。满洲文献不仅提到了这两个文件，而且引用了文件的原文。据《实录》记载，在 1688 年 5 月 30 日正式送别使团时，皇帝曾颁给清代表团首脑索额图一道训旨，其中包括为满洲方面参加谈判制定的训令。

在这份训令里重复讲的关于阿穆尔地区对清人在战略方面的重要性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意义。该文件中写道：

“皇帝谕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曰：‘俄人侵入我边界(？——格·麦·)，于阿穆尔河、松花江及库马拉河发动军事行动，占我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地方³，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及至我军于阿穆尔河上构筑城堡，〔我军〕曾两度往征阿尔巴津，围困该俄人城池。凡此〔诸事〕即为〔我〕与俄人之相互关系历史。

阿穆尔河地区在战略上非常重要。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可达松花江；沿松花江下行，可抵嫩江(诺尼江)；〔沿松花江？〕南行，可至库尔翰江(牡丹江)，抵乌喇、宁古塔地方，〔以及至〕锡伯、科尔沁、索伦、达斡尔等人〔住地〕；若向黑龙江口航行，可达于海。此外，阿姆贡、布列亚、结雅等河〔亦〕注入阿穆尔河。诸河两岸土

^① 此系音译(按应为张鹏翮)。——译者

地(?)尽皆隶属于我之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所有,同时亦为赫哲及费雅喀人所居之地⁴。倘若我方不兼并所有这些地区,则边民永远不会获得安宁。朕以为,涅尔琴斯克、阿尔巴津、阿穆尔河上、下游,以及所有注入该河之大小河川,完全属我所有⁵,不可将〔这片土地的〕哪怕是一小部分〔弃〕之于俄罗斯〔国〕。朕应要求交还我方逃人根特木尔与其他三佐领(连长),以及后来几名逃人。倘若俄人听从朕旨,朕亦遣还彼方逃人及满洲军擒获之俘虏与归顺我方之人,与彼等确定边界,允许彼等〔与我〕贸易。否则,尔等应立即返回,不值得再与彼等进行和谈”^①〔见 12,卷 135,页 14 下—15 下;17,卷 4,第 87—89 页〕。

当日,清使团启程〔见 12,卷 135,页 16 上〕。然而,据文献资料这一天的记载:“〔索额图使团启程之后〕不久,得悉,喀尔喀与准噶尔汗国(厄鲁特人)⁶之间爆发战争……皇帝派侍卫夸塞、关保往追索额图等,令其退驻〔清〕边卡所在之地,并将迟滞原因遣信使告知俄国使臣。于是,索额图等修书,令前锋参领索罗希等送交俄人。俄使在其复书中称,〔彼〕已自涅尔琴斯克遣其代表赴京(北京)。索罗希将上述复书交〔彼〕”^②〔见 12,卷 135,页 16 上〕。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谕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曰:罗刹侵我边境,交战于黑龙、松花、呼马尔诸江,据我属所居尼布潮、雅克萨地方,收纳我逃人根特木尔等。及我兵筑城黑龙江,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此从事罗刹之原委也。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翰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打虎儿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净溪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我之逃人根特木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向彼索还。如鄂罗斯逆谕而行,即归彼逃人,及我大兵所俘获、招抚者,与之画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卷 135,页 14 下—15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是日,索额图等启行。寻以喀尔喀、厄鲁特交相争战。报至,上遣侍卫夸塞、关保往追索额图等,令其退驻汛界地方,将迟滞缘由,遣人晓谕鄂罗斯使臣。于是索额图等以前情作书,令前锋参领索罗希等持送彼处。鄂罗斯使臣答书,称已遣人由尼布潮赴京。索罗希等以书奏览”(卷 135,页 15 下—16 上)。——译者

《实录》中在1688年8月21日这天记载道，康熙皇帝颁发新敕令，命护送清使团的官兵不必在清边卡所在之地滞留，须返回北京，著索额图、佟国纲和马喇仍留驻该地候旨〔见12，卷136，页16上〕。

康熙皇帝谕令清使团扈从士兵返回京城，据满清文献资料讲，其原因是满洲军对过冬没有准备（满军是在夏天出发的，没有带棉衣），所带粮秣不足〔见12，卷137，页11上—11下〕。除不能通过作战地区外，使团迟滞的其他原因在我们所使用的史料里没有提及，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满洲人被迫撤除对阿尔巴津的包围起，至涅尔琴斯克谈判开始止（1687年8月—1689年8月），满清军队始终没有停止在阿穆尔河上的侵略活动。

在1688年5月，清政府就曾命令郎坦、班达尔沙等将领率领一千五百名装备精良的黑龙江兵前去“侦察”阿尔巴津城中的“俄〔188〕人情况”^①〔见5，卷153，页20下〕。

7月20日，满洲军水陆并进至查克丹，郎坦由该处率领五百名持轻武器的骑兵甲士公开地来至阿尔巴津，绕该城所有工事环行，探视工事情况。当时，满洲人发现阿尔巴津郊区播种田地达一千余顷（一顷等于6.14公顷）〔见5，卷153，页21上〕。

次日，满洲军无视俄方抗议，经阿尔巴津城下，沿阿穆尔河水陆并进，向西而去。满洲人在屯色沁地方安营扎寨，而郎坦则率数十名骑兵甲士前去厄里谷诺地方（额尔古纳河）。满洲军侦察该地之后，回抵阿尔巴津，紧靠着城墙驻扎下来，这样，实际上是再次围困了该城。

满洲人向阿尔巴津居民提出一些毫无根据的指责，说他们似乎是“擅”种城郊的田地（?！），并且以他们不能确知俄使是否前来

^① 《八旗通志初集》中的原文是：“罗刹动静”（卷153，页20下）。——译者

为借口,尽割田禾,投入阿穆尔河^①〔见 5, 卷 153, 页 21 上—21 下〕。在此以后,满洲军撤离了阿尔巴津。

当清政府在北京获知费奥多尔·戈洛文已至涅尔琴斯克,并准备与清使进行谈判之后⁷,康熙皇帝再次传谕给索额图和清使团,令其前往涅尔琴斯克,举行钦派他们进行的谈判〔见 12, 卷 140, 页 30 上〕。

此时,康熙皇帝对俄罗斯国的边界政策有了某些改变。这反映在康熙皇帝与索额图就前述命令而进行的往来公文中。实际上,此时索额图得到了他在谈判时应遵循的第二道训令。文献资料中记载道:“索额图奏称:‘既然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乃〔我〕属民所居之地,臣请〔允准〕仍照以前所议,沿涅尔琴斯克划定〔与俄人〕之边界;到涅尔琴斯克之土地,皆应归清帝国所有’。

康熙对此答称:‘若以涅尔琴斯克为界,则前来贸易之俄罗斯使臣将无地存留(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而此事有碍相互交往。谈判之初,尔等仍应坚持以涅尔琴斯克为边界。如彼国使臣请求〔把〕涅尔琴斯克〔留给俄罗斯国〕,则可〔同意〕以额尔古纳为界’^②〔见 12, 卷 140, 页 30 上—30 下; 17, 卷 4, 第 89—90 页〕。

① 《郎谈传》中的记载是:“二十七年四月,奉旨僧班达里沙领黑龙江兵一千五百,往察罗剌动静。六月二十三日,至察克丹。率轻骑五百人,疾驱至雅克萨城故垒,环视其城,残坏如故。惟种田千有余顷。因呼其酋长毋色法里等出,而责之以违令种田之故。彼酋长无言,惟叩头而已。因有恩旨,不加诛戮。还营。明日,督兵过雅克萨城,留水陆兵屯色沁(按俄译将“屯色沁”误为地名)。七月初三日,率轻骑数十人,至厄里谷诺,遍视田无播种,庐舍无人,遂还。明日,兵退至雅克萨,逼城驻营。呼出酋长鄂毋色法里等,责之曰:前者大兵困尔城,死亡殆尽。因尔察罕汗遣使诣阙请罪,皇上降恩旨,释围退兵。尔使使者来讲地界。尔使未来,真实未见,尔何得擅种田禾。语毕,遂遣兵尽刈其田禾投之江流以归”(《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 页 20 下—21 下)。——译者

②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索额图奏言: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上曰:今以尼布潮为界,则俄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卷 140, 页 30 下)。——译者

这样，康熙皇帝颁给其钦差大臣的第二道训令证明了清人对俄国政府的领土要求有了某种缓和，似乎为索额图进行谈判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可能性。

从1688年5月30日至1689年6月13日期间，是什么迫使康熙皇帝对领土的要求变得较为克制了呢？我们记得，康熙皇帝在给索额图的第一道训令里对即将举行的谈判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俄罗斯国应把从阿穆尔河上游地区起至其河口止，包括所有注入阿穆尔河的大小溪流在内的整个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全部让给清帝国；俄方如果不同意，清代表应立即中断和谈，返回北京。

主要原因，无疑是在此时期在蒙古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噶尔丹战胜了蒙古喀尔喀汗。清政府开始准备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自然，在这种情况下，与俄国议和就是迫切需要的了。于是，康熙皇帝为了尽快签订和约，甚至准备作出一定的“让步”。

与此同时，清使团前去参加与俄使的谈判，却好象前去作战一样。康熙皇帝一方面谕令满清代表团前往涅尔琴斯克，一方面却提议向那里调遣大批满洲军〔见12，卷140，页30上—30下；17，卷4，第89—90页〕。这支军队的基本力量是由一千五百名黑龙江兵和由北京分拨的使团护兵组成。索额图、佟国纲和马齐率领这支军队的一部分经陆路前往；郎坦、班达尔沙、萨布素等则奉命率领由一百艘装备有大炮的船只组成的庞大的满洲舰队，乘船经阿穆尔河和石勒喀河至涅尔琴斯克〔见5，卷153，页21下—22上〕。

清使团临启行前，康熙皇帝给了全体成员非常丰厚的赏赐。皇帝给了他们一道密谕，令他们不要错过“相机而动”的机会，即若有机会，应向俄方施加军事压力。为此，特授给使团八面（各种颜色的）大龙旗〔见5，卷153，页21下—22上〕。B. C. 米亚斯尼科

[190] 夫正确地指出：“同时，满洲人有一定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中包括一系列军事措施，它能使满洲人获得对俄国使团的优势”〔见 173, 第 19 页〕。

1689 年 5 月 27 日，满洲军将领来到阿穆尔河。在两周多的时间内，把大炮、军事装备和粮食装载上用来远征的一百多艘大船，6 月 11 日，满洲军舰队开往涅尔琴斯克。这支军队需用的马匹，在前几天已由鄂色、罗里白等军官经“努民地方”押送到那里〔见 5, 卷 153, 页 21 下〕。

7 月 4 日，满洲舰队经过阿尔巴津，再次无视俄方对这次武装侵入俄国领土所提出的抗议〔见 173, 第 20 页〕，于 7 月 26 日分乘一百二十只江船到达了涅尔琴斯克，在这一天内，由陆路前去的其余的满洲军也陆续到达。遣满洲人白莫多带领二人进城打听“俄使至否？”〔见 5, 卷 153, 页 22 下〕。

这后一个证据，证明满洲人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开进俄罗斯国的领土时，已充分掌握了费奥多尔·戈洛文尚在前往涅尔琴斯克途中的情报。据满洲文献资料记载，戈洛文直到 1689 年 8 月 18 日（7 月 4 日）才到达涅尔琴斯克，而谈判于 8 月 22 日（7 月 8 日）开始〔见 5, 卷 153, 页 22 下〕。

满洲代表就是这样违反国际法的一切准则和惯例，率领大批在当时来说装备精良的军队，携带大量大炮，而且奉有康熙皇帝的“相机而动”的密令，前来参加在俄国领土上举行的谈判的。这一切行动很少象是希望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而更象是有意炫耀清帝国的军事威力。后来事实表明，清人正是把自己的军队当作向俄国使团施加军事压力的工具。

满清人利用费奥多尔·戈洛文途中耽搁的机会，以保护自己使团为借口，把自己的军队开到涅尔琴斯克。B. A. 亚历山大罗夫指出：“进军的结果，满洲人得以占领整个阿穆尔河两岸，并将为

数达一万五千名的士兵、五十门大炮和大批舰船集中于涅尔琴斯克附近。在其进军期间，能够抵抗他们的在阿尔巴津只有一百名军役人员，而在涅尔琴斯克也只有近六百人……费·阿·戈洛文来到涅尔琴斯克以后，俄国人的力量达到近两千名火枪兵和哥萨克，还有一些布里亚特族和通古斯族士兵……这就是进行涅尔琴斯克和平谈判所处的不平常的形势”〔见 35，第 187 页〕。

尽管清使臣带有确定清朝领土要求的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的两份康熙皇帝训令，满洲代表团在开谈时却提出两份训令中都没有规定的要求：沿勒拿河划定两国之间的边界，即要求让给清帝国的不仅有俄国人居住的整个达斡尔地区，而且还包括外贝加尔地区及其它广阔的早已被俄国人开发了地区。“〔清〕大臣向俄使提议：‘里雅那江（勒拿河）原为我国（清帝国——格·麦·）边界（？1——格·麦·）’，因此，以此江为界如何？’费奥多尔〔戈洛文〕没有同意”①〔见 5，卷 153，页 23 上〕。

于是，清人采用了炫耀自己军事威力的策略。“〔谈判〕第三天，郎坦见费奥多尔坚持不让，乃密向诸大臣说：‘我等临出征（1）时，奉有相机而动密旨。今已很明显，只有借助武力，方可迫使俄人〔同意〕。今夜，我命令八旗及宁古塔精兵，悄悄渡往对岸，于俄人城堡附近之林谷中设伏。天明时，各位可去与之正式谈判。〔若彼等之使臣〕听从则已；若再不从，我等将以武力威吓之，〔我等受委之〕事可顺利完成’。是夜，彼遣全军过河，藏于林中。晨，诸大臣仍来至〔会谈〕帐幕。谈至中午，〔俄使〕仍执着不从。郎坦将御赐八面龙旗分发给八旗护军及其他军队。在其指挥之下，全军在周围林谷中来回行进，以〔向俄人〕显示威力。俄人十分惊恐，于是

①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既相见，语其使曰：里雅那江原系我疆界，以此为界何如？费咬多罗不从”（《八旗通志初集》，卷 153，页 23 上）。——译者

开始请求〔缔结〕和约”^①〔见 5, 卷 153, 页 23 上—23 下〕。

由此可见, 连满洲文献资料也证明在涅尔琴斯克谈判期间清代表对俄国使团施加的军事和政治压力。关于《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具有强制性质的说法不仅为俄国文献〔见 173, 第 22—29 页〕, [192] 而且也为满清官修文献所证实; 尽管如此, 直接以武力压制俄国使臣的事实, 在中国的历史著作中却被掩饰起来(如顾颉刚〔220〕、赵泉澄〔243〕、丁名楠等人〔222〕的著作, 以及刘大年〔228, 第 7 页〕和范文澜〔238, 第 53 页〕的论文)。

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期的满清文献资料对这个条约的评价, 也可以使我们断定清人在 1689 年涅尔琴斯克谈判时提出的领土要求毫无根据, 以及清方在此次谈判中推行的勒索和威胁政策得以成功。这些文献资料直言不讳地说, 经过清帝国和俄罗斯国这一阶段的划分远东领土疆界的过程, 并入清帝国的土地, 先前从未属于清帝国。这些资料通过我们的前辈——M. 兀. 赫拉波维茨基和 B. C. 米亚斯尼科夫的著作在科学界传播开来, 这些资料是满清方面对这次谈判结果的评价。一个补充文件是国务会议成员呈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关于涅尔琴斯克会谈结果的奏章:

……“皇上立即俯准撤(阿尔巴津之——格·麦·)围, 命大臣向俄人阐释正义原则(格·麦·)。惟于此时, 俄罗斯国之人方感皇上洪恩, 开始倾心于〔我之〕文明, 完全〔同意〕履行前已达成之协议。我大臣〔向其〕指出应于何处划界(格·麦·)。就这样, 位于东北之方圆数千里从未属于中国之土地尽入我版图。此

^① 《郎谈传》中的原文是: “第三日, 郎谈见费哆罗语意不逊, 乃密向诸大臣曰: 临行时, 有密旨令相机而动。今观罗利, 非以兵威勒之不可。今夜, 我潜率八旗与宁古塔劲兵渡江, 设伏于其城近林谷中。天明, 诸公试往讲之, 从则已; 设再不从, 以兵威惧之, 事可济也。是夜, 天未明, 兵尽渡, 伏于林间。侵晨, 诸大臣仍至幕所, 讲至日中, 犹不从。郎谈因将上赐八龙鞭给八旗护军等执之, 督众旌旗于遇林谷中出入, 以张声势。罗利等大惧, 始乞盟”(《八旗通志初集》, 卷 153, 页 23 上—23 下)。——译者

皆我皇上睿虑周详之所致也。……

俄罗斯国从未与中国往来，俄人性情凶野难驯。但今俯首听命，诚心向化。起自极北、面向中国之兴安岭〔坡上〕之数千里荒无人烟之土地，悉归中国所有……由此可见我皇上之圣德……

因此，我皇声誉传布天下，甚至远播于今已属我之无人烟之荒地……^①（异体字是我标的——格·麦·）〔见 17，卷 4，第 93 页，第 99—100 页；俄译全文见 173，第 686 页，第 688 页〕。^[193]

仅在这一个文件里，这种承认，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出现了三次。

满清文献提供的所有这些资料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过去研究清朝开发满洲（东北）北部地区和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问题的某些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的倾向性。

* * *

对满清文献资料中关于所探讨的问题的材料的研究，据我们看来，可以使我们作出一些重要结论，并对一系列所研究的问题，给予新的阐述。

首先，所引用的材料可以使我们彻底地断定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叶东北各女真部落聚集成满族的过程积极进行的领土基地。

满族的形成是在建洲境内——紧靠着明帝国的东北边界，在抚顺城以东和长白山以西——在从中国夺得的辽东土地上进行

① 《平定罗刹方略四》中的原文是：“皇上即许撤围，兼令大臣以义理晓譬之。俄罗斯国人始感戴覆载洪恩，倾心归化，悉遵往议大臣指示，定其边界。使东北数千里从未入中国之地，咸归版图。此皆我皇上睿虑周详、德威远播之所致也。……”

夫俄罗斯从昔不通中国，其人最犷悍难驯。今一旦弭首顺从，倾心向化，自极北不毛之地，兴安岭以内数千里境，悉归版图。由是观之，圣德神功，巍巍荡荡……

声灵普被而鸿濛未辟之土尽入提封……”（《朔方备乘》，《平定罗刹方略四》）。——译者

的。

满族聚集的领土不包括现今的黑龙江省、整个阿穆尔河流域以及滨海地区领土。形成满洲部落联盟核心的，是所谓建洲女真和住在他们北面和东北面的各女真部落——所谓海西女真。

在这些地区形成的部落联盟的经济需求，以及努尔哈赤和阿巴海的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同明代中国的多年的艰苦战争——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全力扩充于1616年建立的满洲国军队人数。在这方面，满洲人常常袭击的大批邻近部落是非常重要的兵源。满洲人袭击这些部落的主要目的，是将这些部落的人驱赶到满洲人实际控制的领土内。

满洲人于十七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进行的对东北各部族的这些频繁的军事征讨，并未抱有将东北边陲的领土和土地并入清帝国[194]的目的。历史著作中流行的那种关于满洲人的这些袭击正是为了征服某些领土的见解，在清代文献资料中没有得到证实，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中国东北属于清帝国领土的正式边界是以建于1678—1684年的柳条边边界线确定的。满洲人的讨伐，将土著居民从其故土上大批地强制驱走，对当地各部落经济的破坏，大批毁灭和掠夺当地物质资源，这一切是使东北荒芜和它的生产力的发展后来长期陷于停滞的原因。

索伦(和达斡尔)诸部落在政治上聚集的过程已很明显，但是这些部落遭到满洲人的摧残，从而又分散了。

在我们前面所探讨的这个时期里，根本谈不上满洲人对自己部落联盟领土界外的土地进行什么开发。开发边外疆土的第一次尝试是满洲人深入到宁古塔，而在宁古塔从1636年起才驻有固定的满洲驻防军。然而，尽管宁古塔驻有固定的驻防军的事实本身和对其供应物资的必要性无疑要求对这一地区的土地进行某种经济开发，但是在文献里却没有任何关于开发宁古塔土地的资料。

在 1645 年以前，宁古塔是满洲国的东北边缘前哨，从那里组织军事远征队派往北方、东北方和西北方以擒获俘虏和掠夺战利品。

清代官修文献资料所指出的清帝国的势力部分达到的边外的宁古塔和吉林地区的边界，证明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俄罗斯国领地（即 1682 年已具规模的阿尔巴津县的领土）和清帝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的边界之间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一中间地带包括松花江的中、下游流域，以及诺尼江、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流域。

满清编年史《实录》和其他清代官修文献资料收录的性质各不相同的文件证明，现今黑龙江的领土，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并不属于满洲人，也未作为边外疆土纳入清帝国的管辖范围之内。[195]

满清人在八十年代进入黑龙江领土并在此扎根，完全是出于军事考虑。清帝国第一次实现了扎根于阿穆尔河上的意图，仅仅是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已是阿穆尔沿岸地区正式并入俄罗斯国版图之后了，而清帝国却企图以武力在此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取代俄国政权，客观地评价此事，只能看成是领土扩张和侵略。满洲人征讨阿尔巴津，是在经济上未经开发，情况不熟悉的地区进行的，距离清帝国当时的东北边界相当遥远。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根据满洲官方文件，直至十七世纪末还无法确定黑龙江将军所辖疆土的边界，因为在文献资料中没有这些资料。

满洲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开发基地的薄弱，决定了清人必须花费三年时间进行准备，才能对俄国在此地区的殖民中心——阿尔巴津城发动进攻。清朝外交部门通过拖延确立与俄罗斯国的经常的外交关系和公文往来等方法来保证进行这一准备所需要的时间。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的侵略战争，使清人必须施展旨在证明这种侵略是有理的外交伎俩。伎俩之一就是

是企图制造一整套文件，用以证明清政府在阿穆尔问题上的政策似乎是爱好和平的，并证明阿穆尔沿岸地区“属于”清帝国的事实。

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军事行动，遇到了重重困难。漫长的交通线和对阿穆尔河上满洲军先头部队供应的经常中断，不止一次地使满洲军濒临崩溃边缘，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人同意了与俄罗斯国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就是在此次和谈中，满清方面仍然没有放弃其军事讹诈和威胁的政策，这反映在《尼布楚条约》的领土条款中。导源于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俄罗斯国与清帝国在远东划分领土边界的漫长过程的第一个预备阶段，是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侵略的结果，它反映了满洲人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力量对比上所达到的暂时的优势。

注 释

引言

- 1 所有史料和著作的译名和出版地点、时间等的说明，参看本书所附书目。
- 2 我们认为，西方和苏联的汉学界所确立的下述传统是完全合理的，即对明清皇帝不是按照他们的正式名字，更不是按照他们每个人死后给予他们的所谓庙号来称呼他们。因此，本书下面对满族最初两位统治者将按照他们的名字——努尔哈赤和阿巴海——来称呼他们，对以后的统治者按照他们的年号来称呼他们，如顺治皇帝、康熙皇帝，等等。
- 3 这部文献资料在 Г. В. 叶菲莫夫的著作[101]和我撰写的文章[138]中有较详细的说明。
- 4 这里及以后的中历日期是根据薛仲三和欧阳颀编制的对照表和换算方法[236]换算成欧洲纪年的。
- 5 关于这部文献资料详见我撰写的文章[137，第54—62页]。我译的《郎谈传》是根据卷153译出的[173]。
- 6 我译的这部文献资料的俄译全文见[173]。
- 7 这部文献资料的逐页内容的说明及关于该书作者的资料，见我撰写的文章[142]。
- 8 请与《圣祖实录》中引用的奏疏原文对照[12，卷115，页19下—20下]。
- 9 只须对此补充一点，即没有任何资料说明这些民族认为满洲汗是他们的“君主”。

第一章

- 1 关于明代在女真人土地上设置的“卫”的性质，见我撰写的文章[141]。
 - 2 在1616年前，努尔哈赤建立的女真各部落联盟首次使用了“满洲”的名称，但是这个术语只能有条件地使用。
 - 3 中国历史学家魏源把辽东境外的女真部落分为“海西卫”和“野人卫”是不合理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女真“卫”[见219，卷1，页4上]。莫东寅也注意到了魏源的这个错误[见232，第79页]①。
- 然而魏源“信手拈来”的这些“术语”，不但为中国研究者的某些著作所采用，而且为俄国汉学家的许多著作所采用（例如，B. 戈尔斯基的著作[79，卷1，第39页；卷1，

① 按《满族史论丛》第36页注〔2〕中谈及此事。原作者误标为第79页。——译者

第426页及其它页]。

4 J. 罗斯也指出女真诸部落的极端分散性和软弱性[336, 第4—5页]。

5 蒙古的征服使女真族的聚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破坏了女真人建立的文化, 使女真各部落又恢复到以前的分散孤独状态。见我写的文章[143]。

6 “贝勒”——满语, 意思是“公”或“大公”。这是满族形成初期女真统治者的称号[103, 第484页], “昂邦”意译是“大官”“大臣”[103, 第484页], “噶山”可以译成“村长”。

7 “穆坤尼”——满语为“穆坤达”——“族长”, “一族之长”。

8 在 B. 戈尔斯基的论文中引用了满洲官修史书《满洲源流考》和《开国方略》材料的译文[79, 第26页, 第28页, 80, 第189—244页]。

9 里——中国长度单位, 约等于0.5公里。

赫图阿拉——即今中国东北辽宁省新宾城南面的老城[见地图一]。J. 罗斯对关于当朝始祖来源的奇异的满洲人的传说, 对他们虚构的满洲故乡的说法, 作了确切的没有神奇色彩的解释。他写道, 满洲统治者把鄂朵里指为他们的故乡“仅仅是因为这个地方位于白山(长白山——格·麦·)以北……, 这里曾产生过三个强大的王朝——赫图、渤海、金”, 满洲人试图以此为本朝增光。他继续写道: “然而, 满洲人的真正发源地是在一个小而美丽的赫图阿拉山谷, 它在盛京(沈阳)以东, 如今兴京所在地。在鄂朵里归属满洲人之前, 满洲人便建立了强大的国家”[336, 第5页]。

10 在1583—1645年努尔哈赤和阿巴海统治时期, 对东北三个主要部落及其他一些毗邻部落曾进行军事远征。我们对这些部落的地理名称以及居民点的考证, 均收在本书附录中。考证结果都反映在所附的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前半叶远东各部落和部落分布的历史地图中。应当指出, 直到如今, 苏联汉学界仍忽视中国(其中也包括东北)历史地理问题, 这是不应该的。

11 还在1575年, 图伦城总管尼堪外兰为了消除敌手而利用了明帝国的军事支持。前来援助尼堪外兰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女真人城堡古勒和沙济, 消灭了尼堪外兰的主要敌手, 其中也有觉昌安(景祖)和塔克世, 即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努尔哈赤当时刚满十六岁)。在这些事件之后, 尼堪外兰在明朝的援助下便成了满洲诸部联盟的盟主。

12 何秋涛在考证鹅尔浑城地址时写道: “经考证后查明, 鹅尔浑城在齐齐哈尔西南十余里(格·麦·), [努尔哈赤攻克该城]是大清帝国征服黑龙江(阿穆尔地区——格·麦·)的开端”①[241, 卷2, 页4下]。何秋涛在此犯了一个大错误。首先发现这个错误的刘选民尖刻地指出: “他(指努尔哈赤——格·麦·)能够来到这里, 除了飞越阻碍他到此地来的与他敌对的赫图阿拉之外, 别无他法”②[230, 第175页]。根据这一事实,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 “鄂勒欢在齐齐哈尔城西南三十余里, 周二里许。丙戌年秋七月, 太祖率师往征鄂勒欢, 克其城。……此我朝用兵黑龙江地之始”(卷2, 页1上)。——译者

② 刘选民的原话是: “《朔方备乘》谓鹅尔浑城在齐齐哈尔城西南十余里, 为清朝用兵黑龙江之始; 实误作渥集部呼尔哈路之鄂尔浑屯, 且其地格于辉发、乌喇诸部, 岂能飞渡取之耶!”(《燕京学报》, 1938年, 第23期, 第144页)。——译者

可以得出关于何秋涛为了适应他的亲君观念所进行的“考证”的性质的结论。

关于十七世纪满洲文献中“黑龙江”这个术语，应当专门谈谈。众所周知，“黑龙江”是阿穆尔河的中国名称。在这一时期的清朝著述中，还可见到“黑龙江地”或者“黑龙江地方”，即“阿穆尔沿岸地区”等说法。

很明显，十七世纪时，满洲人对今东北北部的地理和水路系统了解很差（详见本书第二章），他们对这个术语的理解，首先是阿穆尔河本身以南的领土，大致在今黑龙江省境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行政区划）。

就十七世纪而言，这是一块极其辽阔的（达数百公里）无主地带，在西边，它包括蒙古地方，在东边，包括数目繁多的东北诸部（首先是那乃人部落）的居住地。当时清帝国和俄罗斯国曾向这一地带相互渗透。

13 莫东寅写道，到1582年，满洲周围各豪部皆为削平，而到1591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领土[232,第73页]。以上所引事实可以使我们确定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诸部的年代。

14 И. 扎哈罗夫认为，“朱舍里”是“满洲氏族之一的名称”[103,第1006页]。文献资料证明，这个时期在长白山地区正是住有三个部落[25,卷1,页9上;31,卷3,第44页;16,卷8,页4上;24,卷12,页17下]。魏源与何秋涛在其著作中只提到鸭绿江部和讷殷部。

15 刘选民误指为万历21年(1593年)11月[230,第153页]。

16 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我撰写的文章[144]。

17 关于当地女真诸部落代表编入满洲八旗牛录之事，见我撰写的文章[140,第77—97页]。

18 此处及以后对关于所获俘虏数量的满洲资料及其他资料，应持谨慎态度，因为这些资料都有些夸大。

19 这是《努尔哈赤实录》首次提到宁古塔地方。后来于此地建成的满洲城堡便以此命名。这个城堡在清帝国东北边疆发展史上起过重大作用。

20 必须指出，所有文献资料只提到东海三部——瓦尔喀部、窝集部和虎尔哈部。只在《努尔哈赤实录》中见到萨哈连部，用以表示该部名称所用的汉字，与表示萨哈连乌喇的汉字相同。在稍后时期的满洲文献资料中用萨哈连乌喇称呼阿穆尔河。因此，如果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在1616年已把这个术语理解为阿穆尔河，那么便可将“萨哈连部”这个名称干脆译成“阿穆尔部(诸部)”，也就是说，在文献资料中对该部使用了最笼统的集合名称。E. П. 列别杰娃显然因此没有在其冗长的“满洲”各民族族谱中引用这个名称。

甚至何秋涛也指出，在文献资料中“错”把萨哈连部“归入东海”① [241,卷2,页1下]。何秋涛没有指出该部分布地点，然而他把音达琿塔库喇喇路②、诺落路和锡拉忻路归为“萨哈连”的近邻[同上]。关于音达琿塔库喇喇路、诺落路和锡拉忻路下面还要

① 《朔方备乘》中的记载是：“国初时有萨哈连部（夹注）：臣秋涛谨案：萨哈连部虽属东海，然其地实在黑龙江城之东。当时各部地域相错，类如此”（卷2,页1下）。——译者

② 原文误把该路写成“塔库喇喇路之音达琿”。——译者

谈到。

21 使犬国——直译为“(乘)狗之领地”，即可能指冬季用狗拉窄长雪橇的松花江或乌苏里江的那乃人(果尔特人)。

22 在中国文献中对每一个这样的使团都有极为详尽的记载的情况下，无论如何，这一事实证明，在满洲人同使犬国的相互关系中，曾有过多年间断的情况。

23 详见 B. 戈尔斯基所写的论文〔79，第 47—49 页〕。

24 何秋涛把十九世纪后半叶住在吉林省境内受三姓副都统管辖的渔猎诸部归入东海诸部。同时作者指出，魏源撰写的《圣武记》中，没有论述满洲人“征服”“东海诸部”历史的专门篇章，因此他的著作力图填补这个空白〔241，卷 1，页 6 下〕。

25 中国人种学家凌纯声在其著作的历史部分中，得出结论说，东北许多民族的名称，其中包括赫哲(他称那乃人为赫哲)、乌德盖和虎尔哈，都来源于“窝集”，其本意为“林丛”、“莽林”〔226，第 47 页〕。B. П. 瓦西里耶夫把“窝集”译为“森林覆盖的多山之地”〔63，第 25 页〕。

26 这一错误的根源还是来自十九世纪作者克拉普罗特和普拉特两人。Л. И. 什连克也采用了他们的观点，他写道：“毋庸置疑，吉切尔人是满洲部落，而且正如吉切尔人名称所证实的那样，正是女直、女真、和朱里真的后裔……总之，是合并以后形成了满洲的那些部落之一。”Л. И. 什连克在这里引用的正是这两位作者的著作〔202，卷 1，第 154—155 页〕。Л. И. 什连克把尼福赫人——古亚细亚人(古亚细亚人)——也认为是通古斯满洲人〔184，第 75 页〕。

27 甚至象何秋涛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在其著作中也把“东海”三部(其中包括虎尔哈部)和黑龙江索伦诸部同建州本土“满洲”五部、长白山二部(т——格·麦·)和扈伦四部正确地区分开。

他所引用的一整套阿穆尔沿岸地区完全隶属清帝国的“佐证”，完全是以满洲人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对此地区进行的军事远征为根据的，也就是说，其根据是企图把事情说成是清人似乎征服了阿穆尔沿岸地区，而绝不是满洲人居住在阿穆尔河两岸的什么事实。

28 譬如，正如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和杨宾的《柳边纪略》等著作所证明的那样，至少到十八世纪中叶，虎尔哈人仍继续是贡民。

29 我们知道只有一位作者——文·陈斯言：“阿穆尔河和松花江上的索伦人——达斡尔人和吉切尔人——同满洲人同属一个氏族”〔285，第 76 页〕。

30 郎坦的疏报见本书第三章，第 137 页。

31 我们在此指出，就是这个毫无疑问的那乃人氏族在 1744 年的清朝文献资料中已经被称为“满洲氏族”〔128，第 75 页〕。据《太宗实录》记载，满洲人于 1633 年和 1640 年曾几次残酷地侵袭了该那乃人氏族。

32 该文献资料错误地指出，最后一次远征是对“与朝鲜接壤的虎尔哈部”进行的。很明显，这里的“虎尔哈”应该看成是瓦尔喀。

33 该论旨作为最高智慧的典范，收录在《八旗通志初集》里〔5，卷 65，页 11 下—13 上〕。

34 关于远征结果，见〔8，卷 39，页 29 下—30 上；卷 41，页 22 上〕。

35 梅勒章京——满蒙八旗(军)中的“梅勒”——相当于旅或翼的长官的职衔；这

一职衔共分三等，授予吴巴海的是其中最末一等——第三等。

36 吴巴海在海兰河南岸第一次修筑了一座石墙城堡，墙高一丈(3.2公尺)，周长一里(近600公尺)[28, 卷10, 页19上]。后来在该城堡以北开始兴建宁古塔旧城[同上]。

37 关于此事，文献资料是这样记载的：“还有从前库尔喀归降、进贡者一百四十九人，以及新获者二百九十二人，俱都留置在那朱屯中，令每年进贡貂皮、海豹等[方]物”①[8, 卷52, 页12下—13上]。

38 “黑龙江地方”——即“阿穆尔沿岸地区”，“阿穆尔地区”；在十七世纪的中国文献中，这一地区首先是指河以南的辽阔领土。详见本章注释12。

39 《太宗实录》中以前从未提及任何远征此地之事。

40 据研究俄罗斯档案文件的B. O. 多尔基赫所考证，达纳尔酋长巴尔达齐的小堡垒位于结雅河畔，在托姆河河口至结雅河河口中途上。沿结雅河至该河口住着达纳尔耕民，而沿托姆河则住着属于该酋长乌卢斯的通古斯人。在巴尔达齐的“酋长国”里，共有四百名壮丁。B. O. 多尔基赫认为，巴尔达齐(按当地规模来说)是个相当大的酋长[94, 第585页, 第597页]。

41 不久，在获悉科尔沁盟大批蒙古首领逃离满洲人的时候，在满洲文献资料中又见到巴尔达齐的名字。文献资料记载，科尔沁首领噶尔珠塞特尔、海麟、布颜代、白谷垒、塞布垒率本盟之人，托言往征北方索伦部落，向索伦人征收贡赋，逃叛逃而去。满洲人得知此事之后，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阿巴海召见此时正在满洲宫廷的巴尔达齐，劝他立即返回本土，因为叛变的科尔沁首领在他不在时可能攫取其地。阿巴海降旨科尔沁贝勒必需抓到噶尔珠塞特尔，将其处死或降为奴隶[8, 卷18, 页34上—35下]。

42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满洲文献中根据流经某地的河流(这里指松花江)名称来称呼某地的总倾向[8, 卷21, 页14上]。

43 阿巴海关于满洲人同阿穆尔沿岸诸部“同宗共祖”以及他们“从前”为“一国之人”的这种论断，在我们看来很明显，首先是抱有军事政治目的的，即力图削弱对方的反抗并使士气沮丧。这种论断的根据只能解释为满洲汗希望同昔日女真王朝金朝(1115—1234年)统治者攀上血缘关系。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努尔哈齐家谱(第30页)所证明的那样，满洲统治者虽然极力强调他们同金朝皇帝有血缘关系(众所周知，他们甚至称自己的王朝为后金)，但实际上他们同金王朝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金王朝是在我们所述事件之前约四百年前进行统治的。

这种宣传手法，显然是寄希望于那些对本族历史了解模糊的女真“野蛮”部落。另见谕旨末尾部分(第60页)。

44 何秋涛十分认真地把阿巴海的这些论断看成是满洲国对黑龙江拥有政治权力的“证据”[241, 卷1, 页1上]，虽然他本人也断言，黑龙江本地的居民正是索伦人[241, 卷1, 页1上]——在人种类型上与满洲人完全不同的蒙古语民族。

①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又从前库尔喀归降、进贡一百四十九人，并新获二百九十二人，俱留置那朱屯中，令每年进贡貂皮、海豹等物”(卷52, 页12下)。——译者

45 该论旨作为最高智慧典范收录在《八旗通志》里〔5,卷65,页6上—8下〕。

46 显然,这里的“纪年”不仅是指的历法,即指出这些部落的一般的文化落后,而且可能也指“唯一的真实纪年”,即按照满洲国统治者的统治年代纪年;这样,阿巴海的这句话,可以具有附加的政治涵义,并且表示出他对这些民族进行统治的野心。A. A. 施克夏宁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47 鄂伦春似为阿穆尔沿岸地区“使鹿”鄂温克部落。

48 “喀木尼汉使鹿部”应该理解为阿穆尔河上游鄂温克诸部之一。

49 该文献这段文字写于1685年以后时期。

50 尽管何秋涛的倾向性十分明显,时至今日,步这位作者后尘的研究者还大有人在。例如,文·陈在1966年就这样写道:“1636年,满洲人已达到了他们称之为北海的鄂霍次克海(Г1——格·麦·)。后来1639—1640,1641,1643—1644年间的几次远征,巩固了满洲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控制(Г1——格·麦·)”〔285,第20页〕。

51 卦尔察部住在松花江上现今伯都讷城境内。除证明有远征的记载外,在这一时期(1637年5月)前后,还记载有,隶属于杜尔伯特蒙古人的卦尔察部来朝贡貂之事〔8,卷41,页15上—15下〕。

52 仅仅在一个月以前,巴尔达齐就曾两次自萨哈尔察地方来见满洲人。鉴于当时刚刚携带丰厚礼物离开阿巴海朝廷的巴尔达齐关系很融洽,满洲人此番出征的原因和目的确实使人茫然不解。诚然有可能,此次远征的对象根本不是“萨哈尔察地方”本身,而满洲人也仅仅是到达了巴尔达齐领地。还应指出在文献史料中关于远征对象——部落的名称的混乱现象。

53 雅克萨(满语为“崖岸”,“高岸”)——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一座索伦城堡。在清朝官方文件里,此地名称毫无证据地被考证为1651年俄国移民在阿穆尔河上构筑的阿尔巴津,因而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前三年的满洲文件里,阿尔巴津城也被称为“雅克萨”。

自1640年后,“雅克萨”一名在满清文献资料里完全消失不见了,在此后四十二年(自1640至1682年)过程中,一次也没有出现过,这更加明显地说明将这两个居民点考证为同一地方的企图荒谬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浩如烟海的十七世纪满清文献资料里,绝对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用来证明索伦城堡雅克萨这一满语名称指的就是俄国人在阿穆尔河酋长阿尔巴西城堡旧址上修建的阿尔巴津城。这种随心所欲地给俄国居民点标上满语或汉语名字的企图,只是反映了清朝当局向邻国提出领土要求的一定的策略。

54 何秋涛在这一段落以前简直是照搬中国文献资料,但在援引“乌鲁苏屯博穆博果尔索伦”一段时,竟略去了“博穆博果尔”几字;而且把“鄂尔吞”和“奇勒里”注释为当地部落名称〔241,卷14,页11上〕。

55 何秋涛在该文献资料的这最后一句话后添上了:“博穆博果尔及余众二百俱遁”〔241,卷14,页11上〕。

56 何秋涛引用的数字为七人〔241,卷14,页11下〕,可能是印刷错误。

57 然而进攻者的准确数字无从确定,因为满洲各旗、甲喇和牛录远征和作战时从不全数出动,只是从这一个或那一个支队调出必要数量的步兵或被甲骑兵参加。

58 何秋涛略去了这一全段文字,看来是他不愿使人注意到满洲人抢掠阿穆尔沿

岸地区各部的规模和驱赶他们离弃故土的事实。

59 文献资料写的是：“……七屯之人已归额驸巴尔达齐”。何秋涛全文录引这句话时，删略了“额驸”，同时有意识地在“已归”之后加一“附”字（“已归附”），这样做虽未改变词组的意义，但却使这句话具有了已告结束的性质〔241，卷14，页12上〕。这样，接在“已归附”之后的“巴尔达齐”几字，按何秋涛的划法，便应归到下一句里去：成为“巴尔达齐别屯之人……。”①这严重地歪曲了文件的意义，因为这样就变成：七屯的索伦首领不是“归附”巴尔达齐（即没有回到自己的当地首领管辖之下），而是“归附”满洲人了。看来《朔方备乘》的作者就是企图表达这样的意思。这只能使人认为是文献资料的有意篡改。

60 “据巴尔达齐曰”几字，也被何秋涛删略，从而改变了此段的含意。

61 法库门——原来的明边墙的一座关隘，通向蒙古的主要道路，便经过这座关隘，就是说，阿巴海命令自己的军队返回时要取道蒙古，而不要经过北方地区（原叶赫部领地）。

62 这些资料皆被何秋涛删略；他只举出了总计数字——六千九百五十人〔241，卷14，页12下〕。

63 文献资料中就是如此。

64 还在这些事件之前，1642年10月，将领沙尔呼达和朱玛喇便奉命往征分布在松花江沿岸的虎尔哈部。1643年1月2日，他们奏报说，该部十屯自愿“归顺满洲人”②，共有一千四百八十名男人、妇女和儿童〔8，卷63，页34下〕。何秋涛在解释这次远征结果时，企图得出结论：似乎到1642年，经过满洲人军事远征后，东海所有各部皆已被满洲征服，其领土也似乎并入了满洲国领土之内〔241，卷1，页6下〕。但是，如果是这样，就完全没有必要向此地进行任何补充性的军事远征了，这岂不显而易见？

65 记载此事的段落的俄译文，见〔196，卷1，第600页〕。

66 关于此事详见本书第82—84页。

67 关于B. O. 多尔基赫的观点，参见本章注40。满洲文献资料对于巴尔达齐来自何部落和地区的记载则前后不同：1634年，这些文献资料说是“黑龙江地方”〔8，卷18，页20下〕；1635年——“黑龙江索伦部”〔8，卷23，页20下〕；同年又称——“萨哈尔察部落”③〔8，卷23，页29下—30上〕；1636年——“萨哈尔察地方索伦部”〔8，卷28，页17上〕；1637年——又是“黑龙江地方”〔8，卷39，页2上〕；1643年——“黑龙江额驸巴尔达齐”〔8，卷64，页24下—25上〕等等。尤其是“萨哈尔察氏族”到后来竟也被清代历史著作纳入“纯粹的满洲氏族”名单之内了〔128，第75页〕。

68 居住在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的各个部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各屯，博穆博果尔及其他首领的部落等，何秋涛统统都错误地说成只是索伦部的不同氏族和索伦各

①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于是，七屯之人……俱已归附巴尔达齐，别屯虽现在逃窜，不久终必来归也”（《索伦诸部内属述略》，卷2，页3下）。——译者

②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俱已招降”（卷63，页314下）。——译者

③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索伦部落萨哈尔察地方”（卷39，页2上）。——译者

屯，只字未提这些地方的土著居民——阿穆尔河上人种上最为稳定的居民达斡尔人。何秋涛甚至把喀木尼汉部或氏族也归入了索伦[241,卷2,页1上—1下]。

69 关于将索伦人编入满洲族籍一事，文献资料记载说，1640年，将索伦人编为一个牛录，然而人数只占半个牛录——这是镶黄旗第五甲喇第一牛录；还有一个编成年代不明的牛录里，索伦人占全体人数的五分之一——这是镶蓝旗第五甲喇第十五牛录[5,卷3,页27上；卷5,页5下,页27上；卷10,页29下]。

第二章

1 中国作者赵泉澄称，在1644年以后宁古塔仿佛由盛京昂邦章京管辖。同时，作者引证的正是《世祖实录》中的卷7和卷26。然而在卷7中只列举了上述十五个据点，其中没有宁古塔。除此之外，在该卷中没有关于东北境内任何居民点状况的其它材料。在卷26中只记载了一份与管理东北有关的文件：任命满洲人叶克书为昂邦章京镇守盛京[11,卷26,页11上]，也没有关于宁古塔状况的任何记载。对于这种粗暴地伪造历史的企图，我们应当指出赵泉澄在科学上是不诚实的。对于黑龙江，作者也做了这样的伪造（顺便提一下该书的校订者是顾颉刚）[243,第21页,第27页（关于黑龙江）]。

2 关于祭祀满洲皇室祖先的记载在《世祖实录》中屡见不鲜。努尔哈赤和阿巴海祖先的陵墓名为永陵（在兴京西北五公里处）；努尔哈赤墓名为福陵（在盛京东北十公里处）；阿巴海墓名为北陵（在盛京西北五公里处）。

3 1657年取消辽阳府的名称；设置奉天府（其实就是“盛京府”），并置府尹——府的民政长官。

4 著名的镶蓝旗的沙尔呼达（萨儿吴代）任第一任宁古塔昂邦章京[11,卷107,页25上]。

5 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顺治、康熙年间（1644—1679年），盛京省的流放地是尚阳堡、铁岭、抚顺，稍后为宁古塔，而从康熙十九年（1680年）起为乌喇（吉林），后为黑龙江、齐齐哈尔、伯都讷，三姓[10,卷774,未标明页码]。

6 不久前，在同年5月，张尚贤曾呈给朝廷一张盛京舆地图——清朝绘制的第一批舆图之一。看样子奏疏是说明这张图的[11,卷2,页14上]。

7 一里约等于0.5公里。

8 佐领（牛录章京）是八旗军基层军事单位——牛录（相当于连）的指挥官。在文献资料中提到佐领，说明这里驻有一支人数不多的满洲驻防军。

9 譬如下述事实也可以说明清人对东北边陲是不重视的：在东北服役的满洲官兵比驻扎在北京的满洲人所享受的特权要少，所领的饷俸也少。1662年，满洲人吴库礼上疏朝廷称，驻在盛京的满洲官兵“在给所有满洲人带来幸福康泰之地服役”，生活十分贫困，“军役与传递[驿路文书]差事繁重，苦不堪言”[2,第9卷,第216页]。吴库礼请求对北京和东北的满洲官兵给予同样的特权和饷俸。

10 将军是在其所辖疆土上的全部满洲八旗军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当地军事民政长官，实际上拥有无限权力，并且拥有司法权。

象 E. Ф. 热洛霍夫娃所指出的那样，“将军的职权范围同十七世纪末俄国行署军政长官的权限相近，后者手中集中了全部军政管辖权”[102,第178页]。B. II. 瓦

西里耶夫把“将军”译为“воевода”(督军,长官),而把他所辖疆土译为“воеводство”(督军辖区)[63,第5页]。我们觉得,这两个术语最好译为“наместник”(总督)和“наместничество”(总督辖区)。

11 象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满洲人对东北相邻的诸部落知之不详,这里赫哲所指的不是一个而是阿穆尔河的几个民族——首先是那乃人(果尔特人)、奥罗奇人和尼福赫人(基里亚克人),Л. И. 什连克对此做了考证[参看 202,第1卷,第146页]。

12 完全是蛊惑性的武断,甚至不能用任何一次满洲人对这些部落的军事远征来证实。例如满洲人同费雅喀的接触只是在1659年5月才开始——已经在费雅喀开始向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缴纳实物税之后了[本书第97,98,101页]。“赫哲”的名称一般说来才第一次见于文献资料。

13 由此便产生了吉林的第二个名称——船厂。

14 在伊凡·克瓦什宁等远征之后,才获悉阿穆尔沿岸地区盛产粮食,伊凡·克瓦什宁等找到了另一条通往阿穆尔的道路,与波雅尔科夫所走的道路不同。

15 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上游右支流阿尔巴西河口加固阿尔巴津城正是在这一时期[50,第2册,第306页]。

16 为了对比可以指出,在全雅库茨克督军辖区一年内征收了二万九千卢布的实物税[176,第34页]。

17 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库,全宗1177,目录4,第31—45页;另见[94,第592页]。

18 见中央国家古代文献档案库,全宗1177,目录4,《163年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实物税册》,第31—45页;另见[94,第593—595页]。

19 “费雅喀”的名称此处第一次见于清朝文献资料。Л. И. 什连克令人信服地证明,满洲人使用这一名称是用来概括表示阿穆尔地区的几个民族或者他们的语言,其中包括尼福赫人(基里亚克人),而绝不只是表示后者[202,第1卷,第102—104页]。

20 在圣旨中皇帝谕曰:“该部落首次归附,对愿进京来朝者,(应)允准,并满足其所需”①[11,卷124,页6下]。这可以作为当地部落的代表在经济上关心进京与满洲人互市的佐证。

21 在《实录》中这一奏疏也如同许多其它奏疏一样付诸阙如。这一奏疏说明甚至在设防的宁古塔满洲人也惧怕俄罗斯哥萨克,并且在此时感到自己非常缺乏信心。

22 康熙皇帝的这一声明,依我们来看是清人对1669年С.阿勃林使团以及后者同意行“叩头”礼的反应。

23 无论是俄方,无论是满方的这种论点(还可参看11,卷91,页20下—21上;172,第553页)都是非常奇怪的。显然,各方的官僚机器有时是失灵的。

24 “倾心向化”(“倾心于贵国文明”)是非常固定的清朝政治用语,表示“倾心于”清帝国者的藩属地位的确立。对俄国使用这一用语是错误的,是不合理的。

25 一丈等于3.2公尺。

26 后来,为了弄清楚某些实际问题还曾多次派遣考察队到长白山。例如,1684

①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今该部落,初经降附。有欲赴京来朝者,从其便,报可”(卷124,页6下)。——译者

年曾派驻防协领名勒出往长白山,到达鸭绿江上游三遗沟地方〔256,第4卷,第12页〕,然而只是在1691年工部^①尚书图纳才奉旨绘制发源于长白山诸河流的全图〔31,卷1,第10页〕。杨宾列举了所有这些河流:“从湖水中流出,南流入海的有三条河流:图们江、鸭绿江和佟家江。北流的有五条河流:赛因纳因河、额黑纳因河、昂邦土拉库河、娘木娘库河、阿脊革土拉库河。所有这些河流都注入混同江”^②(松花江——格·麦·)〔31,卷1,第10页〕。

27 畿辅——京都(北京)省的名称。

28 此处及以下“东海界”,无论如何不能视为清帝国国界。这是满洲人所模糊地想象的领土的最全的地理区域。

29 山海关不在盛京西,而在盛京西南。

30 实际上清帝国和朝鲜边界不是在锡霍特岭。

31 《盛京通志》中关于这一地区的记载为:“奉天将军所辖疆域:东至兴京二百八十余里,乌喇界;西至山海关八百余里,山海关界;南至沿海岸之金州七百三十余里,海界;北至边二百六十余里为〔国〕界;东南至镇江城五百四十余里,朝鲜界;东北至开原威远堡二百三十余里,乌喇界;西南八百余里,海界;西北至九宫台门四百五十余里,蒙古界”^③〔28,卷8,页2上〕。杨宾在引用了关于盛京疆域的资料后,具体地写道:“以上所指土地皆入〔清〕帝国版图”^④〔31,卷1,第5页〕。

32 文献资料中记载:“宁古塔将军所辖疆域:东至东海三千余里,海界;西至开原、威远堡五百九十余里,奉天府界;南至长白山一千三百余里,朝鲜界;北至法忒哈边关六百余里,为〔国〕界;东南至希喀特山二千三百余里,海界;东北至飞牙喀〔部落居住地〕三千余里,海界;西南至英额边门七百余里,奉天府界;在西北边四百五十余里处黑尔苏,为〔国〕界。自宁古塔至盛京一千三百五十余里,自乌喇至盛京八百二十余里”^⑤(以上所有距离自宁古塔计里——格·麦·)〔28,卷8,页2上—2下〕。

① 《柳边纪略》中写的是“刑部”。——译者

② 《柳边纪略》中的原文是:“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门江、曰鸭绿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赛因纳因河、曰额黑纳因河、曰昂邦土拉库河、曰娘木娘库河、曰阿脊革土拉库河,而总汇于混同江”(卷1,第10页)。——译者

③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奉天将军所辖疆域:东至兴京二百八十余里,乌喇界;西至山海关八百余里,山海关界;南至金州沿海七百三十余里,海界;北至边二百六十余里,边界;东南至镇江城五百四十余里,朝鲜界;东北至开原、威远堡二百三十余里,乌喇界;西南至海八百余里,海界;西北至九宫台边门四百五十余里,蒙古界”(1684年版,卷8,页2上)。——译者

④ 《柳边纪略》中的原文是:“以上皆入版图”(卷1,第5页)。——译者

⑤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宁古塔将军所辖疆域:东至东海三千余里,海界;西至开原、威远堡五百九十余里,奉天府界;南至长白山一千三百余里,朝鲜界;北至法忒哈边六百余里,边界;东南至希喀特山二千三百余里,海界;东北至飞牙喀三千余里,海界;西南至英额边门七百余里,奉天府界;西北至黑儿苏边四百五十余里,边界。自宁古塔至盛京一千三百五十余里,自乌喇至盛京八百二十余里”(1684年版,卷8,页2上—2下)。——译者

33 《盛京通志》记载：“乌喇所辖疆域：东至俄莫贺索落站（驿路站）二百五十里（注：宁古塔界）；西至威远堡五百九十里（奉天府界）；南至长白山一千三百余里（注：其南为朝鲜界）；北至法特哈边门六百余里（注：蒙古界）；东南至图们江七百二十里（朝鲜界）；东北至阿尔楚哈屯九百二十余里（注：蒙古界）；西南至英颖六百九十五里（注：奉天府界）；西北至黑尔苏四百三十余里（注：蒙古界）；西南至盛京城八百二十余里”①（所有距离自宁古塔计里——格·麦·）[28, 卷 8, 页 12 上]。

34 “宁古塔所辖疆域：东至东海三千余里（注：海界）；西至俄莫贺索落站二百五十里（注：乌喇界）；南至图们江六百里（注：朝鲜界）；北至混同江（松花江——格·麦·）六百里（注：蒙古界）；东南至希喀特山一千五百七十里（注：海界）；东北至飞雅喀（部落居住地）三千余里（注：海界）；西南至勒福陈河五百里（注：乌拉界）；西北至阿尔楚哈[屯]七百余里（注：蒙古界）；西至盛京一千三百五十余里”②（所有距离自宁古塔计里——格·麦·）[28, 卷 8, 页 12 上—13 上]。

35 此处应当指出，作者说俄国仿佛在阿穆尔河上同强大的中国发生冲突的说法不妥[216, 第 126 页]。

36 最初的两个总督辖区（按指将军所辖疆域——译者）：盛京总督辖区和宁古塔总督辖区。

37 羁縻——中国中世纪的术语，直译为“笼络（束缚）各种力量的土地”；例如，明代用这一术语表示明帝国边界以外的，从未入它版图，完全由当地酋长管辖的东北疆土。杨宾有充分根据地使用这一术语来表示清代东北边疆的状况。东北当地诸部落的土地（至于更遥远部落的土地更不用提）仍归各部落的酋长管辖，而不归清朝管辖，他们的领土未纳入帝国版图[141]。

38 1616 年远征“萨哈连部”正是在那个地区，在那里在清洲人所记载的事件以后，差不多过了七十年，修建了爱浑堡，以上这种意见是杨宾个人的看法。

我们认为，这次远征的地区是在松花江和阿穆尔河的汇合处。

39 这些事实使人对日本作者秋成船越关于确定西伯利亚（?）满洲地图的日期的结论产生一定的怀疑，他把他所谈的地图归到 1673—1676 年；在此时期清朝的制图家尚不能绘制这样的地图；在图中标有布（法）特哈乌喇证明该图是在十八世纪上半叶绘

①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乌喇所辖：东至俄莫贺索落站二百八十里^{宁古塔界}；西至威远堡边五百九十五里^{奉天府界}；南至长白山一千三百余里^{其南朝鲜界}；北至法特哈边六百余里^{蒙古界}；东南至土门江七百二十里^{朝鲜界}；东北至阿尔楚哈屯九百二十余里^{蒙古界}；西南至英颖边六百九十五里^{奉天府界}；西北至黑尔苏边四百三十余里^{蒙古界}；西南至盛京城八百二十余里”（1684 年版，卷 8, 页 12 上—12 下）。——译者

②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宁古塔所辖：东至东海三千余里^{海界}；西至俄莫贺索落站二百五十里^{乌喇界}；南至土门江六百里^{朝鲜界}；北至混同江六百里^{蒙古界}；东南至希喀特山一千五百七十里^{海界}；东北至飞雅喀三千余里^{海界}；西南至勒福陈河五百里^{乌喇界}；西北至阿尔楚哈屯七百余里^{蒙古界}；西至盛京城一千三百五十余里”（1684 年版，卷 8, 页 12 下—13 上）。——译者

制的〔248,第199—218页〕。

40 满洲文献资料中几乎没有引用关于满洲人来此的材料,但是我们在俄国档案文件中看到了关于叶·哈巴罗夫同“博格德人”在古伊古达尔城和平会见的记载,后者看样子是满洲商人或者征收实物贡的人〔95,第三卷,№102,第359—371页;172,第135页〕。从关于这次会见的记载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绝对不是在阿穆尔各民族土地上的满洲行政管辖的什么滥觞。

41 关于不能认为是某种政治上从属形式的“名义上的藩属”的制度,详见〔58,第41—42页等〕。

第三章

1 对阿穆尔沿岸土地的开发,还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初便已由叶·哈巴罗夫和德·季诺维耶夫开始了〔208,第193页;216,第59—61页;34,第49—52页〕。

2 奇勒尔部落这一名称,应理解为现今的奥洛奇人和尼福赫人。在此之前,在满洲文献里未曾提到过这一名称。

3 此段文字也准确地收录在《八旗通志初集》里〔5,卷153,页13上—13下〕。

4 达斡尔人——是阿穆尔河上游的主要居民。“达斡尔”一名,首次出现于这份至为重要的满洲官修文献资料。这一事实说明很多问题。我们即使同意某些研究者的看法,即阿穆尔河的当地居民经常愿意把自己称作“索伦人”(因为住在莽林里的这些渔猎部落的代表素以勇敢强悍著称),满洲人不知阿穆尔河土著居民的确切名称为何的事实仍然十分发人深思。

5 《平定罗刹方略》即以这一事件为开端,叙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清人准备在阿穆尔沿岸地区进行战争的历史〔17,卷1,第1—2页〕。

6 艾·陈和文·陈在翻译这段时,看来并未理解其内容。在这里谈的不是乌苏里江,而是一个地理点——额苏里屯,该屯位于阿穆尔河上,在阿尔巴津与爱浑之间。这一错误使得文·陈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康熙皇帝指派郎坦“探察自宁古塔经乌苏里江去阿穆尔河的水路”(284,第151—152页;285,第77页)。如果看看地图,那么这种说法至少是令人感到奇怪的。

7 一石约为103.5公升。

8 一寸为3.2公尺。

9 何秋涛在引用这一资料时,犯了大量错误〔241,卷14,页20下—21上〕。

10 在浑河河口设有船台。

11 看来此人就是许多俄国档案文件上提到的孟格德。在这些文件里,有时把他称作“脑温督军”〔例如见中央国家古文献档案馆,中国卷宗,第三卷宗,第165—166页;216,第109页〕。清朝文献资料里自然没有提到孟格德的这种官名,因为当时在东北根本不存在任何“脑温督军辖区”。

12 清帝国与当地各民族在过去的相互关系的性质是,满洲人的不断袭击,大批迁徙当地居民,强制他们与掠夺者进行货物交换,满洲将军一年数度征收毛皮;这一切使我们认真地怀疑是否有各民族向满洲人求援这种可能性。

13 《平定罗刹方略》称这条河为布尔马大河〔17,卷2,第3页〕。(作者弄颠倒了:《清实录》称此河为布尔马夫河;而《平定罗刹方略》称之为布尔马夫河。——译者)

14 下面这个插入段落系何秋涛引自《八旗通志初集》，在《实录》正文中没有此段落。

15 《平定罗刹方略》中的这个插入段落到此结束，下面又是《实录》的正文。

16 在满洲文献资料中，被俘的费奥多尔的供词没有载入。

17 满洲文献中也未载入此上谕。

18 有趣的是，稍后不久，于1685年2月25日，同一文献资料在叙述这些事件时，在转述瓦山和萨布素从当地送来的奏疏之前，写道：“圣上钦命都统公瓦山、侍郎郭丕前往黑龙江，彼等在该地应与将军萨布素仔细研究：是否需要攻取阿尔巴津（着重号是我加的。——格·麦·），应采取何种步骤。应制定于我有最大利益的措施”①〔12，卷119，页4上—4下〕。即再次强调了康熙皇帝训示的基本内容。

19 指1655年那次明安达礼对俄国的库马尔堡的不成功的围攻。

20 何秋涛对这一文件的转述，简单而不完整〔214，卷14，页25下—26下〕。

21 俄国俘虏提供的这些资料，被过分夸大了。1685年在阿尔巴津能拿起武器的只有四百五十人，三门大炮，只有四发炮弹〔216，第122页〕。

22 《平定罗刹方略》里，凡遇黑龙江城，皆以“爱琿”或“爱琿兵”代替〔17，卷2，第51页〕。

23 这篇传记最初的译本是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翻译的〔2〕，还以《关于对俄战争的中国记实》一名著称于世〔中央国家古文献档案库《俄中关系》全宗，目录2，1682年，卷宗1〕。阿·列昂季耶夫的译文的某些片断曾由尤·巴尔坚涅夫发表〔50，第1册，第329—336页〕。今天这一译本已有些陈旧了。

24 П. Т. 雅科夫列娃只根据她所知道的一篇《郎谈传》，便认为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只是由郎坦指挥的〔216，第122页〕。

25 “关保奏云：‘我军原订于4月28日（1685年5月20日。——格·麦·）水陆同时并进。在此之前连日雷雨大作。至26日（1685年5月18日。——格·麦·）阿穆尔河水开始上涨，而且刮起逆风，使船行非常困难。到了27日（1685年5月19日。——格·麦·）天竟放晴，水亦渐落。28日（1685年5月20日。——格·麦·）从晨起竟转为顺风。我军士兵扬帆溯流而上，三日行程竟于一日之内走完。由陆路出发的部队，纵然加速行军，也未及赶上目的地。

驻扎在爱琿的部队中肉食匮乏。突然自山上跑下数以万计的鹿群，骑兵开始挽弓射击鹿群，步兵亦用棍棒猛击，甚至乘坐舟筏之人亦来相助。计获鹿五千只。’

朕获悉此二事，预知可获军事胜利。但事尚未结束，朕姑且未言。今已告平息，朕特颁谕旨，令尔等遇知此二事”②〔173，第678页；18，卷2，页19上—19下〕。

①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上命都统公瓦山、侍郎郭丕往黑龙江与萨布素等详议，应否攻取雅克萨城，并作何举行，择其有裨于事者奏闻”（卷119，页4下）。——译者

② 《朔方备乘》中的原文是：“上复谕曰：前关保奏云：我兵拟于四月二十八日水陆进发。先期雷雨大作，至二十六日江水泛滥，又风逆舟不得前，及二十七日天晴水落。二十八日平旦，忽转顺风。我兵扬帆溯流直上，三日之程，一朝而至。陆路之兵，虽疾行不及也。又驻劄爱琿兵适当肉食匮乏。忽有鹿数万自山趋下。骑者驰射，步者挺击，及驾船筏于江中截获者，计五千有余。朕观此二事，豫知可以奏功，因事未就，姑秘不发，今既荡平，故传谕尔等知之”（《平定罗刹方略二》卷首六，页5下）。——译者

26 A. B. 鲁达科夫就此事所援引的数字是：每站伏役三十名和博什库三十名，这显然是笔误〔168，第 543 页〕。

27 1685 年 10 月以前，黑龙江将军及其副职皆非正式任命，这些任命是临时性的，完全是与战事需要有关。

28 骁骑校——满洲八旗军的低级军官职称。

29 请与载入《详志》的 A. 列昂季耶夫的译文相比较〔12，卷 10，第 140 页〕。

30 这道谕旨的完整译文，曾被 A. E. 柳比莫夫引用过〔131〕。沿雅库次克土地划定边界的建议，康熙皇帝曾重复过三次〔131，第 89 页，第 90 页和第 91 页〕。

31 《平定罗刹方略》中不称黑龙江，而称爱珲。

32 请与俄罗斯国发出的国书的真实内容相比较〔48，第 40—42 页〕。

33 文件中大概有错误。可能不是塔海，而是巴海。巴海远征俄国人之事，以前在文献资料中曾记述过。然而，满洲文献资料丝毫没有谈到这两个将领的失败。

34 《平定罗刹方略》中没有收入这道谕旨。

35 1687 年 2 月 20 日，康熙皇帝颁旨，其中谈到由于发生传染疾病，派遣医生赴阿穆尔河上满洲军前之事〔12，卷 129，页 2 上—2 下〕。

结语

1 П. Т. 雅科夫列娃根据从中国杂志翻译的译文，不准确地把他的名字音译为佟桂纲〔216，第 153 页〕。试与 Ю. П. 巴尔涅涅夫的译音表相比较〔50，第 1 册，第 2 分册，第 304—365 页〕。

2 П. Т. 雅科夫列娃还指出了乌涅达^①和阿尤希两个名字〔216，第 154 页〕。此外，使团成员内还包括两名耶稣会士——徐日升（Томас Перейра）和张诚（Жан Франсуа Жербиён），但他们的名字在中国文献资料里并未提及。

3 见对于 1685 年 2 月 5 日康熙皇帝谕旨的说明（本书第 163 页）。

4 应该注意这道谕旨的这一提法：赫哲和费雅喀两个部族是单独提的，没有指明他们属于清帝国。

5 清朝上层统治者的侵略计划的实质和领土扩张的规模，在这里表现得相当露骨。与此同时，不应忽视，这个公开的扩张主义纲领正是满使在涅尔琴斯克谈判中准备向俄方实际提出的，而且直接以军事压力加以支持的那些要求。

6 关于这个问题，《平定罗刹方略》里说：“当索额图等尚未抵达色楞格斯克之时”^②〔17，卷 4，第 89 页〕。

7 据《八旗通志初集》的资料，此事是郎中伊道于 1689 年 4 月奏报的〔5，卷 153，页 21 下〕；而据《圣祖实录》证明：“俄使费奥多尔（戈洛文）至涅尔琴斯克，请求讨论划界事宜。”所记日期为 1689 年 7 月 13 日〔12，卷 140，页 30 上〕；《平定罗刹方略》没有指明日期，但说：“此时俄使所遣信使已至，报称：俄罗斯大使臣费奥多尔（戈洛文）等早

① 按应为参加使团的理藩院郎中温达。——译者

② 《平定罗刹方略》中的原文是：“是日，索额图等启行。未抵色冷格地方，适喀尔喀、厄鲁特争战报至，上即遣……”（《朔方备乘》卷首 8，页 1 下）。——译者

(已)抵达涅尔琴斯克^①〔17,卷3,第89页〕。

8 清使一开始“讨价”甚至远远超出了康熙皇帝下达的最大限度的训令所规定的范围。显然,这里反映出了满洲中国人外交的基本特点。

^① 现将《郎谈传》、《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平定罗刹方略》中各有关段落附此,以资对照:

“二十八年三月郎中伊道报:鄂罗斯国使臣费咬多罗于今春至尼布抽讲地界”(《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页21下)。

康熙二十八年夏四月壬辰。“鄂罗斯遣使费要多罗等至尼布潮地方,请议分界事宜”(《圣祖实录》,卷140,页30上)。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壬辰。……时鄂罗斯使臣所遣人至,言其大使者费要多罗等前来尼布楚地方”(《朔方备乘》卷首8,页1下)。——译者

附 录

东北各部领土上的居民点考证

王甲那

王甲城——位于哈达河(今清河)上游北岸,哈达城以东[230,第148页]。

瓦尔喀那

阿万路——此地无法考证。

阿库里路——乌苏里江上游支流阿库里河流域土地[29,第3排,第2上页]。

安褚拉库城——位于今阿城附近,阿城原名阿勒楚喀城[29,第3排,第3上页]。

尼满路——在中国地图册上尼满河标为乌苏里江上游支流之一,而“尼满路”标在此河流域内[29,第3排,第2上页]。

诺雷路——此地无法考证。

内河城——大约位于安褚拉库城东南。

塞木克勒路——准确位置不详。

乌尔吉路——准确位置不详。

蜚悠城——据稻叶岩吉称,此城位于今琿春城附近[265,第2卷,第644页]。

额勒约索(额勒)路——准确位置不详。刘选民认为,此地位于乌苏里江上游地区遼东[230,第169页]。

额赫库伦路——此地位置无法考证。刘选民认为,此地位于乌苏里江上游地区遼东[230,第169页]。

窝集那

东额黑库伦城——此地位置无法考证。

木伦路——此地得名于乌苏里江左侧支流穆稜河,该河流经兴凯湖的西北方。可以认为,木伦地方在今穆稜河流域,距该河流入乌苏里江处不远[16,卷13,页14上]。

那木都鲁路——在今绥芬河上游地区,大约在琿春河附近[5,卷152,页16上—16下]。

尼马察路——大约在乌苏里江上游和兴凯湖以南,绥芬河以北的地方[29,第3排,第2上页]。

宁古塔城——今宁安城。

宁古塔路——在绥芬路以北,今宁安城以南。

西临路——位于西临河流域。该河在雅兰河以西,南流入日本海[29,第3排,第

2 上页)。西临河曾流经琿春东南部[24, 卷 2, 页 23 下]。

绥芬路——在绥芬河上游[29, 第 3 排, 第 2 上页]。

乌尔古京路——此地无法考证。1684 年刊印的《盛京通志》已不能提供有关此地的资料。

佛讷赫枪索路——位于今宁安城西南,佛多和河和居民点额默和站以北[24, 卷 12, 页 10 上, 20 下]。据《盛京……战迹舆图》,此地位于牡丹江上游,镜泊湖以东,宁安西南[29, 第 3 排, 第 3 上页]。

花宝村、山寮堡①等五城——这些地方无法考证,大约都在扎库塔城附近。

津野路——位于琿春以东[24, 卷 12, 页 13 下]。

赫席黑路——今敦化地区[24, 卷 12, 页 6 上]。

扎库塔城——《吉林通志》称:扎库塔城位于琿春西一百二十里处[24, 卷 24, 页 28 下]。《盛京……战迹舆图》上扎库塔位于图们江北岸,海兰江以西[29, 第 2 排, 第 3 上页]。

山寮堡——见花宝村条。

俄漠和苏鲁路——《吉林通志》考证其为今额默和索罗站[24, 卷 12, 页 20 下]。《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地标在佛多和河(牡丹江上游支流)以西,赫什赫屯以北[29, 第 3 排, 第 2 上页]。

雅搜路——此名大约来源于雅兰河[29, 第 3 排, 第 2 上页]。遗憾的是,十七世纪的文献资料没有提供任何可供考证此河方位的资料。

董鄂部

瓮郭落城——未能考证出此地位置。《满洲源流考》证实此城属董鄂部[16, 卷 8, 页 84 上]。

董鄂城——《盛京通志》*称:“东峨城在永吉州西南五百二十里……旧为东峨大长鲁克索所居”[28, 卷 15, 页 9 上]。《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置于诸巴雅尔呼河以北,株鄂山以南和今浑江以西[29, 第 2 排, 第 4 上页]。

齐吉答城——位于旺清河与喀什河汇流处以南,浑江以西[29, 第 2 排, 第 38 页②]。

雅尔古寨——位于董鄂城东南,浑江西岸[29, 第 1 排, 第 3 上页]。

叶赫部

阿气兰城——位于叶赫部东南边界上[230, 第 162 页]。

叶赫城——文献资料里还可见到此城的另一名称——东城。此城为叶赫首领金台石居地。《盛京通志》指出,叶赫城位于吉林以西四百九十五里[28, 卷 15, 页 9 下],蒙古峪以东四十里[28, 卷 13, 页 20 上]。《吉林通志》进一步确定,此城位于呼兰峰西南,距吉林约四百里,在白石山西北,半截塔山麓东北[24, 卷 18, 页 21 上, 页 22 上和

* 此处及后面的引文皆取自此书的 1736 年版本。

① 这两个地名系根据俄语音译。——译者

② 原文如此,应为“第 3 下页”。——译者

页22下]。《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置于叶赫河(今通河)上游西南[29,第3排,第4上页]。

叶赫山城——位于叶赫河南岸[230,第165页]。在文献资料里还可看到此城的另一名称——西城,乃是叶赫首领布羊古居处。《盛京通志》确定其位置在叶赫城西北三公里处[28,卷15,页9下]。

喀布齐费城——见何敦城条。

克亦特城——位于叶赫城东十里,黑儿苏城以西。

兀苏城——即今伊通城[24,卷12,页6上]。《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置于长白山讷殷部领土内,在额赫纳音河与松花江汇合处[29,第2排,第3上页]。正如刘选民所断定的,这一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讷殷部在1591年已被努尔哈齐征服[230,第162页]。

何敦城、喀布齐费城、俄及岱城及“其他十九处”^①——这些地方的位置无法考证。

黑儿苏城——《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置于赫儿苏河与阿济格雅哈河(“小雅哈河”)之间[29,第2排,第4上页]。《盛京通志》把黑儿苏河称为东辽河上游,指出此河位于吉林城西四百余里处[28,卷13,页26下]。

吉当阿城——位于张城与兀苏城之间[230,第163页]。

张城——位于叶赫部东南边界上[230,第162页]。

粘罕寨——位于叶赫城东十里,黑儿苏城之西。

俄及岱城——见何敦城条。

呀哈城——位于昂邦牙哈河(“大牙哈河”)东北[29,第2排,第4上页]。据《盛京通志》记载,昂邦牙哈河在吉林以西三百二十余里[28,卷17,页26下]。

库尔喀部

拉发地方——此地无法考证。

辉克地方——位置不详。

耶朱屯——此地无法考证。

满洲部

兴京城——今辽宁省新宾。五岭——《盛京通志》考证五岭为分别座落在兴京西南五、二十一、三十六、五十六和七十一里的五座山岭[28,卷13,页1下]。

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老城。

讷殷部

佛多和山^②——确定此山位置颇为繁难,因为在东北有三条佛多和河。据刘选民的意见,此山应在流入额赫纳音河的那道佛多和河流域内[230,第153—164^③页]。

^① 据《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俄作者在计算上有误。《实录》原文是:“其张城、吉当刚城、黑儿苏城、押哈城、何敦城、喀布七拉城、俄及塔城大小共十九处……”可见前列各城俱包括在“十九处”之内。——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应为“佛多古山”(见刘选民的文章)。——译者

^③ 原文如此,按应为“第153—154页”。——译者

萨哈连部

努尔哈赤军队攻取的“十一寨”——看来这主要是松花江流入阿穆尔河右侧南岸地区的沿岸村寨。

兀尔简河——此河无法考证。

佛多罗袞寨——此地位置不详。

索伦部和虎尔哈部

阿里岱屯——见塞布奇屯条。

阿里闾屯——见兀赖布丁屯①条。

阿撒津城——看来位于乌库尔城东北，阿穆尔河岸上〔见29，第5排，第4上页〕。

巴哈纳屯——见兀赖布丁屯条。

大噶里达苏屯——见博和里屯条。

博和里屯、诺尔噶勒屯、都里屯、大噶里达苏屯、小噶里达苏屯、绰库禅屯及能吉勒屯——这些地方的位置不十分清楚。《盛京通志》称博和里河为阿穆尔河右侧（南侧）支流，在黑龙江城南一百五十里〔241，卷14，页8上〕。可能博和里屯位于此河流域内。其他各屯，看来都分布在离此屯不远的地方。

幹齐奇屯——位于苏克特库屯②以东，松花江以南〔29，第4排，第2下—3上页〕。

温多河——此河无法考证。

甘地——此地位置未能考证出。

郭博勒屯——何秋涛考证此地即《盛京通志》中所提到的果布噶尔城，在黑龙江城（爱晖）西北一百里处〔240，卷14，页7下〕。

噶勒达苏屯——见塞布奇屯条。

噶勒达逊屯——见多科屯条。

多博库地方③——此地位置不详。

多科屯、噶勒达逊屯、穆丹屯、都孙屯、乌尔堪屯、德笃勒屯——这些地方的准确位置，暂时不能确定，但是，看来这些地方都在巴尔达齐领地境内或在其附近。

都孙屯——见多科屯条。

多金城——位于雅克萨城西南，在阿穆尔河右岸，平武河以东〔29，第5排，第4上页〕。

铎陈城——位于阿撒津城以东〔29，第5排，第4上页〕。

都里屯——见博和里屯条。

德笃勒屯——见多科屯条。

库鲁木图屯——见乌音屯条。

库马拉河（呼麻立河）——今呼玛尔河，阿穆尔河的右支流。

库巴察拉屯——位于福提希屯东北，喀尔喀木屯西北，在松花江南岸〔29，第4排，

① 按“兀赖布丁屯”应为“精奇里兀赖（精奇里江）（之）布丁屯”。——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当为“遮克特库屯”。——译者

③ 原文如此，据《朔方备乘》，应为“多尔博库地方”。——译者

第2下—3上页]。

克音屯——见塞布奇屯条。

喀尔喀木屯——位于松花江南岸，在三姓城东北〔29，第4排，第2下—3上页〕。

拉里阑屯——此地位置仍然不详。

小喀里达苏屯——见博和里屯条。

穆丹屯——见多科屯条。

纳屯——见乌音屯条。

尼叶尔伯屯——在萨里屯西南〔29，第4排，第2下—3上页〕。

诺尔喀勒屯——见博和里屯条。

能吉勒屯——见博和里屯条。

鄂尔琿屯——位于松花江同阿穆尔河汇合处东北〔29，第4排，第2下—3上页〕。

塞布奇屯、喀勒达苏屯、阿里岱屯、克音屯、裕尔根屯——这些地方的位置不详。

萨里屯——位于额提奇屯西南，在松花江右（东）岸〔29，第4排，第2下—3上页〕。

图呼尔察城①——此地位置无法确定。

乌音屯、库鲁木图屯、纳屯——这些地方的位置仍然不详。

乌库尔城——位于流入阿穆尔河的乌库尔河河口附近，在多金城东〔29，第5排，第4上页〕。

兀赖布丁屯、乌木内克屯、巴哈纳屯、阿里阑屯——这些地方位置不详。

乌尔堪屯——见多科屯条。

乌兰海伦屯——位置不详。

乌鲁苏屯——何秋涛考证此地为似乎在黑龙江城西北三百里的乌鲁苏穆丹城，并把它称为索伦首领博穆博果尔的住地〔240，卷14，页7下〕。据我们看来，他的考证根据不足。

乌木内克屯——见兀赖布丁屯条。

福提希屯——位于喀尔喀木屯西北，在松花江南岸〔29，第4排，第2下—3上页〕。

海伦屯——何秋涛考证此地为通常称为海拉尔的呼伦贝尔地区〔240，卷14，页8上—8下〕。这种推断不值一驳，难以接受〔244，第435页〕。

齐洛台地方——此地未能考证出。

绰库禅屯——见博和里屯条。

绰尔门地方——看来位于绰尔河流域。此河系嫩江（诺尼江）支流〔244，第118页〕。

苏克特库屯（按应为“遮克特库屯”——译者）——位于请巴河以东，松花江以南〔29，第4排，第2下—3上页〕。

鄂尔多木②——此地位置不详。

额尔图屯——何秋涛毫无根据地把此地与距黑龙江城西北达一千三百里的额莱

① 此地名系根据俄语音译。——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鄂尔多木系人名，是科尔沁部土谢图亲王属下将领。——译者

格河①联系在一起[240,卷14,页3下]。此地位置不详。

幹齐奇屯——位于松花江同阿穆尔河汇流处东南[29,第4排,第2下—3上页]。

裕尔根屯——见塞布奇屯条。

雅克萨城——索伦城,其准确位置,根据十七世纪文献资料已无法考证,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清人毫无根据地把此城考证为阿尔巴津城。这一伪造历史的说法得到了《盛京……战迹舆图》的肯定,在此图上,该城被标在今阿尔巴津的遗址上[29,第5排,4上页]。

苏完鄂

苏完地方——《盛京……战迹舆图》将其置于松花江上游地区,在佛多和河与塞朱伦河之间[29,第2排,第3上页]。刘选民认为,这是错误的[230,第151页]。然而,据我们的看法,苏完地方位置的问题尚未十分弄清楚,尚须进一步确定。

苏克苏浒河鄂

安土瓜尔佳城——刘选民指出了《东北边防辑要》一书的错误,该书称此城即翰图阿拉[230,第139页]。《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置于苏克苏浒河北岸,在扎喀关以西,大黑山东南[29,第2排,第4上页]。

古勒城——位于古勒山麓。《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绘于苏子河南岸,扎喀关西南,图伦城东南[29,第2排,第4上页]。

马儿墩寨——此地位置不明,其属于苏克苏浒河部的根据,可见[16,卷8,页24上]。

徽尔湖城——《盛京通志》认为,此城位于兴京西一百二十里处[28,卷15,页2上]。《盛京……战迹舆图》将其绘于萨尔浒河以东,图伦城以西,萨尔浒河与苏子河汇流处西南[29,第2排,第4上页]。

图伦城——位于苏子河同浑河汇流处东南,在古勒城东北,徽尔湖城以东和界藩城附近渡口以南[29,第2排,第4上页]。

黑济革城——位于扎喀关以西,古勒城以北[230,第140—141页]。

嘉木湖寨——曾位于大黑山以东,安土瓜尔佳城西北,在苏子河北岸[29,第2排,第4上页]。

扎喀城——位于扎喀关以东或东南。据《盛京通志》记载,扎喀关位于兴京城西六十三里处[28,卷16,页1下]。

沾河寨——文献资料里没有指出此寨位置,但是,看来此地距嘉木湖寨不远。

沙济城——此地准确位置不详,但是,根据《实录》记载,此城距古勒城不远[25,卷1,页4上]。

乌拉鄂

郭多城——距俄汉城②不远。

① 此河名系根据俄语音译。——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应为“俄澳城”。——译者

宜罕山城(宜罕阿麟城)——位于吉林东北,在宜罕河北岸,在宜罕山上(今老爷岭西脉或其支脉)[28,卷15,页10上;29,第3排,第3下页]。

“乌拉部临河五寨①”——五寨的准确名称皆已湮没,分布于乌拉河(松花江上游)沿岸[230,第159页]。

孙札泰城——位于俄汉城南和西南[29,第3排,第3下页]。

乌拉城——为乌拉首领布占泰的主要驻地。《盛京通志》确定其位置在吉林城北七十里[28,卷15,页9下]。《努儿哈奇实录》证明,此城在乌拉河以东,距金州城二里[25,卷2,页5上]。《吉林通志》错误地将其考证为今之打牲乌喇城[24,卷15,页18下],但是,打牲乌喇城是由于乌拉旧城在江河泛滥时,屡遭水淹,因此东移,于1703年才修筑的。《盛京……战迹舆图》将乌拉城绘于乌拉河以东,打牲乌喇城以西,在哲松额河北岸[29,第3排,第3上页]。

伏尔哈城——在文献资料里,以伏尔哈为名的城市有二:一在吉林西南五百里,另一在吉林北三十三里[16,卷13,页37上]。属于乌拉部的,可能是第二座城,因其原为佛索诺贝勒所居[28,卷15,页9下]。《盛京……战迹舆图》将其绘于乌拉河东,宜罕山城以西,在宜罕河北岸[29,第3排,第3下页]。

金州城——根据《努儿哈奇实录》的资料,可以断定,此城位于乌拉城西,在乌拉河左(西)岸[25,卷2,页5上]。稻叶岩吉认为,此城位于宜罕河岸边,在景恩佛勒站附近[265,第2卷,第637页]。《盛京……战迹舆图》将其绘于乌拉城南,在宜罕河北岸和乌拉河东岸[29,第3排,第3下页]。刘选民认为,稻叶岩吉的说法是错误的[230,第159页]。

俄汉城——《盛京通志》将其置于吉林城东北三十里处[28,卷15,页10上]。

乌扎拉那

乌扎拉屯——其遗址位于穆稜河同乌苏里江汇合处以南[29,第4排,第2下页],在康熙皇帝于1682年所密派至阿尔巴津城下的满洲人细作郎坦和彭春的奏疏里,也提到过“乌扎拉地方”,根据这一奏疏,可以将此地与叶·哈巴罗夫于1652年建立阿枪斯克城堡,并同满洲人发生第一次冲突的地区联系在一起。

哈达那

绥哈城——《满洲源流考》确定该城位置在吉林城西四十里[16,卷13,页46下]。《盛京……战迹舆图》将其标于绥哈河与宽奠河之间[29,第3排,第3下页]。

富家儿齐寨②——位于同努尔哈赤部交界的地方[25,卷1,页10上]。

哈达城——同名城市有三:哈达新城、哈达旧城——部落首领的原来住城——和哈达石城。《盛京通志》称:“哈达新城为部长所居,在衣车峰上;哈达部贝勒将其都城自开原境内旧城迁此”③[28,卷15,页9上]。《吉林通志》称:“哈达新城建于衣车峰

① 原文如此。按应为“临河五城”。——译者

② 俄作者沿袭了刘选民文章中的排印错误,此地名应为“富儿家齐寨”。——译者

③ 《盛京通志》中的原文是:“哈达新城在衣车峰之上,哈达贝勒自开原界内旧城迁居于此”[卷15,页9上]。——译者

山脊之上，哈达石城建于衣车峰山麓”①〔24，卷 18，第 25a 页〕。《盛京……战迹舆图》将哈达旧城绘于哈达石城西南，在清河北岸〔29，第 2 排，第 4 上页〕。

哈达河——今清河。流经哈达都土地〔16，卷 13，页 14 上；28，卷 13，页 14 上〕。

柴河寨——看来位于柴河流域内。《盛京通志》确定，柴河在铁岭城北二里的地方流过〔28，卷 13，页 16 下〕。

辉发部

多壁城——位置不明，大约在边界地带。

辉发城——文献资料中提到的辉发城有三：辉发下城——在辉发峰西北；辉发河城——在吉林南三百里，在辉发河岸边；辉发城——在吉林西三百七十里，在吉林峰上〔24，卷 12，页 18 下；28，卷 15，页 8 下〕。部落首领拜音达里住地大约是辉发城。据《哥儿哈奇实录》，辉发部祖先王机②在寇尔奇山中修筑城堡，在吉林西三百七里，与吉林峰上的辉发城直接相邻〔25，卷 1，页 3 下—4 上〕。《吉林通志》记载，浑河绕经辉发城北部，因而此城在浑河南岸〔24，卷 22，页 6 下〕。《盛京……战迹舆图》将此城绘于浑河南，在三屯河与托忻河之间〔29，第 2 排，第 3 下页〕。

浑河部

播—混寨——刘选民认为，此地位于安土瓜尔佳城与托漠城之间〔230，第 142—143 页〕。

东佳城——位于伊勒登河上游北岸，在兆佳城西南〔29，第 2 排，第 4 下页〕。

枕甲路——位置不详。《盛京……战迹舆图》将其标于松山堡峰以南，浑河北岸，高丽营以东〔29，第 4 排，第 4 下页〕。

甲版城——距离抚顺不远。《盛京……战迹舆图》将其标于抚顺以东〔29，第 2 排，第 4 上页〕。

扎库木路——在伊勒登河上游南岸，东佳城西南〔29，第 2 排，第 4 上页〕。

兆佳城——在古勒山西北，古勒城西南〔29，第 2 排，第 4 下页〕。

鹅尔浑城——从努尔哈赤的进军路线来看，可以断定，此城位于托漠河城西北，可能在甲版城北，距明辽东边墙不远〔25，卷 1，页 4 下—5 上，页 8 上〕。

虎尔哈部——见索伦部和虎尔哈部

哲陈部

巴尔达城——位于浑河北岸〔230，第 147 页〕。《柳边纪略》将此城以及界藩城，皆划归浑河部〔31，卷 3，第 44 页〕。

洞城——在努尔哈赤拿下巴尔达城之后，立即将此城攻克，因此可以断定，此城距离巴尔达城甚近。

① 《吉林通志》中的原文是：“哈达新城建于衣车峰上，哈达石城在衣车峰山下”〔卷 18，页 25 上〕。——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应为“王机砮”。——译者

托澳河城——位于浑河与苏子河之间，在界藩城东，安土瓜尔佳城西北〔29，第2排，第4上页〕。

界藩城——位于浑河北岸〔230，第148页〕。

山城——位置不详。

使犬部

音达琿路①——十九世纪中国作者魏源推测，此地在阿穆尔河支流音达穆河流域内〔219，卷1，页7上〕。

诺罗路——魏源将其置于诺罗河流域〔230，卷1，页7上〕。遗憾的是，这种说法没有任何论据证实。

石拉忻路——大约位于同名河流域，石拉忻河为流入乌苏里江的诺罗河的支流〔29，第4排，第2上页〕。

塔库喇喇路——位置不详。

① 按“音达琿塔库喇喇”是一个地名，意即“使犬部”。而俄作者却将“音达琿”和“达库喇喇”分为两个地名。——译者

书 目

史料

俄文

1. «Записки о Нингуге», 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В. П. Васильева, — в кн.: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 отдельный оттиск из «Записо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1857, кн. XII.

《宁古塔纪略》，В. П. 瓦西里耶夫译自中文，载《满洲志》一书，单行本取材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圣彼得堡，1857年，第12册。

2. «Обстоятельное описани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состояния Манджур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и войска, осми знаменах состоящего». Перевел с манджурского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 т. 1—17, СПб., 1784.

《满族与八旗军之起源与现状详述》，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自满文，第1—17卷，圣彼得堡，1784年。

3. «Тайцин Гурунь и Ухери Коли, то-есть все законы 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а ныне Манчжур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еревел с манчжурского ...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 т. 1—3. СПб., 1781—1783.

《中国(今满洲)政府法规大全》，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自满文，卷1—3，圣彼得堡，1781—1783年。

中文

4.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阿桂等编，木版，出版地点不详，1744年。
5. 《八旗通志初集》，木版，出版地点不详，1739年。
6. 《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东京，1937年〕。
7. 《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东京，1937年〕，第一帙，第1—2册，卷1—10。
8.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东京，1937年〕，第2—3帙，卷1—56。
9. 《大清会典图》，出版地点不详，〔1899年〕，卷1—270。
10. 《大清会典事例》，出版地点不详，〔1899年〕。
11. 《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载《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东京，1937年〕，第5—7帙，卷1—144。
12.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载《大清历朝实录影印本》〔东京，1937年〕，第8—14帙，卷1—300。

13. 《大清世祖章皇帝圣训》，木版，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卷1—6。
14. 《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木版，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卷1—4。
15. 《开国方略》，木版，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
16. 《满洲源流考》，木版，出版地点不详，1777年。
17. 《平定罗刹方略》，常书等编，木版，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
18. 同书，载何秋涛编著的《朔方备乘》，出版地点不详，1881年，卷首5—8。
19. 萨英额：《吉林外记》，共十卷，载《皇朝藩属舆地丛书》，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第2册。
20. 西清：《黑龙江外记》，共八卷，载《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2册。
21.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一卷，载《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2册。
22. 《皇朝一统志省府厅州县全图》，出版地点不详，1734年。
23. 《黑龙江通志》，手稿，藏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C-89，据1953年编目为№223，卷1—6。
24. 《吉林通志》，出版地点不详，1898年，卷1—122。
25. 《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故宫博物院版，1932年，一册，卷1—10①。
26. 《钦定八旗通志》，木版，出版地点不详，1799年。
27. 《钦定盛京通志》，出版地点不详，1782年。
28. 《盛京通志》，木版，出版地点不详，1684年版。
29.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佐藤四郎出版，大连，1935年。
30. 《御制大清会典》，木版，出版地点不详，1732年。
31. 杨宾：《柳边纪略》，共五卷，上海，1936年。

著作

俄文

32. 《Акт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т. IV, 1861, №5.
《历史文献》，第4卷，1861年，№5。
33.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перед Нерчинским миром 1689 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57, №5.
В. А. 亚历山大罗夫：《1689年尼布楚和约前的俄中经济关系史》，载《历史问题》，1957年，№5。
34.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Начал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освоения рус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Забайкалья и Приамурья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VII в.),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68, №2.
В. А. 亚历山大罗夫：《俄国居民对外贝加尔地区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开端(十七世纪后半叶)》，载《苏联历史》，1968年，№2。
35.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х рубежах, М., 1969.
В. А. 亚历山大罗夫：《俄罗斯在远东边界上》，莫斯科，1969年。
36. Алексеев М. П., Сибирь в известиях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путешест-

① 按该版本为一册，卷1—4。——译者

венников и писателей. Введение, текс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Второе издание, Иркутск, 1941.

М. П. 阿列克谢耶夫: «西欧旅行家和作家笔下的西伯利亚», 引言、正文和注释, 第2版, 伊尔库次克, 1941年。

37. «Амур и Уссурийский край», б. м., 1885.

«阿穆尔与乌苏里边区», 出版地点不详, 1885年。

38. Андреев А.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ю Сибири. Вып. 1. XVII в.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М.—Л., 1960.

А. И. 安德烈耶夫: «西伯利亚史科学纲要», 第一分册, 十七世纪, 第二版,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60年。

39. Андреев Г.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Приамурскому краю, Оренбург, 1866.

Г. И. 安德烈耶夫: «阿穆尔沿岸地区资料集», 奥伦堡, 1866年。

40. Андреев М., Из истории с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XVII—XX вв.), — «Северная Азия», 1925, №5—6.

М. 安德烈耶夫: «俄中关系史»(十七—二十世纪), 载《北亚》, 1925年, 第5—6期。

41. Андриевич В. К.,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Забайкалья от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1762 г., СПб., 1887.

В. К. 安德里耶维奇: «外贝加尔地区简史(从远古至1762年)», 圣彼得堡, 1887年。

42. Арсеньев В. К., Быт и характер народностей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кра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8.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 «远东地区各民族的生活与性格»,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8年。

43. Арсеньев Ю. В.,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казания о реке Амуре, — «Извест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82, №4.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 «阿穆尔河传说的起源», 载《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通报》, 1882年, 第四期。

44.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из бывшего Пек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дворца. Письма, полученные из России в годы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Кан-си и Цянь-лун», Бэйпин, 1936.

«故宫俄文史料», (清康、乾年间俄国来文原档), 北平, 1936年。

45. Базилевич К. В., В гостях у богдыха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я русских в Китай в XVII в.), Л., 1927.

К. В. 巴齐列维奇: «在博格德汗那里作客(十七世纪俄人旅华记)», 列宁格勒, 1927年。

46. Базилевич К. В.,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от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конца XVII века, М., 1950.

К. В. 巴齐列维奇: «苏联史(从远古至十七世纪末)», 莫斯科, 1950年。

47. Банников А. Г.,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в Монголию и Се-

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М., 1954.

А. Г. 斑尼科夫: «早年俄人旅游蒙古与华北记», 第2版, 莫斯科, 1954年。

48. Баянш-Каменский Н. Ф.,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 дел между Российским и Китай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с 1619 по 1792-й год. Составлено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хранящимся в Московском архив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коллеги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 1792—1803 году, Казань, 1882.
Н. Ф. 班蒂什-卡姆斯基: «1619—1792年俄中两国外交文件汇编» (根据1792—1803年莫斯科国家外交委员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构成), 喀山, 1882年。
49. Баранов А., Изучение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ости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 «Бюллетень Музея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края», №1, Харбин, 1923.
А. 巴拉诺夫: «满洲古文物研究», 载《东省研究会博物馆通报》, №1, 哈尔滨, 1923年。
50. Бартенев Ю. П., Герои Албазина и Даурской земли, —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99, кн. 1—4.
Ю. П. 巴尔捷涅夫: «阿尔巴津和达斡尔地区的英雄们», 载《俄罗斯档案》, 1899年, 1—4册。
51.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Казаки на Амуре, Л., 1925.
С. В. 巴赫鲁申: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 列宁格勒, 1925年。
52. Бахрушин С. 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 и XVII вв., М., 1928.
С. В. 巴赫鲁申: «十六、十七世纪西伯利亚殖民史纲», 莫斯科, 1928年。
53. Берх В. Н., Подвиги боярского сына Ерофея Хабарова и водворение россиян при берегах реки Амура, — «Сын Отечества», 1821, № IX—XII.
В. Н. 别尔赫: «军役贵族叶罗菲·哈巴罗夫的功绩与俄罗斯人在阿穆尔河两岸的定居», 载《祖国之子》, 1821年, №9—12。
54. [Бичурин Н. Я.], 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ии, сочиненные монахом Иакинфом, СПб., 1828年, т. 1—2.
[Н. Я. 比丘林]《雅金夫神甫的蒙古札记》, 圣彼得堡, 1828年, 卷1—2。
55. Бичурин Н. Я., 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Восточной и Срединной Азии. Сост. Л. Н. Гумилев и М. Ф. Хван, Чебоксары, 1960.
Н. Я. 比丘林: «东亚与中亚历史地理资料汇编», Л. Н. 古米列夫与 М. Ф. 赫凡辑, 切鲍克萨雷, 1960年。
56. Бичурин Н. Я.,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двух частях, Пекин, 1910.
Н. Я. 比丘林: «中华帝国综述», 两卷集, 北京, 1910年。
57. Богданов Н. Н.,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Верхнеудинск, 1927.

- Н. Н. 鲍格丹诺夫:《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历史概要》, 上乌丁斯克, 1927年。
58. Бокщанин А. А., Китай и страны Южных морей, М., 1968.
А. А. 鲍克夏宁:《中国与南海诸国》, 莫斯科, 1968年。
59. Болобан А. П., Колонизацио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Маньчжурии и Монголии, Харбин, 1910.
А. П. 鲍洛班:《中国、满洲与蒙古的殖民问题》, 哈尔滨, 1910年。
60. Бруннерт И. С., Гагельстром В. В.,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Китая, Пекин, 1910.
И. С. 布伦纳特与 В. В. 哈杰斯特鲁姆合著:《现代中国的政治机构》, 北京, 1910年。
61. Васильев А. П.,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е каза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Чита, 1917, т. 1.
А. П. 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哥萨克(历史概要)》, 赤塔, 1917年, 第一卷。
62.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История и древно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част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от X до XIII в.,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перевода китайских известий о киданях, чжурчжэнях и монголо-татарах, СПб., 1857.
В. П. 瓦西里耶夫:《十——十三世纪中亚东部历史与古迹。附有 关于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鞑靼人的中文资料译文》, 圣彼得堡, 1857年。
63.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Описа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 отд. оттиск из «Записо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Пб., 1857, кн. XII.
В. П. 瓦西里耶夫:《满洲志》, 单行本取材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 圣彼得堡, 1857年, 第12册。
64.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Приведение в покорность монголов при начале Дайчжу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из Шен-у-цзи), СПб., 1883.
В. П. 瓦西里耶夫:《清初绥服蒙古记》(摘译自《圣武记》), 圣彼得堡, 1883年。
65. Васильев В. П., Примечания к первому выпуску китайской хрестоматии, СПб., 1896.
В. П. 瓦西里耶夫:《中国文选第一册注释》, 圣彼得堡, 1896年。
66. Васильев В. П., Сведения о маньчжурах во времена династий Юань и Мин, СПб., 1883.
В. П. 瓦西里耶夫:《元明两朝关于满洲人的记载》, 圣彼得堡, 1883年。
67. Васютинский В., О русских посольствах в XVII в., СПб., 1860.
В. 瓦休京斯基:《十七世纪的俄罗斯使节团》, 圣彼得堡, 1860年。
68. Венюков М., Обзорение реки Уссури, — «Вест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859, ч. XXV, отд. 2.
М. 维纽科夫:《乌苏里江概述》, 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 1859年, 第25卷, 第2分册。

69. Вилков О. Н., Китайские товары на Тобольском рынке в XVII в.,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8, №1.
О. Н. 维尔科夫: «十七世纪托博尔斯克市场上的中国商品», 载《苏联历史》, 1958年, 第1期。
70. Воробьев В. В., Города южной ч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сторико-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Иркутск, 1959.
В. В. 沃罗比约夫: «东西伯利亚南部诸城 (历史地理概要)», 伊尔库次克, 1959年。
71. Воробьев П. И.,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XVII веке, —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АН СССР», 1936. т. XVII.
П. И. 沃罗比约夫: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 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著作集》, 1936年, 第17卷。
72. Вяткин Р. В.,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Вестник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59, №10.
Р. В. 维亚特金与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编: «俄中关系史文件», 载《科学院通报》, 1959年, 第10期。
73. Вяткин Р. В.,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 КНР,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63, №10.
Р. В. 维亚特金与 С. Л. 齐赫文斯基合著: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科学的某些问题», 载《历史问题》, 1963年, 第10期。
74. Г.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о местах, лежащих при реке Амуре, — «Сибир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824, ч. 1—3.
Г. С.: «阿穆尔河沿岸各地的历史与统计资料», 载《西伯利亚时报》, 1824年, 第1—3卷。
75. Гамель И. Х., Англичане в России в XVI — XVII столетиях, —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т. VIII, 1865, СПб., №1.
И. Х. 加麦利: «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人在俄国», 载《皇家科学院学报》, 第8卷, 1865年, 圣彼得堡, 第1期。
76. Гербиллон [Жербийон], Описание и известие о великой Татарии, — «Календарь, или месяцеслов», СПб., 1744, 1745, 1746, 1747.
张诚[热尔比昂], 《大鞑靼记略》, 载《历书或日历》, 圣彼得堡, 1744年, 1745年, 1746年, 1747年。
77. [Годунов П. И.], Ведомость о кит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и о глубокой Индии, —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 искусства», СХХХIII, 1899.
[П. И. 戈杜诺夫]: «中国地方与神秘的印度调查记», 载《文物》, 第133期, 1899年。
78. Головачев П. М., Росс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СПб., 1904.
П. М. 戈洛瓦切夫: «俄国在远东》, 圣彼得堡, 1904年。
79. Горский В., Начало и первые дел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дома, —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СПб., 1852, т. 1.

В. 戈尔斯基:《满洲王朝的崛起与最初的事业》,载《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圣彼得堡,1852年,第1卷。

80. Горский В.,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а ныне царствующей в Китае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и имени народа маньчжу, —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 т. 1. СПб., 1852.

В. 戈尔斯基:《论当今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始祖与满族一名的起源》,载《俄国驻北京传教士团著作集》,第1卷,圣彼得堡,1852年。

81. Горяинов С.,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Бутхаского фудутунств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3.

С. 戈里亚伊诺夫:《布特哈副都统辖区研究资料集》,符拉迪沃斯托克,1903年。

82. Граве В. В., Китайцы, корейцы и японцы в Приамурье, СПб., 1912.

В. В. 格拉维:《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与日本人》,圣彼得堡,1912年。

83.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Северная Азия», 1926, №5—6.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远东(历史概要)》,载《北亚》,1926年,第5—6期。

84.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Заселение Маньчжурии,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жизнь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29, №7—8, №44.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满洲的移民》,载《远东经济生活》,1929年,第7—8期,第44期。

85.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К изучению истории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по данным археологии, — «Юбилейный сборник Общества изучения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1916.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根据考古资料对阿穆尔边区史的研究》,载《阿穆尔边区研究协会纪念文集》,1916年。

86.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Маньчжуры, их язык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фотоци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и фотоли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таблиц,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2.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满洲人及其语言和文字》,(附照相铸版和照相石版一览表),符拉迪沃斯托克,1912年。

87.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Очерк засе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амурья, —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1911, №7.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中国阿穆尔沿岸地区移民概况》,载《亚细亚时报》,1911年,第7期。

88.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Основы китайской колонизации Маньчжурии, — «Труд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колониаль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М., 1926, ч. 2.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中国殖民满洲之基础》,载《俄国殖民问题研究所著作集》,莫斯科,1926年,第2卷。

89.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 Описание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СПб., 1894.

- Г. Е. 格鲁姆-格爾日麦洛: 《阿穆尔省志》, 圣彼得堡, 1894 年。
90.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О датировке грамот императоров М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царю Михаилу Федоровичу,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60, №1.
- Н. Ф. 杰米多娃与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著: 《明朝皇帝致沙皇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的国书年代考》, 载《东方学问题》, 1960 年, 第 1 期。
91. Демидова Н. Ф.,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в Китае («Роспись» И. Петлина и статейный список Ф. И. Байкова), М., 1966.
- Н. Ф. 杰米多娃与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著: 《第一批使华的俄国外交官 (И. 彼特林的《手稿》与 Ф. И. 巴伊科夫的《出使报告》)》, 莫斯科, 1966 年。
92. Л. А. Дербов, Начало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и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Саратов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ени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ыпуск, т. 68, 1960.
- Л. А. 杰尔鲍夫: 《俄国同中国的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开端》, 载《国立车尔尼雪夫斯基萨拉托夫大学学报》, 历史专辑, 第 68 卷, 1960 年。
93. Долгих Б. О., Рассел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 «Советская этнография», 1952, №3.
- Б. О. 多尔基赫: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分佈》, 载《苏联人种学》, 1952 年, 第 3 期。
94. Долгих Б. О., Родовой и 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 «Труды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 Н. Н.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 новая серия, т. 55, М., 1960.
- Б. О. 多尔基赫: 《十七世纪西伯利亚各民族的氏族与部落组成》, 载《Н. Н. 米克卢霍-马克莱人种学研究所著作集》, 新版, 第 55 卷, 莫斯科, 1960 年。
95. «Дополнения к Акта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т. VI, СПб., 1857.
- 《历史文献补编》, 第 6 卷, 圣彼得堡, 1857 年。
96. Думан Л. И., Агра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ц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яньцзяне в конце XVIII в., М. — Л., 1936.
- Л. И. 杜曼: 《十八世纪末清政府在新疆的土地政策》,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6 年。
97. [Думан Л. И.],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Лекции, читанные доцентом Л. И. Думан, ч. II. Китай в XVII—XVIII вв., Л., 1938.
- [Л. И. 杜曼]: 《中国近代史》, Л. И. 杜曼副教授的讲义, 第 2 卷, 《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 列宁格勒, 1938 年。
98. Дюгальд Ж. Б.,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хр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Тата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б.], 1774, т. 1, ч. 1—2.
- J. В. 迪荷尔德: 《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地区地理、历史、编年史概述》, [圣彼

- 得堡], 1774年, 第1卷, 第1—2册。
99. Ермаченко И. С., Политик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в отношении Южной и Север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 XVII веке, М., 1973.
И. С. 叶尔马钦科: «十七世纪满清王朝对南蒙与北蒙的政策», 莫斯科, 1973年。
100. Ефимов Г. В.,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я в конце XIX в. в китай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ах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 «Памяти академика Игнатия Юлиановича Крачковского», Л., 1958.
Г. В. 叶菲莫夫: «中国史料和著作中的十九世纪末中国国际关系史», 载《伊·尤·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纪念文集》, 列宁格勒, 1958年。
101. Ефимов Г. В., Историко-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источник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Л., 1965.
Г. В. 叶菲莫夫: «中国近代史史料和著作的历史书目简评», 列宁格勒, 1965年。
102. Желуховцева Е. Ф., Материалы мест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XVII—XIX вв.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 архиве», —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60, №4.
Е. Ф. 热洛霍夫采娃: «满洲档案中的十七—十九世纪中国东北地方机构资料», 载《东方学问题》, 1960年, 第4期。
103. Захаров И. И., Полный маньчжур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Пб., 1875.
И. И. 扎哈罗夫: «满俄大辞典», 圣彼得堡, 1875年。
104. Зензино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реке Амуре. Шесть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х, что в конце XVII столетия течение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принадлежало русским, — «Москвитянин», 1843, вып. VII.
津齐诺夫: «阿穆尔河的历史回忆 (证明十七世纪末阿穆尔河下游属于俄罗斯人的六份历史文件)», 载《莫斯科人》, 1843年, 第7期。
105. Златкин И. Я., История 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1635—1758), М., 1964.
И. Я. 兹拉特金: «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年)», 莫斯科, 1964年。
106. Златкин И. Я., О роли России в борьбе монголов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отив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завоевателей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VIII в.,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1952, вып. VI.
И. Я. 兹拉特金: «论俄国在十七世纪后半叶——十八世纪前半叶蒙古人反抗满洲征服者、争取独立斗争中的作用», 载《东方学研究所简讯》, 1952年, 第6期。
107. Золотарев А. М., Из истории народов Амур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37, №7.
А. М. 佐洛塔列夫: «阿穆尔各族人民史», 载《历史杂志》, 1937年, 第7期。

108. Золотарев А. М., Родовой строй и религия ульчей, Хабаровск, 1939.
А. М. 佐洛塔列夫:《乌里契人的氏族制度与宗教》, 哈巴罗夫斯克, 1939年。
109. [Ивановский А.], Конспект истории Маньчжурии (лекции преп. А. Ивановского за 2-ое полугодие 1886/87 академич. года). Курс 1, СПб., 1887.
[А. 伊凡诺夫斯基]《满洲史纲要》(А. 伊凡诺夫斯基教师在 1886/87 学年第 2 学期讲义), 第一讲, 圣彼得堡, 1887 年。
11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акты о подвигах Е. Хабарова на Амуре в 1649—1651 гг.», — «Журнал для воспитанников военно-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й», 1840, №VIIII.
《关于叶·哈巴罗夫 1649—1651 年在阿穆尔河上所建树的功勋的历史文件》载《军事院校学员杂志》, 1840 年, 第 8 期。
111. «История дипломатии», М., 1959, т. 1.
《外交史》, 莫斯科, 1959 年, 第 1 卷。
112.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ом первый. Древняя Сибирь», Л., 1968.
《西伯利亚史(自远古至现代)》五卷集, 第 1 卷, 《古代西伯利亚》, 列宁格勒, 1968 年。
113. Кабанов П. И., Амурский вопрос,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959.
П. И. 卡巴诺夫:《阿穆尔问题》, 布拉戈维申斯克, 1959 年。
114. Кафаров (Палладий), Извлечения из китайской книги «Шен-ву-цзи», Пекин, 1907.
卡卡罗夫(巴拉第):《〈圣武记〉摘译》, 北京, 1907 年。
115. Кафаров (Паллад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 в связи с историей Маньчжурии, — «Записк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1879, VIII, вып. 2.
卡卡罗夫(巴拉第):《与满洲史有关的乌苏里地区简史》, 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报》, 1879 年, 第 8 卷, 第 2 期。
116. Кириллов А.,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Амурской и Приморской областей,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1884.
А. 基里洛夫:《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地理统计辞典》, 布拉戈维申斯克, 1884 年。
117. К[омаров] М [атвей], Старинные письм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к Российскому государю, М., 1787.
马[特维伊]·科[马罗夫]:《中国皇帝致俄国君主的古老书信》。莫斯科, 1787 年。
118. Копылов А. Н.,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Яковлева 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 —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59, №4.
А. Н. 科佩洛夫与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著:《评 П. Т. 雅科夫列娃的〈1689

- 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载《苏联历史》,1959年,第4期。
119. Корсак А. К., Истори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Казань, 1857.
А. К. 科尔萨克:《俄中贸易关系历史统计述评》,喀山,1857年。
120. Кречегова М.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XVII—XVIII веках, — «Куль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античного мира и Востока», М. — Л., 1958.
М. Н. 克列切托娃:《十七—十八世纪俄中贸易关系史》,载《古希腊罗马与东方的文化艺术》,莫斯科—列宁格勒,1958年。
121. Кудрявцев Ф. А., Восстания крестьян, посадских и казако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в конце XVII в., Иркутск, 1939.
Ф. А. 库德里亚夫采夫:《十七世纪末东西伯利亚农民、工商业者和哥萨克的起义》,伊尔库次克,1939年。
122. Курдюков И. Ф.,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1695—1720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57, №3.
И. Ф. 库尔久科夫:《俄中关系史(1695—1720年)》,载《历史档案》,1957年,第3期。
123. Курц Б. Г.,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XVII—XVIII вв., —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7, №19.
Б. Г. 库尔茨:《十七—十八世纪俄中两国的殖民政策》,载《新东方》,1927年,第19期。
124. Курц Б.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сношения в XVI, XVII 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х, Харьков, 1929.
Б. Г. 库尔茨:《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俄中关系》,哈尔科夫,1929年。
125. Кюнер Н. В., Китайские известия о народах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61.
Н. В. 丘涅尔:《中国关于南西伯利亚、中亚和远东各民族的记载》,莫斯科,1961年。
126. Кюнер Н. В., Китайск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о народах Севера,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ческих наук», вып. 1, Л., 1949.
Н. В. 丘涅尔:《关于北方各民族的中国历史资料》,载《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东方学专辑》,第1期,列宁格勒,1949年。
127. Кюнер Н. В.,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Дальним Востоком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царствования дома Романовых, 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14.
Н. В. 丘涅尔:《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期间俄国同远东的关系》,第2版,符拉迪沃斯托克,1914年。
128. Лебедева Е. П., Расселение 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родов в конце XVI—начале XVII веков, —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

- 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мени А. И. Герцена», т. 132, 1957.
- Е. П. 列别杰娃: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满洲各氏族的分布», 载《国立列宁格勒 А. И. 赫尔岑师范学院学报》, 第 132 卷, 1957 年。
129. Липский А. Н., Маньчжуро-туягусы русской части бассейна Амура, Хабаровск, 1926.
- А. Н. 利普斯基: «阿穆尔河流域俄国部分的满洲-通古斯人», 哈巴罗夫斯克, 1926 年。
130. Лопатин И. А., Гольды амурские, уссурийские и сунгарийские,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2.
- И. А. 洛帕京: «阿穆尔河、乌苏里江和松花江的果尔特人»,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2 年。
131. Любимов А. Е., Некоторые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XVII веке, —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XI, 1912, вып. II—III.
- А. Е. 柳比莫夫: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上的几份满洲文件», 载《俄罗斯考古协会东方分会学报》, 第 21 卷, 1912 年, 第 2—3 期。
132. Любимов А. Е., Новые маньчжур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с 1680 по 1812 г., —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 1909.
- А. Е. 柳比莫夫: «1680—1812 年阿穆尔边区史的满洲新材料», 载《俄罗斯考古协会东方分会学报》, 第 19 卷, 1909 年。
133. Мамышев Вс., Генерал-фельдмаршал и генерал-адмирал граф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Головин, СПб., 1910.
- Вс. 马梅舍夫: «陆海军上将费·阿·戈洛文伯爵», 圣彼得堡, 1910 年。
134. [Мартенс Ф. Ф.],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 Ф. Мартенса. С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и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автора перевел В. Телесницкий, СПб., 1881.
- [Ф. Ф. 马尔堡斯]: «俄国与中国», Ф. Ф. 马尔堡斯的历史政治研究, В. 捷列斯尼茨基据作者修改与增订本翻译, 圣彼得堡, 1881 年。
135.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од ред. Д. Б. Лезина и Г. П. Калужной, М., 1962.
- «国际法», Д. Б. 列文与 Г. П. 卡柳日娜主编, 莫斯科, 1962 年。
136.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кн. 1—2, М., 1973.
- «远东国际关系», 第 1—2 册, 莫斯科, 1973 年。
137. Мелихов Г. В., «Бацц гунчжи»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источник по воен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аньчжуров, — сб. «Стран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М., 1967.

- Г. В. 麦利霍夫: «关于满洲人军事组织的主要文献资料——〈八旗通志〉», 载《远东与东南亚各国: 历史与经济》文集, 莫斯科, 1967年。
138. Мелихов Г. В., «Да Цин личао шилу» ка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источник, — сб. «Стран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М., 1969.
- Г. В. 麦利霍夫: «历史文献资料——〈大清历朝实录〉», 载《远东与东南亚各国: 历史与经济问题》一书, 莫斯科, 1969年。
139. Мелихов Г. В., К истории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маньчжуров в бассейн Верхнего Амура в 80-х годах XVII в., — 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 Г. В. 麦利霍夫: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满洲人进入阿穆尔河上游流域史», 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 莫斯科, 1966年。
140. Мелихов Г. В.,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консолидации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 при Нурхаце и Абахэе (1591—1644 гг.), — 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 Г. В. 麦利霍夫: «努尔哈赤和阿巴海时代 (1591—1644年) 满族聚集的某些问题», 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 莫斯科, 1966年。
141. Мелихов Г. В., Политика Ми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чжурчженей (1403—1413 гг.), — сб. «Китай и соседи», М., 1969.
- Г. В. 麦利霍夫: «明帝国对女真人的政策 (1403—1413年)», 载《中国和邻国》文集, 莫斯科, 1969年。
142. Мелихов Г. В., Ян Бинь и его труд «Любянь цзильюэ», — сб. «Стран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М., 1967.
- Г. В. 麦利霍夫: «杨宾及其著作〈柳边纪略〉», 载《远东与东南亚各国: 历史与经济》文集, 莫斯科, 1967年。
143. Мелихов Г.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власти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феодалов в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м Китае, — в кн.: «Татаро-монголы в Азии и Европе», М., 1970.
- Г. В. 麦利霍夫: «蒙古封建政权在中国东北的建立», 载《鞑靼蒙古人在亚洲与欧洲》一书, 莫斯科, 1970年。
144. Мелихов Г. В., Система военного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осемью знаменами как част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ппарата маньчжуров, — в кн.: «Стран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М., 1970.
- Г. В. 麦利霍夫: «八旗军事民政管理体系是满洲人国家机关的一部分», 载《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历史与经济问题)》一书, 莫斯科, 1970年。
145. Миллер Г. Ф., История Сибири, т. 1, М., 1937.
- Г. Ф. 米勒: «西伯利亚史», 第1卷, 莫斯科, 1937年。
146.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о поездке в Китай Ивана Пет-

- лина,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1.
- В. С. Мясников: «关于伊凡·彼特林旅华的新文件», 载《苏联汉学》, 1958年, 第1期。
14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Русские архив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о завоевании Китая маньчжурами (1618—1690 гг.), — сб.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 В. С. Мясников: «关于满洲人征服中国 (1618—1690年) 的俄国档案文献资料», 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 莫斯科, 1966年。
148. Назаров А. Ю., Маньчжуры, дауры и китайцы Ам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 «Известия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IV, 1883, вып. 1—2.
- А. Ю. Нацаров: «阿穆尔省的满洲人、达斡尔人和汉人», 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 第14卷, 1883年, 第1—2期。
149. «Новые данные о посольстве Сеиткула Аблина» (Публикация, вступительная статья и примечания А. М. Филиппова),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1958, №2.
- 《关于谢·阿勃林出使的新资料》(А. М. 菲利波夫发表, 并为之撰写引言和注释), 载《苏联汉学》, 1958年, 第2期。
150. Оглоблин Н. Н., Обзорные столбцы и книг Сибирского приказа (1592—1768), М., 1898, ч. I—IV.
- Н. Н. 奥格洛勃林: «西伯利亚衙门卷宗评述 (1592—1768年)», 莫斯科, 1898年, 第1—4卷。
151. Оглоблин Н. Н., Сибирские дипломаты XVII в. (Посольские статейные списки), СПб., 1891.
- Н. Н. 奥格洛勃林: «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外交家(使团出使报告)», 圣彼得堡, 1891年。
152.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до начала XIX столетия, ч. 1, Иркутск, 1920—1924; ч. 2, вып. 1. Завоевание русскими Сибири,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4.
- В.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 «西伯利亚史纲(至十九世纪初)», 第1卷, 伊尔库次克, 1920—1924年; 第2卷, 第1分册, «俄罗斯人对西伯利亚的征服»,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4年。
153.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Туземное и русское земледелие на Амуре в XVII в., — «Труд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III, №4,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 В.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 «十七世纪阿穆尔河上土著人和俄罗斯人的农业», 载《国立远东大学著作集》, 第3集, №4,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7年。
154.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Далекое прошлое Приморь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59.
- 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59年。
155.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от эпохи

- первобыт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 1—2,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67.
- 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苏联远东历史(由原始时代到今天)», 第1—2卷, 符拉迪沃斯托克, 1967年。
156.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под ред. Шан Юэ, М., 1959.
《中国历史纲要》, 尚钺编, 莫斯科, 1959年。
157. Паршин В., Поездка в Забайкальский край, ч. 1—2, М., 1844.
В. 帕尔申: «外贝加尔边区游记», 第1—2卷, 莫斯科, 1844年。
158. Паткаюв С. К., Опыт географии и статистики тунгусских племен Сибири, ч. 1—2, СПб., 1906.
С. К. 帕特卡诺夫: «西伯利亚各通古斯部落的地理与统计初探», 卷1—2, 圣彼得堡, 1906年。
159. Позднеев А. М.,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э», СПб., 1883.
А. М. 波兹德涅耶夫: «蒙古编年史(元朝秘史)», 圣彼得堡, 1883年。
160. Потапов Л. П., Народы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53.
Л. П. 波塔波夫: «南西伯利亚各民族», 新西伯利亚城, 1953年。
161. Потоцкий С. П., Из истории торгов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 с Сивыцзяном в XVII—XX столетия, М., 1948.
С. П. 波托茨基: «十七—二十世纪俄国同新疆的贸易与经济关系史», 莫斯科, 1948年。
162. «Приамурье. Факты, цифры, наблюдения», М., 1909.
《阿穆尔沿岸地区. 事实、数字、见闻》, 莫斯科, 1909年。
163. Путята, Походы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ов Да-ц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с картою), — «Сборник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и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Азии», 1890.
普佳塔: «大清始祖远征记》(附地图一张), 载《亚洲地理、地形与统计材料汇编》, 1890年。
164. Пуцилло М., Указатель статьям и рукописям, относящимся до Сибири и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м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главному архиву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М., 1879.
М. 普齐洛: «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西伯利亚的文章和手稿索引》, 莫斯科, 1879年。
165. Рабич Г., К вопросу о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XIII—XVII вв., — «Сборник студенческих работ Среднеазиа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ып. XV, се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Ташкент, 1956.
Г. 拉比奇: «十三—十七世纪俄中关系问题》, 载《国立中亚大学大学生论文集》, 第15册, 历史特辑, 塔什干, 1956年。
166. [Риттер К.],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Азии Карла Риттера, перевод и дополнения П. Семенова, ч. 1, СПб., 1856.
[К. 里特尔]《卡尔·里特尔的《亚洲自然地理学》》, П. 谢苗诺夫翻译与补

- 充。第1册,圣彼得堡,1856年。
167. Рудаков А. В., История развития военных сил в Гиринь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 «Извест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т. V, 1902; т. VI, 1903.
А. В. 鲁达科夫:《吉林省军事力量发展史》,载《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通报》,符拉迪沃斯托克,第5卷,1902年;第6卷,1903年。
168. Рудаков А. В.,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Гиринь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1644—1902 гг.), т. 1. Перевод Цзи-линь тун-чжи с дополнениями по новей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официальным данным,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03.
А. В. 鲁达科夫:《吉林省中国文化史资料(1644—1902年)》,第1卷,《吉林通志》的译本,并曾根据最新中国官方资料加以补充,符拉迪沃斯托克,1903年。
169. Рудаков А.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Маньчжурии, стеклогр. б. м., б. г.
А. В. 鲁达科夫:《满洲的政治机构》,玻璃版印刷,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
170. «Русские мореходы в Ледовитом и Тихом океанах.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 Л., 1952.
《北冰洋和太平洋上的俄国航海家。文件汇编》,莫斯科—列宁格勒,1952年。
171.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89—1916.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Сост. П. Е. Скачков и В. С. Мясников, М., 1958.
《1689—1916年俄中关系。正式文件集》,П. Е. 斯卡奇科夫与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合编,莫斯科,1958年。
172.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1, 1608—1683», М., 1969.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件集,第一卷,1608—1683年》,莫斯科,1969年。
17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т. 2, 1686—1691», М., 1972.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件集,第二卷,1686—1691年》,莫斯科,1972年。
174.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607—1636.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9.
《俄蒙关系,1607—1636年,文件集》,莫斯科,1959年。
175. Рябов Н.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XVII—XIX вв.), Хабаровск, 1939.
Н. И. 里亚鲍夫:《远东史纲(十七—十九世纪)》,哈巴罗夫斯克,1939年。
176. Рябов Н. И., Штейн М. Г.,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Дальнего

- Востока. XVII—начало XX в., Хабаровск, 1958.
- Н. И. 里亚鲍夫与 М. Г. 施坦因: «俄国远东史纲 (十七世纪——二十世纪初)», 哈巴罗夫斯克, 1958 年。
177. Саввин В. П.,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 Л., 1930.
- В. П. 萨文: «沙皇俄国与苏联同中国的相互关系»,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0 年。
178. Селезнев М. С., Документы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рхиве древних актов,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59, №2.
- М. С. 谢列兹涅夫: «北京古代文献档案馆收藏的俄文文件», 载《历史档案》, 1959 年, 第 2 期。
179. Сельский И., Последняя осада Албазина маньчжуро-китайцами в 1687 г. (Из древних списко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китайс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 «Записки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V, 1858, отд. 1.
- И. 谢利斯基: «1687 年满汉军队对阿尔巴津的最后一次围攻 (取材于东西伯利亚古代抄本及中国文献资料)», 载《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学报》, 第 5 卷, 1858 年, 第 1 分册。
180. Скалон В. Н., Русские 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 —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Сибири в XVII в., М., 1951.
- В. Н. 斯卡隆: «俄国新土地发现者——十七世纪西伯利亚考察者», 莫斯科, 1951 年。
- 180a.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Очерк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М., 1957.
-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 «苏中经济关系纲要», 莫斯科, 1957 年。
181. Спасский Г. И., Сведения русских о реке Амуре в XVII столетии, — «Вестник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ч. VII, 1853, отд. 11.
- Г. И. 斯巴斯基: «俄罗斯人关于十七世纪阿穆尔河的资料», 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 第 7 卷, 1853 年, 第 11 分册。
- 182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 Китая рус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Николая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 Дорожный дневник, СПб., 1882.
- [Н. Г. 斯帕法里]: «1675 年俄国使臣尼古拉·斯帕法里穿越西伯利亚旅行记, 自托博尔斯克至涅尔琴斯克和中国边界, 旅途日记», 圣彼得堡, 1882 年。
183. Спафарий Николай Милеску, Сибирь и Китай, Кишинев, 1960.
- 斯帕法里·尼古拉·米列斯库: «西伯利亚与中国», 基什尼奥夫, 1960 年。
184. Таксами И. М., Нивхи, Л., 1967.
- И. М. 塔克萨米: «尼福赫人», 列宁格勒, 1967 年。
185.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 сб. «Мань-

чжурское влады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е», М., 1966.

С. Л. 齐赫文斯基: «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 载《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文集, 莫斯科, 1966年。

186. Титов А., Сибирь в XVII в., М., 1890.

А. 季托夫: «十七世纪的西伯利亚», 莫斯科, 1890年。

187. Титов А., Из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старины, — «Вестник Азии», №3, 1910.

А. 季托夫: «满洲往事摘记», 载《亚细亚时报》, 第3期, 1910年。

188. Трусевич Х., Посоль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ношения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до XIX в.), М., 1882.

Х. 特鲁谢维奇: «俄中外交与贸易关系(十九世纪以前)», 莫斯科, 1882年。

189. [Тулищ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посланника к калмыцкому Аюке-хану с описанием земель и обычае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ерезел 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 СПб., 1782.

[图理琛]: «中国使臣往见卡尔梅克阿玉奇汗旅行记及俄罗斯风土见闻录» (即《异域录》——译者), 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译, 圣彼得堡, 1782年。

190. Фишер И. Э.,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сам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ибири до завоевания сей земля российским оружием, СПб., 1774.

И. Э. 菲舍尔: «西伯利亚史(自最早发现西伯利亚之时起, 到俄罗斯人以武力征服该地止)», 圣彼得堡, 1774年。

191. Хаптаев П. Т.,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Улан-Удэ, 1942.

П. Т. 哈普塔耶夫: «布里亚特蒙古人民简史», 乌兰乌德, 1942年。

192. Хариский К. А., Китай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Хабаровск—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27.

К. А. 哈里斯基: «中国(从远古至现代)», 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 1927年。

193. Хвостов В. М., Китайский «счет по реестру» и правда истории,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64, №10.

В. М. 赫沃斯托夫: «中国的“账目清单”与历史真相», 载《国际生活》, 1964年, 第10期。

194.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М. Д., Несколько замечаний касательно давности и законности обладания Маньчжурскою династиею левым берегом Амура, рукопись, — Рукописный отдел Всесоюз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имени В. И. Ленина, фонд 273, картон №22, ед. кр. №6.

М. Д. 赫拉波维茨基: «关于满洲王朝占有阿穆尔河左岸的时间及其合法性的几点看法。手稿», 全苏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 第273号全宗, 第22号篋, 保存单位 №6。

195.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XV—XVIII вв.)», М., 1960.

《中国中世纪史文选(十五—十八世纪)», 莫斯科, 1960年。

196. «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т. 1, М., 1963.
«近代史文选», 第1卷, 莫斯科, 1963年。
197. Чебоксаров Н. Н., Северные китайцы и их соседи, —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этнографии», вып. 5, 1949.
Н. Н. 切鲍克斯罗夫: «北方中国人及其邻人», 载《人种学研究所简讯》, 第5册, 1949年。
198. Чжан Му, Хэ Цю-тао, Мэнгу ю му цзи. 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П. С. Попова, СПб., 1896.
张穆、何秋涛合著①: «蒙古游牧记», П. С. 波波夫译自中文, 圣彼得堡, 1896年。
199. Чулков Н., Хабаров Е. П., —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98, №1.
Н. 丘尔科夫: «Е. П. 哈巴罗夫传», 载《俄罗斯档案》, 1898年, 第1期。
200. Шавкунов Э.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охай и памятники его культуры в Приморье, Л., 1968.
Э. В. 沙夫库诺夫: «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迹», 列宁格勒, 1968年。
201. Шастина Н. П.,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е пос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XVII в., М., 1958.
Н. П. 沙斯季娜: «十七世纪俄蒙外交关系», 莫斯科, 1958年。
202. Шренк Л. И., Об инородцах Амурского края, т. 1—3, СПб., 1883—1885.
Л. И. 什连克: «阿穆尔地区的异族人», 第1—3卷, 圣彼得堡, 1883—1885年。
203. Шгейфельд Д. Н., Русское дело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с XVII века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Харбин, 1910.
Д. Н. 施坦因费尔德: «俄国在满洲的事业(从十七世纪到现代)», 哈尔滨, 1910年。
204. Штернберг Л. Я., Гвляки, ороци, гольды, негидальцы, айны. Статьи и материалы, Хабаровск, 1933.
Л. Я. 施坦堡: «基立亚克人、奥罗奇人、果尔特人、涅吉达尔人、爱奴人。论文与资料», 哈巴罗夫斯克, 1933年。
205. Шумахер П. В., К истории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Амура. Наши с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1848—1860, —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78, №11.
П. В. 舒马赫尔: «阿穆尔河兼并史, 我国同中国的关系。1848—1860年», 载《俄罗斯档案》, 1878年, 第11期。
206. Шумахер П. В., Наши с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1567—1805).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79, №6.
П. В. 舒马赫尔: «我国同中国的关系(1567—1805年), 历史纲要», 载《俄罗

① 按应为“张穆撰写, 何秋涛校订”。——译者

- 斯档案», 1879年, 第6期。
207. Шумахер П. В., Первые русские поселения на Сибирском Востоке. — «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879, №5.
П. В. 舒马赫尔: «西伯利亚东部的第一批俄国村屯», 载《俄罗斯档案》, 1879年, 第5期。
208.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земледелия Сибири (XVII в.), М., 1956.
В. И. 顺科夫: «西伯利亚农业史纲要(十七世纪)», 莫斯科, 1956年。
209. Шунков В. И.,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ибири в XVII — начале XVIII веков, М. — Л., 1946.
В. И. 顺科夫: «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初西伯利亚殖民史纲要»,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46年。
210. Щебенков В. Г., Об источникеведении и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XVII в., —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 истори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М., 1958.
В. Г. 谢宾科夫: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文献学与史科学», 载《远东历史论文集》, 莫斯科, 1958年。
211. Щебенков В. Г.,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 М., 1960.
В. Г. 谢宾科夫: «十七世纪俄中关系», 莫斯科, 1960年。
212. Шукин Н., История реки Амура, составленная из обнародова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отдельный оттиск из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х ведомостей», 1856, №19, 21, 26 и 30.
Н. 休金: «阿穆尔河史。据根已公布的文献资料写成», 单行本取材于《圣彼得堡新闻》, 1856年, 第19, 21, 26和30期。
213. Энгельфельд В.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ношениях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в XVII и XVIII вв.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 «Вестник Маньчжурии», 1929, №3.
В. В. 恩格利费利德: «十七和十八世纪俄中关系问题(历史资料)», 载《东省杂志》, 1929年, 第3期。
214. Юзефович Г., Договоры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торговые, СПб., 1869.
Г. 尤泽福维奇: «俄国与东方各国条约集——政治条约与贸易条约», 圣彼得堡, 1869年。
215. Яковлев Л. М., Задачи и проблемы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в связи с историко-этнологическим изучением страны, — «Записки Харби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ей и этнографов», 1946, №1.
Л. М. 雅科夫夫: «与研究满洲地区历史人种学有关的满洲人类学的任务与问题», 载《哈尔滨自然科学与人种学学会学报》, 1946年, 第1期。
216. Яковлева П. Т., Первый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 1689 г., М., 1958.

П. Т. 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莫斯科,1958年。

217. Яковлева П. 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через Нерчинск накануне и после заключения Нерчин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689 г.), — сб.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в XVII—XVIII вв.», М., 1966.

П. Т. 雅科夫列娃:《尼布楚条约签订(1689年)前后通过涅尔琴斯克的俄中贸易》,载《十七—十八世纪俄国的国际联系》文集,莫斯科,1966年。

中文

218. 王德翰:《清史杂考》,北京,1957年。
219. 魏源:《圣武记》,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
220. 顾颉刚:《中国疆域史》,北平,1938年。
221.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上卷,北京,1958年。
222.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北京,1961年。
223. 《东北史纲》,出版地点不详,玻璃版印刷,1932—1933年。
224. 李洵:《明清史》,北京,1956年。
225. 李廷玉:《东三省边务辑要》,出版地点不详,1917年。
226. 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附有英语书名: Ling, Johnson, The 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南京,1934年。
227. 罗振玉:《太祖高皇帝实录汇编三种》①,〔北平〕,1933年。
228. 刘大年:《中国近代史诸问题》,论文集,北京,1965年。
229. 刘选民:《明初之经营东北》,载《大公报》,1936年,12月25日。
230. 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燕京学报》,1938年,第23期。
231. 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大连,1947年。
232. 莫东寅:《清族史论丛》,北京,1958年。
233. 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载《金陵学报》,卷3,1933年,第2期。
234. 谢国桢:《清开国史料考》,北平,1931年。
235. 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上海,1948年。
236. 薛仲三与欧阳颐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附有英语书名: A Sino-Western Calendar for Two Thousand Years 1—2000 AD〕,北京,1956年。
237. 徐兆奎:《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北京,1959年。
238. 范文澜:《对武汉的史学工作者的报告》,载《新建设》,1962年,第1期。
239.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上海,1935年。
240. 何秋涛:《北徼汇编》,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不详。
241. 何秋涛:《朔方备乘》,出版地点不详,1881年。
242. 蒋廷黻:《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北平,1932年。
243. 赵泉澄:《清代地理沿革表》,上海,1955年。顾颉刚校订并作序。
244.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蓀等编,上海,1935年。

① 按应为《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1932年,大连史料整理处影印,四册一函。——译者

245. 《中国历史纲要》，北京，1954年。
 246. 《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分册，台北，1959年。
 247. 申丕瀾(根据音译)：《二百五十年来的中苏外交关系小史》，上海，1947年。

日文

248. Акивару Фувакоси, Карта Сибири эпохи Канси (1662—1722). О старинной карте из коллекции Ло Чжэнь-юя, — «То: хо: гакухо», 1963, №33.
 船越秋成：《康熙时代(1662—1722年)的西伯利亚地图，该罗振玉收藏的一张古代地图》，载《东方学报》，1963年，第33期。
 249. Вада Сэй, То:аси кэнкю:. Мансю:хэн (То:ё бунко ронсо: №37), Токио, 1955.
 和田清：《东亚史研究：满洲篇》，发表于《东洋文库》，A集，№37，东京，1955年。
 250. Идзуми Рэндзи, Нью: кан дзэн-но синтё, Дайрэн, 1924.
 泉连治：《侵入中国内地前之清王朝》，大连，1924年。
 251. Иицука Сю, Ро рё: энкокурю: ко:тихо: ни окэру но:гё, — «Тоё:», т. 27, 1924, №3.
 饭塚修：《俄国所占领的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农业》，载《东洋》杂志，第27卷，1924年，第3期。
 252.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Маммо: сэн то синя хонбу-го-но канкэй, — «Маммо:», т. 5, 1924, №1, 2.
 稻叶岩吉：《满洲、蒙古、朝鲜同中国本土之关系》，载《满蒙》杂志，第5卷，1924年，第1、2期。
 253.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Мансю:коку си цу:рон, Токио, 1935.
 稻叶岩吉：《满洲国史总纲》，东京，1935年。
 254.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Миндай рё:дун-но хэнсё, — в сб. «Мансю: тири ржиси кэнкю: хо:коку», вып. 2, б. м., 1913.
 稻叶岩吉：《明代辽东边墙》，载《满洲地理历史科学通报》文集，第2册，出版地点不详，1913年。
 255.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Синсё: -но кё:ики, — в сб. «Мансю: тири ржиси кэнкю: хо: коку», вып. 2, б. м., 1913.
 稻叶岩吉：《清初的疆域》，载《满洲地理历史科学通报》文集，第2册，出版地点不详，1913年。
 256.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Синтё: дзэнси, т. 1—3, Токио, 1914.
 稻叶岩吉：《清朝全史》，第1—3卷①，东京，1914年。
 257.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Дзо:тэй Мансю: хатгацу си, Токио, 1935.
 稻叶岩吉：《增订满洲发达史》，东京，1935年。
 258.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Тё:сэн рицзунтё:ни окэру рё:ди-но мансю: сюп-

① 按《清朝全史》日文原文分上下两卷，中译文分两册四卷。——译者

- пэй, — «Аокю: гакусю:», 1934, №15—16.
- 稻叶岩吉: «朝鲜李倭王临朝时期满洲人对朝鲜的两次军事远征», 载《青丘学丛》杂志, 1934年, 第15, 16期。
259.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Яно Дзинъити, Тё:сэн. Мансю: си, — в кн.: «Сэкай рэкиси тайхэ», №11, Токио, 1935.
- 稻叶岩吉与矢野仁一合著: «朝鲜史·满洲史», 载《世界历史大系》, №11, 东京, 1935年。
260. Исида Канносукэ, Ро Син канкэй-но дайити ки, — «Гайко: дзихо:», т. 29, 1914, №1—4.
- 石田堪之助: «早期俄清关系», 载《外交时报》, 第29卷, 1914年, 第1—4期。
261. Исимура Тэйити, Гэн Мин Син сиряку, Токио, 1877.
- 石村太一: «元明清史略考», 东京, 1877年。
262. Ито Есикацу, Гайкан мансю:си, Токио, 1942.
- 伊藤义一: «满洲史概观», 东京, 1942年。
263. Кодама Ёити, Сорэн Эй Бэй фуцу сиряку-но ато-о казримитэ, Токио, 1938.
- 儿玉世一: «苏、英、美、法侵入远东史», 东京, 1938年。
264. Комура Хансё:, Син-но сисо-то дэнсэцу, — «Маммо:», т. 12, 1931, №1.
- 小村幡书: «关于清朝始祖的传说», 载《满蒙》杂志, 第12卷, 1931年, 第1期。
265. «Мансю: рэкиси тири», под ред. Куракити Сиратори, т. 1—2, Токио, 1913.
- 《满洲历史地理》, 白鸟仓吉监修, 第1—2卷, 东京, 1913年。
266. Масуда Ко:, Мансин сиряку, Токио, 1880.
- 益田功: «满清王朝简史», 东京, 1880年。
267. Нумада Ёрисука, Нитиман-но кодай кокко, Токио, 1933.
- 沼田依透: «日满之古代外交关系», 东京, 1933年。
268. Огава Такудзи, Сина рэкиси тири кэнкю, Киото, 1928, т. 1—2.
- 小川卓尔: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京都, 1928年, 第1—2卷。
269. Омори Гансэки, Тё:ман хатгати си. Хокусан оёби то: ман хэн. О: мори Гансэки хэн, Сост. Омори Гансэки, Осака, 1933.
- 大森岩石: «朝鲜、满洲发达史。北朝鲜与东满部分》, 大森岩石编纂, 大阪, 1933年。
270. Отаги Мацуо, Нибучу дзё: яку-о цу: дзитэ митаро сё:ки-но росин канкэй, — «То:а кэнкю:сё хо:», 1943, №24.
- 小多枝松雄: «通过尼布楚条约看早期俄中关系》, 载《东亚研究学报》, 1943年, 第24期。
271. Сиратори Куракити, Мансю: миндзоку-но како, — «То:ё дзихо:», 1909, №133.
- 白鸟仓吉: «满族之过去》, 载《东洋学报》, 1909年, 第133期。

272. Танабэ Райдзю, Сиятё: хассё:ти-но дэнсэцу, — «Маммо:», т. 7, 1926, №1.

田道賴造:《关于清朝发祥地之传说》,载《满蒙》杂志,第7卷,1926年,第1期。

273. Харуаки Иманиси, Мансю: гобу-но яти, — «Сисэн», 1956, №4.

今西治章:《满洲五部之遗址》,载《史渊》杂志,1956年,第4期。

274. Янай Ватару, Вада Сэй хэн, Го:ё докуси тидзу, Токио, 1941.

屋内渡:《远东史历史地图集》,东京,1941年。

275. Яно Дзиньити, Квндай сина гайко:си, Токио, 1930.

矢野仁一:《近代中国外交史》,东京,1930年。

276. Яно Дзиньити, Квндай сина си, Киото, 1926.

矢野仁一:《近代中国史》,京都,1926年。

277. Яно Дзиньити, Мансю:кинлай си, Токио, 1941.

矢野仁一:《满洲近代史》,东京,1941年。

278. Яно Дзиньити, Мансю:коку рэкиси, Токио, 1933.

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东京,1933年。

279. Яно Дзиньити, Сиятё:си, [Токио], б. г.

矢野仁一:《清朝史》,[东京],出版年代不详。

西文

280. Baddeley J. F., Russia, Mongolia, China, vol. 1, 11, London, 1919.

J. F. 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上下卷,伦敦,1919年。

281. Biggerstaff K., Some Notes on the Tung-Hua Lu and the Shih-lu,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July 1939, vol. 4, №2.

K. 比格斯塔夫:《〈东华录〉与〈实录〉浅释》,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1939年7月,第4卷,第2期。

282. Cahen G.,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689—1730), Paris, 1912.

G. 加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巴黎,1912年。

283. Cahen G., 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s by Gaston Cahen, Shanghai, 1914.

G. 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上海,1914年。

284. Chen Agnes Fang-chih, Chinese Frontier Diplomacy: 1) The Coming of the Russians and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2) Kiakhta Boundar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IV (February 1949).

艾格尼丝·陈芳芝:《中国的边界外交: 1. 俄国人的到来与尼布楚条约; 2. 恰克图边界条约和协定》,载《燕京大学社会研究杂志》,第4期,(1949年2月)。

285. Chen Vincent,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Hague, 1966.

- 文森特·陈：《十七世纪中俄关系》，海牙，1966年。
286. Ch'eng T'ien-Fa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troduction* by J. L. Stuart, Washington, 1957.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J. L. 斯图尔特作序，华盛顿，1957年。
287. Childe V. Gordon, *Lecture: Discoveries in Siberia and Eastern Russia in Relation to Prehistoric Conne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1952.
蔡尔德·V. 戈登：《在西伯利亚和东俄关于中国和西方史前交往的发现》，讲义，剑桥大学，1952年。
288. «Ch'ing administrative terms. A translation of the terminology of the six boards with explanatory notes», Cambridge, 1961.
《清代行政术语：六部译名及释义》，剑桥大学，1961年。
289. Clyde P. H., *International Rivalries in Manchuria 1689—1922*, s. l., 1928.
P. H. 克莱德：《在满洲的国际竞争（1689—1922）》，出版地点不详，1928年。
290. Crofts A., Buchanan P., *A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58.
A. 克罗夫茨和 P. 布坎南合著：《远东史》，纽约，1958年。
291. Dallin D. J., *The rise of Russia in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9.
D. J. 戴林：《俄国在亚洲的兴起》，新哈芬，耶鲁大学出版，1949年。
292. Doolin Dennis J., *Territorial Claims in Sino-Soviet Conflict. Documents and Analysis*, Stanford, 1965.
J. 杜林·丹尼斯：《中苏冲突中的领土主张。文件及分析》，斯坦福，1965年。
293. Douglas R., *Europe and the Far East 1506—1912*, Cambridge, 1913.
R. 道格拉斯：《欧洲与远东（1506—1912年）》，剑桥大学，1913年。
294. Drew W. J.,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17th Century*, — «Central Asian Review», vol. XVI, 1968, №2.
W. J. 德鲁：《十七世纪中俄关系》，载《中亚杂志》，第16卷，1968年，第2期。
295. Dudgeon J. H.,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Ecclesiast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of Russia with China, Drawn Chiefly from Original Sources*, Peking, 1872.
J. H. 达吉恩：《俄中教会、政治与贸易关系史略》，主要引用原始资料，北京，1872年。
296. Eckel P. E., *The Far East Since 1500*, New York, 1947.
P. E. 埃克尔：《1500年以来的远东》，纽约，1947年。
297. Evans J. E., *Russia on the Amur, 1643—89*, Washington, 1952.
J. E. 埃文斯：《俄国人在阿穆尔河上（1643—1689年）》，华盛顿，1952年。
298. *A History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vol. 1, Fairbank J., Reischauer

- E.,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Boston, 1960; vol. 2, J. Fairbank, E. Reischauer, A. Craig, *East Asia.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Boston, 1965.
- 费正清和 E. 赖肖尔合著:《东亚文明史》,第1卷,东亚。费正清、E. 赖肖尔和 A. 克雷格合著:《伟大的传统》,波士顿,1960年,第2卷。《东亚·现代的变化》,波士顿,1965年。
299. Fairbank J. K., Teng S. Y., *On the Ch'ing Tributary System*,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41. vol. 6, №2.
- 费正清和 S. Y. 邓合著:《清朝进贡制度》,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1941年,第2期,第6卷。
300. Fairbank J. K., Teng S. Y., *The Types and Uses of Ch'ing Documents*, —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 January, 1940, №1.
- 费正清和 S. Y. 邓合著:《清代文献的种类及使用法》,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第5卷,1940年1月,第1期。
301. Fuchs W., *Beiträge zur mandjurischen Bibliographie und Literatur*, Tokyo, 1936.
- W. 富克斯:《对满洲图书目录和文献的贡献》,东京,1936年。
302. Fuchs W., *Der Tod des Kaisers Abahai in J. 1626*, *«Monumenta Serica»*, 1. 1935.
- W. 富克斯:《阿巴海皇帝之死(1626年7月)》,载《科学论文集》,第1卷,1935年。
303. Fuchs W., *The Long White Mountain in Manchuria*, — *«China Journal»*, 1933, №18.
- W. 富克斯:《满洲的长白山》,载《中国杂志》,1933年,第18期。
304. Fuchs W., *The Personal Chronicle of the First Manchu Emperor*, — *«Pacific Affairs»*, 9 (1936).
- W. 富克斯:《第一个满洲皇帝的年谱》,载《太平洋事务》,第9期(1936年)。
305. Fuchs W., *Manjurica*, vol. 1, Peking, 1942.
- W. 富克斯:《有清一代》,第1卷,北京,1942年。
306. Fuchs W., *Zur Druckausgabe der Shih-lu der Manju-Dynastie*, — *«Monumenta Serica»*, 3, 1938.
- W. 富克斯:《关于清实录的印刷版本》——载《科学论文集》,第3卷,1938年。
307. Gale Esson M., *Some Chinese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North-Eastern Asia*, —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LXIV [1933].
- M. 盖尔·埃森:《研究东北亚的若干中文资料》,载《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杂志》,第64期[1933年]。
308. Gardner C. S., *Chinese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Mass., 1938.

- C. S. 加德纳:《中国传统历史编纂法》,马萨诸塞州剑桥市,1938年。
309. Gibert Lucien,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géographique de la Mandchourie, Hongkong, 1934.
吉伯特·吕西安:《满洲历史地理辞典》,香港,1934年。
310. Giles H. A., China and the Manch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2.
H. A. 贾尔斯:《中国与满洲人》,剑桥大学出版,1912年。
311. Golder F. A., Russian Expansion on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F. A. 戈尔德:《俄国人在太平洋上的扩张(1641—1850年)》,克利夫兰,1914年。
312. Harrison E. J., Peace or War East of Baikal? 1910.
E. J. 哈里森:《贝加尔东部是和是战?》,1910年。
313. Du Halde J. B.,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vol. 1—4, s. 1., 1736.
J. B. 迪·荷尔德:《中华帝国和鞑靼中国地理、历史、年表、政治及自然志》,第1—4卷,出版地点不详,1736年。
314. Hsien Pao Cha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1644—1911), Baltimore, 1925.
乔新保(根据音译):《中国的政府(1644—1911年)》,巴尔的摩,1925年。
315. Hummel Arthur W.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vol. 1—2, Washington, 1943.
W. 赫梅尔·阿瑟(恒安石)编:《清代中国名人录(1644—1912年)》,第1,2卷,华盛顿,1943年。
316. Jackson W. A. D., The Russo-Chinese Borderlands Zone of Peaceful Contact or Potential Conflict, Princeton, 1962.
W. A. D. 杰克逊:《和平相处或者潜伏着冲突的俄中边境地区》,普林斯顿,1962年。
317. Ken Shen Weigh, Ph. D., Russo-Chinese diplomacy, Shanghai, 1928.
哲学博士韦星生(根据音译):《俄中外交》,上海,1928年。
318. Klaproth M. J., Mémoires relatifs a l'Asie, contenant des recherches historiques, géographiques et philologiques sur les peuples de l'Orient, Paris, 1824, vol. 1—3.
M. J. 克拉普罗特:《关于亚洲及厄鲁特人历史、地理、语文的考查报告》,巴黎,1824年,第1—3卷。
319. Korff S. A., Russia in the Far East, Washington, 1921. ψ
S. A. 科夫:《俄国人在远东》,华盛顿,1921年。
320. Krausse A.,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 1558—1899, New York, 1899.

- A. 克劳斯:《俄国人在亚洲》,史料与研究(1558—1899年),纽约,1899年。
321. Lattimore O.,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London — New York, 1940.
- O. 拉铁摩尔:《中国的内亚边界》,伦敦—纽约,1940年。
322. Lattimore O.,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 New York, 1934.
- O. 拉铁摩尔:《满洲的蒙古人》,纽约,1934年。
323. Lattimore O.,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 *Collected Papers*, 1925—1958, Paris — La Haye, 1962.
- O. 拉铁摩尔:《边界历史研究》,论文集(1925—1958年),巴黎—海牙,1962年。
324. Lattimore O., *The Unknown Frontier of Manchuria*, —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33.
- O. 拉铁摩尔:《满洲的未知边界》,载《外交事务》,1933年1月。
325. Li Chi Ph. D., *Manchuria in History*, Peiping, 1932.
- 哲学博士李奇(根据音译):《历史上的满洲》,北平,1932年。
326. Lobanov-Rostovsky A.,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1933.
- A.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俄国与亚洲》,纽约,1933年。
327. Michael F.,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Frontier and Bureaucracy as Interacting Forces in the Chinese Empire*, Baltimore, 1942.
- F. 迈克尔:《满洲在中国统治的起始。边界问题和官僚机构在中华帝国的交替作用》,巴尔的摩,1942年。
328. Morgan Evan, *Times and Manners in the Age of the Emperor K'ang Hsi*, —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69 (1938).
- 摩根·埃文:《康熙皇帝时期的时代特征和风俗习尚》,载《皇家亚洲协会华北分会杂志》,第69期(1938年)。
329. Morse H. B.,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3, London, 1910.
- H. B. 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1—3卷,伦敦,1910年。
330. Parker E. H., *A Thousand Years of the Tartars*, Shanghai—Hongkong Yokohama, 1895.
- E. H. 帕克:《鞑靼人的一千年》,上海—香港—横滨,1895年。
331. Pavlovsky M. N., *Chinese-Rus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49.
- M. N. 巴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纽约,1949年。
332. Penkala M., *A Correlated History of the Far East: China, Corea, Japan*, Tuttle, 1966.
- M. 彭卡拉:《远东相互关系史:中国、朝鲜、日本》,塔特尔,1966年。
333. Petrov V. P., *Manchuria as an Objectiv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1954.
- V. P. 彼得罗夫:《满洲是俄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华盛顿,1954年。

334. Ravenstein, *The Russians of the Amur, its Discovery,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London, 1861.
拉文斯坦:《阿穆尔的俄国人,它的发现、征服和开发》,伦敦,1861年。
335. Rockhill W. W., *Diplomatic Audiences at the Court of China*, London, 1905.
W. W. 罗克希尔:《外使晋谒中国朝廷记》,伦敦,1905年。
336. Ross J., *The Manchus or the Reigning Dynasty of China. Their Rise and Progress*, London, 1880.
J. 罗斯:《满洲人——当今中国的皇朝。他们的勃兴与发展》,伦敦,1880年。
337. Sebe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The Diary of Thomas Pereira, S. J., Rome, 1961.*
J. 塞比斯:《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谈判(1689年)》。徐日升日记,罗马,耶稣教会,1961年。
338. Shirokogoroff S. M., *Social Organisation of the Manchus*, Shanghai, 1924.
S. M. 沙伊罗科罗夫:《满洲人的社会结构》,上海,1924年。
339. Shirokogoroff S. M.,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angu, Shanghai, 1929.*
S. M. 沙伊罗科罗夫:《北通古斯人的社会结构》,上海,1929年。
340. Stauffer R. B., *Manchuria as a Political Entity: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a Major Region of China, Including its Relations to China Proper*, Minneapolis, 1954.
R. B. 斯托弗:《满洲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主要地区的政府和政策,包括对中国本土的关系》,明尼亚波利斯,1954年。
341. Wada Sei, *The Natives of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Amur River as Represented in Chinese Records, —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1938, №1.*
和田清:《中国史书中记载的阿穆尔河下游的土著》,载《东洋文库研究部学报》,1938年,第1期。
342. Tung Chi-ming, *An Outline History of China*, Peking, 1959, 1965.
佟池名(根据音译):《中国史纲》,北京,1959年,1965年。
343. Wales H. G. Q., *The Sacred Mountain in the Old Asiatic Religion,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53, 23.*
H. G. Q. 韦尔斯:《古代亚洲宗教中的圣山》,载《皇家亚洲协会杂志》,1953年,第23期。
344. Yakhontoff V. A.,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31.
V. A. 亚洪托夫:《俄国与苏联在远东》,纽约,1931年。

人名索引

- Абай 阿拜 46
Абатай 阿巴泰 61
Абахай (Тайцзун Вэньхуанди) 阿巴海(太宗文皇帝) 4—6, 15, 17, 32, 42, 44—47, 54—57, 59, 60, 61, 63, 64, 68, 71, 72, 75, 76, 79, 80, 122, 125, 128, 138, 193, 196, 197, 200—203
Аблин Сенткул 阿勃林·谢伊特库尔 102
Акинару Фунакоси 船越秋成 206
Аксёнка (О-жэ-со-му-кэ) 阿克先卡(鄂克索木果) 174
Алайдархань 阿赖达尔汉 64
Албаза 阿尔巴西 84, 201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В. А. 亚历山大罗夫 В. А. 13, 14, 131, 185, 190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царь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沙皇 96, 103
Алексей 见 Толбузин Алексей 条
Алиная 见 Арни 条
Амухулан 阿穆瑚琅 146
Аньчжуху 安珠瑚 106, 124, 172
Арни (Алиная) 阿尔尼(阿喇尼) 168, 186
Арсеньев В. К. 阿尔谢尼耶夫 В. К. 11
Аханихань 阿哈尼堪 69, 70
Аюка-хан 阿玉奇汗 122
Аюси 阿尤希 208
- Базилевич К. В. 巴齐列维奇 К. В. 11
Бай 拜 69
Байиньдали 拜音达里 38, 216
Байков Ф. И. 巴伊科夫 Ф. И. 13, 98
Байкэ 见 Бокэ 条
Баймодо 白莫多 190
Балдача (Бардаци) 巴尔达齐 58, 61, 63, 70, 72, 81, 129, 200—202, 213
Баньдарша (Баньдалиша) 班达尔沙 168, 173—175, 186, 187, 189
Баодай 宝岱 67
Баоланъа 包朗阿 30
Баоци 包奇 152, 153

- Баоши 宝实 30
Бардаця 见 Балдача 条
Бартеньев Ю. П. 巴尔坚涅夫 Ю. П. 207, 208
Бахай (Тахай) 巴海(塔海) 79, 89, 92, 101, 102, 123, 124, 136, 138, 144, 146, 169, 181, 208
Бахрушин С. В. 巴赫鲁申 С. В. 11
Баццилань 霸奇兰 59—61, 63
Башаньяланту 巴山郎图 70
Бодин 博定 171, 176, 177
Бойгонь 宝冈 96
Бокщанин А. А. 鲍克夏宁 А. А. 78, 200
Бокэ (Байкэ) 白克 167
Болицо 博里秋 167
Бомбогор 博穆博果尔 15, 65—71, 201, 202, 214
Бохай 渤海 197 (此系国名, 应列入<地名索引>——译者)
Боци 博奇 179
Бочжоку 博卓户 70
Бугулуй 白谷垒 200
Бухэда 布赫德 155
Бучжаньгай 布占泰 38—40, 215
Буянгу 布扬古 44, 45, 212
Буяндай 布颜代 200
Бэддлн Дж. 巴德雷 19
Бэйлэр 倍勒尔 156, 165
- Вадай 瓦代 68, 72
Валиху 瓦礼枯 138, 142, 144
Вангао 王果 29
Ванцзи 王机(住机) 216 (按应为王机碧或住机奴。俄作者以讹传讹, 把刘选民文中的错误抄到自己书中。——译者)
Ваньли 万历 198
Васильев В. П. 瓦西里耶夫 В. П. 9, 10, 199, 203
Вахаа 瓦哈纳 167
Вашань 瓦山 159, 160, 167, 207
Венюков Никифор 维纽科夫, 尼基菲尔 180
Власов Иван 弗拉索夫, 伊凡 170, 174
Вэй Юань 魏源 50, 106, 125, 196, 198, 217
Вэньбутэ 温布特 70
Вэньдай 温岱 152, 167, 168, 171
Вэньду 温都 67

Вяткин Р. В. 维亚特金 Р. В. 13

Гаврила 加夫里拉 165

Галдан 嘎尔丹 135, 189

Гантимур 根特木尔 20, 67, 96, 103, 121, 147, 148, 155, 180, 186, 187

Голдер Ф. А. 戈尔德 Ф. А. 18, 20, 21

Головин Ф. А. 戈洛文 Ф. А. 21, 188, 190, 191, 208, 209

Гопи 郭丕 159, 178, 207

Гордунь 郭尔敦 59—60

Горский В. 戈斯基 11, 104, 196—198

Гребенщиков А. В. 格列宾希科夫 А. В. 12

Гуансюй 光绪 50, 158, 187, 207①

Гурцида 贾尔机达 59

Гу Цэ-ган 顾頔刚 16, 17, 74, 192, 203

Гэлиньа 噶凌阿 68

Гэрту 嘎尔图 142, 143

Гэрцзю 嘎尔纠 64

Гэрци 葛尔气 33

Гэрчжусайтэр 噶尔珠塞特尔 200

Дархань 达尔罕 117

Дарханьси 达尔罕辖 43

Дачжуху 达朱户 56

Демидова Н. Ф. 杰米多娃 Н. Ф. 13, 98

Дербов Л. А. 杰尔鲍夫 Л. А. 13

Джайльс Х. 贾尔斯 Х. 19

Дин Мин-нань 丁名楠 192

Долгих Б. О. 多尔基赫 Б. О. 11, 12, 51—53, 93, 97, 200, 202

Доргонь 多尔衮 72, 73

Думан Л. И. 杜曼 Л. И. 11, 185

Думона 杜莫纳 59

Дунбао 佟宝 160, 173

Дуньо 董鄂 56

Дэшику 德世库 30

Екэшу 叶克书 68, 69, 203

Елэй 叶雷 64—67

Ефимов Г. В. 叶菲莫夫 Г. В. 196

① 只在原书第 50 页中出现过一次光绪,其余各页中均为“关保”。——译者

Желоховцева Е. Ф. 热洛霍夫采娃 Е. Ф. 203
Жербийон Жан Франсуа (Гербиллон) 张诚(张诚) 125, 208

Захаров И. И. 扎哈罗夫 И. И. 198
Зиновьев Дмитрий 季诺维耶夫, 德米特里 96, 206

Ибахань 伊巴汉 146, 147
Изанов Андрей 伊凡诺夫, 安德烈 95
Идао 伊道 208
Инаба Ивакити 稻叶岩吉 22, 23, 66, 69, 101, 105, 111, 210, 215
Иньту 殷图 57, 151
Исанъа 伊桑阿 136, 153
Исиной 亦失涅 95
Исунь 伊孙 69, 70
Ито Ёсикацу 伊藤义一 25
Ицзина 伊济纳 58
Ичанъа 宜昌阿 142

Кабанов П. И. 卡巴诺夫 П. И. 13, 97, 131
Канси (Шэнцзу Жэньхуанди) 康熙(圣祖仁皇帝) 4, 6—8, 15—17, 19—22, 25,
52, 91—93, 100, 102—104, 113, 114, 116, 122, 124, 125, 128, 129, 132, 134—164, 166
—183, 185—192, 196, 203, 204, 206—209, 216

Казн Г. 加恩 Г. 19, 140
Квашнин Иван 克瓦什宁, 伊凡 204
Клапрот 克拉普罗特 199
Копылов А. Н. 科佩洛夫 А. Н. 13
Крайг А. 克雷格 А. 20
Куймань 魁满 56
Кулмаметов Сейдяш 库尔马麦托夫, 谢伊佳什 102
Кусай 夸塞 187
Кэбэй 喀拜 59—60
Кэгэданъа 噶克当阿 154
Кэда 喀达 58
Кэзунихань 喀木尼汉 64, 67, 200, 202
Кэнабулу-дархань 克纳布鲁达尔汉 67
Кэргэсунь 克尔格孙 101
Кэръжу 噶尔珠 56
Кэцина 科奇纳 70
Кэчжу 喀住 58

Кэюэбулу 科约布鲁 70

Кюнер Н. В. 丘涅尔 Н. В. 14

Лавкай 拉夫卡伊 84

Ладунгэ 喇东格 59

Лайдаку (Лайтаку) 赖达库(赖塔库) 83

Лантань 郎坦 8, 21, 22, 54, 100, 135—137, 141, 142, 145, 149, 167, 168, 173—175,
186, 187—189, 191, 196, 199, 206, 207, 215

Ланьбай 兰拜 69

Латтимор О. 拉铁摩尔 О. 20, 111

Лебедева Е. П. 列别杰娃 Е. П. 12, 52, 53, 198

Леонтьев (Леонтиев) А. 列昂季耶夫 А. 207, 208

Лядуень 见 Лядуень-батуру 条

Лядуень-батуру 礼敦巴图鲁 30, 32

Лин Чунь-шэн 凌纯声 48, 53, 199

Линь Син-чжу 林兴珠 136, 166

Ли Цзы-чэн 李自成 73

Лолибай 罗里白 190

Лукэсу 鲁克素 211

Лэдэхун 见 Цэнло Лэдэхун 条

Любимов А. Е. 柳比莫夫 А. Е. 208

Лю Да-нянь 刘大年 192

Лю Сюань-минь 刘选民 18, 19, 28, 29, 34, 43, 50, 51, 54, 74, 111, 112, 197, 198,
210, 212, 214—216

Лючань 刘闾 30

Лю Чжао-ци 刘兆奇 167

Майкл Ф. 迈克尔 Ф. 43

Мала 马喇 146, 154—158, 164—167, 172, 175, 186, 187

Маньдай 满代 80

Маньпи 满丕 174

Маргань 嘛尔干 58

Маци 马齐 186, 189

Милованов Иван 米洛万诺夫, 伊凡 25

Мингай 明该 178 (此系俄作者杜撰出来的人名)

Миньлэчу 名勒出 204

Миньгай 明爱 132, 166

Миньганьдали 明安达礼 97, 100, 137, 161, 169, 207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царь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沙皇 13

Мо Дун-янь 莫东寅 18, 30, 196, 198

- Монгодей 见 Мэнгэдэ 条
Москвитин Иван 莫斯科维京, 伊凡 94
Мутай 穆泰 150
Мучэнгэ 穆成格 60
Мэнгэ-темур (Мэнгэму-дуду, Чжаоцзи Юаньхуанди) 孟哥帖木儿 (孟特穆都督, 肇基原皇帝〔按应为肇祖原皇帝——译者〕) 29, 30
Мэнсайр 蒙塞尔 72
Мэнгэму-дуду 见 Мэнгэ-темур 条
Мэнгэдэ (Монгодей) 孟額德(孟格德) 147, 207
Мясников В. С. 米亚斯尼科夫 В. С. 13, 79, 134, 185, 190, 192
- Намияр 纳米雅尔 155
Наньдию 南地攸 59
Нара 纳喇 41
Нартай 纳尔泰 57
Нацинъ 纳秦 171
Нигэли (Нихали) 尼哈里 101
Никан-вайлан 尼堪外兰 32, 33, 197
Никанъ 尼堪 46
Николай 见 Спафарий 条
Нихали 见 Нигэли 条
Ноцини 诺奇尼 70
Нурхаци (Тайцзу, Тайцзу Гаохуанди, Тайцзу Ухуанди, Хуанкао Тайцзу, 努尔哈赤(太祖, 太祖高皇帝, 太祖武皇帝, 皇考太祖)) 4, 5, 15, 17, 19, 22, 26, 28—30, 32—47, 62, 65, 66, 75, 79, 85, 117, 122, 125, 138, 193, 196—198, 200, 203, 212, 216, 217
Нэнтэ 能特 152
- Огородников В. И. 奥戈罗德尼科夫 В. И. 12, 51
О-кэ-со-му-кэ 见 Аксёнка 条
Осэ 鄂色 164, 190
Оуян И 欧阳颐 196
- Пашков Афанасий 巴什科夫, 阿法纳西 97
Перейра Томас 徐日升 208
Петлин Иван 彼特林, 伊凡 13
Плат 普拉特 199
Поцзили 波济里 58
Поярков Василий 波雅尔科夫, 瓦西里 17, 94, 204
Пэнчунь 彭春 8, 54, 100, 135—137, 142, 159, 167, 169, 170, 173, 215

- Рабич Г. 拉比奇 Г. 13
Равенштейн Ф. 拉文斯坦 Ф. 21
Рейшауэр Э. 赖肖尔 Э. 20
Росс Дж. 罗斯 Дж. 19, 29, 196, 197
Рудаков А. В. 鲁达科夫 А. В. 9, 121, 122, 208
Рябов Н. И. 里亚鲍夫 Н. И. 13
- Сабиту 萨必图 70
Сабсу 萨布素 52, 105, 136, 138, 143, 144, 146, 148—151, 153—155, 157—161, 164, 165, 167, 169—171, 173—175, 177, 180, 186, 189, 207
Садай 萨岱 63
Савньэ 萨芙额 4, 10
Сайбулуш 塞布垒 200
Салу 萨禄 70
Самшика 萨穆什喀 59—61, 63, 69—71
Сарудай 见 Шархуда 条
Сарцзю 萨尔纠 57
Сахай 萨海 160
Сахальянь 萨哈连 81
Се Го-чжэнь 谢国楨 88
Сергудай 见 Шархуда 条
Сибасибьянчу 锡宝锡篇丘 30 (按应为锡宝锡篇古——译者)
Сидали 席达里 64
Синна 星纳 68
Синцзу-дуду (Синцзу Чжихуанди, Фумань-дуду) 兴祖都督 (兴祖直皇帝, 福满都督) 30
Сигу 席图 57
Ситэку 席特库 64—66, 71, 72, 143
Сифу 希福 99, 100
Сицин 西清 4, 10
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斯拉德科夫斯基 М. И. 13
Солоси 索罗希 187
Сонготу (Созту) 索额图 25, 186—189, 208
Сосокэ 索琐科 80
Сохай 索海 69—71
Сочанга 索长阿 30
Созту 见 Сонготу 条
Спафарий Н. Г. (Николай Милеску, Николай) 斯帕法里 Н. Г. (尼古拉·米列斯库, 尼古拉) 25, 103, 180
Степанов Онуфрий 斯捷潘诺夫, 奥努夫里 12, 96, 97, 99—101, 125, 134, 204

Сурдунъа 苏尔东阿 36
Сэнгэ 僧格 79, 80
Сюань-хуанхоу 宣皇后 29
Сюе Чжун-сань 薛仲三 196
Сюй Чжао-куй 徐兆奎 18
Сюнькэло 硕翁科罗 43
Ся 夏 59
Сяньцзу Ихуанди 见 Такэши 条
Сяокэсэ 硕格色 174

Табугану 塔布他努 101
Тайцзу 见 Нурхацн 条
Тайцзу Гаохуанди 见 Нурхацн 条
Тайцзун Вэньхуанди 见 Абахай 条
Тайцзу Ухуанди 见 Нурхацн 条
Таксами Ч. М. 塔克萨米 Ч. М. 11
Такэши (Сяньцзу Ихуанди) 塔克世(显祖翼皇帝) 30, 197
Таньбу 谭布 69
Тахай 见 Бахай 条
Тачабяньгу 塔察篇古 30
Тогодай 托果代 65
Тоймо 妥义谟 30
Толбузин Алексей 托尔布津, 阿列克谢 165, 168, 174
Толга 托尔加 84
Толо 妥罗 30
Туйдохунь 图伊多浑 67, 96
Тун Гун-ган 见 Тунгоган 条
Туна 图纳 204
Тунгоган 佟国纲 186, 187, 189, 208
Туронча 图隆恰 84
Тяньмин 天命 42, 117
Тяньцун 天聪 58

Убахай (Убахай-батуру) 吴巴海(吴巴海巴图鲁) 55—57, 64—66, 69, 199
Укури 吴库礼 203
Умубурдай 乌木布尔代 174
Умуна 吴默纳 103—105, 109
Унеда 乌涅达 208 (应为温达——译者)
У Сань-гуй 吴三桂 73
У Чжэнь-чэнь 吴振臣 4, 9, 10, 102, 199

Уша 乌沙 167

Фаворов Иван 法沃罗夫, 伊凡 180

Федор 费奥多尔 157, 207

Фань Вэнь-лань 范文澜 192

Фобао 佛宝 142

Фокэто 佛可托 160

Фолунь 佛伦 168

Фосоно 佛索诺 215

Фукс В. 富克斯 В. 119

Фумань-дуду 见 Синцзу-дуду 条

Фэйянгу 费扬古 80

Фэньдали 分达里 55

Фэрбэнк Дж. 费正清 20

Хабаров Е. П. 哈巴罗夫 Е. П. 17, 54, 95, 96, 206, 216

Хайсэ 海色 95, 99, 100, 137

Хайта 海塔 101

Ханаур 哈纳乌尔 147

Харнский К. А. 哈尔恩斯基 К. А. 11

Храповицкий М. Д. 赫拉波维茨基 М. Д. 113, 132, 192

Хуанкао Тайцзу 见 Нурхаци 条

Хубуно 胡布诺 167

Хунь-батуру 洪巴图鲁 38

Хунци 洪吉 176, 178

Хэйдлай 海赖 200

Хэто 和托 69

Хэ Цю-тао 何秋涛 14—16, 66, 74, 197—202, 206, 207, 213, 214

Хэ Ю 何佑 161, 166, 167

Цзекань 界堪 30

Цзингурдай 荆古尔代 55, 56

Цзинцзу 见 Цзюечангань 条

Цзинь-тайши 金台石 44, 45, 211

Цзиоло Лэдэхун 觉罗勒德洪 141, 142

Цзиргалан 济尔哈朗 38

Цзисыха 济席哈 71, 72

Цзюечангань (Цзинцзу, Цзинцзу Ихуанди) 觉昌安(景祖, 景祖翼皇帝) 30, 32, 197

Цзян Тин-фу 蒋廷黻 17, 18, 21, 74, 140

Цилудэ 奇鲁德 70
Цилэли 奇勒里 69
Цинцзир 勤定吉尔 174
Цэцэн-хан (Чэчэнь-хан) 车臣汗(车臣汗) 135, 156
Цянтули 羌图里 58, 83
Цяньлун (Цянь-лун) 乾隆 53

Чаннин 常宁 168

Чан Шу 常书 7

Чаньбу 禅布 178

Черниговский Никифор 切尔尼戈夫斯基, 尼基弗尔 102, 134

Чжан Пэй-юй 张佩玉(音译) 186 (即张鹏翮——译者)

Чжанхуанди 见 Шуньчжи 条

Чжан Шан-сянь 张尚贤 89, 91, 105, 109, 203

Чжаоци Юаньхуанди 见 Мэнгэ-темур 条

Чжао Цюань-чэн 赵泉澄 17, 192, 202, 203

Чжацзи 谯奇 79

Чжихуанди 见 Синцзу-дуду 条

Чжобутуй 卓布退 70

Чжумара 朱玛喇 69, 202

Чингисхан 成吉思汗 28

Чжуни 褚库尼 68

Чундэ 崇德 23, 66, 68

Чуншань 充善 30

Чуянь 褚宴 30

Чэнь А. Фан-чжи 艾·陈芳芝 17, 20, 22, 112, 206

Чэнь В. 文·陈 17, 20—22, 112, 140, 199, 200, 206

Чэнь Цзин-инь 陈敬尹 88

Чэнь Ши-ань 陈世安 186

Чэчэнь-хан 见 Цэцэн-хан 条

Шархуда (Сарудай, Сергудай) 沙尔呼达(萨儿吴代, 沙尔虎达) 15, 60, 89, 99,
100, 123, 169, 181, 202, 203

Шицзу Чжанхуанди 见 Шуньчжи 条

Шренк Л. И. 什连克 Л. И. 12, 51, 199, 203, 204

Штейн М. Г. 斯坦因 М. Г. 13

Шунков В. И. 顺科夫 В. И. 130

Шуньхэло-батуру 顺科落巴图鲁 117

Шуньчжи (Шицзу Чжанхуанди) 顺治(世祖章皇帝) 4, 6, 72, 85, 87, 89, 98, 101,
102, 122, 127—129, 196, 203, 204

Шэнцзу Жэньхуанди 见 Канси 条

Эйду 額亦都 38, 39

Элуньтжаргуци 俄伦札尔固齐 67

Эргунь 额尔衮 30

Эрдому 俄尔多木 65, 66

Эрпэнь 额尔喷 70

Эрсай 额尔塞 150, 152

Эргунь 俄尔音 69

Юнчжэн 雍正 7

Яковлева П. Т. 雅科夫列娃 П. Т. 13, 94, 99, 114, 131, 132, 185, 186, 207, 208

Ян Бинь 杨宾 4, 9, 10, 85, 86, 88, 117, 125, 199, 204—206

Яно Дзиньити 矢野仁一 22—25, 111

Ярофейко 见 Хабаров Ерофей 条

Ярьжкин Петр 雅雷什金, 彼得 98

Яцива 雅齐纳 152, 167

Яцинь 雅钦 167

地名索引

- Авань 阿万路 210
Автономный округ Внутренняя Монголия 内蒙古自治区 3
Авунское 阿冯屯 97
Азия 亚洲 111
Айху 见 Айхунь 条
Айхунь (Айху, Хэйлуницзянчэн) 爱浑(艾虎·黑龙江城) 8, 65, 113, 116—118, 120, 132, 137, 138, 144, 145, 150, 152, 153, 166, 170—172, 177, 181, 206—208, 213, 214
Айхуцзян 见 Тумьньцзян 条
Акули 阿库里路 210
Акулихэ 阿库里河 210
Албазин ("Якса", Албаз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阿尔巴津("雅克萨", 阿尔巴津堡) 6, 8, 15, 16, 23, 52, 54, 73, 93, 95, 100, 102, 116, 130—132, 135—137, 139—142, 144—151, 153—170, 172—177, 179—181, 183—188, 190, 192, 195, 201, 204, 206, 207, 214, 215
Албазинский уезд 阿尔巴津县 131, 184, 194
Албазин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阿尔巴津督军辖区 131
Албазиха 阿尔巴西河 204
Алидай 阿里岱屯 63, 213
Аличань 阿里阐屯 70, 214
Альчука 见 Ачэн 条
Алэчукэчэн 见 Ачэн 条
Амгунь (Хэнгунь, Хэнкунь) 阿姆贡河(恒滚河, 恒滚河) 131, 132, 134, 154, 186
Амноккан 见 Ялуцзян 条
Амур (Сахальянь, Сахальянь-ула, Сахальяньхэ, Хэйлуницзян) 阿穆尔河(萨哈连, 萨哈连乌喇, 萨哈连河, 黑龙江) 6, 8, 11—13, 15, 16, 19—25, 27, 43, 44, 51—54, 61, 66, 69, 70, 72, 73, 75, 77, 83, 84, 92—103, 106, 111, 113, 114, 116, 118—120, 125, 128, 130—140, 143—148, 150—154, 157—164, 166, 168, 170—178, 181—183, 185—190, 193—195, 197—202, 204, 206—208, 212, 214, 217
Ам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地区(阿穆尔边区) 11, 12, 204
Анбань-тулакухэ 昂邦土拉库河 204
Андрюшкина 安德罗什金纳屯 130

- Аньбахэ 请巴河 214
Аньба-яхахэ (Аньбань-яхахэ, Большая Яхахэ) 昂邦牙哈河(昂邦牙哈河, 大牙哈河) 212
Аньба-ярхухэ 请巴-雅尔呼河 211
Аньтугуарцзя 安土瓜尔佳城 214—216, 217
Аньчулаку 见 Ачэн 条
Аньшань 鞍山 85
Аргу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额尔古纳堡 130
Аргунь (Элигуна) 额尔古纳(额尔古纳) 16, 131, 133, 155, 168, 188, 189
Арчукатунь 见 Ачэн 条
Асацзинь 阿萨津城 69, 70, 213
Ауминский улус 阿乌明乌卢斯 97
Ацзигэ-гулакухэ 阿脊革土拉库河 204
Ацзигэ-яхахэ (Малая Яхахэ) 阿济格-雅哈河(小雅哈河) 212
Ацзингахэ 阿济纳河 33
Ацилань 阿气兰城 211
Ачанский городок (Ачанский острог) 阿枪城(阿枪堡)(乌扎拉屯) 54, 95, 96, 99, 100, 216
Ачэн (Аньчулаку, Арчукатунь, Алэчукэчэн, Альчука) 阿城(安褚拉库, 阿尔楚哈屯, 阿勒楚喀城, 阿勒楚喀) 36, 113, 205, 210
- Байкал 贝加尔湖 66, 131
Байча 拜察山 168
Байшишань 白石山 211
Бандинский улус 班金乌卢斯 98
Баньцзайташань 半截塔山 211
Баонтунь 包衣屯 154
Барда 把尔达城 217
Бахана 巴哈纳 69, 214
Белые горы 见 Чанбопань 条
Бодунэ 伯都讷城 113, 118, 201, 203
Бохунь 播一混寨 216
Большая пустыня 大漠 108, 116
Большая Яхахэ 见 Аньба-Яхахэ 条
Большое Гэрдасу (Да Гэрдасу) 大噶里达苏屯(大噶里达苏屯) 213
Бохэли 博和里屯 70, 213
Бохэлихэ 博和里河 213
Бражнов улус 勃拉日诺夫乌卢斯 97
Буря (Нюмань) 布列亚河(牛满江) 43, 132, 154, 186
Буринсков улус 布林斯科夫乌卢斯 98

- Бурмадохэ 见 Бурмафухэ 条
Бурмафухэ (Бурмадохэ) 布尔马夫河(布尔马大河) 155, 207
Бу[фа]тэхаула 布[法]特哈乌喇 206
Буян улус 布扬乌卢斯 98
Бык 贝克河 98
Бэйгуань 北关 41
Бэйлян 北陵 203
Бэйпин 见 Пекин 条
- Вайсиъаньлин 见 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 条
Ванцзя 王甲城 210
Ванцихэ 旺清河(正文中为 Ванцихэ——译者) 211
Ващици 斡齐奇屯 213
Великая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ена (Великая стена) 长城 45, 112
Верхне-Монастырская 上修道院屯 130
Верхозейский острог 上结雅斯克堡 130, 131
Внутренний Китай 中国内地 73, 85, 87, 88, 93
Вонаньхэ 见 Онон 条
Восточная Монголия 东蒙古 21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94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见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条
Восточно-Сибир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东西伯利亚督军辖区 94
Восточный Хамалин хр. (Дахэйшань) 东哈马岭(大黑山) 214, 215
Вохэйхэ 握黑河 55
Вэйюаньпу 威远堡 37, 41, 106, 107, 205
Вэнголо 瓮郭落城 211
Вэньдохэ 温多河 65, 213
- Гайпинсянь 盖平县 92, 115
Гайцин 盖清屯 80
Гайчжоу 盖州 85, 89, 90
Гань 甘地 71, 213
Гаолиин 高丽营 216
Гаопиншалин 高平沙岭 90
Гирин (Ула, Улачэн, Ула-Гирин, Цзилинь, Цзилинь-ула, Цзилиньчэн, Чуаньчан, Юнцзичжоу) 吉林(乌拉, 乌拉城, 乌拉吉林, 吉林, 吉林乌拉, 吉林城, 船厂, 永吉州) 3, 4, 8—10, 22, 50, 52, 53, 88, 93, 102, 104, 105, 107, 111—117, 119, 123—125, 135—138, 141—145, 149—153, 166, 171, 175, 178, 186, 194, 203, 205, 211, 212, 215, 216
Гиринская провинция 吉林省 103, 108, 198

Гобжайское 戈勃扎伊屯 97
Гобор 果博尔屯 70
Гобугэр 见 Гэбор 条
Годо 郭多城 215
Горлос 郭尔罗斯 41, 82, 152
Граница ивовых тычин (Лютябянь) 柳条边(柳条边) 108, 115, 117, 118
«Граница отдельных тычин» “一条边” 89
Гуалар 挂喇尔屯 70
Гуаннин 广宁 89—91
Гуаннинсянь 广宁县 91, 115
Гуаннинфу 广宁府 91
Гуаннинчжоу 广宁州 91
Гуанчэн 广城 85
Гуйгударов городок 古伊古达尔城 206
Гуйфу 归复 89
Гулэ 古勒 197, 215, 217
Гулэшань 古勒山 214, 217
Гунун 固浓屯 63
Гэбор (Гобугэр) 郭博勒屯(果布噶尔屯) 63, 213
Гэньхэ 根河 155
Гэрдасу 噶勒达苏屯 63, 213
Гэрдасунь 噶勒达逊屯 70, 213

Да-Гэрдасу 见 Большое Гэрдасу 条
Далинхэ 大凌河 89
Далинхэ, р. 见 Цинхэ 条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3, 4, 11—14, 16, 18, 26, 28, 48, 50, 54, 66, 74, 78, 93, 94, 99,
110, 120, 139, 140, 164, 173, 192, 194, 195, 197
Дамулушань 达穆鲁山 41 (按应为达喜穆鲁山——译者)
Дамьянь 闾门 65
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见 Даурия 条
Даурия (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达斡尔地区(达斡尔土地) 13, 101, 132, 159, 170, 191
Дахэишань 见 Восточный Хамалин хребет 条
Дачкиево 达奇基耶沃屯 97
Дашэвзулачэн 打牲乌喇城 215
Джаори 贾奥里岬 95
Джунг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准噶尔汗国 180, 187, 189
Доби (Добичэн) 多壁城(多壁城) 216
Добоку 多博库 64, 213
Докэ 多科屯 70, 213, 214

- Доловский острог 多隆堡 130, 131
Доцзинь 多金城 69, 214
Дочэнь 铎陈城 69, 70, 213
Дули 都里屯 213
Дунбэй 见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条
Дунляохэ (Хэйэрсухэ) 东辽河(黑儿苏河) 212
Дунцизи 东京 85
Дунцзя 东佳城 33, 216, 217
Дунцяцзян 佟家江 204
Дунчэн 洞城 217
Дунчэн 见 Ехэчэн 条 45
Дуньо (Дуньэ) 董鄂城(董鄂城) 211
Дуньохэ 见 Хуныцзян 条
Дуньошань 栋鄂山 211
Дуньэ 见 Дуньо 条
Дуньэхэйкулунь 东额黑库伦城 42, 210
Дуншахэ 东沙河 115, 116
Дуньхуа 敦化 211
Дурбог 杜尔伯特 152, 166
Дусунь 都孙屯 70, 213
Дэдур 德笃勒屯 70, 213
Дэлинбай 得冷白 155
Дэнсэтунь 等色屯 141, 142
- «Ежэнь-вэй» “野人卫” 196
Ендонский улус 延顿乌卢斯 98
Ерулусков улус 耶鲁卢斯科夫乌卢斯 98
Ефодлергиево 耶福弗杰尔基耶沃屯 97
Ехэнзинь 额赫沁阴 104
Ехэнзиньхэ 204 (按此条与 Эхэнзиньхэ 条重复——译者)
Ехэйхэ 见 Тунхэ 条
Ехэхэ 见 Тунхэ 条
Ехэчэн (Дунчэн) 叶赫城(东城) 45, 211, 212
Ехэпаньчэн (Сичэн) 叶赫山城(西城) 212
- Желтое море 黄海 66
Жунхэ 溶河 115
-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地区 14, 97, 130, 131, 191
Западно-Корейский залив (Южное море) 西朝鲜湾(南海) 66

- Западный Лаоелин (Иханьшань) 西老爷岭(宜罕山) 38, 215
- Зейское зимовье 结雅冬营 131
- Зяя (Цзинцилицзян) 结雅河(精奇里江) 23, 51, 54, 66, 69, 70, 94, 131—133, 138, 139, 147, 148, 186, 200, 213
- Ивовая граница 见 Ивовый палисад 条
- Ивовый палисад (Ивовая граница, Любянь) 柳寨(柳边) 4, 9, 10, 20, 23, 24, 49, 106, 108, 111, 115, 116, 118, 121, 125, 141, 170, 183, 194
- Игнашино 伊格纳申诺屯 130
- Ильинское 伊利英斯克屯 130
- Илдэнхэ 伊勒登河 33, 216, 217 (按图上为 Иладэнхэ)
- Интай 濛台 142
- Иньдамухэ 音达穆河 217
- Иньдахунь 音达理路 44, 217
- Ингэ 见 Ингэбяньмынь 条
- Ингэбяньмынь 英额边门 205
- Ирмыньхэ 伊尔门河 142
- Итуи (Усу) 伊通(兀苏) 41, 212
- Итунькоу 伊屯口 142, 143
- Итуньмынь 伊屯门 118, 141—143
- Итуньхэ 伊屯河 141, 143
- Иулюйшань 医巫闾山 116, 118
- Иханьалинь (Иханьшань) 宜罕阿麟城(宜罕山城) 38, 215
- Иханьхэ 宜罕河 215
- Иханьшань, г. 见 Иханьалинь 条
- Иханьшань 见 Западный Лаоелин 条
- Ичжоу 义州 85
- Ичэфэн 衣车峰 216
- Кайюань 开原 26, 44, 89, 91, 205, 216
- Кайюаньсянь 开原县 92, 108, 115
- Камлымский улус 卡姆雷姆乌卢斯 98
- Касукин улус 卡苏金乌卢斯 98
- Кирконский улус 基尔康乌卢斯 98
- Киргинское 基尔京屯 97
- Китай (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中国 3, 5, 6, 9, 11, 13, 16—21, 27, 33, 40—42, 44, 45, 47, 73, 78, 85, 86, 88, 97, 98, 103, 104, 106, 112—114, 119, 126, 132, 134, 135, 139, 140, 157, 171, 175, 179, 180, 192, 193, 197, 205, 207
-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中华人民共和国 3, 198
- Комара 见 Кумара 条

- Ко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条
- Корея 朝鲜 26, 33, 45, 47, 54, 55, 57, 64, 103, 104, 108—112, 126, 127, 138, 139, 199, 204, 205
- Корцинь 科尔沁 41, 63, 65, 112, 200
- Куанцзоу 宽州 146
- Куаньдзнь 宽甸 35
- Кубачала 库巴察拉屯 213
- Куби 库比屯 98
- Кудэо 见 Сахалин 条
- Кулумуту 库鲁木图屯 59, 213
- Кумара (Жомара, Хумалихэ, Хумархэ) 呼玛尔河 (库马拉河, 呼马里河, 呼玛尔河) 51, 69, 96, 100, 130, 137, 138, 144, 145, 150, 186, 213
- Ку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Жомарский острог) 呼玛尔堡 (库马拉堡) 96, 97, 99, 100, 130, 207
- Куньдулунь 昆都轮屯 63
- Куркэхэ 库尔喀河 51
- Курханьцзян 见 Муданьцзян 条
- Кэбуцилай 喀布齐费城 212
- Кэнь 克音屯 63, 213
- Кэнтэ 克亦特 45, 212
- Кэркэ 见 Халха 条
- Кэркэму 喀尔喀木屯 213, 214
- Кэшихэ 喀什河 211
-
- Лаличань 喇里喇 69, 213
- Ламск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条
- Лаоелин Западный 见 Западный Лаоелин 条
- Лаочэя 见 Хэтуала 条
- Лафа 拉发 57, 212
- Лена (Лиянацзян) 勒拿河 (里雅那江) 93, 191
- Лицзякоу 栗家口 146
- Лиянацзян 见 Лена 条
- Луитигирское 伦季基尔屯 97
- Лэфучаньхэ 勒福陈河 205
- Любянь 见 Ивовый палисад 条
- Люйшунь 旅顺 89
- Люйяньи 闾阳驿 90
- Лютяобянь 见 Граница ивовых тычин 条
- Люцю 见 Рюкю 条
- Лючжоухэ 六州河 115

Ляньшань 连山 89

Ляодун 辽东 26—28, 32, 33, 37, 40, 44, 45, 51, 62, 85, 87, 107, 112, 193, 196, 217

Ляодун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辽东半岛 40, 115

Ляонин 辽宁 3, 26, 197, 212

Ляоси 江西 45, 85, 87

Ляохэ 辽河 18, 75, 89, 108, 115, 116, 141, 143

Ляоян (Ляоянчжоу, Ляоянфу) 辽阳(辽阳州, 辽阳府) 45, 62, 87, 90, 115, 203

Ляоянчжоу 见 Ляоян 条

Ляоянфу 见 Ляоян 条

Маги улус 马基乌卢斯 98

Макавсков улус 马坎斯科夫乌卢斯 98

Макавское 马坎屯 97

Малая Яхахэ 见 Ацзигэ-яхахэ 条

Малое Гэрдасу (Сяо-Гэрдасу) 小喀里达苏屯(小喀里达苏屯) 213

Маэинский улус 曼津乌卢斯 98

Маньчжоу, владение (Маньчжоу-го) 满洲, 领地(满洲国) 5, 28, 29, 32—38, 42, 44, 46, 47, 54, 57, 111, 198, 200

Маньчжоу-го, империя 满洲国, 帝国 5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империя 见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条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满洲国 5, 11, 15, 19, 21, 22, 24, 34, 40, 44, 45, 54, 57, 62, 67, 73—77, 80—82, 84, 86, 101, 109, 111, 127, 139, 193, 194, 200, 202

Маньчжур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满洲联盟 27, 31—33, 47, 197

Маньчжурия 满洲 3, 73, 111, 193

Маолинь 毛岭 26

Маомингань 茂明安部 64

Мардунь 马儿墩寨 214

Марицкое 马里茨屯 97

Меевский улус 麦廷乌卢斯 98

М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明帝国 18, 26, 29, 43—45, 54, 72, 75, 76, 89, 193, 197, 205

Могженский улус 莫格任乌卢斯 97

Мокэдин 墨克顶 144, 145

Молэгэнь 见 Нуныцзян 条

Монастырщина 修道院屯 130

Монголия 蒙古 20, 21, 71, 82, 111, 112, 145, 189, 202

Моргэнь 见 Нуныцзян 条

Морхуньтунь 澳尔浑屯 154

Морчавинское 莫尔恰文屯 97

Москов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莫斯科国 131

Мошино 莫申诺屯 97

- Мудань 穆丹屯 70, 213
- Муданьцзян (Курханьцзян, Урха, Холохэ, Хурлахэ) 牡丹江 (库尔翰江, 乌尔哈河, 霍洛河, 虎尔哈河) 27, 48, 50, 51, 73, 83, 92, 99, 113, 134, 186, 211
- Муира 穆伊拉屯 98
- Мужден (Фэнтянь, Фэнтяньфу, Шэньцзин, Шэньян) 盛京 (奉天, 奉天府, 盛京, 沈阳) 4, 5, 8, 9, 19, 45, 61, 62, 71, 81, 85—87, 89—93, 97, 105, 106, 108—110, 112, 114—119, 121—124, 126—128, 132, 142, 143, 150, 161, 170, 178, 179, 181, 197, 203, 205
- Мужденский округ (Фэнтяньфу) 奉天府 (奉天府) 205
- Мулинхэ 穆棱河 210, 216
- Мулунь 木伦 39, 210
- Мулусусу 穆鲁苏苏 51
- Мэньгуюй 蒙古峪 211
- Мэргэнь, г. 见 Нуьцзян 条
- На 纳屯 59
- Намдорское 纳姆多尔屯 97
- Намдулу 那木都鲁路 38, 48, 79, 210
- Нанайский район 那乃人地区 95
- Наньгуань 南关 37
- Наньшахэ 南沙河 116
- Натунь 纳屯 213
- Нелбицкое 涅尔比茨屯 97
- Нерча 涅尔查河 97
-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 (尼布楚) 13, 15, 16, 18, 24, 25, 116, 130, 131, 135, 136, 139, 140, 144, 154—157, 163, 168, 170, 173—177, 179, 184—192, 208, 209
- Нерч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涅尔琴斯克堡 97
- Нерчинский уезд 涅尔琴斯克县 173
- Нерчин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涅尔琴斯克督军辖区 130
- Ньербо 尼叶尔伯屯 213
- Нимань 尼满路 55, 210
- Ниманьхэ 尼满河 210
- Нимача 尼满察路 38, 79, 210
- Нингута, г. 宁古塔城 4, 8—10, 17, 19, 22, 50, 52, 55—57, 65, 85—89, 91—93, 99—102, 104, 107, 112, 113, 115—118, 120—128, 136—138, 143—145, 149—151, 153, 171, 175, 178, 186, 194, 198, 199, 202—206, 210
- Нингута, местность 宁古塔路 38, 48, 79, 210
- Нинъань 宁安 17, 210, 211
- Нинъюань 宁远 85, 89, 90, 147
- Нинъянчжоу 宁阳州 115 (按应为宁远州——译者)

- Ноло 诺罗路 44, 217
Нолохэ 诺罗河 217
Нолэй 诺雷路 210
Ноницян 见 Нуныцян 条
Нонни 见 Нуныцян 条
Ноныцян 见 Нуныцян 条
Нора 诺拉 98
Норгэр 诺尔噶勒屯 213
Нуминь 努名 190
Нуныцян, г. (Моргэнь, Молэгэнь, Мэргэнь) 嫩江城(墨尔根城, 墨尔根城, 墨尔根城) 113, 118, 120, 137, 170—173, 176, 177, 181
Нуныцян, р. (Ноницян, Нонни, Ноныцян) 嫩江(诺尼江, 诺尼江, 嫩江) 52, 54, 73, 99, 111, 113—116, 118, 119, 170, 186, 194, 214
Нэйхэ 内河城 36, 210
Нэнцир (Нэнцилэгунь) 能吉勒屯 213
Нэнцилэгунь, селение 见 Нэнцир 条
Нюйэрхэ 女儿河 115
Нюмань 见 Буря 条
Нючжуан 牛庄 85, 89, 115
Нянмуянкхэ 娘木娘库河 204
- Одоли 鄂朵里 197
Озерная 奥泽尔纳亚屯 130
Онон (Вонаньхэ) 鄂嫩河(斡难河) 76
Ордо 鄂尔多峰 32, 33
Орхунь 鄂尔浑屯 213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Ламское море,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喇嘛海, 北海) 65, 76, 94, 112, 154, 201
- Паново 帕诺沃屯 130
Паньшань 盘山驿 90
Пекин (Бэйпин) 北京(北平) 17, 73, 85, 89, 91, 93, 98, 101—105, 122, 128, 149, 150, 154, 157, 162, 174, 187—189, 203, 204
Пянгухэ 平武河 213
Погадаева 波加达耶瓦屯 130
Покровская 波克罗夫斯卡娅村 130
Приамурье (Даурская земля) 阿穆尔沿岸地区(达斡尔地区) 3, 6, 10—14, 18, 20, 21, 24, 25, 27, 52, 53, 67, 70, 77, 81, 82, 85, 93—99, 101—103, 106, 107, 113, 114, 116, 121, 122, 129—131, 134, 135, 137, 139, 141, 143, 145, 148, 151, 153, 157, 159, 161, 162, 166, 167, 170—172, 179, 181—185, 194, 195, 199—201, 204, 206

Прибайкалье 贝加尔沿岸地区 97
Приморье 滨海地区 6, 11, 12, 20, 77, 193

Россия 见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条

Рус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Россия) 俄罗斯国(俄国) 3, 11, 13, 14, 17—19, 21, 23—25, 52, 66, 99, 100, 102, 103, 106, 110, 114, 117, 131, 132, 134, 135, 139, 140, 150, 159, 162, 163, 165, 167, 172, 173, 176, 180, 182, 183, 185, 186, 188—190, 192, 194, 195, 198, 204, 205, 207, 208

Рухцамасков улус 鲁赫查米斯科夫乌卢斯 48

Рюкю (Люцю) 琉球 127

Сайбуци 塞布奇屯 63, 213, 214

Сайиньяэиньхэ 赛因纳因河 204

Саймукэлэ 塞木克勒路 210

Сайчжулуьхэ 塞朱伦河 34, 214

Сали 萨里屯 213

Саньдаогоу 三道沟 204

Саньсин, местность 三姓路 83

Саньсин, г. 三姓城 50, 83, 118, 203, 213

Саньтуьхэ 三屯河 216

Саньчэхэ, г. 三岔河城 89

Саньчэхэ, р. 三岔河 90

Сарху 撒尔湖城 215

Сархухэ 撒尔浒河 215

Сахалин (Куэдао) 萨哈林(库页岛) 94, 112, 119

Сахалинь 见 Амур 条

Сахалиньхэ 见 Амур 条

Сахалинь-ула 见 Амур 条

Сахарча 萨哈尔察 68, 80, 201, 202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ьчжурия 北满 20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北海” 66

Северное море 见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条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华北 26, 45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见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条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东北海 75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ый Китай (Дунбэй,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КНР) 中国东北(东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 3, 4, 6, 8—13, 17—20, 22—24, 26, 27, 29, 33, 44, 45, 47, 52—54, 75, 76, 84—88, 91, 96, 103, 105—108, 110, 112, 114, 119, 125, 136, 137, 143, 146, 170, 179, 183, 193—195, 197, 199, 202, 203, 205, 214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е море 西北海 75, 76, 135

- Селемджа 西林穆迪河 43
- Селемджинский острог 西林穆迪斯克堡 130, 131
-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208
-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11, 12, 14, 24, 25, 66, 140, 163, 206
- Сикэташань 见 Сихотэ-Алинь 条
- Силасинь 石拉忻 44, 217
- Силасиньхэ 石拉忻河 217
- Силинь 西临路 42, 211
- Силинь, р. 西临河 211
- Сингайху 见 Ханка 条
- Синли 杏岭 33
- Синцзин 见 Сивьбинь 条
- Сившань 杏山 89
- Сивьбинь (Синцзин) 新宾(兴京) 19, 85, 89, 91, 107, 115, 179, 197, 203, 205, 212, 215
- Синьянь 见 Синьяньли 条
- Синьяньлинб(Синьянь, Хинга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兴安岭(兴安岭, 兴安岭) 137, 192
- Синьчэн 新城 85
- Сихотэ-Алинь (Сикэташань) 锡霍特岭(希喀特山) 108—110, 204, 205
- Сичэн 见 Ехэшаньчэн 条 212
- Солдатово 士兵屯 130
- Сорко 索尔扩 146
- Соудэн 叟登 146
- Соудэнхэ 叟登河 216
- Спаский монастырь 斯巴斯基修道院 130
- Среди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见 Китай 条
- СССР 苏联 13
- 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 (Вайсиньяньлин) 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 43, 54, 112
- Суань, м. 苏完地方 214
- Суйфунь 绥芬河 48, 53, 73, 210, 211
- Суйфэнь 绥芬路 38, 79, 210, 211
- Суйха 绥哈城 216
- Суйхахэ 绥哈河 216
- Суксухухэ 见 Суцзыхэ 条
- Сунгари (Сунгари-ула, Сунгэли, Сунхуацзян, Суньали, Улахэ, Улацзян, Шингал) 松花江(松加里乌拉, 松鸣里, 松花江, 松阿里, 乌拉河, 乌拉江, 松加里) 15, 22, 27, 39, 46, 48, 50—52, 59, 61, 65, 73, 75, 83, 93, 97—101, 105, 113, 114, 116—119, 123, 125, 134, 137, 141—143, 168, 182, 183, 186, 194, 199—202, 204, 206, 212—215

Сунгари-ула 见 Сунгари 条
Сунгэли 见 Сунгари 条
Сунхуацзян 见 Сунгари 条
Суншань 松山 89
Суншаньпуфэн 松山堡峰 216
Сунъали, местность 松阿里地方 59
Сунъали 见 Сунгари 条
Суньчжатай 孙扎寨城 40, 215
Суцзыхэ (Суксухухэ) 苏子河(苏克苏浒河) 29, 32, 33, 146, 214, 215, 217
Сюньяо 熊岳(雄耀) 85
Сюньяо 熊岛 24
Сюянь 岫岩 85
Сяо-Гэрдасу 见 Малое Гэрдасу 条
Сяолинхэ 小凌河 115
Сяо-Сяньлинь, хр. 见 Хинган Большой хребет 条

Тайвань 台湾 161
Тайцзыхэ 太子河 115, 146
Такулала 塔库拉路 44, 198, 217
Танхэ 汤河 115
Татарский пролив 鞑靼海峡 51, 65, 120
Ташань 塔山 89
Телин 铁岭 44, 90, 203, 216
Телинсянь 铁岭县 92, 108, 115
Тихий океан 太平洋 94, 110
Томохэ 托漠河城 32, 216, 217
Томь 托姆河 43, 200, 213
Тосиньхэ 托忻河 216
Тронцкое 特罗伊次屯 95
Тулунь 图伦 32, 197, 214, 215
Тумалинский улус 图马林乌卢斯 98
Тумот 土默特 41, 112
Тумыньцзян (Айхуцзян) 图们江(爱淖江) 48, 66, 105, 204, 205, 211
Туяхэ (Ехэйхэ, Ехэхэ) 通河(叶黑河, 叶赫河) 41, 211, 212
Тунчжоу 通州 142
Туньсэцинь 屯色沁 188 (按俄作者将“屯[兵][于]色沁”误为地名)
Тухурчань 图呼尔阑屯 213

Уда 乌第河 110
Уиньтунь, Уинь 乌音屯 59, 213

- Уксин улус 乌克辛乌卢斯 97
Укур 乌库尔城 69, 214
Укурхэ 乌库尔河 214
Укшиминское 乌克希明屯 97
Ула, г. 乌拉城 215
Ула 见 Гирин 条
Ула-Гирин 见 Гирин 条
Улайбудин 兀赖布丁屯 69, 214
Улакэ 乌尔塔屯(兀喇喀屯) 70, 213, 214
Улань 吴蓝屯 63
Уланьхайлунь 乌兰海伦屯 69, 214
Улахэ 见 Сунгари 条
Улацзян 见 Сунгари 条
Улачэн 见 Гирин 条
Улинево 乌利耶沃屯 97
Улин, Улиншань 五岭山 32, 212
Улунакэ 兀鲁纳克 69 (按应为兀木纳克——译者)
Улунцзян 乌龙江 102
Улусу 乌鲁苏屯 51, 63, 65, 69, 201, 214
Улусумуданьчэн 乌鲁苏穆丹城 214
Улья 乌利亚河 94
Уми 乌米屯 98
Умунакэ 乌木内克屯 214
Ургучэнь 乌拉古宸路 39, 211
Урка 见 Уркан 条
Уркан (Урка) 乌尔坎河(乌尔卡河) 95
Урка 见 Муданьцзян 条
Урцзи 乌尔吉路 210
Урцзянхэ 兀尔简河 43, 213
Уснoв 乌斯诺夫屯 97
Уссури (Усулицзян, Ушур) 乌苏里江(乌苏里江, 乌苏里江) 22, 48, 50—52, 73, 95, 97, 98, 114, 119, 120, 125, 194, 206, 210, 216, 217
Усть-Стрелочный острог 乌斯特·斯特烈耳卡堡 97, 130
Усть-Улья 乌斯特·乌利亚 94
Усу 见 Итун 条
Усулицзян 见 Уссури 条
Учжала 乌扎拉屯 50, 54, 55, 73, 79, 100, 137, 216
Учжумуцзянь 乌珠穆秦 145, 146
Ушур 见 Уссури 条

Факумынь (Факу) 法库门(法库) 71, 111, 202
Фанский улус 凡乌卢斯 98
Фатэха 法特哈 107, 113, 118, 205
Фендерский улус 芬杰尔乌卢斯 98
Фодолокунь 佛多罗袞寨 43, 213
Фодохэ 佛多和 36
Фодохэхэ 佛多和河 36, 211, 212, 214
Фодохэшань 佛多和山 212
Фонэхэтокэсо 佛讷赫托克索路 38, 211
Фулив 福陵 116, 203
Фурха 伏尔哈城 40, 215
Футнев улус 富季耶夫乌卢斯 97
Футися 福提希屯 214
Фуцзянь 福建 136, 160, 166
Фуцзярци 富家儿齐寨 216
Фучжоу 复州 89
Фушунь 抚顺 26, 29, 52, 90, 91, 193, 203, 217
Фэйю 蜚悠城 38, 210
Фэнтянь 见 Мукден 条
Фэнтяньфу 见 Мукден 条
Фэнтяньфу 见 Мукденский округ 条
Фэнхуан (Фэнхуанчэн) 凤凰城(凤凰城) 85, 89, 90, 115
Фэнхуаншань 凤凰山 107, 116

Хада 见 Хадасиньчэн 条
Хадасиньчэн (Хада, Хадачэн, Хада-Новый город) 哈达新城 37, 210, 216
Хадахэ 见 Цинхэ 条
Хадацзючэн (Хада-Старый город) 哈达旧城 216
Хадашичэн (Хада-Каменный город) 哈达石城 216
Хайланьхэ (Хайлань) 海兰河(海兰河) 199, 211
Хайлар 见 Хулуь-буир 条
Хайлуь 海伦屯 63, 214
Хайси 海西 26, 27, 37, 41, 193
«Хайси-вэй» “海西卫” 196
Хайчжоу 海州 85
Хайчэн 海城 87, 90
Хайчэнсянь 海城县 115
Халгиево 哈尔基耶沃屯 97
Халха (Кэркэ) 哈尔喀(喀尔喀) 68, 112, 156, 180, 187
Ханка (Синкайху) 兴凯湖(兴凯湖) 119, 210

- Ханцзялу 杭甲路 33, 216
Харшань 哈尔滨 146
Хинган, Большой хребет (Сяо-Синьяньлин) 兴安岭, 大岭 (小兴安岭) 51
Хинганский хребет 见 Синьяньлин 条
Хойкэ 辉克地方 212
Хойфасячэн 辉发下城 216
Хойфафэн 辉发峰 216
Хойфахэ 辉发河 38
Хойфахэчэн 辉发河城 216
Хойфачэн 辉发城 38, 216
Холохэ 见 Муданьцзян 条
Хотунский улус 霍通乌卢斯 97
Хоусо 后所 89
Хуабочунь 花宝村 211
Хуангудао 黄骨岛 89
Хуаннива 黄泥洼 89
Хуе 津野路 38, 211
Хулань 呼兰 113
Хуланьфэн 呼兰峰 211
Хулунь 扈伦 37, 41
Хулуньбуир (Хайлар) 呼伦贝尔 (海拉尔) 113, 214
Хулунь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扈伦联盟 27, 35, 37, 40, 41, 44, 46, 47
Хумалихэ 见 Кумара 条
Хумар 呼玛尔城 51
Хумархэ 见 Кумара 条
Хунлошань 红螺山 116
Хунцзуй 红嘴 89
Хуньтунцзян 混同江 50, 65, 113, 115, 118, 119, 204, 205
Хуньхэ 浑河 29, 32, 33, 115, 146, 206, 215—217
Хуньцзян (Дуньохэ) 浑江 (董鄂河) 33, 211
Хуньчунь, г. 琿春城 210, 211
Хуньчунь, р. 琿春河 210
Хурха 呼尔哈路 39, 46, 50
Хурхахэ 见 Муданьцзян 条
Хурцишань 扈尔奇山 216
Хэдунь 何敦城 212
Хэйлуунцзян, местность 黑龙江地方 18, 23, 50, 58, 59, 61—64, 66—68, 72, 74, 76, 80, 81, 83, 87, 100, 117, 118, 120, 136, 149, 150, 159—162, 164—168, 170—173, 178, 179, 181, 182, 197, 199, 200, 202, 203, 207
Хэйлуунцзян, р. 见 Амур 条

Хэйлуницзян, провинция КНР 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 3, 4, 8, 10, 18, 23, , 50
113, 116, 117, 119, 193—195, 198, 203
Хэйлуницзявчэн 见 Айхунь 条
Хэйцзыгэ 黑济革城 215
Хэйэрсу 黑儿苏城 113, 205, 212
Хэйэрсухэ 见 Дуяляохэ 条
Хэнань 河南 160, 161
Хэигунь 见 Амгунь 条
Хэнкунь 见 Амгунь 条
Хэсихэй 赫席黑路 38, 211
Хэгуала (Лаочэн) 赫图阿拉城(老城) 29, 197, 212, 214
Хэгуала, долягна 赫图阿拉山谷 29
Хэшихэтунь 赫什赫屯 211

Цзефань 界藩城 146, 215, 217
Цзиданга 吉当阿城 212
Цзилян 见 Гирин 条
Цзилян-ула 见 Гирин 条
Цзилянфэн 吉林峰 216
Цзилянчэн 见 Гирин 条
Цзинбоху 镜泊湖 211
Цзинцилицзян 见 Зея 条
Цзиньэньфолочжань 景恩佛勒站 215
Цзянь, империя 金帝国 28
Цзиньчжоу, креп. 金州城堡 40, 215
Цзиньчжоу, г. 金州, 锦州 85, 89—91, 115, 118, 147, 205 (俄作者把金州、锦州两个地名列为一个条目——译者)
Цзиньсянь 锦县 91
Цзюгунтай 九宫台 108, 205
Цзюйлюэхэ 巨流河 142, 143, 147
Цзябань 甲版城 32, 217
Цзямуху 嘉木湖寨 215
Цзяньчжоу 建州 26—29, 36, 52, 107, 111, 193, 198, 199
Цзяньчжоу-вэй (округ Цзяньчжоу) 建州卫(建州卫) 26, 33
Цилотай 齐洛台地方 71, 214
Цинская империя (Цин, Цин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империя)
清帝国(清国, 满洲帝国) 3—6, 8—11, 13, 16, 17, 19, 20, 22—25, 52, 53, 75—
77, 81, 82, 91, 92, 101, 103—117, 119, 122, 124—126, 128—130, 134, 135, 139, 141,
143, 147, 156, 163, 172, 176, 180, 183—186, 188—195, 197—199, 204, 205, 207, 208
Цинхэ (Далинхэ, Хадахэ) 清河(大凌河, 哈达河) 33, 37, 115, 210, 216

- Цифу 畿辅 108, 204
Цицида 齐吉达城 211
Цицикар (Цицихар) 齐齐哈尔(齐齐哈尔) 52, 113, 118, 120, 197, 203
Цицихар 见 Цицикар 条
Цяньвэй 前卫 89
Цяньшань 千山 118
- Чагда 恰格达屯 98
Чайхэ, селение 柴河寨 216
Чайхэ, р. 柴河 37, 216
Чакэдань 查克丹 175, 181, 188
Чанбошань (Белые горы, Чанпэксан) 长白山(长白山, 长白山) 28, 36, 65, 75, 103—105, 109, 117, 118, 193, 197, 198, 204, 205, 212
Чанбошань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 长白山联盟 27, 34, 35
Чанпэксан 见 Чанбошань 条
Чахар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察哈尔汗国 45, 54
Чжакумулу 扎库木路 33, 217
Чжакуга 扎库塔城 39, 48, 211
Чжакэ 扎喀城 215
Чжакэгуань 扎喀关 214, 215
Чжалайтэ 扎赖特 166
Чжангуанцайлин 张广才岭 38
Чжанчэн 张城 212
Чжаньхай 粘海寨 212 (按应为粘罕寨——译者)
Чжаньхань 粘罕 45
Чжаньхэ 沾河寨 215
Чжаоцзя 兆佳城 33, 216, 217
Чжили 直隶 160, 161
Чжуан 庄屯 101
Чжунцяньсо 中前所 89
Чжэньцзян (Чжэньцзянчэн) 镇江城 89, 205
Чжэсуньхэ 哲松额河 215
Чокучань 绰库禅屯 213
Чол (Чорхэ) 绰尔河 214
Чолтурский улус 乔尔图尔乌卢斯 98
Чормынь 绰尔门地方 59, 214
Чорхэ 见 Чол 条
Чуаньчан 见 Гирин 条
Чэндэсянь 承德县 92

- Шалинь 沙岭 116
Шантарские острова 善塔尔群岛 94, 110
Шанъянпу 尚阳堡 203
Шаньдун 山东 26, 160, 161, 165, 179
Шаньмучан 杉木厂 146
Шаньси 山西 160, 161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 (Шаньхайгуаньская застава) 山海关(山海关) 26, 73, 85, 89, 106, 108, 112, 114, 115, 129, 179, 205
Шаньчалу 山察堡 211
Шаньчэи 山城 217
Шаолинь 昭陵 116
Шара-Мурэнь 萨拉-穆连河 75
Шахэ 沙河 89
Шацзи 沙济城 197, 215
Шербадаев улус 舍尔巴达耶夫乌卢斯 97
Шилка 石勒喀河 67, 97, 130, 189
Шингал 见 Сунгаря 条
Шингалова 申加洛瓦屯 130
Шишаньчжань 拾山站 90
Шукэтэку 庶克特库屯 213, 214 (按应为邁克特库屯——译者)
Шэнцзин 见 Мукден 条
Шэньян 见 Мукден 条
- Ыркуяское 伊尔贡屯 97
Ылגיעво 伊尔基耶沃屯 97
- Элигуна (Элигуно) 见 Аргунь 条
Элэ 见 Элэюэсо 条
Элэгэхэ 额莱格河 214
Элэюэсо (Элэ) 厄勒约索地方(厄勒约索地方) 73, 210
Эмохэсолочжань (Эмохэсулу, Эмохэчжань) 额默和索罗站(俄渣和苏鲁路, 俄渣和站) 38, 205, 211
Эмохэсулу 见 Эмохэсолочжань 条
Эмохэчжань 见 Эмохэсолочжань 条
Эрдэмур 额尔德木尔 67, 214
Эрту 额尔图屯. 70, 71, 213, 214
Эрхунь 额尔浑城 33, 197, 217
Эсули 额苏里 51, 63, 67, 71, 136, 145, 147—149, 154, 158, 165, 166, 206
Этици 额提奇屯(幹齐奇屯) 213, 214
Эхань 俄汉城 215

Эхэ, р. 娥河 141

Эхэ 见 Эхэйкулунь 条

Эхэйкулунь (Эхэ) 额黑库伦(额黑库伦) 73

Эхэнзинь 额赫纳音河 212

Эхэнзиньхэ 额赫纳音河 36, 204, 212

Эцэтай 俄及岱城 212

Юаньтайхэ 渊台河 115

Юж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蒙古南部 26

Южное море 见 Западно-Корейский залив 条

Юйшань 于山 116

Юйэргэнь 裕尔根屯 63, 213, 214

Юнлинь 永陵 116, 203

Юнцзичжоу 见 Гирин 条

Юркунское 尤尔孔屯 97

Югуньвэй 右屯卫 90

Яблоновый хребет 雅布洛诺夫山脊 112

Ягуский улус 雅古乌卢斯 97

Якса, г. 雅克萨城 17, 69, 73, 201, 213, 214

«Якса» 见 Албази 条

Якутия 雅库特 131

Якутск (Якутский острог) 雅库次克(雅库次克堡) 94, 139, 163, 164, 208

Якут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雅库次克地区 176

Якутский острог 见 Якутск 条

Якутское воеводство 雅库次克督军辖区 131, 204

Ялань, местность 雅攏路 42

Ялань (Яланьхэ), р. 雅兰河 211

Ялуцзян (Амноккан) 鸭绿江(阿姆诺坎) 26, 35, 65, 89, 105, 204

Янцзихэ 扬即河 116

Яншэнмухэ 杨桎木河 115

Яньчжу 耶朱屯 199, 212

Яочжоу 耀州 85 (俄文原书索引误写为 Яочжо——译者)

Япония 日本 5

Японские острова 日本列岛 110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Восточное море) 日本海(东海) 15, 28, 42, 43, 46, 50, 53, 56, 64—66, 76, 108, 109, 114, 119, 198, 199, 202, 204, 205, 211

Яргу 雅尔古寨 211

Яха 呀哈城 212